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名人演讲经典



世界名人

【古希腊】吕西阿斯（前 450 ~ 前 380）

吕西阿斯，古希腊演说家。公元前 404 年，雅典寡头派的“三十僭主”政府没收他家财产，处死他的兄长。次年，民主制度恢复，他控告三十僭主中的忒翁涅托斯辞，即本文最负盛名。

控告忒翁涅托斯辞

诸位陪审员，我认为我不至于找不到证人，因为我看见你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前次在场的陪审员，当时吕西透斯控告忒翁涅托斯在抛弃武器之后没有资格再向人民发表演说而他却公然发表了演说。在那次的诉讼中，忒翁涅托斯还控告我杀死了我自己的父亲。他若是控告我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我倒可以饶恕他信口开河，认为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不值半文钱。即使我听见他把别的禁止说的词儿加在我身上，我也不至于对他起诉，因为我认为为了受诽谤而诉诸法律未免气量狭窄，太爱打官司了。但是目前的案件涉及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应该受到你们和城邦的尊重的——我如果不对说这句话的人进行报复，就会感到羞耻。我很想从你们这里知道，到底是他要受惩罚呢，还是只有他一个雅典人能够违反法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的年龄，诸位陪审员，是 33 岁；而从你们回到城里的时候算起，现在是第二十个年头了。由此可见，我父亲被三十独裁者处死的时候，我才 13 岁。在那个年龄里，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寡头派，也没有能力洗刷我父亲的冤屈。此外，我也没有真正为了金钱而谋害父亲的动机，因为是我的长兄潘塔勒昂拿走了全部家产，成为我们弟兄的监护人，剥夺了我们的财产继承权，所以，诸位陪审员，我是有许多理由希望我父亲活下来的。此刻，尽管我必须提起这些理由，但是不必多去细说，因为你们全都知道我说的是事实。然而我还是要为证明这些事实而请来一些见证人。

[几个见证人出庭作证]

也许，诸位陪审员，他不会就这些事实进行答辩，而是也向你们陈述，他曾厚颜无耻地向仲裁人这样陈述，控告某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不算使用了那种禁止说的词儿，因为法律并不禁止人使用“杀死”这个词儿，而只是禁止说“杀人凶手”。我认为，诸位陪审员，你们所争议的不会是字眼，而是字眼的含义。你们都知道，杀过人的是杀人凶手，杀人凶手是杀过人的。要求立法者写出所有具有同一意义的字眼，那就太费事了；他只是提起其中一个以示全部字眼的意义。忒翁涅托斯，如果有人说是“打父者”或“打母者”，你一定希望他败诉，赔偿你所受的损害，那么，如果有人说你出手打了你的生父或你的生母，你决不会认为，他既然没有使用那种禁止说的词儿，当然可以不受惩罚。我高兴听你说说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行动和言论都是既高明而又熟练的，——如果有人说你扔下了盾牌（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若有人断言其人抛弃盾牌，则付审判”），难道你就不控告他吗？如果有人说你扔下了盾牌，只因为“扔下”和“抛弃”不是一码事，你就会感到满意而不加理睬吗？倘若你身为十一位司法官之一，如果有人把一个犯人押来，控告那人“脱去了他的外衣”或者“剥去了他的衬衣”，

你会不受理，而根据同一条法则，认为他并没有被称为“偷衣者”，就把他释放吗？如果有人因拐卖儿童而被捉住，你会说他不是“拐卖人口者”！只因为你是字眼上争论，而并不顾及他的行动，但是人人都是按照行动而制定词儿的。诸位陪审员，请你们考虑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人由于懒惰成性、萎靡不振，从未上过战神山，——你们全都知道了，在那个地方，当法庭审判杀人案的时候，两造是不使用这个字眼来起誓的，而是使用那个被用来诽谤我的字眼，原告发誓说对方杀了人，被告则发誓说他没有杀人。那么，把那个由于原告发誓说被告杀了人而被称为“杀人凶手”的行动者无罪释放了，岂不是奇怪吗？难道这个和这人所说的有什么区别吗？（向忒翁涅托斯）你曾经控告吕西透斯诽谤你，因为他说你扔下了盾牌。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提起“扔下”这个词儿：然而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抛弃了盾牌，就得罚他五百块德拉克马。当你对仇人的诽谤进行报复的时候，你是像我现在这样理解法律的意义，而当你违反法律诽谤别人的时候，你却可以不受惩罚，这不是奇怪吗？你到底是认为你聪明绝顶能够随心所欲地利用法律呢，还是认为你无比强大，使那些被你伤害的人无法进行报复？你不觉得羞耻吗？你愚蠢到这个地步，不问你对城邦有何贡献，只是利用你的未受惩罚的罪行为自己自谋利益。请为我宣读这条法律。

[宣读法律]

诸位陪审员，我认为你们全都看出了我的陈述是正确的，而这人却是这样愚蠢，不能领会上面说的话。因为我想引用其他的法律来开导他，使他现在在这个高位上受到一点教育，从今以后不再给我们找麻烦。请为我宣读梭伦的古老的法律。

[宣读法律]

“须处以五日足枷，若法庭加此。”

所谓“足枷”，忒翁涅托斯，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处以木头”。所以，如果有人受了枷刑，而在刑满出来之后，在十一位司法官受审查的时候，控告他们不是用“足枷”而是用“木头”把他枷了起来，他们不会认为他是个白痴吗？请宣读另一条法律。

“其人须凭阿波罗起誓，交保证金。如对审判有所畏惧，容其出亡。”

所谓“起誓”，就是“赌咒”；所谓“出亡”，就是我们所说的“逃走”。

“小偷入室，任何人可逐出。”

所谓“逐出”，就是“拒之于门外”。

“金钱可按放款人选择之比率放出。”

所谓“放出”，好朋友，并不是“放在天平盘上”，而是按放款人选择的数字收取利息。

请宣读这条法律的最后一句。

“所有当众来往的妇女。”

还有：

“伤害家庭，赔偿加倍。”

请注意！所谓“当众”，就是“公开地”。所谓“来往”，就是“走动”。所谓“家庭”，就是“仆人”。

这种字眼，诸位陪审员，还有许多别的。只要他不是个冥顽不灵的人，

我认为他会理解，当今的事情还是和古时的一样，只不过有时候我们不像从前那样使用同样的词儿罢了。他也会这样表示，因为他将默默无言地离开座位而去。如若不然，诸位陪审员，我请你们公正地投票判决，要考虑到被说成“杀父的凶手”，和“抛弃盾牌”比起来，是大得多的过失。我宁可抛弃所有的盾牌，也不甘心想到这种有关我父亲的事情。

这人上次被控告时，他所受的灾难是比较小的，却不仅得到你们的怜悯，而且导致那个见证人被褫夺公民权。但是我曾亲眼看见他做过那件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自己虽然保全了我的盾牌，却被控犯有伤天害理、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果他无罪获释，我的灾难将是弥天大罪；如果他被判有诽谤罪，他的灾难则是微不足道的。难道我不该要他赔偿吗？你们对我有什么谴责呢？是我被正当地控告吗？不，你们自己也不会这样说。是被告为人比我更好，出身更高贵吗？不，他本人也不能这样宣称。是我在抛弃了武器之后控告那个保全了自己的武器的人诽谤我吗？这不是城里流传的故事。请你们记住，你们曾经赠送他一件有分量的珍贵礼物，那一次准不怜悯狄俄倪西俄斯遭受的灾难？他在危险中表现得最英勇不过，当他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说，那是我们进行的最不幸的战役，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阵亡了，而那些保全了自己的武器的人却因伪誓罪被那些抛弃了自己的武器的人在法庭上击败了。他还说，最好是让他死于战斗，胜于活着回家遭受这样的命运。你们不要怜悯忒翁涅托斯受到他应受的辱骂，也不要原谅他违反法律的残暴言行。我已经遭受这种涉及我父亲的可耻的控告，还有什么更大的灾难会落到我头上呢？我父亲曾多次担任将军，和你们一起多次出死人生，他从未落到敌人手里，从未在受审查的时候被他的同邦人定罪。他在67岁的时候由于对你们的人民表示忠诚而死于寡头政府的淫威之下。难道我不应该对说这种话的人表示愤慨，不应该拯救我的陷入这种诽谤的父亲吗？他死于敌人之手，还遭受被他的孩子们谋杀的骂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他苦恼的命运呢？直到如今，诸位陪审员，象征他的英勇的纪念品依然悬挂在你们的庙上，而象征这人和他父亲的卑鄙的纪念品则是悬挂在敌人的庙上的，他们的怯懦是这样根深蒂固的。真的，诸位陪审员，那些外表更高大、更有生气的人更应该惹人气愤。因为很明显，尽管他们的身体是强壮的，他们的灵魂却是邪恶的。

我听说，诸位陪审员，这人求助于这样的遁词，说他是在气愤之下针对我提出的和狄俄倪西俄斯的相同的见证而发出这样的言论的。但是，诸位陪审员，你们要考虑到立法者并不认为忿怒是情有可原的，立法者惩罚这种发言者，要是他不能证明他说的是真话。我已经两次针对这人提出见证，因为我还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罚过那些目击者，原谅过那些抛弃了盾牌的人。

我不知道这些论点是不是还须再加论述。我请求你们对忒翁涅托斯投定罪票，你们要考虑到，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件案子更为严重的诉讼。我现在虽然是控告他有诽谤罪，但是这次的投票判决却涉及我被控告有杀父之罪，我曾独自一人，在刚刚接受检阅之后，就在战神山上控告三十独裁者。请你们记住这些论证，拯救我和我的父亲，维护既定的法律和你们发过的誓言。

【古雅典】伯里克利（前 495 ~ 前 429）

伯里克利，古雅典政治家，战略家。受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民主思想的影响，推崇奴隶主民主政治。公元前 444 年当选将军，连续十五年执掌军权，成为雅典的实际统治者。这是他在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牺牲者葬礼上的演说。

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

.....

我们的宪法不抄袭邻国的宪法。我们不模仿别人，相反，却是别人的典范。我们的政府为大多数人而不为少数人谋利，这就是它被称为民主政体的原因。法律方面，所有个别情况不同的人都得到同样的公平对待。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公众生活中获得擢升的人均具真才实学而非徒负虚名。有才干的人不容受其所属阶级影响；贫穷亦不至阻挡其前进道路。能为国家服务的人不因出身低微而受困阻。我们在政府工作中享受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也可得到。我们绝不因嫉妒而互相监视，不因邻人做自己喜欢的事而生气，甚至不喜欢常常脸露不豫之色。因此这种脸色虽无实际惩罚作用，却着实令人反感。我们与人交往随和，但不会因此成为目无法纪的公民。正是畏惧流于目无法纪的心理，成为捍卫我们法律的主要保障，教导我们服从行政机构和法律。我们恪守保护受害人的法律，不论其是否明载于法典。即便这类法律不成文，违反者必定蒙受耻辱。

此外，我们提供多种方法，使人在从事纷繁的事务后得到休息，头脑清新。我们终年举行娱乐活动及祭神典礼。优雅的住宅成为我们日常欢愉生活的泉源，驱散我们的忧闷。我们规模宏大的城市吸引世界各国将产品运入我们的港口，让我雅典人得以经常享用其他各国及本国的产品。

我们的军事政策也同敌人的不同。我们的城市向世界敞开大门。虽然敌人或会因我们自由开放而进行窥探得益，我们从不订出排外法令，阻止外国人到此学习和观察。相对来说，我们不大依靠政策制度，反而较为信赖我们公民天生的爱国精神。在教育方面，我们的对手以严酷的纪律自小训练公民英勇精神，而我雅典公民则完全随意而生活，却同样能随时面对任何真正危险。为证明此事实，请注意，斯巴达人侵略我国时，动辄与所有同盟者联合，不敢单独前来。而我雅典人进入邻国国土时，不需别人支援。我们在国外打仗，往往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保卫自己家园的异国人。我们不用整支部队对外克敌，因为我们既要守护海上，又要派遣公民在陆地执行上百种不同勤务。如此看来，无论敌人在何处遭遇我方武装力量分队，战胜我们的分队可扩大视为战胜我们的国家，相反，如若失败，便等于败在我们全体人民之手。然而，尽管我们习惯于安闲而不惯劳苦，我们的勇气来自天生而非训练所得，我们仍然愿意面向危险。我们具有双重有利条件：既可免于事先受严格训练之苦，又在需要时，能够同经常警戒的人一样，无畏地迎接艰险。

【古希腊】苏格拉底（前 469 ~ 前 399）

苏格拉底，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没有著作传世。本文引自柏拉图对话录。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著有《理想国》、《法律篇》等。

临终辨词

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来思考死亡，就会发觉有绝大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形中之一：或者是完全无知觉的虚无状态；或是大家常说的一套，是灵魂经历变化，由这个世界移居到另一世界。倘若你认为死后并无知觉，犹如无梦相扰的安眠，那么死亡真是无可形容的得益了。如果某人要把安恬无梦的一夜同一生中的其他日子相比，看有多少日夜比这一夜更美妙愉快，我想他说不出有多少天。不要说是平民，就是显赫的帝王也如此。如果这就是死亡的本质，那么死亡真是一种得益，因为这样看来，永恒不过是一夜。倘若死亡一如大家常说那样，只是迁居到另一聚居了所有死去的人的世界，那么，我的诸位朋友、法官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来得更美妙呢？假若这游历者到达地下世界时，摆脱了尘世的判官，却在这里见到真纯正直的法官迈诺、拉达门塞斯、埃阿科斯、特立普托里玛斯，以及一生公正的神的诸子，那么这历程就确实值得一行了。如果可以同俄耳甫斯、缪萨尤斯、赫西奥德、荷马相互交谈，谁不愿意舍弃一切？要是死亡真是这样，我愿意一死再死。我愿碰到帕拉默底斯、蒂拉蒙的儿子埃杰克斯以及受不公平审判而死的古代英雄，和他们交谈。我相信互相比较我们所受的苦难会是件快事。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像在这个世界一样，在那新世界里继续探求事物的真伪。我可以认清谁是真正的才智之士，谁只是假装聪明。法官们啊，谁不愿舍弃一切，以换取研究远证特洛伊的伟大领袖、奥德修斯、西普法斯和无数其他的男男女女的机会！同他们交谈，向他们请教，其乐无穷！在那个世界里，绝不会有人因提出问题而获死罪！如果传说属实，住在那里的人除了比我们快乐之外、还会永生不死。

法官们啊，不要为死亡而感到丧气吧。要知道善良的人无论生前死后都不会遭逢恶果，他和家人不会为诸神抛弃。快要降临在我身上的结局绝非偶然。我清楚知道，现在对我说来，死亡已比在世为佳，我可以摆脱一切烦恼：因此未有神谕显现。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不怨恨起诉者或是将我判罪的人。他们虽对我不怀善意，却未令我受害。不过，我可要稍稍责怪他们的不怀善意。

但我仍然要请他们为我做一件事情。诸位朋友，我的几个儿子成年后，请为我教导他们。如果他们把财富或其他事物看得比品德为重，请像我麻烦你们那样麻烦他们。如果他们自命不凡，那么，请像我谴责你们那样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忽视了应看重的事物，他们本属藐小而自命不凡。你们倘能做到，我和我的儿子便会自你们手中得到正义。

离别的时刻到了，我们要各自上路——我将走向死亡，你们继续活着。至于生与死孰优孰劣，只有神明方才知道了。

【古雅典】狄摩西尼（前 384 ~ 前 322）

狄摩西尼，古雅典政治家，雅典后期民主派代表人物。《第二篇反腓力辞》是公元前 344 年为谴责腓力破坏和约，怂恿墨塞涅和阿尔戈斯攻打雅典而发表的演说。《金冠辩》是他谴责叛徒埃斯涅斯的一篇战斗檄文。

第二篇 反腓力辞

雅典人！任何时候，我们辩论的主题都是指向腓力充满敌意的各种企图，指向他不断对和平犯下的暴行。在辩论中，你们的发言充满人性和正义。而且，有些人在猛烈抨击腓力时所表现的激情，将永远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直率地讲，关于必要的各项措施，至今既没有人进行探索，也没有人做过任何一件切实有效的事情。

当然，在座各位比腓力更有资格为正义事业辩护，或者说当它遭受到别人强制时更有资格为它忧虑。但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反对腓力目前的各种图谋呢？在这方面，你们全然无所作为。对后果，对必要性，对必然的结局，你们明察秋毫，你们个个擅长于此，你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是，腓力强于行动，而你们长于演说。如果认为只消用真理和正义的浩然气势去论辩、去说项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打算考虑一下如何匡正时下的混乱，如何提防漫不经心地陷入更大的危险，如何阻止最终会扼杀所有反对意见的某种力量的增长，如果我们真想这样考虑，我们的辩论就必须采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雅典人，首先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人面对腓力日益扩大的权势和征服欲竟无动于衷，毫不担心，甚至还幻想这并不预示着国家面临危难，或者幻想腓力的各种图谋不全是针对你们，这样，我将感到震惊！我不得不恳求你们留心听我解释，而我要解释的那些理由促使我抱有不同的看法，促使我把腓力看作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我首先要提到和约刚签订后腓力获得的东西——温泉关，以及福西斯的统治权。腓力利用它们干了些什么？他用来讨好忒拜人，而不是为雅典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野心勃勃，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一统天下的帝国；他不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安宁，也不是为了任何正义的目的。他内心非常清楚，我国的宪法和原则使他无机可乘，不会允许他用他的任何承诺和他的任何作为，劝诱你们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希腊的一个城邦。由于你们相当注重正义，唯恐自己的名誉沾上哪怕一丝污点，由于你们具有敏锐的识别能力，所以一旦他有所企图，你们就会群情激奋，起而反对，其势如同你们直接遭到攻击一般。腓力认为，忒拜人为了自身利益，决不会去反对和阻止他的图谋，而会容许他随心所欲地如法对待其他地方的人，并会欣然听候调遣，为他而战。现在，出于同样的信念，他对美塞尼亚人和阿尔戈斯人恩宠有加，信誓旦旦。我的同胞们，这一切反而将你们反衬得更加伟大，更为光彩。因为，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事实证明唯有你们在坚定不移地维护着希腊人的权利。任何个人感情，任何出自私利的游说都不能诱惑你们背离对希腊的热爱之情。

腓力知道你们持有这些观点，持有这些与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截然不同的观点，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也许已被你们所折服，你们不仅用过去，

而且用现在的事例使他感到信服。他肯定很早就知道，你们的先辈原本可以通过归顺国王而换得希腊的主权。当亚力山大这位腓力的先辈以信使身份前来传达条件的时候，雅典人不仅表示轻蔑，决不听从，而且作出了弃城的选择。尽管雅典人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们的英勇行为却使人们激动不已，永远称颂。至于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的先辈，腓力知道前者是为暴君而战，而后者并不反对他。因此，他早就了解到这两个民族所关注的仅仅是私利，一点也不关心希腊人的共同事业。腓力如果选择你们作为他的同盟，你们至多也只会是在正义所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效力；但是，如果他到忒拜人和阿尔戈斯人那里去寻求支持，他将会得到他们的帮助来实现他的雄心和完成全部计划。正因为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腓力决意站在他们那边，而不是站在你们这边。

雅典人，让那些曾经信誓旦旦的人受到传唤吧！这是公正的做法，因为正是他们的许诺，才促使你们签订了和约。如果早知道在达成和约后腓力竟会如此行事，那我决不会去出任什么和谈使节，而且我坚信，你们也决不会放下武器。不！决不会！腓力昔日作出的保证与今天的所作所为大相径庭！另外，还有一些人也必须受到传唤。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第二次出使归来看到这个国家受到凌辱的时候，我向你们提出过危险的警告，证明过事实的真相，并尽我所能反对放弃温泉关和福西斯。在这个时候，就是这些人大叫大嚷，说什么我这个禁酒主义者乖僻暴戾，说什么只要和约得以通过，腓力就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就会加强塞斯比阿和普拉蒂亚，制止忒拜人的蛮横无礼，切断切尔松尼斯，并将埃维厄岛和奥罗珀斯让给雅典人，作为安菲波利斯的等价交换之物。我相信，你们对所有这些依然记忆犹新，尽管此刻更能让人牢记的是切肤之痛，更有甚者，你们似乎嫌这奇耻大辱还未到顶，你们竟然将自己的子孙后代也卷入到那个和约中去，让他们全然依附于那些承诺；你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地陷入一种诱惑。

此刻，我提这个问题的目的何在？我又为何希望那些人应该受到传唤？我要诸神为我作证，我将毫不推诿，我将勇敢地宣布真理！我不会破口谩骂，进行攻击，那样只会使自己遭到同样的待遇，再次为我的宿敌提供一个领取腓力赏金的好机会；我也不会沉湎于那种向公众慷慨陈词的虚荣做法。但是，我确实忧心忡忡：腓力的所作所为比现在更能引起你们关注的那一天肯定会到来。我认为他的图谋正变得越来越成熟。但愿将来的事实证明我现在的担心和疑虑是多余的。但我还是惧怕这个时刻离我们不远了。只有到了是否可以对事态不加理会已由不得你们作主的时候，到了你们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智，而不是用我的或其他什么人提供信息在燃眉之急中确保自己安全的时候，你们才会迸发出最强烈的忿恨。

既然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完全令人绝望，既然我们还有着辩论的权利，那么，请允许我提醒你们一件事：是谁游说你们放弃福西斯和温泉关？我们中间谁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只要一得到那两个地方，那个人就为他的军队开往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铺平了道路。尔后，他就能迫使我们放弃考虑希腊的权力和我们在外国的利益，迫使我们转而进行一场防御战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强烈地意识到那个人的居心。而就在那一天，他的图谋变成了现实了。如果当时我们不是受骗上当，这个国家本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担忧。他的海军不可能变得如此强大，足以从海上冒犯阿提卡；他也不可能横扫温泉关和福西斯。若不是我们受骗上当，他只能在道义约束下认真遵守协

议，否则立即会卷入一场战争，就像上次那场战争那样，他必将被迫乞求和平。

金冠辩

.....

埃斯基涅斯，我可以下断言，你是利用这件事来显示你的口才和嗓音，而不是为了惩恶扬善。但是，埃斯基涅斯，一个演说家的语言和声调的高低并没有什么价值。能够以人民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以国家的爱憎为自己的爱憎，才足珍贵。只有有着这样心怀的人才会以忠诚的心说话。要是威胁共和国安全的人阿谀奉承，同人民离心离德，那自然无法指望与人民一同得到安全的保障。但是，——你看到了吗？——我却得到了这种安全保障。因为我的目地与我的同胞一致，我并无突出于人民利益之外的利益。你是否也是同样情况呢？这又怎么可能？众所周知，尽管你原来一直拒绝接受出使腓力的任务，战后你却立即到腓力处出任大使，而当时给你的国家带来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他。

是谁削弱了国家？当然是那个心口不一的人。宣读公告的人该对谁公开诅咒？当然是上述那类人。对于一个演说家，还有比心口不一更大的罪恶吗？你的品格却正是这样。你还胆敢张口说话，敢正视这些人！你以为他们认不清你的面目吗？你以为他们昏昏沉睡或如此健忘，已记不得你在会上的讲话？你在会上一面诅咒别人，一面发誓与腓力绝无关系，说我告发你是出于私怨，并无事实根据。等到战争的消息一传来，你就把这一切都抛到脑后了。你信誓旦旦表示和腓力关系甚好，你们之间存在友谊——其实这是你卖身的新代名词。埃斯基涅斯，你只是鼓手格劳柯蒂亚的儿子，又能够在什么平等和公正的借口下成为腓力的朋友或知交呢？我看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你是受雇来破坏国人利益的。虽然你在公开叛变中被当场捉获，事后也受到了告发，你却还以一些即使别人可能犯而我却不会犯的事来辱骂我、谴责我。

埃斯基涅斯，我们共和政体的许多伟大光荣事业是由我完成的，国家没有忘记我的业绩。以下事例就是明证：选举由谁来发表葬礼后的演说时，有人提议你，可是，尽管你的声音动听，人民不选你；也不选狄马德斯，尽管他刚刚签署了和约；也不选海吉门或你们一伙的任何人，却选了我。你和彼梭克列斯以粗暴而又可耻的态度（慈悲的上天啊！）列出你现在所举的这些罪状来谴责、辱骂我时，人民却更要选举我。原因你不是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雅典人知道我处理他们的事务时的忠诚与热忱，正如他们知道你和你们一伙的不忠一样。共和国昌盛时你发誓拒认之事，国家蒙受不幸时，你却承认了。因此，对于那些利用共和国灾难来取得政治安全的人，我们的人民认为在他们这样做之前早已成为人民的敌人、现在则更是公认的敌人。人民认为向死者演说致敬、表扬烈士英勇精神的人，不应和与烈士为敌的人共处一室，同桌而食；他不该与杀人凶手一起开怀饮宴，并为希腊的大难唱欢乐之歌后，再来这里接受殊荣；他不该用声音来哀悼烈士的厄运而应以赤诚之心吊唁他们。人民在我和他们自己身上体会得这一点，却无法在你们中的任何人得到。因此他们选了我，不选你们。人民的想法如此，人民选出来主持葬礼的死者父兄的想法也一样。按照风俗，丧筵应设在死者至亲家属家中，但人民却命令将筵席设在我家。他们这样做有道理；因为，个别来说死

者与其亲属关系比我密切，但对全体死者而言，却没有人比我更亲了。更深切关心他们安危成就的人，对他们死难的哀痛也最深。

【古罗马】加图（前 234 ~ 前 149）

加图，罗马政治家、将军。洛迪安人拒绝在波斯战争中帮助罗马人，加图在本文为洛迪安人申辩。

为洛迪安人申辩

我知道多数人在取得胜利和成就的时刻都会得意洋洋、骄傲自大、目中无人。鉴于我们在上次战争中作战极其顺利，我深切希望我们不要因考虑欠周而犯错误，使我们辉煌的胜利黯然失色；我希望我们不要得意忘形。逆境使人头脑清醒，知道必须怎么办；顺境却容易令人得意忘形，偏离冷静思考和可靠判断的道路。正因上述理由，我敦促劝告你们，待过分的兴奋消减，回复我们通常具备的自制能力时，再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我承认洛迪安人不愿看到我们战胜波斯王。不单洛迪安人如此，许多其他民族和国家均表达过相同的愿望。我颇相信洛迪安人在这场战争中的立场，并非有意冒犯我们，而是出现一种很自然的恐惧，害怕我们一旦在世界上无所忌惮，便会为所欲为。他们害怕很快就会像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成为我们帝国统治下的奴隶。他们与我们作战，只是为保持自由的愿望所驱使，即便如此，他们并未公开支援波斯王。

请你们稍停片刻，想想我们关切自身的利益，远超过洛迪安人考虑他们的利益，假如我们任何人预见自己的个人利益可能受损，他会竭尽努力去避免。然而洛迪安人虽然知道他们的利益可能受损，却一直耐心忍受。

我们现在是否立刻全部放弃同洛迪安人友好而得到的多样好处，并剥夺为他们带来的同样好处呢？那样一来，我们说洛迪安人想要做的事，事实上我们自己不是先就做了吗？

……

一个人说他打算做好事而事实上没有做，对这样的人加以尊敬当然是不恰当的。那么。洛迪安人并没有做错事，而只是有人说他们想做，难道竟能因此而对他们加以敌视吗？

“但是这些洛迪安人呀，可真骄傲。”他们说。这个谴责倒说中了我和我的孩子们。就算他们骄傲吧，那又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是不是因为有人比我们更骄傲，我们就该发脾气呢？

【古罗马】西塞罗（前 106 ~ 前 43）

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他以广博的知识和雄辩艺术，被誉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名作《对威勒斯的控告》是对当时罗马官员普遍贪污的指控。威勒斯任西西里总督，更是其中较显著者。《大演说家及其训练》是他阐发演说技巧的著名论述。

对威勒斯的控告

各位元老，长时期以来，存在着这样的见解：有钱人犯了罪，不管怎样证据确凿，在公开的审判中总是安然无事。这种见解对你们的社会秩序十分有害，对国家十分不利。现在，驳斥这种见解的力量正掌握在你们手中。在你们面前受审的是个有钱人，他指望以财富来开脱罪名；但是在一切公正无私的人心目中，他本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就足以给他定罪了。我说的这个人就是凯厄斯·威勒斯。假如今天他不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那不是因为缺乏罪证，也不是因为没有检察官，而是因为司法官失职。威勒斯青年时放荡无行，后就任财务官时，除为恶之外，又岂有其他？他虚耗国库；他欺骗并出卖一位执政官；他弃职逃离军队使之得不到补给；他劫掠某省；他践踏罗马民族的公民权和宗教信仰权！威勒斯在西西里任总督时，更是恶贯满盈，使他的劣迹遗臭万年。他在这期间的种种决策触犯了一切法律、一切判决先例和所有公理。他对劳苦人民的横征暴敛无法计算。他把我们最忠诚的盟邦当作仇敌对待。他把罗马公民像奴隶一样施以酷刑处死。许多杰出人士不经审讯就被宣布有罪而遭流放，暴戾的罪犯却用钱行贿得以赦免。

威勒斯，我现在要问你对这些控告还有什么辩解的话？不正是你这个暴君，胆敢在意大利海岸目力所及的西西里岛上，将无辜的不幸公民帕毕列阿斯·加弗斯·柯申纳斯钉在十字架上，使他受辱而死吗？他犯了什么罪？他曾表示要向他国家的法官上诉，控告你的残酷迫害！他正要为此乘船归来时，就被捉拿到你面前，控以密探之罪，受到严刑拷打。虽然他宣称：“我是罗马公民，曾在卢西乌斯·普列蒂阿斯手下工作。他现刻在盘诺马斯，他将证明我无罪！”这个声明毫无用处，你对这些抗辩充耳不闻，你残忍已极嗜血成性，竟下令施此酷刑！“我是罗马公民！”这句神圣的话，即使在最僻远之地也还是安全的护身凭证。但柯申纳斯语音未绝，你就将他处死，钉在十字架上！

啊，自由，这曾是每个罗马人的悦耳乐音！啊，一度是神圣不容侵犯的神圣的罗马公民权，而今却横遭践踏！难道事情真已至此地步？难道一个低级的地方总督，他的全部权力来自罗马人民，竟可以在意大利目力所及的一个罗马省份里，任意捆绑、鞭打、刑讯并处死一位罗马公民吗？难道无辜受害者的痛苦叫喊，旁观者的同情热泪，罗马共和国的威严以至畏惧国家法制的心理都不能制止那残忍的恶人吗？那人恃仗自己的财富，打击自由的根基，公然蔑视人类！难道这恶人可以逃脱惩罚吗？诸位元老一定不可以这样做啊！这样做了，你们就会挖去社会安全的基石，扼杀正义，给共和国招来混乱、杀戮和毁灭！

大演说家及其训练

在数量众多的学者中，有大批精通本业的专家和许多最杰出的天才，而雄辩术虽有各种根据因而可获得最丰厚的报酬，但演说家却为数甚少。除了这项艺术令人难以置信的博大精深外，谁能想象出其它原因？对于各种事物的渊博知识是必要的，否则词语的流利就会空洞可笑；演说本身的构成不仅依靠选择词语，而且依靠细心地遣词造句；自然赋予人的各种感情都应深刻地加以认识；因为演说中的一切力量和技艺都必须用来融合或激起听众的情感。应该具备一定的优美和机智，教养良好者应有的知识，在抨击和回答时的敏捷和简洁，以及精心表现出的体面和文雅。此外，还得记住全部古代知识和大量事例；一般法律，特别是民法的知识也不能忽视。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由身体的动作、姿势、外观和声音的抑扬变化所决定的演说风格。因为，相对平凡的演员表演艺术即已证明：从本质上说，仅仅演说风格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力量。尽管许多人都以极大的努力塑造自己的外观、声音和姿势，但谁不知道，能使人们屏息聆听的演说家过去和现在都屈指可数？对于记忆，那个一切事物的贮藏库，我能说些什么呢？除非它所保存的素材和词语是思想和创造力的成果，否则，纵使演说家的才能超群，亦将无所裨益。我们不必惊叹优秀演说家之难得，因为雄辩术来自所有上述各种条件，而每一种条件都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成功地获得。我们还要告诫孩子们和珍视其荣誉与光荣的人深思这个目标的深广程度，不要以为通过他们现正遵循着的箴言和大师们的教导，通过练习就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而应该懂得他们必须采用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照我看来，实际上没有人能成为集一切值得称赞的才能于身的演说家，除非他能获得关于所有重要事物和全部文理科的知识；因为他的语言必须通过知识的滋养，才能臻于华美绚丽，旁征博引，演说家若不能理解并感受到处于表面以下的事物，演说术就会变成近乎儿语的连篇空话。

克拉苏斯说：“我的看法是，对演说提供最大帮助的首先是禀性和天才；就安东尼乌斯现在所指的那些谈论艺术的人而言，他们的演说所缺乏的，不是技巧和方法，而是天赋的才能；因为，在人的思想和认识中总该有某些敏于构思、长于描述、善于记忆的活跃力量；如果有人设想能够通过艺术得到这些力量（那是不对的，因为它们倘能由艺术激起，固然很好，但他们是天赋的才能，不能由艺术灌输给人），那么口才的流利、音质、肺部的活力和整个面容及身体的构造这些条件是与生俱来的，他又该作何解释呢？我并不是说艺术不能改进这些具体条件（因为我并非不知道好的条件能通过教育而更好，不很好的条件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进）；但有人说话吞吞吐吐，声调刺耳，身体的动作和神态笨拙粗野，则不论其因天赋或因艺术而具有什么力量，也不能算作优秀的演说家；然而另有一些人却幸运地具有上述条件，天资过人，熠熠生辉，似乎生而与人有异，系由神力造成。在大庭广众之中，人人静听某一个人谈论最重要的问题，这确实是了不起的事业，因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敏锐地觉察讲演者的失误，而不会注意他的长处，因而听讲者一有反感就会忘却讲演者值得称赞的地方。我这番话对于即使是天资不足的年轻人也根本无意于阻止他们学习演讲术。因为，谁没看到我的同时期人凯利乌斯，一个新手，才智平庸，却在演讲中赢得殊荣？谁不知道你们的同时期人维里乌斯，一个迟钝笨拙的人，却依靠磨练本领而赢得盛誉？”

可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完美的演说家，我们必须在讨论中设想一位却除

一切缺点、具备各种优点的演说家。即使大量的讼案与各种原因和我们借以展开辩论的广场上的混乱与粗野都给最差的演说家留下了活动余地，我们也不能把这当作理由而将视线从我们探讨的目标移开。人们在演说艺术中寻求的不是某种必不可少的实际用途，而是思想中得以无所拘束地、精细地、几乎近于挑剔地进行评价的乐趣。因为，尽管人们可能容忍广场上平庸的演说家，却没有什么讼案和论战能迫使人们忍受舞台上拙劣的演员，所以演说家必须认真做好准备：不但要满足必须给予满足的那些人，还应显示出值得那些有权进行公正评价的人所作的赞美，如果你们想知道我自己的想法：亲密的朋友们，我愿向你们表白我至今尚未说过并且认为永远也不应该提及的想法。那些讲得最好而且姿态最自然、最优雅的人，如果开始讲话时一点也不胆怯，一点也不慌乱，在我看来，他们似已丧失了羞耻感；尽管不应显出胆怯和慌乱，然而我们却无法做到，因为一个人进行演说的条件越充分，他就越对演说的困难、演说是否成功和听众的期望感到担心。但他若不能说出与讲题相符、与演说家的名声相称并值得听众注意的内容，即使他讲话时故作慌乱，在我看来，也是完全不知羞耻的；我们不能通过表现羞怯，而应通过摒弃不适宜于我们的腔调，来避免厚颜无耻的品性。我认为没有羞耻之心的演说家（我在许多人身上看到这个情况）不仅应受责备，还应当面给以申斥。确实，常在你们身上看到的情况也十分频繁地出现在我身上，我在演说开始时往往脸色苍白，感到心中一阵战栗，也可以说，全身都在战栗。我年轻时，一次在开始一项指控时由于害怕而完全失去了信心和讲话的能力，非常感激玛克西穆斯，他一见到这个情景便即刻宣布解散那个集会。

人们对此都表示赞成，意味深长地相互看着，并开始交谈：在克拉苏斯身上有着一神奇妙的羞怯，那非但不是他的演说的缺陷，而且是对它的一种帮助，使它显示出可取的诚实。

【法国】圣伯纳德（1091～1153）

圣伯纳德，法国教士、罗马教皇顾问。罗马天主教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十字军曾进行十次东征。本文是第二次十字军出征前，圣伯纳德向军队的布道，它是实际意义上的战前动员令。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你们必然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面临毁灭的时代。人类之敌使得世界所有地区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我们面前，满目都是未受惩戒的邪恶行为。人类的法律和宗教的规条已无力阻止道德沦落、邪恶得逞。异教的魔鬼占据了真理的宝座，上帝已将咒诅降到他的圣殿。

听我布道的人们啊，你们快快使上天息怒吧，但不要只靠几句空洞的苦诉来求得他的慈悲。披上丧服于事无补，穿上你们那刺不透的盔甲吧。白刃相交、行军劳顿、危难困苦就是上帝要求你们的赎罪的苦行。快快战胜异教徒，以洗清你们的罪孽。夺回圣地将是对你们忏悔的奖赏。

如果有人向你们宣告敌人已经侵占了你们的城池与堡垒，凌辱了你们的妻女，褻渎了你们的神庙，有谁会不飞奔前去拿起武器？现在，所有这些灾难，甚至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你们兄弟身上，降临到耶稣基督的家庭——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你们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去消除罪恶，惩处暴行呢？难道你们能容许异教徒蹂躏了基督子民后依旧心安理得、逍遥法外吗？请记住，他们的得胜将使我们的子孙长恨无穷。我们这一代若容许他们得胜，便将成为千古罪人，是的，耶稣基督命我向你们宣布，他要惩罚那些不保护他免受敌人之害的人。

快快拿起武器吧。愿神圣的怒火使你们在战斗中勇武有力。愿基督徒的世界回响起先知的预言：“刀剑不染血的人要受诅咒。”我主召唤你们起来保卫他的遗产，切勿以为他已失去手中力量。他岂不能派遣无数天使或一声令下就使敌人顷刻之间化为齑粉？但是上帝顾惜他的子民，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能得到他的怜悯。他慈悲为怀，召唤你们为恢复他的荣耀和圣名而战，使你们有一天得到平安。

基督的勇士们，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基督今天要求你们以生命回报。你们值得进行这场战斗，因为战胜则无比光荣，死亦受福无穷。显赫的骑士，十字架的英勇捍卫者啊，紧记你们先辈征服耶路撒冷的榜样，他们的名字已经铭刻在天堂。抛弃尘世终将消灭的一切吧，你们该夺取的是常青之树，要征服的是永恒的王权。

【英国】约翰·保尔（？～1381）

保尔（？～1381），英国牧师与社会改革家。这是他在1381年在伦敦附近向农民发表的演说。

奴隶与自由民

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时，有什么绅士？

上帝造人之初，一切人生来本属平等，后来由于恶人的不义压迫，我们才被束缚陷于奴隶的境地。如果上帝一开始就要创造奴隶，他必然会指定谁为奴隶，谁享自由。因此我要劝你们考虑，上帝指定的时刻现已到来，只要你们愿意，就可以摆脱身上的枷锁，恢复自由。我建议你们深思熟虑、鼓足勇气、振作精神。你们要学习好庄稼人的榜样，先耕耘田地，再拔除损坏庄稼的莠草。你们也可以先铲除国内的大贵族，然后除去法官、律师、贪得无厌者和一切压抑平民百姓的人。时候一到你们便可以得到和平与安定。除去那些大人物后，你们就能得到平等自由，再没有高低贵贱的不同等级。剩下的就是你们在一切事物上的同等的尊严和权威了。

【德国】马丁·路德（1483～1546）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倡导人。他的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影响极大，罗马教皇要他撤回《九十五条论纲》，本文系就此发表的演说。

在沃姆斯国会上的演说（节选）

.....

我只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我不是上帝，因此，我要像耶稣那样为自己辩护。他曾经说过：“如果我说了什么有罪的话，请拿出证据来指责我。”我是一个卑微、无足轻重、易犯错误的人，除了要求敌人提出所有可能反对教义的证据来，我还能要求什么呢？

至尊的皇帝陛下，各位显赫的亲王，听我讲话的一切高低贵贱人士，我请求你们看在慈悲的上帝分上，用先知和使徒的话来证明我错了。只要你们能使我折服，我就会公开承认我所有的错误，首先亲手将我写的文章付之一炬。

我刚才的这番话清楚地表明，这对我的处境是危险的，我曾经仔细权衡轻重，深思熟虑。可是我不但没有被这些危险所吓倒，相反，十分欣慰地看到今天基督的福音仍同古代一样，引起了震荡和纷争。这是上帝福音的特质，注定如此。耶稣基督曾说：“找到世上，不是送来和平而是送来刀剑。”天意神妙而可敬可畏。我们应当谨慎，以免因制止争论而触犯上帝的圣诫，引来不能解脱的危险，当前的灾难以至永远的毁灭。.....我们应当谨慎，使上天保佑我们的少主查理士皇帝不仅开始治国，而且国运久长。我们对他的希望仅次于上帝。我原引用神喻中的例子。我要说古埃及的法老王、巴比伦诸王和以色列诸王。他们貌似明智，想建立自己的权威，结果反倒成了灭亡的主要原因，正如福音所说：“上帝在他们不知不觉中移山倒海。”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各位高贵的亲王有必要听取我这粗浅的判断。我这样做，是出自我对德国的责任感。国家有权期望自己的儿女尽公民的责任。因此，我来到陛下和各位殿下尊前，谦卑地恳求你们禁止我的敌人因仇恨而将我不该受的愤怒之情倾泻于我。

既然至尊的皇帝陛下、诸位亲王殿下要求我简单明白、直截了当地回答，我遵命作答如下：我不能向教皇或元老院屈服，从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的情形有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的道理或无可辩驳的理由使我折服，无法用福音或圣经改变我的判断，那么，我不能够，也不愿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说一句违心之言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英国】约翰·弥尔顿（1608～1674）

英国诗人，政论家，新闻自由思想奠基人之一。

本篇发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1643年，革命阵营内的上层长老派试图与王党妥协，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新闻检查法案。为捍卫出版自由，反对检查制度，弥尔顿以演说词形式向国会提出了这篇呼吁。

论出版自由

出版检查之弊

如果我们想依靠对出版的管制，以达到淳正风尚的目的，那我们便必须管制一切消遣娱乐，管制一切人们赏心悦目的事物。除端肃质朴者外，一切音乐都不必听，一切歌曲都不编不唱。同样舞蹈也必设官检查，除经获准，确属纯正者外，其余一切姿势动作俱不得用以授徒；此节柏拉图书中本早有规定。但要想对家家户户的古琴、提琴、吉它逐一进行检查，此事确乎非动用二十个以上检查官莫办；这些乐器当然都不能任其随便絮叨，而只准道其所应道。但是那些寝室之内低吟着的绵绵软语般的小调恋歌又应由谁去制止？还有窗前窗下、阳台露台也都不应漏掉；还有坊间出售的种种装有危险封皮的坏书；这些又由谁禁绝？二十个检查官够用吗？村里面自也不应乏人光顾，好去查询一下那里的风笛与三弦都宣讲了些什么，再则都市中每个乐师所弹奏的歌谣、音阶等等，也都属此二例，因为这些便是一般人的《理想乡》与蒙特梅耶……脱离现实世界而遁入到那些碍难施行的“大西岛”或“乌托邦”式的政体中去，决不会对我们的现状有所补益；想要有所补益，就应当在这个充满邪恶的浊世中，在这个上帝为我们所安排的无可逃避的环境中，更聪明地去进行立法。

言论自由之利

正像在躯体方面，当一个人的血液鲜活，各个基本器官与心智官能中的元气精液纯洁健旺，而这些官能又复于其机敏活泼的运用中恣骋其心智的巧慧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异常良好那样，同理，当一个民族心情欢快，意气欣欣，非但能绰有余裕地去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且能以余力兼及种种坚实而崇高的争议与发明的时候，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它没有倒退，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经历了阵痛而重获青春，从此步入足以垂懿范于今兹的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心中仿佛瞥见了一个崇高而勇武的国家，好像一个强有力者那样，正从其沉酣之中振身而起，风鬓凜然。我觉得，我仿佛瞥见它是一头苍鹰，正在振脱着它幼时的健翮，它那目不稍瞬的双睛因睁开对中午的炎阳而被燃得火红，继而将它的久被欺诳的目光疾扫而下，俯瞰荡漾着天上光辉的清泉本身，而这时无数怯懦群居的小鸟，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分的鸟类，却正在一片鼓噪，上下翻飞，对苍鹰的行径诧怪不已；而众鸟的这种恶毒和叽叽喳喳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英国】皮特（1708—1778）

皮特是 18 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本文是他在上议院的一篇著名演说。对于北美独立问题，他主张同北美和谈加以解决。

北美是不可征服的

各位议员，这是个危机四伏的非常时期。现在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在这道路坎坷、征途险恶的时刻，甘言谀词不能解救我们。现在必须向我王陛下以真情。如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设法使王室抛弃幻想，不受蒙蔽；我们要将大祸临门的真相完全说清。各位部长大人，你们难道还能昏昏然自以为可以得到国会的支持吗？难道国会对自己的尊严与职责如此麻木，竟会受骗以致丧失尊严、背弃职责吗？对于带给我们屈辱累累、厄难重重的措施，竟会无限度地给予支持吗？这些措施已经使我们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帝国陷入灾祸，蒙受羞辱。昨日，英国犹巍然屹立，可与世界抗衡，今天，已无人低下地向她致敬了。各位大人，法国侮辱了你们，并怂恿支持北美；且不谈北美的是非曲直，为着保持我国的尊严，你们也应斥责法国干涉我国内政的侮人行为。我们的各位部长大人是否还能容忍比这更大的屈辱呢？他们连要求法国黜废北美的全权大使，以表示有意挽回他们的声誉与国家的尊严也不敢吗？各位部长假意轻蔑地把北美人民称为乱民，但是他们已经强大起来，获得敌人的称号了。为了与北美人民对敌，你们已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战争，还要我们尽全力支持你们无望的军事行动。这个被斥为反叛、视作敌人的民族受法国怂恿，起来反对你们。你们的死敌法国供给他们一切军需，为他们的利益商谈，款待他们的大使，而我们诸位部长大人却不敢严正有力地出面干预！

诸位议员，这种使我们既不能动而取胜，又不能挫而不屈的绝境，要求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和最响亮的语言说出事实真相，使陛下开目启听，去除幻想。恕我冒昧直言：你们无法征服北美。你们目前在北美的处境如何？最坏的情况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已知在三次战役中，我们一无所获并损失惨重。你们可以更加不惜代价地增加一切可用开支，使尽一切力量，乞求、借贷一切助力，同那个把炮灰送到外国的，地小力微的德国王子做买卖。但是，你们的努力是永远不会奏效的，你们倚赖这种雇佣兵的援助，作用适得其反；因为你们用掠夺成性的卑贱兵士去滋扰他们，把他们及其财产置于雇佣兵的蹂躏之下，这样只会更加激起他们无法平息的仇恨。倘若我生为北美人，正如我现在是英国人一样，当外国军队侵入我国国境之时，我是绝对不会放下武器的。永远、永远、永远不会！

【美国】华盛顿（1732～1799）

华盛顿，美国“国父”，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人之一。美国第一任总统。总统任年主持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建树颇多。为纪念他，美国首都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1789年4月30日他发表的首任就职演说

首任就职演说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公民们：

在人生沉浮中，没有一件事能比本月14日收到根据你们的命令送达的通知更使我焦虑不安。一方面，国家召唤我出任此职，对于她的召唤，我永远只能肃然敬从。而我十分偏爱、并曾选择了隐退，我还满怀奢望，矢志不移，誓愿以此作为暮年归宿。星转斗移，我越来越感到隐退的必要和亲切，因为喜爱之余，我已经习惯，还因为岁月催人渐老，身体常感不适。另一方面，国家召唤我担负的责任如此重大和艰巨，足以使国内最有才智和经验的人度德量力；而我天资愚钝，又无民政管理的实践，应该倍觉自己能力之下足，因此必须感到难以荷此重任。怀着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唯一敢断言的是，通过正确理解可能产生影响的各种情况来恪尽职守，乃是我忠贞不渝的努力目标，我唯一敢祈望的是，如果我在执行这项任务时陶醉于往事，或因由衷感到公民们对我高度的信赖，因而过分受到了影响，以致在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大事时，忽视了自己的无能和消极，我的错误将会由于使我误入歧途的各种动机而减轻，而大家在评判错误的后果时，也会适当包涵产生这些动机的偏见。

既然这就是我在遵奉公众召唤就任现职时的感想，那么，在此宣誓就职之际，如不热忱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就极其失当。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它的神助能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愿上帝赐福，保佑一个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组成的政府，保佑它为这些基本目的而作出奉献，保佑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在我负责之下都能成功地发挥作用。我相信，在向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伟大缔造者献上这份崇敬时，这些话也同样表达了各位和广大公民的心意，没有人能比美国人更坚定不移地承认和崇拜掌管人间事务的上帝。他们在迈向独立国家的进程中，似乎每走一步都有某种天佑的迹象；他们在刚刚完成的联邦政府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如果不是因虔诚的感恩而得到某种回报，如果不是谦卑地期待着过去有所预示的赐福的到来，那么，通过众多截然不同的集团的平静思考和自愿赞同来完成改革，这种方式是难以同大多数政府在组建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相比的。在目前转折关头，我产生这些想法确实是深有所感而不能自己。我相信大家会和我怀有同感，即除了仰仗上帝的力量，一个新生的自由政府别无他法能一开始就事事如意。

根据设立行政部门的条款，总统有责任“将他认为必要而妥善的措施提请国会审议”。但在目前与各位见面的这个场合，恕我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而只要提一下伟大的宪法，它使各位今天聚集一堂，它规定了各位的权限，指出了各位应该注意的目标。在这样的场合，更恰当、也更能反映我内心激情的做法是不提出具体措施，而是称颂将要规划和采纳这些措施的当选者的才能、正直和爱国心。我从这些高贵品格中看到了最可靠的保证：其一，任何地方偏见或地方感情，任何意见分歧或党派敌视，都不能使我们偏离全

局观点和公平观点。即必须维护这个由不同地区和利益所组成的大联合；因此，其二，我国的政策将会以纯正不移的个人道德原则为基础，而自由政府将会以赢得民心和全世界尊敬的一切特点而显示其优越性。我对国家的一片热爱之心激励着我满怀喜悦地展望这幅远景，因为根据自然界的法理和发展趋势，在美德与幸福之间，责任与利益之间，恪守诚实宽厚的政策与获得社会繁荣幸福的硕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统一；因为我们应该同样相信，上帝亲自规定了永恒的秩序和权利法则，它决不可能对无视这些法则的国家慈颜含笑；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满怀深情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把维护神圣的自由之火和共和制政府的命运，系于美国人所遵命进行的实验上。

除了提请各位注意的一般事务外，在当前时刻，根据激烈反对共和制的各种意见的性质，或根据引起这些意见的不安程度，在必要时行使宪法第五条授予的权利究竟有多大益处，将留待你们来加以判断和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从过去担任过的职务中找到借鉴，因此我不提具体建议，而是再一次完全信任各位对公众利益的辨别和追求；因为我相信，各位只要谨慎避免作出任何可能危及团结而有效的政府的利益的修订，或避免作出应该等待未来经验教训的修订，那么，各位对自由人特有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和谐的关注，就足以影响大家慎重考虑应在何种程度上坚定不移地加强前者，并有利无弊地促进后者。

除上述意见外，我还要补充一点，而且向众议院提出最为恰当。这条意见涉及到本人，因此宜尽量讲得简短一些。我第一次荣幸地奉召为国效劳时，正值我国为自由而艰苦奋斗之际，我对我的职责的看法要求我必须放弃任何俸禄。我从未违背过这一决定。如今，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想法仍然支配着我，因此，我必须拒绝享用任何个人报酬，并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不可避免的是，行政部门享有俸金有可能被列入永久性规定。同样，我必须恳求各位，在估算我就任的这个职位所需要的费用时，可以根据我的任期以公共利益所需的实际费用为限。

我已将有感于这一聚会场合的想法奉告各位，现在我就要向大家告辞；但在此以前，我要再一次以谦卑的心情祈求仁慈的上帝给予帮助。因为承蒙上帝的恩赐，美国人有了深思熟虑的机会，以及为确保联邦的安全和促进幸福，用前所未有的一致意见来决定政府体制的意向；既然如此，上帝将同样明显地保佑我们能扩大眼界，稳健地进行协商，并采取明智的措施，而这些都是本届政府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依靠。

对部队的演说

美国人能成为自由人，还是沦为奴隶；能否享有可以称之为自己所有的财产；能否使自己的住宅和农庄免遭洗劫和毁坏；能否使自己免于陷入非人力所能拯救的悲惨境地——决定这一切的时刻已迫在眉睫。苍天之下，千百万尚未出生的人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这支军队的勇敢和战斗。敌人残酷无情，我们别无他路，要么奋起反击，要么屈膝投降。因此，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若不克敌制胜，就是捐躯疆场。

祖国的尊严，我们的尊严，都要求我们进行英勇顽强的奋斗，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将感到羞愧，并将为全世界所不齿。所以，让我们凭借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和上帝的恩助——胜利掌握在他手中——鼓励和鞭策我们

去创造伟大而崇高的业绩。全国同胞都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有幸为他们效劳，将他们从企图强加于他们的暴政中解救出来，我们将受到他们的祝福和赞颂。让我们相互激励、互相鞭策，并向全世界昭示：在自己国土上为自由而斗争的自由民胜过世上任何爱人驱使的雇佣兵。

自由、财产、生命和荣誉都在危急存亡之中，我们正在流血受辱的祖国寄希望于我们的勇敢和战斗，我们的妻儿父老指望我们去保护。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上苍一定会保佑如此正义的事业获得胜利。

敌人将炫耀武力，竭力恫吓，但是，别忘了，在许多场合，他们已被为数不多的勇敢的美国人所击败。他们的事业是邪恶的——他们的士兵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在他们开始进攻时，就沉着坚定地予以反击，凭着我们有利的工事和熟悉的地形，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每一位优秀的士兵都将枕戈待旦——整装待命，一旦出击，必歼顽敌。

【美国】帕特里克·亨利（1736～1799）

亨利，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本篇是他 1775 年 3 月 23 日，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说，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战争口号，严厉驳斥了妥协主张。

不自由，毋宁死

主席先生：

没有人比我更钦佩刚刚在会议上发言的先生们的爱国精神与见识才能。但是，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事物。因此，尽管我的观点与他们截然不同，我还是要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并希望不要因此而被认为是对先生们的不敬。此时不是讲客气话的时候，摆在各位代表面前的是国家存亡的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享受自由还是蒙受奴役的大问题。鉴于它事关重大，我们的辩论应该允许各抒己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搞清事物的真相，才有可能不辱于上帝和祖国所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在这种时刻，如果怕冒犯各位的尊严而缄口不语，我将认为自己是祖国的背叛和对比世界上任何国君都更为神圣的上帝的不忠。

主席先生，沉湎于希望的幻觉是人的天性。我们有闭目不愿正视痛苦现实的倾向，有倾听女海妖的感人歌声的倾向，可那是能将人化为禽兽的感人的歌声。这难道是在这场为获得身由而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一个聪明人所应持的态度吗？难道我们愿意做那种对这关系列是否蒙受奴役的大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人吗？就我个人而论，无论在精神上承受任何痛苦，我也愿意知道真理，知道最坏的情况，并为之做好一切准备。

我只有盏指路明灯，那就是经验之灯，除了以往的经验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判断未来。而既要过去的经验为依据，我倒希望知道，十年来英国政府的所做所为中有哪一点足以证明先生们用以欣然安慰自己及各位代表的和平希望呢？难道就是最近接受我们请愿时所流露出的阴险微笑吗？不要相信它，先生，那是在您脚下挖的陷阱。不要让人家的亲吻把您给出卖了。请诸位自问，接受我们请愿时的和善微笑与这如此大规模的海陆战争准备是否相称。难道舰艇和军队是对我们的爱护和战争调停的必要手段吗？难道为了解决争端，赢得自己的爱而诉诸武力，我们就应该表现出如此的不情愿吗？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先生，这些都是战争和征服的工具，是国君采取的最后争执手段。主席先生，我要向主张和解的先生请教，这些战争部署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其目的不在于迫使我们屈服的话，那么哪位先生能指出其动机所在？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有哪些对手值得大不列颠征集如此规模的海陆军队呢？不，先生，没有其它对手了。一切都是针对我们而来，而不是针对别人。英国政府如此长久地锻造出的锁链要来桎梏我们了，我们该何以抵抗？还要靠辩论吗？先生，我们已经辩论十年了，可辩论出什么更好的抵御措施了吗？没有。我们已从各种角度考虑过了，但一切均是枉然。难道我们还要求教于哀告与祈求吗？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更好方法未被采用吗？无需寻找了，先生，我恳求您，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了。我们已经做了应该做的一切，来阻止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风暴。我们请愿过了，我们抗议过了，我们哀求过了，我们也都曾拜倒在英国王的宝座下，恳求

他出面干预，制裁国会和内阁中的残暴者。可我们的请愿受到轻侮，我们的抗议招致了新的暴力，我们的哀求被人家置之不理，我们被人家轻蔑地一脚从御座前踢开了。事到如今，我们再也无法沉迷于虚无缥缈的和平希望之中了。希望已不复存在！假如我们想得到自由，并拯救我们为之长期奋斗的珍贵权力的话，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长期所从事的，曾经发誓不取得最后胜利就决不放弃的光荣斗争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必须战斗！我们的唯一出路只有诉诸武力，求助于战争之神。

主席先生，他们说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了，不能与如此强大凶猛的敌人抗衡。但是，我们何时才能强大起来呢？是下周？还是明年？还是等到我们完全被缴械，家家户户都驻守着英国士兵的时候呢？难道我们就这样仰面高卧，紧抱着那虚无缥缈的和平幻觉不放，直到敌人把我们的手脚都束缚起来的时候，才能获得有效的防御手段吗？先生们，如果我们能妥善利用自然之神赐予我们的有利条件，我们就不弱小。如果我们三百万人民在自己的国土上，为神圣的自由事业而武装起来，那么任何敌人都是无法战胜我们的。此外，先生们，我们并非孤军作战，主宰各民族命运的正义之神，会号召朋友们为我们而战。先生们，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胜利永远属于那些机警的、主动的、勇敢的人们。况且，我们已没有选择余地了。即使我们那样没有骨气，想退出这场战争，也为时晚矣！我们已毫无退路，除非甘受屈辱和奴役！囚禁我们的锁链已经铸就，波士顿草原上已经响起镣铐的叮响声。战争已不可避免——那就让它来吧！我再重复一遍，就让它来吧！

回避现实是毫无用处的。先生们会高喊：和平！和平！！但平安在？实际上，战争已经开始，从北方刮来的大风都会将武器的铿锵回响送进我们的耳鼓。我们的同胞已身在疆场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袖手旁观呢？先生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生命就那么可贵？和平就那么甜美！甚至不惜以戴锁链、受奴役的代价来换取吗？全能的上帝啊，阻止这一切吧！在这场斗争中，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法国】米拉波（1749～1791）

米拉波，法国政治家。法国革命前，面临严重经济危机，财政部长年克提出征收高额所得税。本文是米拉波于1771年9月在国民会议上发表的支持内克的演说。

关于年克的经济计划

财政部长为我们的财政状况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他肯定地告诉我们，任何延宕必然使危机恶化。只要再拖延一天，甚至一分一秒，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代替他提出的计划。因此，我们只能靠这个计划了。但是，有些先生问：我们有时间审查及彻底研究这个计划，并核实其计算方法吗？没有了，一点点时间都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提出一些随意的猜测和无关紧要的质询；这样做只会把他人引入歧途。我们是否应为此而错过关键的时机呢？诸位先生是否愿意全国经济总破产；也不愿意作出牺牲和交付税款？总破产还不就是最残酷、最不公平、最不合理、而且会带来大灾大难的征税吗？请忍耐片刻听我说几句话吧。

两个世纪以来的横征暴敛挖下一个要吞没我们国家的深渊。这可怕的深坑必须填平。但是怎么填？这里有一份财产所有人的名单。从中挑出最富有的人来吧，这样可以使要牺牲的公民人数减至最少。只要挑出来就行了！为了使广大人民得救，难道不应该牺牲少数人吗？于吧，这里有两千个显要人物，他们的财产可以弥补财政赤字。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和平与繁荣吧！动手吧，不要心软！牺牲这些不幸的受害者，把他们投到深渊里去，深渊也就填平了！

你们被这计划吓得畏缩。你们多么矛盾、懦弱呵！怎么，你们难道没有想到，如果公布全国经济破产，或更坏的是，未作公布而无可避免地破产了，你们会极其丢脸，因为你们做了比罪犯还要坏一千倍的事，那实在愚不可及且毫无补益。我建议的办法虽然令人震惊，但毕竟可以消除财政赤字！

你们以为拒绝付款就不欠债了吗？想想看，那突然爆发的可怕破产，或因破产而生的剧变，会令成千上万的人顷刻之间失去给他们的生活以慰藉、甚至是唯一赖以生存的事物。难道你们以为他们会让你们安安稳稳地享用犯罪的果实吗？这场降临到法兰西头上的灾难，将造成数不清的恶果。对此冷漠的旁观者，麻木不仁的自私自利者，你们以为这场使人伤心绝望的大变故会像其他灾难那样，终将成为过去了，甚至因其变动剧烈而会更快过去？难道你们真有把握这许多忍饥受饿的人会让你们安稳地享受种种美味佳肴，分量一点不少，味道丝毫不差吗？不，你们会灭亡的！在这场人们自己伸手点燃的遍地焚烧的大火中，你们不仅声名扫地，你们那可厌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将烧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我们正在走的路。

我还要告诉你们，对于实行政府要求的这些牺牲，比起其他的人最有利害关系的正是你们自己！那么，投票通过这项额外补贴案吧，但愿这能补足亏缺！尽管你们对这措施还有点模模糊糊、不明真相的怀疑，但在这紧迫情况下，你们别无选择了。我们也不能立即找出其他可以替代这项措施的办法。那么，你们就投票吧，因为国家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回避这个问题，我们要对一切延误的后果负责。小心有人要求拖延时间！灾难不让人有拖延时日从容

思索的余地了。……

【德国】歌德（1749～1832）

歌德，德国诗人、剧作家、批评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诗剧《浮士德》，自传《诗与真》等。

莎士比亚纪念日的讲话

我觉得我们最高尚的情操是：当命运看来已经把我们带向正常的消亡时，我们仍希望生存下去。先生们，对我们的的心灵来说，这一生是太短促了，理由是：每一个人，无论是最低贱或最高尚，无论是最无能或最尊贵，只有在他厌烦了一切之后，才对人生产生厌倦；同时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尽管他渴望着这样做；因为他虽然在自己的旅途上一直很幸运，往往能眼看到自己所向往的目标，但终于还要掉人只有上帝才知道是谁替他挖好的坑穴，并且被看成一文钱不值。

一文钱不值啊！我！我就是我自己的一切，因为我只有通过我自己才了解一切！每个有所体会的人都这样喊着，他（高视）阔步走过这个人生，为（踏上）彼岸无尽头的道路作好准备。当然各人按照自己的尺度（来做）。这一个带着最结实的旅杖动身，而另一个却穿上了七里靴，并赶过前面的人。后者的两步就等于前者一天的进程。不管怎样，这位勤奋不倦的步行者仍是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尽管我们对那一位的（高视）阔步表示惊讶与钦佩，尽管我们跟随着他的脚印并以我们的步伐去衡量着他的步伐。

先生们，请踏上这一征途！对这样的一个脚印的观察，比起呆视那国王入城时带来的千百个驾从的脚步更会激动我们的心灵，更会开扩（我们的胸怀）。

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位最伟大的旅行者，同时也为自己增添了荣誉。（因为）在我们身上也蕴藏着我们所公认的那些功绩的因素。

你们不要期望我写许多像样的（东西）！心灵的平静不适合作为节日的盛装，同时现在我对莎士比亚还想得很少；在我的热情被激动起来之后，我才能臆测出，并感受到最高尚的。我读到他的第一页，就使我这一生都属于了他；当我首次读完他的一部作品时，我觉得好像原来是一个先天的盲人，这时的一瞬间（有）一只神奇的手赋予了我双目的视力。我认识到，我很清楚地体会到我的生活是该无限地扩大了；一切对于我都是新鲜的，陌生的（东西），还未习惯的光明刺痛着我的眼睛。我慢慢学会看东西，这要感谢天使使我具有了识别能力！我现在还能清楚地体会到我所获得的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踌躇过一刹那，去放弃那遵循格律的戏剧。地点的一致对我如同牢狱般地可怕，情节的统一和时间的一致是我们想象力的沉重桎梏。我跳进了自由的空气里，这才感到自己（生长了）手和脚。现在，当我认识到那些讲究规格的先生们从他们的巢穴里给我硬加上了多少障碍时，以及看到有多少自由的心灵还被围困在里面时，如果我再不向他们宣战，再不每天寻找机会以击碎他们的堡垒的话，那么我的心就会愤怒得碎裂。

法国人用作典范的希腊戏剧，按其内在的性质和外表的状况来说，就是这样的：让一个法国侯爵效仿那位亚尔西巴德却比高乃依追随索福克勒斯要容易得多。

开始是一段敬神的插曲，然后悲剧庄严隆重地以完美的单纯朴素（风

格)，向人民大众展示出先辈们的各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在各个心灵里激动起完整的，伟大的情操；因为悲剧本身就是完整的，伟大的。

在什么样的心灵里啊！

希腊的！我不能说明这意味着什么；但我感觉出这点，为简明起见，我在这里根据的是荷马，索福克勒斯及忒俄克里托斯；他们教会我去感觉。

同时，我还要连忙接着说：小小的法国人，你要拿希腊的盔甲来做什么？它对你来说是太大了，而且太重了。

因此所有的法国悲剧本身就变成了一些摹仿的滑稽诗篇。不过那些先生们已从经验里知道，这些悲剧如同鞋子一样，只是大同小异，它们中间也有一些乏味的东西，特别是经常都在第四幕里，同时他们也知道这些又是如何按照格律来进行的。这方面我就无需多花笔墨了。

我不知道是谁首先想出把这类政治历史大事题材搬上舞台的。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可以借此机会写一论文，加以评论。这发明权的荣誉是否属于莎士比亚，我表示怀疑；总而言之，他把这类题材提高到至今似乎还是最高的程度，眼睛向上看（的人）是很少的，因此也很难设想，会有一个人能比他看得更远，或者甚至能比他攀登得更高。

莎士比亚，我的朋友啊！如果你还活在我们当中的话，那我只会和你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想扮演配角匹拉德斯，假如你是俄来斯特的话！而不愿在德尔福斯庙宇里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司祭长。

先生们，我想停笔，明天再继续写下去；因为现在滋长在我内心里的这种心情，您们也许不容易体会到。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个美妙的万花镜，在这里面，世界的历史由一根无形的时间线索串连在一起。从我们眼前掠过。他的构思并不是通常所谈的构思；但他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神妙的点（还没有一个哲学家看见过这个点并给予解释），在这里我们个人所独有的（本性），我们从愿望出发听想象的自由，同在整体中的必然进程发生冲突。可是我们败坏了的嗜好是这样迷糊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几乎需要一种新的创作，来使我们从这暗影中走出来。

所有的法国人及受其传染的德国人，甚至于维兰也在这件事情上和它一些更多的事情一样，做得不太体面。连向来以攻击一切崇高的权威为职业的伏尔泰在这里也证实了自己是个十足的台尔西特。如果我是尤利西斯的话，那他的背脊定要被我的王笏打得稀烂！

这些先生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莎士比亚的人物性格表示特别反感！

我却高呼：自然，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

这样一来，于是乎他们一起来扭住我的脖子。

松开手，让我说话！

他与普罗米修斯竞争着，以对手作榜样，一点一滴地刻划着他的人物形象，所不同的是赋予了巨人般的伟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不出他们是我们的兄弟——然后以他的智力吹醒了他们的生命。他的智力从各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因此大家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我们这一代凭什么敢于对自然加以评断？我们从什么地方来了解它？我们从幼年起在自己身上所感到的以及在别人身上所看到的，这一切都是被束缚住的和矫揉造作的东西。我常常站在莎士比亚面前而内心感到惭愧；因为有时发生这样的情形：在我看了一眼之后，我就想到：要是我的话，一定会把这些处理成另外一个样子！接着我便认识到自己是个可怜虫，从莎士比亚

描绘出的是自然，而我所塑造的人物却都是肥皂泡，是由虚构狂所吹起的。

虽然我还没有开过头，可是我现在却要结束了。

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关于世界所讲的一切，也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所称之为恶的东西，只是善的另外一个面，对善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与之构成一个整体，如同热带要炎热，拉伯兰要上冻，以致产生了一个温暖的地带一样。莎士比亚带着我们去周游世界；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无所见识的人遇到每个没见过的飞蝗却都要惊叫起来：先生，它要吃我们呀！

先生们，行动起来吧！请你们替我从那所谓高尚嗜好的乐园里唤醒所有的纯洁心灵，在那里，他们饱受着无聊的愚昧，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他们内心里虽充满激情，可是骨头里却缺少勇气，他们还未厌世到致死的地步，但是又懒到无所作为，所以他们就躺在桃金娘和月桂树丛中，过着他们的萎靡生活，虚度光阴。【法国】罗伯斯庇尔（1758～1794）

罗伯斯庇尔，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的实际政府首脑。1794年热月党人发动政变，被捕后于次日处死。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过许多精彩的演说。1791年12月18日他在立法议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说，主要驳斥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鼓吹战争而不顾及人民利益的观点。这篇演说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最后的演说词》是他临终前两天发表的演说。

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

如果战争是换取自由的必要代价，法兰西民族决不拒绝战争；但是，她拒绝一切旨在消灭自由和宪法的战争方案，即使它是在保卫法兰西民族的借口下提出来的。

爱国的立法委员，现在我来回答你，你提出了哪些预防措施来防止这些危险，反对这种同盟呢？一项也没有。

爱国的立法委员，请不要恶意中伤持怀疑论者。不管你怎么说，他们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他们对自由的深厚感情就像一个人唯恐失去爱情一样。

新的立法委员们，请想一想，要是你们的前任曾经感到需要这种美德，你们完成任务就会比现在容易多了。没有这种美德，你们也会注定成为最卑鄙、最腐败的家伙手中的玩物和牺牲品；为了拯救自由，在一切必要的品质中，这种美德是你们唯一所缺少的，你们应当为此感到担心。

今年7月份，人民在首都流了血，人民也在，可凶手却没有受到制裁。这是谁下的命令？当然，有人民在。但是，你们，代表们，你们不也在吗？你们不去发现和挫败压迫者的计划，只会抛弃人民，让他们去行使起义的权利，那么，你们是干什么的？

（布里索叫喊：“向科布伦茨进军！向科布伦茨进军！一切祸害都来自那。”）

不，祸害的策源地根本不在科布伦茨，在你们中间，在你们内部。在向科布伦茨进军前，你们至少要能够打仗才行。现在怨声四起，反对计划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面目可疑的军官，让部队没有指挥官，让部分边境不设防，难道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既不了解计划，又不了解进行远征的奥秘及其后果，就要投身到一场远征中去吗？

目前根本不应宣战，首先应立即在各地制造武器；必须武装人民，哪怕是用长矛武装起来也好；必须采取严厉的、不同于迄今已采取的措施，使大臣们不能对国家安全家所需要的措施掉以轻心而不受惩罚；必须维护人民的尊严，保护他们被过分忽视的权利；必须监督财政开支的正确使用，而不能让国家的财力在一场冒失的战争中消耗殆尽；必须惩办犯法的大臣并坚持那个镇压叛乱僧侣的决议。我们怎么能指望人民比受他们委托负责维护其利益的人警惕性更高，比应该为人民事业献身者更多的献身，比他们选出的贤明者更加明智呢？

我们遇到了一个关系到我们革命的决定性危机；重大的事件将迅速地相继发生。那些在这种情况下不愿为解放祖国而抛弃他们的派性、他们的感情乃至偏见的人们该倒霉了。

最后的演说词

共和国的敌人说我是暴君！倘若我真是暴君，他们就会俯伏在我的脚下了。我会塞给他们大量的黄金，赦免他们的罪行，他们也就会感激不尽了。倘若我是个暴君，被我们打倒了的那些国王就绝不会谴责罗伯斯庇尔，反而会用他们那有罪的手支持我了。他们和我就会缔结盟约。施行暴政必须有工具。而暴政的敌人，他们的道路又会引向何方呢？引向坟墓，引向永生！我的保护人是什么样的暴君呢？我属于哪个派别？我属于你们！有哪一派从大革命开始以来查出这许多叛徒，并粉碎、消灭这些叛徒？这个派别就是你们，是人民——我们的根本！我忠于这个派别，而现代的一切流氓恶棍都拉帮结党反对它！

确保共和国的存在一直是我的目标；我知道共和国只能建立在永存的道德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为了反对我，反对那些和我有共同原则的人，他们结成了联盟。至于说我的生命，我早已置之度外！我曾看见过去，也预见将来。一个忠于自己国家的人，当他不能再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能使无辜的人免受迫害时，他怎么会希望再活下去？在这阴谋诡计永远压倒真理、正义受到嘲弄的地方，在这最鄙薄的热情欲和最无稽的恐惧常凌驾于人类的神圣利益之上的地方，我还能在这样的制度下继续做些什么呢？目睹在革命的潮流中，沙泥俱下，鱼龙混杂，周围都是混迹在人类真诚朋友之中的坏人，我必须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时我确实害怕我的子孙后代会认为我已被同流合污了。令我高兴的是，这些反对我们国家的阴谋家，因为不顾一切的疯狂行动，现在已和所有忠诚正直的人划下了一条深深的界限。

只要向历史请教一下，你便可以看到，在各个时代，所有的自由卫士是怎样受尽诽谤的。但那些诽谤者也终不免一死。善人与恶人同样要从世上消失，只是死法大不相同。法兰西人，我的同胞啊，不要让你的敌人用那为人唾弃的原则使你的灵魂堕落，令你的美德削弱吧！不，萧梅特啊，死亡并不是“长眠”！公民们！请抹去这用褻读的手刻在墓碑上的铭文，因为它给整个自然界蒙上一层丧纱，使受压迫的清白者失去依赖与信心，使死亡失去有益的积极意义！请在墓碑刻上这样的话吧：“死亡是不朽之始！”我为压迫人民者留下骇人的遗嘱；只有一个事业已近尽头的人才能毫无顾忌地这样说，这也就是那严峻的真理：“你必定要死亡！”

【美国】门罗（1758～1831）

门罗，美国第五届总统。民主共和党人，美国革命“开国元勋”中的最后一位总统。本文是他 1823 年 12 月 2 日致美国国会第七年度咨文。

门罗主义

.....

出于我们坦率的天性，加上我国和欧洲各国间的友好关系，我们宣布：如果欧洲列强企图把其制度扩张到本半球的任何区域，我们便认为此举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欧洲任何国家现有的殖民地与附属国，我们不曾干涉过，今后也不会干涉。但是对于有些已经宣布独立并维护其独立的政府，我们经过认真考虑并凭正义的原则，已经予以承认。我们认为，任何欧洲国家旨在压迫这些政府，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其命运，都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

我们承认这些新政府之时。就已宣告对它们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持中立态度。我们现在仍然持这种态度。如果形势不变，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态度。但如本政府主管当局判断形势发生变化，为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改变态度，美国将作相应的改变。

西班牙与葡萄牙近来发生的事件说明欧洲局势仍不稳定。这些重要事实最有力不过地证明了，各同盟国只依据符合自己心愿的原则，便认为可以以武力干涉西班牙内政。因此，以上述原则为依据的干涉行动可以扩展到何种程度，便成为其政府结构与西、葡政府结构不同的一切独立国家所关心的问题。甚至距离很远的国家对此亦感关切，其中美国尤为关切。

欧洲长期以来战祸频仍，我们对欧洲的政策是在欧洲战乱早期制定的。现在我国国策仍然不变，那就是，不干涉该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承认实际存在的政府是合法政府，与之发展友好关系，并以坦率、坚定与果敢的政策保护这种关系；在任何情况下满足每一国家的正当要求，但对任何损害我们的行为则绝不屈服。然而，南北美洲的形势大不相同。如果各同盟国要将他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这两大洲的任何部分，就不可能不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幸福。此外，无人会相信，如果听任我们南方兄弟作自由选择，他们会自愿选择同盟国的政治制度。因此，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干涉，要我们漠然置之，也同样不可能。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西班牙和这些新成立的政府的力量、资源以及其间相隔的距离，可以看到，西班牙显然无法令这些新政府屈服。美国的真诚政策仍然是对他们双方都不加干涉，因为我们希望别的国家亦采取同一政策。

.....

【法国】德穆兰（1760～1794）

德穆兰，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一位领袖。因反对罗伯斯庇尔镇压反革命，被送上断头台处死。本文发表于1788年2月，发表后两天，革命群众便攻占了巴士底狱。

生不自由，毋宁死去

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有一点区别。仅仅这点区别就足以使人怀着恐惧摒弃君主统治，不惜牺牲一切以建立共和制了。民主政体下的人民可能会受骗。但至少他们珍爱美德。他们把权力交给他们相信是有道德的人，而不是交给作为君主制基础的流氓恶棍。邪恶、诡计、犯罪等等共和国之痼疾，却是使君主政治健全和赖以生存的要素。黎塞留红衣主教公开承认他的政治原则是“君主应永远避免任用绝对诚实的人之才能。”远在他说这话之前，萨卢斯特就说过：“君主身边不能缺少恶棍流氓。相反，他们应惧怕任用诚实与正直的人。”因此，只有在民主政体下，善良的公民才有可能看到阴谋与罪犯不能得逞。为了达到这目的，只需使人民受到启蒙。

君主制与共和制之间还有一点区别：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卡利古拉、图密善的统治都以善始。事实上，一切统治开始之时都比较开明，但只是一种假象而已。因此保皇党人嘲笑法国目前的状况，似乎认为它始于暴力与恐怖，故不能持久。

所有事情都使专制君主生气。受人爱戴的公民会成为君主的敌手，他会引起内乱，因此就是一个可疑分子。相反来说，假如他不求闻达，深居简出，这种退隐生活使他引人注目，因此他便是一个可疑分子。假如他很富有，那末他就极可能以慷慨馈赠来腐蚀人民，因此，他也是一个可疑分子。你穷吗？那又怎么样！永远正确的皇帝陛下们啊，这人可要严密监视，因为没有人比一无所有的人更野心勃勃了，他是个可疑分子！你生性阴沉、忧郁，或是不修边幅吗？那末你一定是因为不满国事而苦恼了，你是个可疑分子。

……

塔西佗告诉我们，古罗马有一条法律，专门治“不敬君主”之罪。犯此罪者要判处死刑。古罗马共和国的叛逆罪有四种，那就是：在敌国领土上擅离军队私逃；煽动叛乱；管理国库不善；由于不称职而损害了多数罗马人的利益。

但是罗马皇帝们需要更多法律条款，以便给一些城市和公民多加罪名。奥古斯都最先扩大了“不敬君主”罪或“革命”罪的范围。他的后继者继续扩大这种罪的范围，以至无人可幸免。最轻微的行动便构成反对国家之罪。看一眼，露一点愁容，表一点同情，叹一口气，甚至一声不响都是犯了“不敬君主”和不忠之罪。处死你的父母或朋友，你也必须欢欣雀跃，否则你自己也就完了。公民们，自由必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加图宁愿剖腹自杀，也不愿受国王统治。有哪一个国王比得上伟大凯撒的英雄气概呢？但加图仍不能忍受凯撒的统治。卢梭说得很对，“自由同清白与美德一样，只有在你享有它们时，才会感到满足，一旦失去它们，你就会感到欢乐停止了。”

【美国】杰克逊（1767～1845）

杰克逊，美国第七任总统。他是“最后一个由于个人地位重要而当选的美国总统”（马克思）。这是他首任就职演说，时为1829年3月4日。

捍卫自由

公民们：

在我即将承担一个自由的民族经过挑选所委派于我的艰巨职责时，我谨利用这一合乎惯例而又庄严的时刻来表达我被你们的信任所激起的感激之情，并接受我的职守所规定的责任。你们极大的关注使我深信，任何感谢之词都不足以报答你们所授予我的荣誉，同时又告诫我，我所能作出的最好的报答，就是将我微薄的能力热忱地奉献给你们谋福利尽义务的事业。

作为联邦宪法的工具，在一段规定的时期内，执行合众国的法律，主管外交及联邦各州关系，管理税收，指挥武装部队，通过向立法机构传达意见，普遍保护并促进其利益等职责将移交给我。现在由我简要地解释一下我将赖以努力完成这一系列职责的行动准则是颇为适当的。

在实施国会的法律时，我将始终铭记总统权力的限制及范围，希望借以执行我的职能而不越权。在与外国的交往方面，我将致力于研究调停各种可能存在和可能产生的争端，以更多地表现出适合于一个大国的克制而不只是一个勇敢的民族所具有的敏感，在公正和体面的条件下维护和平及缔结邦交。

在我可能被要求执行的有关各州权利的措施里，我希望对我们合众国各个自主州的适当尊敬将能激励我工作，我将小心翼翼绝不混淆他们为自己保留的权利和他们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

国家税收的管理——在所有的政府中这都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是我们政府中最微妙和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它当然不会只引起我无足轻重的关注。从各个方面来考虑厉行节约，看来将大有裨益。我之所以切望能达到这个目标，是因为它既有利于偿清国债，而不必要的漫长期限是同真正的独立不相容的，也由于它将能抵制政府和个人的恣意浪费的趋势，而政府的庞大开支是极易造成这种浪费的。国会明智地制定了关于公款的拨用和政府官员欠账偿付期限责任的规定，这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一良好的目的。

至于旨在充实国家岁入的纳税对象的适当选择，我以为构成宪法的公正、谨慎和互让的精神，要求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巨大利益应当受到同样的关照。也许这一原则唯一的例外在于，对其中任何一种于民族独立必不可缺的产品给以特殊的鼓励。

国内的进步以及知识的传播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将能受到联邦政府宪法条例的尽力的鼓励。

考虑到常备军在和平时期对自由政府构成的危险，我将不寻求扩大现在的编制，我也不会无视政治经验提供的有益教训，即军方必须隶属于文官政府。我国海军要逐步增强，让它的战旗在遥远的海域飘扬，显示出我们航海的技术和武器的声誉；我们的要塞、军火库和码头要得到维持，我们的两个兵种在训练和技术上要采用先进的成就等等，这些都有审慎的明文规定，恕我不在此絮谈其重要性。但是我们的国防堡垒是全国的民兵，在我国目前的

才智和人口的情况下，它一定会使我们坚不可摧。只要我们的政府为民众谋福利，按他们的意志进行管理；只要它保障我们人身和财产的权利，保护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它定将值得捍卫；只要它值得捍卫，一支爱国的民兵将以坚不可摧的盾来护卫它。我们可能会遭受部分的伤害和偶尔的屈辱，但是成百万掌握作战方法的武装的自由人决不会被外国敌人所征服。因此，对任何以加强国家的这个天然屏障为目标的正义制度，我都乐于尽力给以支持。

对我们境内的印第安部落，我真诚地永久希望遵循一项公正和宽容的政策，我们将对他们的权利和要求给予人道的和周到的考虑，而这种权利和要求是同我国政府的习惯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

最近表露出来的公众情绪已经在行政任务表里铭刻了改革的任务，字字清晰，不容忽视。这项任务特别要求纠正那些使联邦政府的保护同选举的自由发生冲突的滥用职权的弊端，并抵制那些扰乱合法的任命途径和将权力交给或继续留在不忠实和不称职的人的手中的情况。

在执行这样大致阐述过的任务时，我将努力选择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勤勉和才干将确保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效和忠实地进行合作，为了推进这项公职，我将更多地仰赖政府官员的廉正和热忱，而不在于他们的数量。

我对自己的资格缺乏自信，也许这是很正确的，这将教导我对我的杰出前任留下的公德的榜样无比敬仰，对那些缔造和改革我国制度的伟人们的光辉思想敬慕不已。这种缺乏自信同样促使我希望得到与政府并列的各个部门的教诲和帮助，以及广大公民们的宽容和支持。

我坚定地仰赖着上帝的仁慈，它的天佑保护了我们的民族于襁褓之中，迄今为止在各种盛衰荣枯之中维护我们的自由，这将激励我奉献热忱的祈祷，愿上帝继续给我们可爱的国家以神佑和美好的祝福。

【法国】拿破仑（1769～1821）

拿破仑，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1799年发动政变，1804年称帝。任内加强中央集权，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使帝国达到鼎盛。《开进来兰》是1796年5月15日意大利方面军和平占领米兰后，他向士兵们发布的命令。1815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流放于圣赫勒拿岛。《我要拥抱鹰旗》是他去圣赫勒拿岛之前向卫队发表的演说。

我要拥抱鹰旗

我旧时的卫队士兵们：

我向你们告别。二十年来，我一直陪伴你们走在光荣的道路上。在最后的这些年月里，你们一如我们全盛时期那样，始终是勇敢与忠诚的模范。有了像你们这样的兵士，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失败的。但是这样战事就不会结束，要成为内战，法国就会蒙受更深的苦难。

为了国家的利益，我已经牺牲了我的一切利益。

我要离去了，但是你们，我的朋友，还要继续为法兰西服务。过去我唯一的想望是法兰西的幸福。今后，这仍将是我的祝愿。不要为我的命运惋惜；我之所以苟活，那也是为了你们的光荣。我准备将我们过去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书写成文。别了，朋友们，但愿我能紧紧地拥抱你们。

开进米兰

士兵们！你们像山洪一样从亚平宁高原上迅速地猛冲下来。你们战胜并消灭了一切阻挡你们前进的敌人。

从奥地利暴政下解放出来的皮埃蒙特，表现了与法国和平友好相处的天然感情。

米兰是你们的，在全伦巴迪亚上空，到处都飘扬着共和国的旗帜。

帕尔马公爵和莫德纳公爵能够保留政治生命，完全归功于你们的宽宏大量。

号称能够威胁你们的敌军，再也找不到更多的障碍物，可以凭借它们来抵挡你们的勇气了。波河、提契诺河和阿达河不再阻挡你们前进了。意大利这些所谓了不起的堡垒看来都是不堪一击的，你们像征服亚平宁山脉一样迅速地征服了它们。

你们取得这样多的胜利使祖国充满喜悦。你们的代表们规定了节日，以示庆祝你们的胜利，共和国所有的公社都在庆祝这个节日。你们的父亲、母亲、妻子、妹妹以及你们所有心爱的人都为你们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都以自己是你们的亲人而感到自豪。

是的，士兵们！你们做了许多事情。可是，这是不是说你们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呢？人们在谈到我们时会不会说，我们善于取得胜利，却不善于利用胜利呢？后代会不会责备我们，说我们在伦巴迪亚碰上了卡普亚呢？不过我已经看见你们在拿起武器，懦夫般的休养生活已经使你们烦恼啦！你们为荣誉而花去的时光，也就是为自己的幸福而花去的时光。总而言之。让我们前进吧！目前我们还需要急行军，我们必须战胜残敌，我们要给自己戴上桂冠，对敌人给我们的侮辱必须给以报复！

让那些准备在法国挑起内战的人等着吧！让那些卑鄙地杀死我们的驻外使节和烧毁我们土伦的军舰的人等着吧！复仇的时刻到了！

但是，要叫老百姓放心。我们是一切老百姓的朋友，特别是布鲁图家族、西庇阿家族和一切我们奉为典范的大人物的后裔的忠实朋友。恢复卡皮托利小山上的古迹，在那儿恭敬地竖起一些能使古迹闻名的英雄雕像；唤醒罗马人，使他们摆脱几百年的奴役造成的昏沉欲睡的状态。这些将是你们的胜利果实，这些果实将在历史上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不朽的荣誉将归于你们，因为你们改变了欧洲这一最美丽部分的面貌。

自由的、受全世界尊敬的法国人民正在给全欧洲带来光荣的和平，这种和平将补偿它在六年中所忍受的一切牺牲。那时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你们的同胞就会指着你们说：他是在意大利方面军服役过的！

【英国】坎宁（1770～1827）

坎宁，英国政治家，反对法国大革命及雅各宾派。坎宁曾任外交大臣及海军司库。

论欧洲大陆体系的瓦解

……

现在，已经到了考验的时刻，应该问一问备尝艰苦的人们——尤其要问问那些不在座的人，因为有谁比他们受到更大的困苦？——在这次战争的过去任何一个阶段，有没有一种既能得到和平，同时又能维护国家利益、不辱国家尊严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不去问那种主要只从国家的力量与安全来看她的尊严的人。但是。如果这种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热衷于维护国家的荣誉，却只在极端疲惫和信心不足时便甘愿放弃斗争，那么，我便要问问他，他能否指出，希望在哪一个时候大不列颠政府和国会应该同意放弃斗争？

是不是应该在欧洲大陆还处于和平的时期？那时你在欧洲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互相连结的体系，一个巨大的大体（指法国），周围环绕着许多卫星。在那个时候，我国能得到和平，能维持十二个月的和平吗？答案是什么？唉，我们已经试验过了，结果是重新开战。

那么，是不是应该在后来，在大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在三分之二的欧洲港口已经向你们关闭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在只缺一环就能把整个大陆联成一条铁链，使你不能同各国交往的那个时候？在那时候，人家倒是十分热情地向你们提出和平。先生们，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初次来到你们之中。那时，我冒昧地劝告你们要有耐心，要坚持下去；我说我怀有一个希望，因为这个巨大的联合体是勉强形成的，是强加给大陆国家的，可能不久就会四分五裂。当时你们是姑妄听之，我不知道有几分说服力。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屈服于窘迫与恐惧的压力之下，难道今天应该感到遗憾？结果如何呢？大陆体系在 1812 年确实建立起来了，唯独俄国在外。那一年，我国承受的压力无疑是难忍的。倘使我们当时作了让步，这个体系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于是，第二年还未过去，这个体系就土崩瓦解了。它瓦解了，正如一切暴力体系必然终将解体那样，它不像终于天年的生命，和缓地、逐渐地衰亡，而是突然地分崩离析；它瓦解了，好似冬日的寒霜，太阳出来便消融蒸发。还是在昨日，整个欧洲大陆像覆盖在一块巨大的坚冰之下的广阔平原，呈现出一片荒凉惨淡的景象；今天，天上吹来的和煦温风，将这块大地解冻，于是，河水又潺潺奔流，人类恢复交往。

我们在那严酷的季节下没有屈服，没有像疲惫已极的异乡游子那样躺下歇息——那种歇息无异于死亡——难道今天反而感到后悔吗？我们当时没有气馁，坚持下来，静待变化，难道不是很明智吗？

【德国】黑格尔（1770—1831）

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完成者。著有《逻辑学》、《哲学全书》等。本文是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得堡大学教授哲学文的开讲辞。

哲学开讲辞

诸位先生：

我所讲授的对象是哲学史。而今天我又是初次来到本大学，所以请诸位让我首先说几句话，就是我特别感到愉快，恰好在这个时机我能够在大学里面重新恢复我讲授哲学的生涯。因为这样的时候似乎业已到来，即可以期望哲学重新受到注意和爱好，这门几乎消沉的科学可以重新扬起它的呼声，并且可以希望这个对哲学久已不闻不问的世界又将倾听它的声响。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大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现在现实的这股潮流既然已经打破，日尔曼民族既然已经从最恶劣的情况下开辟出道路，且把它自己的民族性——一切有生命的生活的本源——拯救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希望，除了那吞并一切兴趣的国家之外、教会也要上升起来，除了那为一切思想和努力所集中的现实世界之外，天国也要重新被思维到，换句话说，除了政治的和其他与日常现实相联系的兴趣之外，科学、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也要重新兴盛起来。

我们将在哲学史里看到，在其他欧洲国家内，科学和理智的教养都有人以热烈和敬重的态度在从事钻研，惟有哲学，除了空名字外，却衰落了，甚至到了没有人记起，没有人想到的情况，只有在日尔曼民族里，哲学才被当作特殊的财产保持着。我们曾接受自然的较高的号召去作这个神圣火炬的保持者，如同雅典的优摩尔披德族是爱留西的神秘信仰的保持者，又如萨摩特拉克岛上的居民是一种较高的崇拜仪式的保存者与维持者，又如更早一些，世界精神把它自己最高的意识保留给犹太民族，俾使它自己作为一个新精神从犹太民族里产生出来。（我们现在一般地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较大的热忱和较高的需要，即对于我们只有理念以及经过我们的理性证明了的事物才有效准。——确切点说，普鲁士国家就是这种建筑在理智上的国家。）但是像前面所提到的时代的艰苦和对于重大的世界事变的兴趣也曾以阻遏了我们深切地和热诚地去从事哲学工作，分散了我们对于哲学的普遍注意。这样一来坚强的人才都转向实践方面，而浅薄空疏就支配了哲学，并在哲学里盛行一时。我们很可以说，德国自有哲学以来，哲学这门科学的情况看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坏过。空洞的词句、虚骄的气焰从来没有这样飘浮在表面上，而且以那样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这门科学里说出来做出来，就好像掌握了一切的统治权一样。为了反对这种浅薄思想而工作，以日尔曼人的严肃性和诚实性来工作，把哲学从它所陷入的孤寂境地中拯救出来——去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认为是接受我们时代的较深精神的号召。让我们共同来欢迎这一个更

美丽的时代的黎明。在这时代里，那前此向外驰逐的精神将回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固有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和神圣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

我们老一辈的人是从时代的暴风雨中长成的，我们应该赞赏诸君的幸福，因为你们的青春正是落在这样一些日子里，你们可以不受扰乱地专心从事于真理和科学的探讨。我曾经把我的一生贡献给科学，现在我感到愉快，因为我得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在较高的水准，在较广的范围内，与大家一起工作，使较高的科学兴趣能够活跃起来，并帮助引导大家走进这个领域。我希望我能够值得并赢得诸君的信赖。但我首先要求诸君只须信赖科学，信赖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条件。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人有了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东西会坚硬顽固到不对他展开。那最初隐蔽蕴藏着的宇宙本质，并没有力量可以抵抗求知的勇气；它必然会向勇毅的求知者揭开它的秘密，而将它的财富和宝藏公开给他，让他享受。

【英国】欧文（1771～1858）

欧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新社会观》、《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这是作者 1817 年 8 月 14 日的讲演。

让更多的人幸福

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满足无聊和无用的虚荣心。我来到大家面前，是为了完成一项庄严而极其重要的任务。我所重视的，不是要博得大家的好感和未来的名望。这两项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支配我的行动的惟一动机，是希望看到你们和全体同胞到处都能实际享受到大自然所赋予我们享受极其丰厚的幸福。这是我终身抱定、至死不移的愿望。

世人如果具有智慧的话，在以往许多世代中早就会发现：人们一向追求的这种恩惠，这种非财富所能购买的天赐，一直是掌握在世人手中，甚至连那些历来最不受尊敬的人也能具有这种幸福。幸福的条件虽然遍地皆是，但愚昧却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它用荒谬绝顶的精神环境重重包围住这些条件，这种环境严密万分，而且牢牢地挡住了任何大胆的冒险者，因此连世代积累的经验也一直未能突破它的重重阴影。

这种黑暗环境的统治虽然有无数奇形怪状的毒蛇猛兽防卫着，但终于成为过去了。

经验将它的形迹深深地印在以往的时代中，并毫不疲倦、毫无恐惧、毫不松懈地在它那正义的道路上坚持到底。当敌人睡着的时候，它在前进：当敌人没有注意它的行动时，它在悄悄地往前爬。它前进时虽然步步艰巨而又危险，但终于使敌人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地看到它跨到外层的障碍上来了。一切黑暗势力马上开始了凶险恐怖的活动。准备对这个胆大妄为的来犯者实行报复。

但经验是真知与灼见之母，因而它的一切举止都是明智而又坚定的。以往它一直把自己的伟大和力量隐藏起来，现在它突然展示出它那万能的真理之镜，镜上闪耀出这样神圣的光辉，使得黑暗的全体妖魔看了以后都在这种耀眼逼人的光芒下惊骇退缩，而这种光芒却一下就刺中了他们的心房。这些妖魔完全绝望地溃逃了，甚至现在还在慌忙地向四面八方逃跑，永远离开我们的住处，让我们能充分地享受完整的团结、真正的美德、持久的和平和实际的幸福。

朋友们，今天我希望你们都投到“经验”这位胜利的领导者的旗帜下面来。请不要为这一建议而感到惊恐。由于原先曾受到这位永无过失的教师的教导，我甚至在目前就要更前进一步；现在我要向你们说：你们将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被迫归于经验的旗帜之下，今后你们将永远无法背离它，而今天这个日子后世也将永志不忘。这位领导者的统治和管辖，将使你们感到十分公平和正确，你们将不会感到任何压迫。在经验的城池中绝不会有饥饿和贫困的危机。由于愚昧和迷信而兴建的监狱，将永远敞开大门，监狱的刑具留作经验的应得的战利品。在它的永无差错的规律下，你们的体力和智力都将得到发展，你们将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工作，这一切对于你们自己和旁人都将是有益的、愉快的和有利的，因而使你们再也不想离开你们的正义道路。

在发生怀疑的时候，事实总是随时准备提供证据的。事实说：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帝国现在所遭受的苦难、贫困和悲惨状况比以往许多世纪曾经实际遭受的都更为严重。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帝国从来没有过这样多得不可胜数的条件可以使全体人民解除这种苦难、堕落和危险。

我国当政者还没有提出任何合理办法，对成千成万在贫困中挣扎的人进行一劳永逸的实际救济，他们的家却不必要地成了危害人生的各种苦难的渊藪。

这些当政者没有其他方面的帮助对这个问题便无法具有充分的权力和实际知识来适当地运用国家丰盈有余的条件，使人民摆脱愚昧和邪恶，而这两者又是一切现存祸害的来源。

这种权力和实际知识的帮助，只能由社会上各地区最善于思考、最为明智和最有教养的那部分人明确表示的舆论提供。

事实也证明，舆论应当提出以下各点：

一、一个国家如果供养一大部分劳动阶级过首无所事事的贫困生活或者从事无谓的工作，就永远不能富强。

二、任何国家如果存在着偏见和贫困，而仅有的教育又坏到不堪设想的程度，那就必然会使人民的道德败坏。

三、在这种人民中如果酒店林立，公开赌博的诱惑一应俱全，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变得低能无用，或是作恶、犯罪和危害他人。

四、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用强制手段并使用严峻、残酷和不公平的惩罚。

五、接着人民就会对当政者产生不满、怨恨和各种反抗情绪。

六、政府如果允许和纵容一切恶习、坏事和犯罪行为的诱因存在，而又大谈宗教，大谈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状况，大谈提高他们的道德，那就简直是在嘲笑人们没有常识了。

七、这种行动和言论是欺骗群众的无聊和愚蠢的办法；现在群众已不再受这些言行欺骗了；将来这种矛盾百出和无意义的废话也骗不了任何人。

八、如果让这类条件保存下去，而又希望国家进步，那就像是看到天下江河日夜奔向海洋，还在等待海洋干涸一样愚蠢而无远见。

九、如果要消除这些祸害，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有价值的知识和建立永久的幸福，那就必须把陷于贫困、邪恶、犯罪、苦难和不良习惯之中而又聚在一起的广大群众逐步加以隔离，分成若干可以管理的部分，分配到全国去。

十、如果改善低级阶层以至整个社会的状况，就绝对必须拟定办法使劳动阶级的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有利的方式雇用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和有益的享用品。

十一、我们必须作出安排，使劳动阶级在稳健和公平的法律下通过自己节制有度的劳动获得这一切幸福。在广大人民的品行和知识提高时，这种法律就将相应地扩大他们的自由。

十二、现在着手进行这种安排的经验和条件都已具备；这种变革丝毫不会损及任何人，相反，它会使每个人，从最受压迫和最卑下的人直到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将从这种变革中获得实际的和持久的利益。

事实还说明，现代有学识而无经验的人，如果认为目前行将公开提出的关于消除贫穷、邪恶和犯罪行为的计划会产生、增加和延续贫穷的现象，那

他们就完全想错了。

这些先生们把聪明机智的人所能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都提到公众面前来了，我个人十分感谢。我所希望的是整个计划能受到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使它的直接效果和最间接的后果没有一点不为世人所知。它将经受住最强烈和最稳定的光芒的照射，否则我就不会为它作辩护了。

在这里我要请问这些先生们：

如果把儿童从最小的时候起，就小心地好好加以培养，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用正确和精密的实际知识来教导儿童，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使儿童获得健康，养成仁慈的性情和其他良好习惯，并使他们养成积极而愉快的工作作风，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在劳动阶级中教导每一个男人，使他们学会园艺、农业以及至少另一种行业、工业或职业的实际业务和有关知识；假如我们教导每一个妇女，使她学会用最好的方法看管小孩、培养儿童并操持所有的日常家务，使自己和旁人都生活得舒适；假如我们还教导妇女，使他们学会园艺以及某种有用的、轻松的合乎健康的工业劳动的实际操作和有关知识，请问这个计划中的这些部分或其中任何一部分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假如消除了愚昧、忿怒、报复和其他一切邪恶情欲的根源，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把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培养得节制有度、勤勉而有道德，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以精诚团结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使大家结合在一起，并对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不信任的感情，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如果使世界的财富增加三倍、十倍以至于百倍，这会不会是产生、增加并延续贫穷现象的作法呢？

我还可以对这些先生们提出许多其他问题，他们的答案也许不会像答复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样现成，但我只要提出一个就够了。

他们能提出什么办法使我国人民摆脱全国举目皆是的愚昧、贫困和堕落的现象呢？这些现象如果不迅速加以制止，就必然很快会使所有的阶层淹没在一片混乱和毁灭的景象中。

我有这种看法，而且它在我的心目中就像我现在看到大家一样清楚。这样我难道还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吗？难道我应当讲究毫无意义的形式和习惯而闭口不言吗？不，就我目前所能获得的知识来说，假定我为了任何一种个人打算而不设法让大家听到迄今仍然微弱的真理之声，那我岂不是成了人类的头号罪魁了吗？这种真理之声已经像方舟上的鸽子一样飞出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一真理在前进中永不停步，直到它走遍和充塞世界各地为止。它的影响将驱散和消灭一切瘴疠和一切污秽邪恶的东西。朋友们，它将使我国和其他一切国家变成理性动物的乐园。但是，朋友们，我作为一个平凡而现实的人和长期熟悉人类事务的人向你们提出：在这个时期来临以前，你们身上有许多东西要革除，你们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你们的行动中的这种变化，只能根据初期不完善的方式来完成。

实际推行现在所提出的措施的方式有很多种。我要提出的第一种方法是

切尔西区詹姆斯·约翰逊先生寄给我的，他在信中写道：“未来幸福的前景一旦展示以后，人们就会有耐心来等待享受它的日子。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提出一个简单方案来筹集实现这一计划的资金。我认为基金有十万镑就够了：至于这笔钱究竟应当作为一个新村的基金还是分成较小的份额，则可因时因地制宜。这一数目的一般利息是五千镑。我想不难找到一百个极愿倡导任何增进贫民幸福的事业的绅士，我们在全国各地的慈善团体中可以找到证据（充分的证据）说明，在有必要的时候，从来也不会缺少慷慨的精神……”

富人如果希望改善他们所供养的人或其他人中那些愚昧、无知、邪恶和可怜的人的状况，也可以由一人或若干人按照上面所提的方式组织这种生产团体，从而为同胞们谋求最大福利。富人这样做就能极其有把握地增加他们的收入，并使他们的人生乐趣与时俱增。但在上述两项或其中的任何一项计划没有实现以前，我还有其他任务要完成。我必须指导建立一个包括以上所提出的全部安排的完整的示范团体；此外还要制定惟一能管理这些新村居民、使之获得以上所预言的一切利益并在改进过程中永不倒退或停滞的规章制度。

我还要做这些事情。在我的健康、精力和其他条件允许时，我将始终尽个人的一切能力，根据现在提出的计划帮助这类新村兴建起来。如果我能真正帮助推行任何方面拟制和提出的任何更优越的计划，我将同样感到快慰；不，凭良心说，这样帮助别人所得到的真正快慰，比我支持自己的任何计划还要大。

但我要声明，在世界上愚昧和无知的阻挠下，我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深刻的研究和积极的试验，以便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计划能十分成熟起来。我这样进行工作，并把计划所根据的原理突出地提到公众面前的时候，已经花了很多钱，数目之大足以使一个普通人或目光短浅的谨慎小心的人望而却步。直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而且现在也不为这样花去的任何一点时间和一个先令而感到任何懊悔。我不要求报酬，而且也不应该得到任何报酬：我只是完成了我的责任。我从青年时代以来所抱的主要的伟大人生目标每现在已经完成了，这原理和计划目前已经牢牢地扎下了根，甚至今后全世界的人联合起来也完全元力把它们从公众的心目中铲除。从现在起，它将日益加速地得到推行。

但是能够看到这种令人欣喜的团结合作的协作社在我国和其他国家盛行起来，将使我感到高兴。如果我还能多活一些时候，我最高的雄心壮志就是在这样一个幸福的新村中作一个普通居民。在那里我的开支每年将不超过 20 镑。

根据许多政论家和公务活动家的评论来看，我认为这问题还没有为人所理解。直到目前他们所看到的还只是我所想到的很少几个部分，而且以一种很不调和的方式和他们自己的许多概念混合起来；他们那些概念和我提的计划则是凤马牛不相及的。许多敏感而明智的人对于这一问题事先没有认识；对于这种新奇的人力组合法感到十分诧异而吃惊，因而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提案人一定是一个疯子、一个幻想家，要不然就是一个热情冲动的狂人。

根据以上的看法，我请求大家首先让我一气呵成地把下列决案宣读出来，然后再把它们分别地提供大家考虑和裁决：

一、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有许多贫民和劳动阶级目前无法获得工作来维持适当生活。

二、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贫民、失业者和不能充分就业的人现在都由教区和到处林立而又有害的私人慈善机关来维持，这笔开支对许多教区来说是力难承担的。

三，在这种情形下，贫民和劳动阶级普遍遭受的贫困和灾难大概比我国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严重。

四、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类体力劳动的价值和人民一般衣食价格相比时低于以往任何时期。

五、除非社会作出其他安排，有目的地使一切能够并且愿意劳动的人获得生产性的工作，体力劳动就不可能以有利于国家的方式重新获得恰当而必要的价值。

六、如果能找到方法使任何国家的劳动能作最有利的运用，这在政治经济学上来说，是最富于现实意义的事，因为这对一切阶层的幸福和福利都有最根本的影响。

七、我们必须减低济贫税，并逐步消除贫穷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一切有害和使人堕落的后果。

八、对于这一攸关我们帝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根本利益的问题，要想做出郑重而严肃的判断，就不应草率从事。现在所提出的计划应当由各阶层中最明智、最富于善意并由于原先的素养而能对这一问题提出实用意见的领袖人物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仔细考查和研究；因为我们现在必须做点事情了。

九、全面考查委员会应当由下列贵族和缙绅组成，或由其中愿意为自己、为国家并为子孙后代完成这一高尚而重大的任务的人组成。委员会有权随时增加入选凑足法定人数。

十、该委员会应当将其考察和工作的结果向明年 5 月初为本问题而召开的大会提出报告。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大会可以提前举行。

十一、本计划提案人将根据委员会的要求随时提供自己所掌握的资料。

我本来无意在目前作进一步的讨论，但是，昨天晚上有一个最富于公益和慈善精神的先生（他的姓名目前我还不便冒昧宣布）来访问我，并以最慷慨的态度提供一千五百英亩左右的土地让我作无限期的使用，这块土地从各方面来看都适于作试验，其价值至少有五万英镑，我在 10 月以后的任何时期，都可以用来作实验。因此，我不禁要提出以下各项补充决议案：

十二、现在最好是尽可能立即进行一次或更多次的试验。

十三、这方面的募捐现在已经开始，募得 10 万英镑或相等价值的土地时，就可以立即开始进行第一次试验。募得 10 万英镑以后，就可以立即开始进行第二次试验。以后每多募得 10 万英镑就可以开始进行一次新的试验。

十四、下列各位先生或其中有意参加活动的人，可以组织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在本计划提案人的协助下指导并监督这种试验。

十五、由大会向那位为国家慷慨捐助土地，供我们在需要时作试验用的先生表示最诚恳和最热烈的谢意。

【美国】韦伯斯特（1782～1852）

韦伯斯特，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辉格党创始人。曾两度出任国务卿。他以演讲著称。本文是为悼念约翰·亚当斯和杰斐逊逝世而发表的演说。演说的主题是弘扬、继承美国传统。这篇演说被誉为“炉火纯青”“无人匹敌”的经典作品。

独立宣言永存

今天，当我们悼念美国独立战争中杰出的政治家亚当斯先生、发扬美国革命传统的时候，亚当斯先生为支持美国独立而大声疾呼的动人场面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不管沉浮，不论生死，任凭幸存或毁灭，我都衷心拥护这次通过独立宣言的表决。的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并非在于独立，但是，上帝决定了这种结局。英国的个公正行为，使它看不到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却迫使我们拿起了武器，不管英国怎样顽固坚持殖民立场，我们都要战斗下去，直到独立已垂手可得时，我们便伸手把它拿过来，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把独立宣言拖延下去呢？难道竟有人如此软弱，至今还希望英国和解，指望它来保障北美的生存和自由，保障自己的生存和荣誉吗？难道不是您——那位坐在椅子上的先生，难道不是他——坐在你身边的那位可敬的同事，难道你们两位不是被放逐、受惩罚的对象吗？英国的政权依然存在，在毫无希望得到英王宽恕的情况下，你们除了当化外顽徒之外，能做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我们把独立推迟下去，那么，我们是要把战争坚持下去，还是放弃呢？我们要服从包括波士顿港法案在内的国会议案吗？我们还要允许毁灭我们自己吗？我们能愿意国家受蹂躏、权利遭践踏吗？不！我们不想屈服，也将永不屈服。

当我们推举出华盛顿去冒种种政治风险，甚至可能会招致战争危难之时，我们曾保证：不论出现什么情况，即使倾家荡产或者献出生命，也要全力支持他。难道现在我们却想违背在上帝面前立下的敬重华盛顿的神圣誓言吗？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宁可看到一场大火把大地烧掉，一次地震把地球毁灭，也不愿看到我们的一句誓言化为泡影！十二个月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曾建议：为了捍卫美国的自由，不论是他自告奋勇也好，还是人们推选他也好，应当任命华盛顿当三军司令。就我来说，假如在支持他的过程中有半点犹豫动摇，那我就情愿做一个白痴，甘心受到一切惩罚。

我们必须把战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既然战争要坚持下去，那么为什么要把独立宣言的实施长期地推迟下去呢？宣言会使我们坚强起来，会使我们赢得国际声誉，各个国家会同我们交往。可是，我们现在要是承认自己是拿起武器造英王反的叛民，各国就决不会和我们打文道了。不仅如此，我相信，一旦我们独立，英国就会很快同我们进行和谈。它不会同意以撤消一些法律条文的方式承认，它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正义的和压迫的行为。如果顺应了我们的独立潮流，那么，它的尊严就会比在论战中向叛臣让步所受的损害要小得多。前者它会认为是命运的结果，后者它会感到是自己的耻辱。那么，为什么，先生，为什么，我们不尽快地把内战变成民族战争呢？既然我们要把战争进行下去，而且最终我们必定会取得胜利，那么为什么不把我

们自己放到享受一切胜利利益的地位上去呢？

若是我们失败的话，情况也再坏不到哪里去。况且，我们不会失败。我们的事业会召集起陆军，我们的事业也将会创造出海军。人民，人民，如果我们忠于人民，那就会使我们，使全体人民把光荣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不管其他人如何多变，可是我了解这些殖民地的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思想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每个殖民地的人民都表示，只要我们带头，他们就响应。

先生们，宣言将鼓舞人民，增加人民的勇气。与其仅仅为了恢复权利，纠正冤情，得到英王赠给的特许豁免权而进行一场持久的流血战争，还不如倾注于完全独立的光荣目标，让人民吸进新生活的空气。你要是在军队面前宣读独立宣言，勇士们就会拔刀出鞘，发出誓言，去维护它，宁愿战死在疆场上；你要是到教堂的讲坛上去发表这个宣言，它必将赢得宗教界的赞成，热爱宗教自由的感情就将以它为核心，信徒们就将坚守宣言，将同宣言共存亡；你要是把宣言拿到娱乐大厅去公诸于众，让那些听到了敌人的第一声炮响的人们看看它，让那些看到自己的子弟在帮克高地的战场上或者在莱科西顿大街和康克得大街上倒下去的人们看看它，那么，整个大厅都会迸发出支持宣言的雷鸣般的吼声。

先生，我知道人世间的的事情变幻无常。我明白了，经过这一天的事情后我彻底明白了。当然，我和你都不会后悔。我们可能活不到这一天——实现宣言的日子，我们可能死去，到死的时候仍然可能还是殖民地的人，仍然是奴隶。死，可能在绞架上屈辱地死去。就那样好了。假如天意要我把这微不足道的生命献给我们的国家，我将随时准备着，在需要牺牲的时刻死。让这个时刻到来吧！然而，在我活着的时候，让我有一个国家，起码有一个希望中的国家，有一个自由的国家吧。

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坚信这个宣言将永存。为了它，可能得付出钱财，也可能得付出鲜血和生命。但是，只要宣言存在，就会加倍补偿这两方面的损失。透过现在的黑暗，我看到了未来的光明，它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我们将使它成为一个光荣的、不朽的一天。当我们进入坟草的时候，我们的子孙一定会纪念这一天。他们将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像欢庆节日一样燃起篝火，张灯结彩来庆祝这一天。这一天在一年一度到来的时候，他们将共洒热泪如涌泉。那泪水再也不是殖民者的泪水，不是奴隶的泪水，不是悲痛的泪水，那泪水是狂欢的泪水，感激的泪水，喜悦的泪水。先生，在上帝面前，我坚信这个时刻一定会到来。我赞成这个宣言，我的全部心血都贡献给它。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整个身躯，我今生今世的一切希望都准备随时倾注于它。最后，我再重申开始时讲的话：不论生死，也不管幸存或毁灭，我都支持这个宣言。上帝保佑，这是我生时的夙愿，死时的希望，现在独立，永远独立。

杰出的预言家和忠诚的爱国者亚当斯先生，您所说的一天是光荣的一天，它将一年一度降临人间。您的声明将和它连在一起，您一生的光荣也将同您逝世这一天一样，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美国】西雅图酋长（1790～1866）

西雅图，美国皮吉特湾印第安人酋长，对白人殖民者友好。1855年与白人签订埃利奥特条约，出让印第安土地和建立印第安人保留地。这是他在订约之前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数不尽的世代以来，渺渺苍天曾为我族洒下多少同情之泪；这个在我们看来像是永恒不变的苍天、还是会变的。今天天色晴朗，明天又阴云密布。但我的说话却像天空的星辰，永远不变。西雅图说的话，正如日自东出，春去秋来，华盛顿的大酋长可以确信无疑。白人酋长说，华盛顿的大酋长向我们致意，表示友好。我们感谢他的好意，因为我知道他无所求于我们，不用我们以友情回报。他的人民众多，犹如覆盖着广阔原野的青草。我的人民稀少，像风催雨袭后的平原上稀疏的树木。那位伟大的——我还假定他是善良的——白人酋长派遣人告诉我们，愿意买下我们的土地，但同时也愿意留下足够的土地让我们舒适地生活。这看来确实很公道，甚至很慷慨，因为红种人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得到他尊重的权利了，他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合宜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辽阔的地域。……我不愿再详述我们民族过早的衰微，也不再为此哀叹，不责备白种兄弟加速了我们的衰败，因为我们或许多少也应该责怪自己。

……

白昼与黑夜不能相遇。红种人对白种人从来就是敬而远之的，就像朝雾在旭日升起前就要消散一样。然而，你们的建议看来是公道的，我想我的人民会接受建议，退居到你给他们的保留地。这样我们就能分处两地、和平共存，因为白人大酋长对我人民所说的话，有如大自然从沉沉黑暗中发出来的声音。

我们在什么地方度过余年已经无关重要。我们的来日不多了。这原来比你们更强大、更有希望的民族，曾经人口兴旺，受大神的庇护，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幸福地安居乐业，再过几月，再过几冬，这个民族再也不会会有一个后裔留下在它的墓前致哀了。但我又何必为我民族的天忻哀叹呢？一个部落没落，另一个部落就会振兴；一个民族衰亡，另一民族便会崛起，像海潮一样，后浪逐前浪。这是自然的法则，悲叹惋惜是无用的。你们衰落的时间可能还很遥远，却必定到来。因为即使是能够同上帝像朋友一样亲密无间的白人，也不能免于同样的命运。我们终究会成为兄弟的，等着瞧吧。

我们会考虑你们的建议的，等到我们作出决定，就会通知你们。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项建议，我现在在这里就要提出一个保留条件：我们要求有权随时不受干扰地扫谒我们祖先、朋友和子孙的坟墓。这里每一寸土地对于我的人民都是神圣的。每一片山坡，每一个河谷，每一块平原，每一丛小树都由于往日的哀愁与欢乐而变得无比圣洁。……地上的尘土在我们脚下比在你们脚下更柔软舒适，因为那上面浸满我们祖先的鲜血，我们赤裸的脚踩上土地之时更觉其上充满深情。……甚至只是在这里短暂地居住、嬉戏过的幼童也会热爱这阴沉沉的荒地。在暮色降临之时，他们会迎接那些幽暗朦胧的阴魂归来。当最后一个红种人死去，白人对这个部落的回忆已经成为神话之时，

我部落的那些看不见的亡灵，仍将密密地聚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们的子孙以为他们独自在田野、仓库、商店、公路或寂静的、无路可通的森林中时，他们也不是四周无人。……夜深人静，你以为城镇村落阒无一人时，街上将满是归来的故主。他们过去曾住在这里，他们仍然热爱这块美丽的土地。白人永远不会独占这个地方。

愿他公平、正直、善意地对待我的人民，因为死者并没有失去力量。我说死者吗？不，死者并没有死，只不过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美国】埃弗雷特（1794～1865）

埃弗雷特，曾任美国众议员、马萨诸塞州州长、哈佛大学校长、国务卿等职。本篇是他在公墓落成典礼上讲话的结束部分。

在葛底斯堡公墓落成典礼上的讲话

.....

朋友们，葛底斯堡和宾夕法尼亚的公民们，还有你们从远处各州来的同胞们，在我们分手之前，让我再次恳求你们为这些神圣的坟墓祝福。虽然这是一个气氛悲伤的场合，但是，在这里聚会，你们觉得欣慰。你们感到，东部人、西部人、十九个姊妹州的人，当年在激烈战斗中在危险的山脊上并肩作战，预兆了国家的昌盛繁荣。现在，你们感到，他们又将并排安息在这里，体现一种新的结合，直到比当年列队出征的军号声更为响亮的号角吹起，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联邦；我们勇敢的同胞为捍卫联邦而流洒的热血使我们觉得这联邦更加珍贵。我们怀念他们奋起战斗而又倒下去的地方；这些景色怡人的高地；不久前耳边还回响着听不惯的巷战枪声，如今已是熙来攘往的村庄；山脊外的原野（在那里高贵的雷诺兹曾阻止敌人前进；在他舍身成仁时已能预见他的自我牺牲会带来两天后的胜利）；山间蜿蜒的小溪（将来有一天会有农人从两岸的泥土里同时发现可怕的现代战争炮弹和古代战争的粗陋武器）；神学院山脊、桃园、公墓、卡尔普、狼山、圆顶坡、小圆顶坡，这些过去无名的小地方，从今以后将闻名遐迩，人心向往，千秋万代，永志不忘。在伯罗奔尼撒之战的第一年，伯里克利曾经站在阵亡的同胞遗骸前说过：“整个大地是杰出人物的坟墓。”他应该再加上一句：“无尽的时间长河是他们光荣的庆典。”当然，我不会看轻战争中其他的光辉成就，这些成就反映了合众国海、陆军的荣誉，理应使两军的官兵受到整个民族最热烈的感激和最丰厚的酬谢。但是，我们向先烈遗骸告别之时，我海、陆两军官兵肯定会和我们同声说：整个文明世界任何地方的人，读到这次伟大战役实况时，都会感到，翻遍古今历史的光荣记载，都不能找到比葛底斯堡战役更为辉煌灿烂的一页了。

【美国】约翰·布朗（1800～1859）

约翰·布朗，美国废奴主义领袖，1859年因组织黑人武装起义被俘，法院以“谋叛罪”判处布朗绞刑。在就义前，布朗慷慨陈词，发表了这篇演说。

就义前的讲话

如果法庭允许的话，我有几句话要说：

第一，除掉我所始终承认的——即我的解放奴隶计划之外，我否认一切。我当然想作些此类正义事情，如我去年冬天所曾做过的，当时我到密苏里，在那里双方没有开一枪便带走了奴隶，通过美国，最后把他们安置在加拿大。我计划着在更大的规模上再去做这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我想做的一切。我从未图谋过暗杀或反叛或毁灭财富或煽动奴隶造反或暴动。

我还有一个抗议：那就是我受这样的处罚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以我所承认的方式进行干预此事，而且我们承认的业已基本证实（因为我敬佩在这个案件中作证的大部分证人的诚实和公正），——假如我这样的干预是为了富人、有权势者、有才智者、所谓大人物的人，或者是为了任何他们的朋友，——无论是其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或者任何其中之一，——而且受到损害和牺牲，如我在这次干预中受到的一样，那就好了，那么在这法庭上的每个人都将会认为这种行为应当得到报酬而不应得到处罚。

我想这个法庭承认上帝的法律是正当的。我看到开庭时你们亲吻一本书，我想那是《圣经》，或至少是《新约全书》。这本书教导着我：愿意人怎样待我，我也要怎样待人；它又教我：“记着在縲继中的人们，就如同和他们被监禁在一起一样。”我努力遵照这个教训行动。我说，我还太幼稚，不能理解上帝是会偏袒人的。我相信如我所作的那样干预——如我所常常坦白地承认者，我曾是为了上帝的被人贱视的可怜虫的利益而行动，这不是错误而是正义的。现在在这个奴隶制的国度里千百万人的权利全被邪恶、凶残和不义的立法所摈弃，如果认为必要，我应当为了贯彻正义的目的付出我的生命，把我的鲜血，我子女的鲜血和千百万人的鲜血混合在一起，——我请求判决；就让它这样办吧！

让我还说一句话。

我完全满意于我在审判中所受到的处置。从各种情况来考虑，这比我所期望的更为宽大。但我认识不到我的罪。开始我就曾说过什么是我的意图，什么不是我的意图。我从没有危害任何人的生命的计划，也没有任何叛逆或煽动奴隶起义或发动任何总暴动的布置。我从没有鼓励过任何人去这样做，却总是打消任何这类的念头。

让我再说一句关于那些与我有关的人们所说的话。我听到他们中间有些人说我引诱他们和我联合，但事实却与此相反。我说这句话的目的不是来伤害他们，但是深为他们的弱点而抱憾，他们和我联合的没有一个人不是出自自愿的，并且他们大部分还是自己的钱。他们中间有很多直到来找我的那天，我从没有和他们见过面，从没有和他们说过一句话；这就是为着我已经说过了的目的。

现在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法国】雨果（1802～1885）

雨果，法国文学家，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杰出代表。其主要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本文是他1878年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讲话。

伏尔泰

一百年前的今天，一颗巨星陨落了。但他是永生的。他离开人世时已年登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最荣耀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他在咒骂与祝福声中溘然长逝：被旧时代所诅咒，又受到未来的祝福。这二者都是至高元上的光荣。在他弥留之际，一方面，他受到同时代人和后世子孙的欢呼赞美，另一方面，像其他曾经和旧时代搏斗过的人一样，那对他怀有深仇大恨的旧时代也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叫骂声。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这天意同样明白地体现在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之中。

这位伟人所生活的八十四个头，经历了达到极点的专制时期和刚刚露出一线晨曦的革命年代。他诞生时，路易十四尚在王位，他去世时，路易十六已经戴上了王冠。他的襁褓映照着王朝盛世的余辉，他的灵柩则投射上从大深渊里透出的最初光芒。

在这轻薄无聊、凄惨忧郁的时世下，伏尔泰独自一人，面对宫廷、贵族和资本的联合力量，面对那股毫无意识的强力——群盲；面对那些元恶不作的官吏，他们专门媚上欺下，俯伏于国王之前，凌驾于人民之上；面对那些教士，他们是伪善与宗教狂的邪恶混合体。让我再说一遍，伏尔泰独自一人，同社会上一切邪恶的联合力量宣战，向这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并与之搏斗。他的武器是什么呢？是那轻若微风、重如霹雳的——一枝笔。

他用这武器进行战斗，用这武器赢得胜利。

让我们向伏尔泰的英灵致敬吧。

伏尔泰胜利了。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伏尔泰具有女性的温柔和英雄的震怒，他具有伟大的头脑和浩瀚无际的心胸。

他战胜了陈旧的秩序和陈旧的教条，他战胜了封建君主、中古时代的法官和罗马的教士。他把黎民百姓提高到尊严的地位。他教化、他慰抚、他播种文明。他为西尔旺和蒙贝利而战，也为卡拉斯和拉·巴尔而战。他承受了一切威胁、辱骂、迫害、毁谤。他还遭到了流放。但是他不屈不挠，坚如磐石。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讽刺战胜专横，以嘲弄战胜宗教的自命一贯正确，以坚韧战胜顽固偏执，以真理战胜愚昧无知。

我刚才说到微笑，我要在这里停一停。微笑！这就是伏尔泰。

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这三个民族曾经用人的名字来总结和命名时代，使这些时代具有某种人的品格。我们说，伯里克利时代，奥古斯都时代，利奥十世时代，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时代。这些称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希腊、意大利和法兰西民族享有以人物来命名时代的特权，这正是文明的最

高标志。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某国元首来命名时代的先例。伏尔泰比国家元首更高，他是各派思想的元首，一个新的纪元以伏尔泰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应被理性所考察。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对于人民，高于一切的是法律，对于个人，高于一切的是良心。作为一个人，我们要行使权利；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克尽职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两方面的进步是明确分开的。

……我们要面向伏尔泰那伟大的生、伟大的死和伟大的精神。让我们在他神圣的墓前鞠躬致敬。他在一百年前与世长辞，但他曾造福人类因而永垂不朽，让我们向他请教吧。让我们也向其他伟大的思想家请教，向让·雅克，狄德罗和孟德斯鸠请教吧，他们是光荣的伏尔泰的辅翼者。让我们与这些伟大的声音共鸣。让我们在人类所流的血上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血吧。够了！够了！暴君们。既然野蛮不肯退让。好吧，让文明拍案而起，让 18 世纪来帮助 19 世纪吧。我们的先驱哲人都是真理的倡导者。让我们唤起那些光辉的亡灵，请他们在策划战争的君主们面前公开宣布人类有生存的权利和良知有争取自由的权利；请他们宣布理性支配一切；宣布劳动神圣；宣布和平应受到祝福。既然黑暗来自帝王的宝座，让坟墓中放出光明吧！

【美国】爱默生（1803～1882）

爱默生，美国诗人、散文家和演说家。本文是他 1837 年 8 月 31 日在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联谊会上的讲话。

论美国学者

.....

迄今为止，我们的节日一直只是一种友善的象征，表示我们这忙碌得无暇顾及文学的民族，仍然对文学存着一点爱好。因此，这点爱好有极宝贵的意义，显示我们对文学一种永不泯灭的本能。但是，也许应该有点变化，而且必会发生变化的时刻到了；这大陆上沉睡的知识分子早应觉醒，睁开沉重的铁眼皮，向世界提供一些比机械技术更美好的事物，满足世界期待已久的愿望。我们在学术上依赖别人，长期学习别国的日子快结束了。我们周围的千千万万人，正投身在火热的生活中，不能总吃外国文化的残羹剩饭。我们也有许多事变与活动，要我们去歌唱，它们也要歌唱自己。谁能怀疑诗歌在新时代里将复兴？它像正在天顶熠烁闪耀的天琴星座那样，据天文学家报告，终有一天将成为光照千古的明星，指引我们前进。

.....

我怀着喜悦看到未来的种种吉兆，它们已经透过诗歌和艺术、哲学和科学、教会和政府闪现出来。

这些征兆之一就是所谓国家最低层的阶级已通过运动提升了地位，这运动也同时令文学呈现出值得注意和良好的态势。人们着意发掘并谱写成诗的，不是崇高优美的阳春白雪，而是发生在身旁的、卑微而平凡的事物。那些为束装远游、寄情异国的人踩在脚下不屑一顾的事物，忽然被人发现其实远比一切外国事物更绚烂多彩。穷人的文学、童稚的感情、街头的哲学、家庭生活的意义，都是当代的题材。这是一个跃进。生命的暖流已经流入手指脚尖，身体四肢都已活跃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新的活力迹象吗？我不奢求伟大的、遥远的、浪漫的事物，不追求意大利或阿拉伯的成就，不追求希腊的艺术或普罗旺斯的吟游诗歌；我拥抱平凡，我要探索人所共知的平凡低下的事物。你们尽可占有古代和未来的世界，让我洞察今天的生活吧。我们要从哪里去真正了解意义呢？那就是从桶中饭菜、锅里牛奶、街头小调、马路新闻、目光一闪、身材形体、走路姿态——把这些微末琐事的终极道理写出来，把隐藏于其中最崇高的精神因素写出来吧，因为最崇高的东西往往隐藏在自然界最偏远最微末的地方。让我看到每件日常琐事都直接联系着一条永恒的法则。一间店铺、一把犁耙和一本帐簿同样会引起光波荡漾，值得诗人讴歌，这样，世界就不再是一间堆满零乱杂物、死气沉沉的陋室，却是井然有序。世界无所谓琐事细节，也无所谓疑案难题，最高的与最低的天地万物联成一体，有着同一的生命设计。

哥尔德斯密斯、彭斯、柯珀以及近代的歌德、华兹华斯、卡莱尔等的天才，就是由上述观念激发出来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遵循上述观念，各取得不同成就。同他们的著作相比，蒲柏、约翰逊和吉本的文体显得冷冰冰地带学究气。而他们的著作却都是热血沸腾的。人们惊异地发现，身边的事物并不见得不如远处的美丽与新奇。近的事物解释遥远的事物。一滴水就是一个

小小的海洋。一个人联系整个自然界。从平凡事物中感受价值，可以结出累累硕果。……

【意大利】马志尼（1805～1872）

马志尼，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派领袖。1831年在法国马赛建立青年意大利党。参加1848年革命。本文是他为纪念两位被奥地利统治者所杀害的意大利爱国者所发表的演说。

把你们的热血献给国家吧

年轻人，当我受你们邀请来到了这座寺庙，并说一些话以纪念殉难的班蒂拉兄弟及其部属志士，我想，有一些听到我的话的人，可能会出于高贵的愤慨而大叫：“为什么要哀悼死者呢？”我以为自由志士惟一足资纪念的事是：他们赢得了他们所参与的战斗。他们所倒下去的地方，正遭受敌人的控制；他们的出生地，正强敌环伺。让我们一起去解救吧，除非是解救的那一时刻已经来到，我们不讳言战争。

但是，你们又会想起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征服？为什么我们在北意大利正为独立而战，南方却在毁灭自由？又为什么一场战争，照理应该会马上蔓延至阿尔卑斯山的，却拖了四个月，像蝎子被火困住一样，进退失据？而新近奋起的人们何以变得像病人一样的疲劳，无力地辗转反侧？啊！不错，假使我们都认清了烈士们是为神圣的理想而死，假使他们至高的信心能使我们年轻人去战斗；假如我们有坚强一致的生活，使我们的行动化为一种思想，使我们每个思想化为一致的行动；假如我们将烈士的遗言牢记在心，并认清自由和独立是同样的一种东西，认清神明和人类、祖国和人道是每个想争取国家统一的计划中，两件不能分离的东西；你们也要记得，除非意大利统一，而且尊崇国民间的平等博爱，因崇敬不朽真理而被称颂伟大，并贡献于崇高的使命成为全欧洲人民的道德楷模，那么意大利就不会有真实的生活——因此我们所必需的，不是战争，而是胜利！

年青人啊！志士们所崇敬的理想，并不像你们喊口号那样冠冕堂皇。他们弥留时所遗留给意大利新生一代的伟大任务，要由你们来担当了；这个伟大的使命正被各地假教条分解、支离，被连根拔除，就靠我们来保护了。我回顾，看见在我们这个半岛上，到处都是希望已破灭的人们在拼斗，一会儿愤怒地高喊，一会儿又都沉寂了下来，一会儿高喊要自由，一会儿又默默地承受奴役；国家的灵魂究竟在哪儿啊？这种步调不一致的行动，如何能达成统一我也看不出有哪一句话可扭转那成百个意见分歧且自相矛盾的不当忠告，而群众就是被他们所诱惑着的呀？我也听到过以国家为重的章句——“北意大利——各州联盟——皇子一统”——但是意大利在哪里呢？这个班蒂拉兄弟所欢叫将为欧洲新时代的文明典范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国家在哪里呢？

我们正为最初的胜利而得意忘形，不去计划将来，我们忘记了获得神的启示的人正在受到磨难；所以神明为了惩罚我们的健忘，才延缓了我们胜利的来临。我的同胞呀！意大利的革命是顺应天意，合乎欧洲法意的啊。我们发誓要带给欧洲世界一种道德的进步。可是要达到目的，我们不能只借着政治小说，也不能借着探险理论，去转移或强化人民的生活呀！人道是依赖信心而生存和发育的；最伟大的原则才是引导欧洲迈向未来的指南针。现在让我们面向烈士的坟墓，要求这些为我们而死的人给我们引导，我们就会发现

胜利的秘诀就在于要崇拜信心。殉道的天使和胜利之神的使者是亲兄弟；只不过是一位仰首望天，一位俯着向地；自有历史起，当两位天使在天地之间偶然碰头时，就会培育出一个新生命，也就是从摇篮或坟墓，从布道者或先知培育出新人物的时候了。

没有共同的信心和共同的目标的人，就不会存在于真正的社会中。宗教就是用来宣扬信心和目标的。政治如是信心的真正实践，才能节制社会，并用来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而宗教就是提供原则来应用于政治上的。这个世界上毕竟只有一个太阳，同样的，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来说也是只有一个法则的。个人和全人类的法律都是相似的。我们所应该做的，并非是为了能反复演练我们本身具有的个人才华——我们的才华和自由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也并非是为了实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幸福可以在别处获得，而上帝也在那儿代我们做了。我们应贡献一生去发掘部分的天演律，并就我们个人所允许的环境和力量去实行它，把它的知识和慈爱扩散给我们的同胞们。

我们所要做的，是相亲相爱，努力去建立人类家庭的统一。当能达到一个羊舍仅有一个牧羊人时，神意、天律，就可能有降临的一日了。

要爱！爱使人的灵魂更接近于神：更伟大、更高贵和更美丽，爱是神明在世间的化身。要爱您的国家，要爱您生命的旅伴，要爱那些您准备与他们共享欢乐和悲哀的人，要爱那些对您亲切和您所喜爱的死者。可是得让您的爱是但丁所教予您和我们所教授给您的那种爱——是灵魂所共同渴望的爱，不要只为了寻求造物主命定不赐给我们的幸福才去爱，不要诱惑于必会使您陷入自我主义的妄念的爱，爱就是给予，是未来的保障，神给了我们爱，是我们人生旅途中赖以的支柱。爱是责任之路绽开的花朵；但是爱是不能改变责任之路的。你们要借着爱来纯化、强化和改善你们自己。

要爱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国家是你们父母的寝土，这儿说的是您的心所喜欢的语言，第一句爱语也在这儿滋润、低喃；这儿是神所赐予您的家，您要力争上游，您就更接近神了。在人类中，这儿就是您的化名，您的荣誉，您的称号。把你们的思想，你们的忠诚，你们的热血献给国家吧，使您的国家站起来，使她成为我们先烈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伟大、美丽，并要看清您没有给您的国家半点的虚伪和奴役的耻辱，也不要使她遭到分裂。你们应该这么做，正如上帝所要你们做的一样，你们有二千五百万的人口，拥有天赐的活力，优越的才干，你们所具有的光荣传统为欧洲各国所忌妒。你们的前途无量。你们得抬起你们的眼睛望着那最可爱的天空，看看你们四周这片欧洲最可爱的土地。你们的四周环绕着阿尔卑斯山和大海，你们的疆界，是上帝亲手为伟大的民族所拟划出来的——你们是天意注定如此的，否则什么也没有。因此，我希望你们二千五百万人没有一个人会脱离注定要将你们结合在一起的神力，也让在这儿的每一个抬头望天空的人都是自由人。要让罗马是你们赎罪的方舟，是你们国家的寺庙。这样，你们的国家岂不是欧洲命运的寄托吗？

愿神与你们同在，也祝福意大利。

【法国】布朗基（1805～1881）

布朗基，法国近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这是他1848年2月针对法国临时政府拒绝在市政大厅上空悬挂红旗所作的讲演。

为红旗而斗争

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1793年了！而是生活在1848年！

三色旗不是共和国的旗帜；它是路易·菲力浦和君主国的旗帜。

正是这面三色旗指挥了特朗斯诺南大街、韦斯郊区和圣埃蒂安的大屠杀。它曾多次沉浸在工人的血泪中。

人民在1848年的街垒上高高地举起了红旗，正像他们曾在1832年6月、1834年4月、1839年5月在街垒上举起过红旗一样。这面旗帜经历过胜利的失败的斗争，今后它就成了人民的旗帜。昨天，红旗还光荣地在我们的大厦前面飘扬。

今天，反动派无耻地把它扔到污泥中，并且胆敢诽谤污蔑它。

有人说，这是一面血的旗帜。它是用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先烈的鲜血使它成了共和国的旗帜。

红旗倒下对人民是一个侮辱，对先烈是一种亵渎。市卫队的旗帜将会盖上先烈的坟墓。

反动派赤膊上阵了。人们再一次认清了它的凶恶面目。保卫党分子跑遍了大街小巷，进行破口辱骂和恫吓，撕掉公民身上佩带的红色领章。

工人们！你们的旗帜倒下去了，你们听着，共和国不久将随着红旗倒下去。

【美国】林肯（1809～1865）

林肯，杰出的演说家，美国第十六届总统，1865年赢得内战胜利，废除了黑奴制。内战结束后被暴徒行刺身死。这是他1861年第一次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

第一次就职演说

我们的国家，连同她的行政机构，都属于定居其上的人民。任何时候，他们只要对现政府感到厌倦，便可以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改造政府，或使用革命的权利推翻政府。我知道许多德高望重的爱国公民希望修改国家宪法。我虽然没有提出修改宪法的具体建议，但是我完全承认，在这整个问题上，人民有权按宪法规定，以上述两种方式去行使他们的权利；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并不反对而是赞成给予人民公平的机会去行使这种权力。

……

最高行政长官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并未赋予他任何权力订立分裂各州的条件。如果人民愿意，他们可以确定这样的条件。但最高行政长官本人无权过问此事。他的职责只是接任管理现政府，在卸任时把政府机构完好地移交继任人。

人民是最公正的，我们为什么不对这点抱有最坚定的信心呢？在世界上，我们还能对别的什么寄予同样的或更大的希望吗？在目前南北分歧中，难道哪一方不坚信公理在自己方面？倘若掌握永恒真理与正义的万能之主站在你北方一面，或站在你南方一面，那么美国人民这位伟大的法官必会作出裁决、将真理与正义判与该方。

同样还是这些人民，他们明智地规定了我国的政体，使人民公仆的权力十分有限，不能为非作歹；他们还同样明智地规定了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使可将这极有限的权力收回自己手中。

只要人民保持道德情操和警惕戒备，任何行政管理人员，纵使极端腐败或愚蠢，亦不能在四年的短期中对这政体造成严重损害。

全体同胞们，请你们冷静认真地把整个问题考虑一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会因花费一点时间而失去的。如果有一个目标，促使你们在头脑发热时匆忙地采取了某些不经过深思熟虑是绝不会采取的行动，那么时间稍加拖延这目标就得不到实现了；但是，真正有价值的目标不会因时间拖延而得不到实现。你们当中有人不满未能改变旧宪法，更主要的是未能改变由你们自己根据旧宪法制定的各项法律。而新组成的政府即使愿意，也无直接权力去修改宪法或法律。就算承认在争论中，不满现状的人是正确的，仍然没有任何理由急促行事。上帝从未弃我们这得天独厚的国家于不顾，解决我们目前困难，依然是聪明的才智、爱国的热忱、基督徒的虔诚以及对上帝坚定的信赖。

不满现状的同胞们，内战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而不是我的手中。政府不会攻击你们。如果你们不主动进攻，就不会引起冲突。你们没有对天盟誓要摧毁这个政府，但是我却要最庄严地宣誓“维系、保护和捍卫”她。

我不愿结束我的讲话。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我们一定不要彼此为敌。虽然我们会感情冲动，但亦不要反目成仇。那神秘的记忆的心弦将把每一个

战场和每一个爱国志士的坟墓同我们辽阔国土上每一颗跳动的心和每一个温暖的家庭联结起来：我们善良的天性必将再次拨动这根心弦，使联邦团结的大合唱响彻云霄。

第二次就职演说

同胞们：

在第二次宣誓就职总统的时候，我不必像第一次那样作长篇的演讲了。第一次就职典礼上，较为详尽地叙述我们要采取的方针和道路，看来是合适与恰当的。现在，在我的四年任期结束之时，有关这场至今仍为举国瞩目与致力的大斗争的每个方面，时时有公开的宣告，因此没有新的内容向各位奉告了。我们的一切都依靠武装力量，这方面的进展，大家知道得和我一样清楚。我相信，大家对此颇感满意和鼓舞。我们对未来抱有很大希望，在军事方面就无庸多作预测。四年前我初次就职之际，全国思虑都集中在即将爆发的内战之上。大家对内战都怀有恐惧，都设法避免这场内战的发生。当时我在这个讲坛上发表的就职演说，全部内容就是为了不战而拯救联邦。当时城里的叛逆分子却企图不用战争而摧毁联邦，企图通过谈判来瓦解联邦，瓜分国家所有。双方都反对战争，但其中一方却宁愿战争也不愿联邦毁灭，于是内战爆发。我国黑奴占人口八分之一，他们不是普遍分布于全国各地，而是集中在南部。这些黑奴，构成一种特殊而重要的利益。尽人皆知，这种利益迟早会成为战争的起因。叛逆分子不惜发动战争分裂联邦，以达到增大、扩展这种利益、使之永存的目的，政府却除去要求将奴隶制限于原来区域，不使扩大之外，不要求其他任何权利，双方都不曾预料到战争会有这样大的规模，持续这样久，不曾预料到引起冲突的原因在冲突停止前会消失。双方都寻求轻而易举的胜利，不求彻底或惊人的结果。双方信奉同一宗教。敬拜同一上帝，都诉求上帝帮助战胜对方。说来奇怪，竟有人敢于要求公正的上帝帮助自己去榨取别人的血汗；但我们不要去品评他人吧，以免受到别人的评论。双方的祈求都不应得到满足，也没有任何一方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全能的上帝自有主张。“祸哉斯世，以其陷入故也，夫陷入于罪，事所必有，但陷入祸矣。”如果我们把美国的奴隶制当成是上帝必定要降给我们的灾祸，这灾祸已经到了上帝指定期限，他现在要免去这场灾祸了。他把这场可怕的战争降给南北双方，是要惩罚那些带来灾祸的人。笃信耶稣基督的人常把许多美德归于基督，我们难道可以说基督的这些作为，与他的美德相悖吗？我们满怀希望，我们热诚祈祷，愿这场惩罚我们的战争早日过去；但假若天意要这场战争延续下去，直至二百五十年来利用奴隶无偿劳动辛苦积聚下来的财富销毁净尽，直至奴隶在皮鞭下流淌的鲜血用刀剑下的鲜血来偿清，如同三千年前古语所说的那样，我们仍然要称颂上帝的判决是公允合理的。

我们对任何人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抱有善心，对上帝使我们认识到的正义无限坚定。让我们努力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愈合国家的战争伤痕，关怀战死的烈士及其遗属，尽一切力量争得并维护我国及全世界的正义的、持久的和平。

【德国】俾斯麦（1815～1898）

俾斯麦，德国国王威廉一世的首相。他拥护君主主义，力主以武力镇压革命，有“铁血宰相”之称。本文是他1888年在德国国会上发表的演说。

欧洲战争与战备

.....

试问，自从1870年的大战结束以来，哪一年不曾有过战争的警报？就在70年代初我们结束战争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说了：我们什么时候重新开战？什么时候我们再兴“复仇之师”？最迟不过五年。当时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是否会发生战争以及能否取得胜利（这正是中间派一位代表在国会上用来责备我的话），现今完全取决于俄国了。唯有俄国手里掌握着决定权。”

在现在这种时刻，我们必须尽力壮大自己。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能比世界上拥有同样资源的任何国家更加强大。因此，不利用我们的资源就是一种罪过。如果我们不需要一支随时可作战的军队，我们就无需征集这支军队。这事只取决于并不十分重要的费用问题。费用问题的确无关重要，我只是顺带提提而已。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便应付一切紧急情况。鉴于我国的地理位置，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建议我们必须作出比其他大国更大的努力才行。我国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在三条边界线上可能受到袭击。法国和俄国分别只有东部和西部是无掩护的国界。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或许加上直到现在德国人民所显示的团结力量比其他民族薄弱，使我们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更直接地受到敌对联盟国家的威胁。不管怎么说，上帝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邻里不允许我们稍有懈怠的地位，不允许我们在只求苟存的泥潭中打滚。

这项法案将使我国能增加装配有更多武器的部队。在我们不用增加士兵人数时，增加的士兵无需征集入伍。如果我们有了足够武器，他们就随时可以装备起来。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我还记得1813年英国供给我国后备军的卡宾枪，我用那些枪打过猎，那不是军人用的武器。当然，遇有紧急情况，我们可以很快地得到武器，但如果我们现在储备下武器，这项法案就能加强我们的和平力量，也能给予和平联盟以强大的支援。那就简直有如一个拥有70万军队的第四强国加入联盟。这是迄今在战场上最大的队伍。

.....

我从不主张侵略战争。我们决不发动战争。火必须有人去点才会燃烧，我们决不去点火。无论我们怎样意识到上述自己的力量，也无论我们相信盟国多么可靠，都不会因此而妨碍我们以固有的热忱与努力去继续保卫和平。我们不会意气用事，也不会冲动偏激。

.....

我们德国人除了上帝之外，不畏惧世界上任何人！正是由于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我们热爱和平，保卫和平。谁要是残忍地破坏我们的和平，他就会受到教训，知道我们德国人的尚武爱国感情意味着什么！1813年，当普鲁士还是一个弱小的王国时，这种精神就曾使我们全体人民一致团结在我们的国旗下。他还会知道，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现已成为全德意志民族的共同财富。因此，谁要想进攻德国，都会看到这是一个团结一致，武装起来，每一个战

士都抱定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必胜信心的德国。

【美国】道格拉斯（1817～1895）

道格拉斯，美国 19 世纪著名人权领袖之一。本篇是他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市举行的国庆节大会上发表的演说，用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国黑人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论奴隶制度

公民们，请原谅，恕我问一下为什么今天邀我来此演讲？我，或者我所代表的那些人与你们的民族独立有什么关系？独立宣言中所体现的政治自由和生而平等的伟大原则会赐予我们吗？而为此缘故，就邀我把我们卑下的礼品奉献给美国的圣餐吗？就让我承认这恩典并且要向由你们的独立为我们带来的恩惠表示虔诚的感激吗？

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我真希望这些问题能得到肯定的回答！那样，我的任务将很容易完成，我的负担将变得轻松并令人愉快。因为，有谁会如此冷漠以致全国的同情都不能使他动情？有谁那样无情无义而对感恩的要求都洋洋不睬？竟至不愿感恩戴德地领谢无法估价的善行呢？又有谁会这般迟钝而自私，竟然在奴役的锁链从他的肢体扯下来的时候，他却不愿开口为一国之狂欢佳节的欢呼助威呢？我不是那种人。在那种情况下，哑人也会雄辩地演讲，“跛者亦会如鹿踊跃”。

但事实真象并非如此。我是怀着我们之间有嫌隙的悲哀感觉才说这话的。这光荣的周年纪念日的围栏里不包括我。你们高贵的独立呈现的只是我们之间无法度量的差距。你们今天欢庆的幸事并非普天同庆。有资格享受你们父辈流传的平等、自由、繁荣和独立的宝贵遗产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为你们带来光明和安逸的阳光，却为我带来鞭答和死亡。这个 7 月 4 日是你们的，却不是我的。你们可以欢庆，我却只有悲哀。把一位身披枷锁的人拖进这宏伟、灯火辉煌的自由庙宇，并且请他与你们一道欢唱颂歌，这简直是无道的嘲弄和读神的讽刺。公民们，你们不会是用请我今天在此讲话的方式来嘲笑我吧？如果是，那就适得其反。请准我告诫诸位：曾经有个国家的罪恶堆积如山，结果被全能的上帝不费吹灰之力就摧毁了，并使之不复存在。重蹈这个国家的覆辙是危险的。今天我可以为被剥夺尊严和多灾多难的人民重唱哀歌。

我们曾经在巴比伦河旁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唏嘘不止。我们把竖琴挂在心中的柳树上，因为在那，掳我们为奴的人逼我们唱歌，榨取我们血汁的人迫我们强颜欢笑。他们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异邦唱那和華的歌呢？噢，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掉你，就让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们若不纪念你，就让我的舌头粘在上腭。

公民们，在你们全国范围内的喧嚣欢乐声之外，我听到千百万人的恸哭声！昨天，他们在沉重的锁链下辗转呻吟，今天，你们雷动的欢声使他们身上的枷锁更觉沉重难耐。如果我今天忘记了亲人的悲痛，不把它牢记心上，“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腭！”忘记了他们，对他们的冤屈处之泰然，而去参加庆祝歌唱，这将是 最丑恶最骇人听闻的背叛行为，将受到上帝和世人的指责。因此，同胞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美国的奴隶制，我要从一个奴隶的观点来看今天这个日子和它那为众人所知的特点。

我站在美国奴隶的同一立场把他们蒙受的冤屈当作我自己的冤屈。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出我心灵深处的感受：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品格与行为再也没有像今天7月4日这样黑暗的了！不管过去发过多少宣言，今天又有多少表白，这个国家的行为还是显得同样丑恶，同样令人憎恨。美国过去失信，现在失信，将来也就必然失信。在这个场合里，我和上帝站在一起，与被压榨流血的奴隶站在一起，我要以遭到蹂躏的人性的名义，以被禁锢的自由的名义，以宪法与圣经被无视践踏的名义，最强烈地质问和谴责使奴隶制度得以存在的一切！奴隶制是美国最深重的罪恶和最大的耻辱！“我决不闪烁其词，我也绝不宽恕原宥，”我要用最严厉的言词。然而，只要不被偏见蒙蔽，只要不是天生的奴隶主，就不会不承认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公道的。

……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中有七十二种罪，黑人犯人其中一条，即使他不是明知故犯，也要判处死刑；但同样的罪中，却只有两条白人犯人才会受相同的惩罚。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不正是承认了黑人是有道德、有知识、有负责的人吗？奴隶也是人，这一点是得到承认的。南方各州的法律典籍中充斥禁止教育黑人读书写字的条文，违者罚以巨款或处以重刑，这事实上承认奴隶是人，如果你能指出有哪一条法律条文规定不许教野兽读书写字，我就同意去论证奴隶是不是人。如果连街边的狗、天空的鸟、山上的牛群、海里的鱼类和爬行的蛇蝎都区别不出奴隶和野兽，那时我再和你们辩论到底奴隶是不是人吧！

……
你们把人当作野兽，剥夺人的自由，强迫他们去做无酬的劳动，不让他们知道同胞之间的亲密关系，用棍棒敲打他们，用皮鞭把他们抽得皮开肉绽，用铁链锁住他们的手脚，放狗追咬他们，在集市上拍卖他们，拆散他们的家庭，敲落他们的牙齿，灼烙他们的皮肉，使他们忍受饥饿，以迫使他们屈服听命于主人。此种种，难道你们竟还要我去论证这沾满鲜血，极端腐朽的制度是错的？不，我不去做这种事！我还不如省点时间和精力来做些有用的事呢！

……
现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有说服力的论理，而是炽热的烙铁，啊，要是我有能力使全国的人都听到我的声音，我今天就会滔滔不绝地倾吐出尖刻的嘲笑、强烈的谴责、无情的讥刺和严厉的申斥。因为现在需要的不是光，而是火；不是和风细雨，而是雷电霹雳；我们需要暴雨，需要飓风，需要地震。我们必须触动这个国家的感情，唤起她的良知，震撼她的礼义之心，揭露她的伪善，公开谴责她违反上帝和人类的罪行。

你们的7月4日，对于美国奴隶来说是什么日子？我要回答说：这日子比一年之中其他日子更使他清楚看见他经年累月所受的不公正和残酷待遇。你们的庆祝对于他们是一场欺骗；你们鼓吹的自由不过是行恶的特许证；你们所谓民族的伟大精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荣自负；你们的欢呼是虚张声势；你们对专制的谴责是厚颜无耻的胡说；你们高喊的自由平等是空洞虚假的冒牌货；你们的祷词和赞美诗，你们那喋喋不休的布道说教和感恩祈祷，加上你们那些宗教游行和隆重仪式，都只不过是上帝的吹牛、撒谎、蒙骗、不敬和伪善，只是为了把你们的罪恶遮掩起来的一层薄纱。哪怕是野蛮人的国家也会因这样的罪恶蒙受耻辱。但是，现在没有野蛮人的国家。此时此刻，

在地球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比美国民族的所作所为更骇人听闻，更有血腥味了。

你们可以走遍海角天涯，找遍旧大陆所有君主专制的极权国家，访遍南美洲，到处去挑出一切陋规恶习，然后把其中最放在这个民族每天所做的事情旁边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像我这样说：在极端野蛮和最无耻的伪善方面，美国确实首屈一指，举世无匹。

【德国】马克思（1818～1883）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恩格斯一起领导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事业，并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里选收的两篇演说词，前者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后者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演说词中的经典之作。

在纪念 1830 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 国际大会上的演说

各民族团结友爱，这是目前一切党派，尤其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最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死亡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复活。不过死亡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过时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极大多数的人听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建立起来。

同别的国家比较起来，英国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的国家。因此，英国无产阶级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其所以说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而不是在波兰解放波兰，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你们，宪章主义者，不应该仅限于表示有解放各民族的善良的愿望。粉碎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有权感到自豪，是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那些所谓的 1848 年革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于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懂得粉碎。它们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 19 世纪的秘密，19 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 1848 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二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

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 1849 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 19 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和无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猾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 Vehmgericht”（菲默法庭）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屋子的主人受到了“Vehm”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德国】恩格斯（1820～1895）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最紧密的战友。恩格斯是伟大的演说家，他一生讲演甚多。这是恩格斯 1883 年 3 月 17 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的讲话。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3 月 14 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总共不过两分钟，我们再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在这安乐椅上安详地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所以，生产直接与生活有关物质用品，会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物质用品的生产和经济发展的程度又构成了该民族的国家制度、法制观念、艺术、以至宗教思想发展的基础。因此，我们心须从这个方向来解释上述种种观念和思想，而不是像以往所做那样，作相反的解释。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剩余价值的发现，使前此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在黑暗中摸索、探求的问题上豁然开朗，得到解决。

一生中以有这样的两项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有一项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是数学方面，都有独到的发现。他研究的领域很广，对其中任何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是以各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制度，协助现代无产阶级得到解放。这些现代无产阶级有赖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求，意识到自身的解放条件。斗争是他的气质。他斗争时所具的热忱、顽强精神和成就，无人能及。他做过的工作有：在早期的《莱茵报》（1842 年）、巴黎《前进报》（1844 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 年）、《新莱茵报》（1848～1849 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 年）等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其后参与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个组织的工作，最后创立了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等等。作为这协会的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足够以此成果为自豪了。

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成为当代最遭嫉恨和受到最多诬蔑的人。各国政府，

无论是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无论保守或极端民主派的资产者，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作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工人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美国】安东尼（1820～1906）

安东尼，美国人权运动领袖之一，美国女权运动先驱。本篇是她 1873 年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发表的演说。

论妇女选举权

朋友们、同胞们：

我今晚站在你们面前，被控在上次总统选举中犯有所谓无投票权而参加投票的罪。今天晚上我想向你们证明，我投票选举，不但无罪，相反，只是行使了我的公民权。这项权利是国家宪法确保我和一切美国公民所有的。无论哪一州政府都无权剥夺。

联邦宪法的序言有如下词句：

“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组成一个更完美的联邦，确立公理，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普遍福利，永保我们及子孙后代得享自由之福，特制定此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组成这个联邦的，是我们，是人民，不是男性白人公民，也不是男性公民，而是我们全体人民。我们组成这个联邦，不仅为了使人民得享自由之福，而且要保障自由；不仅为了给我们中的一半及子孙后代的一半人以自由，而是给全体人民，给男子，同时也给妇女以自由。投票权是这个民主共和政府保障公民自由的唯一手段，要是妇女不得运用投票权，那么，向妇女侈谈自由的赐福就是莫大的讽刺。

任何州政府，如果以性别为参加选举的条件，必然会剥夺整整半数人民的选举权；这等于通过一项剥夺公民权的法律或一项事后追认的法律，因此，这样做实在是违犯了我国的最高法律，令妇女及其后代的所有女性永远被剥夺自由。这个政府并未获得由人民的赞同而对女性行使的正当的权力。对于她们来说，这个政府不是民主政体，也不是共和政体。它是可憎的专制政体，是可恨的性别独裁，是地球上所有专制中最可恨的专制制度。相形之下，有钱人统治穷人的富人专制，受教育者统治未受教育者的劳心者专制，甚至撒克逊人统治非洲人的种族专制，人们或许还稍能忍受。但是，这种性别专制却使每家人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得以统治母亲、姐妹、妻子、女儿，使一切男子成为统治者，一切妇女成为奴婢。这种专制给全国的每一个家庭带来不和、纷争和悖逆。

韦伯斯特、伍斯特和布维尔都认为，公民的定义是有权投票和有权在政府供职的美国人。

那末，现在要解决的唯一问题是：妇女是不是人？我很难相信，反对我们的人中有谁敢说她们不是。妇女既然是人，也就是公民。无论哪一个州都无权制定新法或重新执行旧法以剥夺妇女的权利或特权。因此，现今，无论哪一州一切歧视妇女的宪法或法律，正如以往一切歧视黑人的法律一样，都是无效的、非法的。

【美国】费尔普斯（1822～1900）

费尔普斯，美国律师，1885～1890年间出任美国驻英大使。本文为他卸任离开英国前在饯别宴会上的讲话。

告别英伦

市长先生、各位爵士、各位先生：

对于诸位先生对我的亲切表示以及我的朋友市长先生和我的尊敬同行大法官阁下刚才对我的过誉之词，要是说我拙于词令，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谢，想必你们不会觉得奇怪。但是尽管我无法用言语表达，你们一定会相信，我的感情完全是真挚的、由衷的。我感谢你们，各位先生，不仅因为今天晚上你们在此为我举行的宴会极其隆重，有异于寻常的宴会，尤其因为你们使我有机会在这友好的气氛中会晤众多的良友。对于他们，我怀着深深的惜别之情。

……

在我任职的四年内，我出入你们之间，对你们有了很好的了解。我曾参加许多令人满意的公众活动，到过许多家庭做客。女王陛下受到全国人民爱戴和美国人民尊敬，在为她举行的那次令人难忘的大典里，我的心和你们一同欢忻庆祝。我也曾和你们一同站在你们的不朽名人墓前默哀；我也曾分享你们的快乐。我一直尽我的微薄力量以增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彼此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加深他们之间真诚的感情。

这一切使我要就我们之间的关系说几句话。维系政府之间精神上的交流是最重要的，其价值不容忽视。但是，在现代，各国的立场态度，主要系于各国民众之间普遍相互了解的感情。历代帝王或统治者为满足个人的野心和狂想而把国家卷入敌对行为之中的时代早已过去。现在的文明国家，如果得不到本国人民真心的支持，就发动不起战争，而和平也只是空洞而渺茫的。只是双方人民要战争，两国才能动武。除非产生误解，我们这个种族的人是不会轻易彼此怀有敌意的。没有任何龙牙比互相误解更能种出仇恨了。要保障避免发生误解，就必须加强英、美两国之间大量的、不断增长的友好往来联系。只要这种交往继续下去，我们两国的关系就必然是友好的。有时我们可能遇到不幸的意外事件，我们的利益可能有冲突，一方或他方可能犯错误，轻率或无知的人有时会口出刺耳之言。但是，不犯错误的人往往只是什么事也不做的人。同样，一个不犯错误的国家只能在极乐世界中才找得到，在这个有瑕疵的、风吹雨打、坎坷不平的尘世上是没有的。不如人意的种种终究是转瞬即逝的东西，它们不会触及我们两个民族的伟大心怀。它们只是一时随风飘动，然后便永远消失——“埋葬在滔滔大海的深处。”

……

【英国】赫胥黎（1825～1895）

赫胥黎，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其名著有《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天演论》）。本文是他在许多权威学者的一片反对声中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辩护的辩护词。

支持“物种起源”的学说

.....

我曾经说过，科学家是在理性的最高法庭上对自然界最忠实的诠释者。但是，假如无知是法官的顾问，偏见是陪审团的审判长时，科学家诚实的发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我所知，几乎所有伟大的科学真理，在得到普遍接受以前，那些最有地位的大人物总坚持认为被研究的现象是直接以神意为依据的。谁要是企图去研究这些现象，不但枉费心机，而且简直是对神的亵渎。这种反对自然科学的态度，具有异常顽固的生命力。在每次战役中，上述的反对态度都被击溃、受到重创，但却似乎永远不会被消灭。今天，这种反对态度已经遭到上百次的挫败，但是仍然像在伽利略时代那样猖獗横行，幸而危害性已经不那么大了。

请让我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有些人一生都在伟大的真理海洋的沙滩上拾集晶莹的卵石；他们日复一日地注视着那股胸怀包藏着无数能把人类生活装点得更高尚美好的珍宝的海潮。这股气势磅礴的海潮的行进虽然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会上涨。要是这些注视着海潮上涨的人们看到那些现代的克纽斯式小人物俨然坐在宝座上，命令这股巨大的海潮停止前进，并扬言要阻止那造福人类的进程时，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即使不那么可悲，也是可笑的。海潮涨上来了，现代的克纽斯们只好逃跑。但是，他们不像古时那位勇敢的丹麦人，他们学不会谦虚。他们只是把宝座挪到似乎是安全的远处，便又重复地干着同样的蠢事。

大众当然有责任阻止这类事情发生，使这些多管闲事的蠢人声誉扫地。这些蠢人以为不许人彻底研究全能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就是帮了上帝的忙。

物种起源的问题并不是在科学方面要求我们这一代人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前人类的思潮异常活跃，注视着时代各种迹象的人看得很清楚，19世纪必将如16世纪一般发生伟大的思想革命与实践革命。但是，又有谁能知道，在这新的改革过程中，文明世界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与痛苦的斗争呢？

然而，我真诚地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这场斗争中，英国会起到伟大而崇高的作用。她将向全世界证明，至少在一个民族中，专制政治和煽动宣传并不是治国的必要选择，自由与秩序并非必然互相排斥，知识高于威严，自由讨论是真理的生命，也是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英国是否会起这样的作用呢？这就取决于你们大众对科学的态度了。珍惜科学、尊重科学吧，忠实地、准确地遵循科学的方法，将其运用到一切人类思想领域中去，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必定比过去更加伟大。

假如听从那些窒息科学、扼杀科学的人的意见，我恐怕我们的子孙将要看到英国的光辉像亚瑟王在雾中消失那样黯淡下来，等到他们发出像圭尼维尔那样的哀哭时，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英国】戈申（1831～1907）

戈申，英国政治家、教育家，曾任国会议员、驻土耳其大使、爱丁堡大学校长等职。本文是他 1877 年在利物浦学院所作的演说词。

论想象力的培养

我的讲话是主张培养想象力。我的话既是对那些最富足的、前程远大的人说的，也是对最贫穷最卑微的人说的。我要努力不犯一些医生有时会犯的错误，那就是他们向每周收入两镑的病人建议喝香槟酒和到海滨作短期休养。

那么，我是从什么意义上使用“想象力”这个字的呢？约翰逊字典上有答案。我希望你们特别注意约翰逊如何解说“想象力”一词。他对“想象力”下的定义是：“构思出理想图画的能力”“向自己或他人描述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能力。”

这就是我要求你们在学校中、在家庭藏书室里以及用一切我能得到的手段影响你们去培养的能力，我确信这是做得到的；我希望我能引导你们，并向你们说清楚为什么应该培养这种能力。我重复一遍，这是构思出理想的图画以及向你们自己和他人描述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能力。我在下面的讲话使用“想象力”这个字时，就具有这样的含义。

沿着这条思路，我相信可以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不在眼前的事物是什么呢？例如历史就是。历史讲的是过去的事情。从某一意义来说，历史并不存在于你脑中——那就是说，你看不到过去的事情；但是学习历史使你得到并增强理解不在眼前的事物的能力。因此我愿向你们推荐历史课，那是一门最值得学习的课程。

又例如各种外国游记。这又是一些不在你身旁的事物，因为你触摸不到它们。但阅读各种游记会使你认识那些不存在于你自己脑中的事物。至于说到构思出理想图画的能力，我建议你们请教诗人、戏剧家和想象力丰富的作家，阅读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伟大文学作品。这种学习能够令你们在一个新天地中生活、活动与思考，这天地有别于你们周围的狭小世界。这种学习会给你们开辟各种新的乐趣的源泉，这种乐趣，我可以这样说，往往会上升为幸福。

……

【美国】怀特（1832～1918）

怀特，美国教育家与外交家，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的主席。本文发表于会议期间，为赞扬荷兰法学家修果·格劳秀斯（1583～1645）而作。

一位倡导国际和平的伟人

诸位阁下、市长先生、来自各大学的诸位先生、尊敬的和平会议同事们，诸位女士、先生：

美国代表团今天来到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我们受惠于荷兰甚多，现在我们奉命代表我国对荷兰表示一份谢意。

这份谢意是对一位所有文明国家都理应引为骄傲的人而发的，全世界和我们一同感谢他。他是一位诗人、学者、历史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也是《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的作者。

在一切并不自诩为由神启示而写成的著作中，这部由一位在政治与宗教上都受到摈斥和仇恨的人写成的书，已被证明是人类最大的福音。它比别的任何著作使人类少受多少无谓的苦难、悲痛与忧愁；它比别的任何著作使军人的职业变得高尚；它比别的任何著作更能促进了和平的赐福，减少战争的恐怖。

因此，在这座墓前，美国代表团受命向长眠在墓中，被全世界有思想的人们尊崇感谢、并称他为格劳秀斯的修果·德·格鲁特献上我们简朴的礼赞。

……

一切国家都深受惠于格劳秀斯，美国乐于承认为这些国家中之一。他的思想在我国广大人民中影响巨大，深入人心，也许没有别的国家可以相比拟。阿历克塞·德·托克维尔是最有哲理思想的研究美国制度的学者，他说过：美国人生活中最显著而又令人赞赏的事情莫过于对法律的广泛研究了。德·托克维尔无疑是正确的。在我国各地的大学和学院中，有大批青年正在从事各国法律的专门研究；他们不仅从职业观点进行研究，并且是从人类热切希望了解国际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原则的角度去研究。

我的同胞惠顿、肯特、费尔特、伍尔西、达纳、劳伦斯和其他人的许多著作都不断地发展最先由格劳秀斯给予生命与力量的思想。这表明在格劳秀斯开辟的这片伟大园地里，我们的国家在其上也进行了耕耘并开花结果。

格劳秀斯思想的幼芽影响了许多作家，使他们的工作开花结果，我可以举出许多例证，但现在我只举其三：

第一个例子是阿伯拉罕·林肯的行为。在内战激烈进行期间，他就认识到需要制订一部更富有人性的法典，以指导我们南、北两方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行为。他把这部法典的起草工作委托给弗朗西斯·利伯。利伯受全世界法学家敬重，是当时格劳秀斯在美国最重要的信徒。

第二个例子是尤里西斯·格兰特将军的行为。经过长期剧烈的战争，他受命接受他伟大的敌手李将军投降时，拒绝接受这位败将长期勇敢地佩带着的佩剑。格兰特将军除去要求败军解甲回家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条件。他不允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只是简单地说：“让我们共享和平吧。”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全民族的行为。当那场使千百个家园荒芜、使近百万人牺牲生命的残酷战争结束时，得胜的联邦没有对发动战争、主张分裂的南

方的任何一个政治家或任何一个作战的兵士进行报复。从那一天起，直到现在，每年内战停战纪念日到来之时，从南方到北方，不论穿蓝色制服的北军军士的墓地或是穿灰色的制服的南军军士的坟头，都缀饰着簇簇鲜花。我可以肯定他说，尽管我的同胞可能有这样的缺点和那样的错误，但他们却显示出深受仁爱与人道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正是由格劳秀斯带到现代世界来的，没有人可以在这方面和他相比。

……

【美国】马克·吐温（1835～1910）

马克·吐温，美国著名作家。这是霍姆斯七十寿辰（1879年12月3日）时，马克·吐温在波士顿为他祝寿的致词。霍姆斯（1809～1894），是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的创始人。

无意的剽窃

主席先生、各位女士、先生：

为了亲临为霍姆斯博士祝寿，再远的路程我也要前来。因为我一直对他怀有特别亲切的感情。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验，一个人一生中初次接到一位大人物的信时，总是把这当成一件大事。不管你后来接到多少名人的来信，都不会使这第一封失色，也不会使你淡忘当时那种又惊又喜又感激的心情。流逝的时光也不会湮灭它在你心底的价值。

第一次给我写信的伟大人物正是我们的贵客——奥列弗·温德尔·霍姆斯。这也是第一位被我从他那里偷得了一点东西的大文学家。（笑声。）这正是我给他写信以及他给我回信的原因。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不久，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卷首献词写得漂亮简洁。”我说：“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的朋友说：“我一直很欣赏这篇献词，甚至在你的《傻子国外旅行记》出版前，我就很欣赏这篇献词了。”我当然感到吃惊，便问：“你这话什么意思？你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这篇献词？”“唔，几年前我读霍姆斯博士《多调之歌》一书的献词时就看过了。”当然啦，我一听之下，第一个念头就是要了这小子的命（笑声），但是想了一想之后，我说可以先饶他一两分钟，给他个机会，看看他能不能拿出证据证实他的话。我们走进一间书店，他果真证实了他的话。我确实确实偷了那篇献词，几乎一字未改。我当时简直想象不出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因为我知道一点，绝对毋庸置疑的一点，那就是，一个人若有一茶匙头脑，便会有一份傲气。这份傲气保护着他，使他不致有意剽窃别人的思想。那就是一茶匙头脑对一个人的作用——可有些崇拜我的人常常说我的头脑几乎有一只篮子那么大，不过他们不肯说这只篮子的尺寸罢了（笑声）。

后来我到底把这事想清楚了，揭开了这谜。在那以前的两年，我有两三个星期在桑威奇岛休养。这期间，我反复阅读了霍姆斯博士的诗集，直到这些诗句填满我的脑子，快要溢了出来。那献词浮在最上面，信手就可拈来（笑声），于是不知不觉地，我就把它偷来了。说不定我还偷了那集子的其余内容呢，因为不少人对我说，我那本书在有些方面颇有点诗意。当然啦，我给霍姆斯博士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并非有意偷窃。他给我回了信，十分体谅地对我说，那没有关系，不碍事；他还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运用读到的或听来的思想，还以为这些思想是自己的创见呢。他说出了一个真理，而且说得那么令人愉快，帮我顺顺当当地下了台阶，使我甚至庆幸自己亏犯了这剽窃罪，因而得到了这封信。后来我拜访他，告诉他以后如果看到我有什么可供他作诗的思想原料，他尽管随意取用好了。（笑声）那样他可以看到我是一点也不小气的；于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很合得来。

从那以后，我多次见过霍姆斯博士；最近，他说——噢，我离题太远了。我本该向你们，我的同行、广大公众和教师们说出我对霍姆斯的祝词。我应

该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霍姆斯博士的风采依然不减当年。一个人之所以年迈，非因年岁而是由于身心的衰弱。我希望许许多多年之后，人们还不能真正他说：“他已经老了。”（鼓掌）

【美国】波特（1837～1921）

波特，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军将领，曾任格兰特的助手。

尤里塞斯·格兰特（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中北军的主帅，1869年至1877年任第十八届总统。1891年10月8日，田纳西州陆军为格兰特骑马塑像落成举行宴会，这是波特在会上发表的演说。

献给尤里塞斯·格兰特的颂词

……

格兰特将军具有一位成功的军人所具有的一切品格，而且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一生的业绩表明他坚韧不拔，富有创建，足智多谋。他的成功主要是靠独创能力而不是靠适应能力。人们曾将他同几乎每一位历史上的伟大统帅作过比较，这也许恰好证明他有别于任何一人。无论处身于何种紧急情况，他都具有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勇气足以在激动中镇静，在艰苦中忍耐，胜不骄矜，败不气馁。他感情丰富，心地柔和，却从不令自己的感情影响军人应有的严明职责。他知道刀片不能劈石头，纸弹不能打仗，他明白最猛力的打击会带来最速效的结果。死于疾病蔓延的营房中的兵士多于死在枪炮下的人。

他对敌人宽大，对朋友慷慨。只要豪侠的品质受到尊崇，他便会一直为人传颂。你们知道，攻陷淮克斯堡后，他下令说：“卫戍部队明日撤离本城，应指示所属部队在俘虏经过之时保持安静，严守纪律，切勿恶言相加。”李将军在阿波马托克投降后，我军鸣炮庆祝，格兰特将军立即下令制止说：“战事已经结束；叛乱分子又已成为我们的同胞；庆祝胜利的最好方式是避免作出在战场上的一切行动。”……同样，他从不写出陈词滥调，也不追求夸张的警句。当他说“让我们共同享有和平吧”时，他表达的是一颗诚实的心最真挚的信念。他从不厌烦或吝啬对有功下属的贡献作出赞扬。一如编织哥白林双面挂毯的首要艺匠，格兰特将军情愿自己隐在挂毯的后面，让挂毯面精美的图形为挂毯增添光彩。

如果英语的语言宝库里有一个单词可以描画出格兰特将军的性格特点，那么这个词就是“忠诚”。他忠于自己参予的一切伟大事业和工作，忠于朋友，忠于家庭，忠于他的国家，忠于上帝。他的忠诚令所有和他有接触的人不期然作出回报。这就是他的兵士对他如此忠诚的主要原因之一。不错，他是这样地忠诚，以至于因此而犯错误，使他继续帮助那些已经不值得信任的人。但这种性格是如此高尚而光明磊落，我们也就不要去计较它带来的不良后果了。这一点表明他是一个有勇气主持正义的人，有勇气站在值得尊敬的人一边，去反对毁谤他们的卑劣小人。在人心对公众生活起的作用如此微小的年代，他使仁爱的感情还能有些影响。许多公职人员有大批追随者，因为这些追随者能凭借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得到厚利；不少公职人员有一伙伙党羽，因为这些人盲从他所代表的事业；然而除了格兰特将军之外，也许没有人有如此众多的忠实朋友了。他们只是爱他的为人，他们对他的深情与时俱增，他们对他的热爱不会变化，他们像耐萨斯的袍服，永远贴附于他，不论他是军官，是将军，是总统或只是一个普通公民。

【法国】甘必大（1838～1882）

甘必大，法国政治家，曾任内政部长，众议院院长、总理、外交部长等职。这是他就农民教育问题所作的一篇演说。

论法国农民教育

我国农民在文化知识方面比其他受过教育有文化的阶级落后了几个世纪。他们和我们之间距离很大。我们受过当代高级的或科学的教育；虽然我们那时代的那种教育还不算完善。我们学会读历史，学会了使用语言说话。然而，说来痛心，我们的同胞竟有这么多人连话也说不清楚！啊，农民尽管终年劳碌，从事耕作，却任劳任怨，肩负起每日劳作的重担，唯一的安慰只是把祖传的那点土地留给子孙，最好能再增添一分半亩。他们热情、欢乐与恐惧都倾注在这份祖传产业的命运上了。对于外界社会，他听到的只是些街谈巷议，乡里传闻。他受害于奸诈狡猾之徒。他不自觉地打击了使他受惠的革命，却忠心耿耿地向他既敬且畏的那个社会上自己的血汗和租税。但他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和他谈原则，他会茫茫然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必须着手为农民做一些工作。我们要唤起他们，教育他们。党内不少人讥俏地谈论“乡土气”和“乡村议院”。这类字眼不应当成为贬义词，要是有一个真实而具深刻意义的“乡村议院”，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并非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就能组成“乡村议院”，而是要由有知识的，能代表他们自己的自由农民才能组成。这种对于所谓“乡村议院”的批评，不但不应引起对它的嘲笑，相反，应该使这种批评变为对于大众文明进步的礼赞。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应该用于谋求普遍的福利。

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假如我们要改造我们的国家，要恢复我国的尊严和威力，恢复她的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上层阶级唤起并解放劳动者。这些劳动者蕴含着一股潜在力量，一经开发，便会成为活力与才能的无尽宝藏。如果法国民主不能表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进步。我们要自己懂得，并教育农民使他们懂得他们对社会负有何等责任，使他们懂得他们有权向社会要求些什么。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能理解到我们没有比这更崇高更紧迫的工作了；我们应该把其他一切改革先放下，我们只有一项任务，就是教育人民、普及知识、倡导科学——这一天到来之时，便是我们在重建法国的任务上迈开大步之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采取两方面的行动，既要注意智力训练又要注意体力训练。准确他说，就是每个人不仅应该学到知识，学会思考、阅读和逻辑推理，而且应该能够行动与战斗。在任何地方，除教师之外，还应有体育家和军人，使我们的儿童、兵士与公民都能够拿起刀剑，扛起枪杆，长途跋涉，餐风宿露，勇敢地应付爱国者可能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我们必须将教育推广到前线去。否则，我们就只能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不能筑起一道由爱国者组成的钢铁长城。

……

【美国】威拉德（1839～1898）

威拉德，美国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本文是她 1890 年发表的演说。

为人类而做的工作

我希望我们对伟大的过去历史研究得更彻底。这样，我们对未来就敢于作更大胆的预言，对当前的工作就更乐观、欢快。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有着何等坚韧的生存力量。地震、饥馑、瘟疫可以肆虐一时，但随后流过的岁月又治愈一切创伤，使它们消失不见；又或伟大的历史进程横扫大地，抹去一切伤痕。新形式的文明围绕着显赫的帝王建立起来，这些帝王逝世后，又有更伟大的人物继起。有些国家民族被消灭，巨大的希望化为泡影；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爱国志士血流成河；地球本身似乎就要沉入毁灭的深渊了；然而新的爱国者又涌现出来，更高的希望像繁星般闪现：人类大步走出了黑暗时代，比当初进入那阴森洞穴般的时代大为进步。从此，公理被承认为至高无上。现在，基督王国比我们最当初预想到的更为临近了。

只有那些不懂历史的人才在伟大的改革中灰心丧气，只有那些不读天才人物传记的人才会自以为是首创者。除了物质领域中的发明之外，天下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哪一种改革不是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有伟大的心灵憧憬过，没有哪一种教义不是某位神父早就订立过的。希腊哲学家和早期的基督教神父早已一劳永逸地为后人指明了方向，我们尽可以在他们留下的记载中去任意挑选。因此，让我们学会既聪明又谦虚吧。让我们记住，世上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宣称我们的时代是世界历来最坏的时代，另一类人却认为这是最美好的。一切新发明、一切科学和全部历史都证明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是正确的。而且永远、永远正确。

最正常、最完美的人就是那彻底投身于自己最擅长的活动的人，是那完全献身于周围世界和众人的人。他完全专心致志于他对世界的有利作用，以致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与世界还存在距离。

……

【法国】福煦（1851～1929）

福煦，法国元帅。本文是他 1921 年 5 月 5 日纪念拿破仑逝世一百周年时，在拿破仑墓前发表的演说。

拿破仑

只要想一想，1796 年，拿破仑年仅 27 岁已经崭露头角，就不难知道他天赋非凡的资质。他把自己的天才不断地用于建立一生的丰功伟业。

由于秉赋这种天才，他在人类军事史上走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他高举战无不胜的鹫旗从阿尔卑斯山进军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塔古斯河之滨到莫斯科河两岸。在飞扬的军旗下，他建立的赫赫武功超越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大将和凯撒大帝。这样，他以惊人的天才、不甘守成和好大喜功的本性成为胜过一切其他人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这种本性，有利于战争，但对维持和平的均势却很危险。

他把战争艺术提高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而这就将他推到了令人眩晕的巅峰。他把国家的伟大视为他个人的伟大，他要以武力控制各国的命运。他以为一个人能够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得到一系列的胜利，换来本民族的繁荣：以为这个民族可以靠光荣而不是靠劳动获得生存；以为那些被征服而失去独立的国家不会一朝奋起，列出阵容强大、士气高昂、战无不胜的义师，推翻武力统治，重新赢得独立；以为在文明世界里，道德公理不应比完全靠武力形成的力量强大，不管这力量有多大的天赋才能。由于这样的企图，拿破仑走了下坡路。不是因为他缺乏天才，而是由于他想做那不可能的事。他想以当时财枯力竭的法国使整个欧洲屈膝，岂知当时欧洲已经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很快就全面武装起来。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但是，比指挥军队克敌制胜更为崇高的是，按照祖国的需要为祖国服务。正义应在一切地方受到尊重。和平应高于战争。

的确，在处理人的问题时如果只依赖个人的见识与才智，歪曲为尊重个人而制定的社会道德法律，歪曲作为我们文明基础和基督教本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那么，即使是最有天才的人，也肯定会犯错误。

陛下，请安息吧。你英灵未泯，你的精神仍然在为法兰西服务。在每次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的鹫旗依然迎风招展。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你建造的凯旋门下胜利归来，那是因为奥斯特利茨的宝剑为他们指引了方向，教导他们如何团结起来带领军队取得胜利。你高深的教诲，你坚毅的劳动，永远是我们不可磨灭的榜样。我们研究思索你的言行，战争的技艺便日益发展。只有恭谨地、认真地学习你不朽的光辉思想，我们的后代子孙才能成功地掌握作战的知识和统军的策略，以完成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事业。

【美国】格雷迪（1851～1889）

格雷迪，美国新闻记者、编辑。本文是他1889年12月13日在波士顿商会的年会上的讲话，阐述了南北战争结束二十多年后美国仍然存在的种族问题。

南方的种族问题

.....

主席先生，在南方的远处，有一块地球上最秀丽最富饶的土地，被一条界线同这个地区分开。这条界线一度标明了无法和解的矛盾，一度洒满了兄弟相残的鲜血，现在，感谢上帝，这界线已经渐渐消失，只留下一丝阴影了。那里是一个勇敢而友好的民族的家园。那里集中了给人类带来欢乐与繁荣的一切条件。那里气候和煦，土壤肥沃，出产温带的一切农产品。在那里，棉花在繁星下好似一片白银，金色的阳光在麦芒中闪耀。风吹苜蓿偷香，雨洒烟叶送馥。那里的崇山峻岭储藏着无尽宝藏；原始森林广阔无垠；江河汨汨，迤迤入海。那区域稳握各种工业必需的三要素：棉花、铁与木材。棉花占牢固的垄断地位，铁矿经探明首屈一指；木材足以供应全国。由于有了这种永恒确保的有利因素，虽然存在暂时的人为不利条件，那里已经发展起一个惊人庞大的工业体系。这个工业体系不靠关税和资本来维持，更不靠充足低廉的资源供给，而是靠神的保证，靠周围的原野、矿山和森林，这个工业体系不是建立在花销很大的农场之中（这些农场之间的竞争使农人绝望破产），而是建立在阳光充足的廉价土地之上，这些土地广阔无限，农产丰富，四季如春。这个工业体系日益发展，将光照人寰，令举世瞩目。

.....

如果我刚才的这番话提不起你们的兴趣，那么请听我再说一点，我的同胞，你们南方的兄弟——与我们共命运、共有过去与将来最美好一切的骨肉兄弟——现在正为这个问题苦恼。这个问题能否得到正当的解决，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他们的过失。共和国贩运奴隶的船只从你们的港口启航，运来的奴隶在我们的土地上劳动。你们不会为奴隶贩运申辩，我也不卫护奴隶制度。但是我要在这里声明，由于我们的祖先建立起明智而又有人道主义的政府，由于他们把奴隶提携到他们在野蛮故乡时从未梦想到的高度地位，给他们享受到虽然在目前解放了的生活中还未享受到的幸福，他们已经给子孙留下一份极宝贵的储备遗产。奴隶制度在一场战争的风暴中消失了。我像你们一样衷心地感谢上帝，人的奴隶制已从美国国土上绝迹。

但是解放了的奴隶还在。伴随他们存在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请注意这问题的惊人情况：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双方人数大约相等，但掌握的知识与负有的责任却极为悬殊。双方都竭力反对互相溶化，其中一个种族在一百年中充当另一个种族的奴隶，最后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中得到了解放。这场战争是双方都不打算进行，但又带着怀疑地采取的一个试验。——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情况。

.....

果断的，头脑清醒、心胸开阔的南方人，他们的天才曾经使美国开国七

十年的每一页历史熠熠发光，他们的勇气与刚毅精神，你们已在那五年最残酷的战争中考验过，他们曾经用过人的精力白手起家，在炮火余尽、断壁颓垣上建造起锦绣的家园。这些人日日夜夜把上述的种族问题放在心底，记于脑中。他们意识到这问题很严重，那是你们认识不到的。他们知道欠下这友好仁慈的从属种族的债；全世界都仇恨奴隶制，他们知道由于过去维护与保持了奴隶制，欠下世界的债有多么深重，虽然他们的脚步在荆棘中蹒跚，他们的行进受重担的拖累，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忍耐与信心。忍耐使他们头脑清醒，信心使他们勇气百倍。先生，即使在感情冲动的时刻，在他们心中出现地狱和殷红血迹的模糊可怕阴影时——我祷告上帝使他们永远不要陷进去——他们也没有被恐怖慑服而不去为事业献身！

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的性格。但是问题本身的情况如何？我为他们说话的南方人民和你们的人民一样诚实，公正，通情达理，如果你处在他们的地位，你会和他们一样具有寻求正确解决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的热情。主席先生，除非你就在此承认南方人民的上述各点，否则我们就无需再说下去了。如果你坚持要说他们是暴徒，指责他们盲目地用棍棒与枪枝去掠夺、压迫另一个种族，那么我就是白白地牺牲了我的自尊心并浪费了你们的耐性。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他们是有常识和具有一般诚实品质的人，他们正在运用智慧改造一个他们不能完全置之不顾的环境，尽一切努力去引导和控制两个种族中凶恶的、不负责任的人，坦率地承认错误，用耐心重新挽回感情冲动时所失去的东西，时时刻刻意识到一着失误将毁去全局——如果承认这些，我们今晚就可能达到互相谅解。

.....

【美国】戴克（1852～1933）

范·戴克，美国作家、传道士。本文是他1898年6月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说。

盐

“你们是世上的盐。”《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

这个比喻平凡而发人深省。盐食之有味，又可洁物、防腐。盐是一种奢侈品，那位伟大的法国才子称之为“头等必需品”。人类有史之初，就以为盐有很高的价值，并在山洞和海滩采集之。盛产盐的国家曾被视为富国。在原始部落里，一袋盐比一个人还要贵。犹太人尤其珍视盐，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气候炎热，食物难于保藏。此外，他们的宗教特别强调洁净，向神献祭时又需大量用盐。

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时，选了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物喻。他以此说明，他认为众门徒该肩负的使命和应发生的影响。他们到世上来就是要净化、美化他们所在的世界，使它免于腐败，给人人的生活以新的、更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作用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们活动的范围是今世，不必把盐省下来带到天国去。天国不需要盐，盐的使命是渗入、调和与净化尘世的事物。

……

享有特权而无力量的人是废物。受过教育而无影响的人是堆一文不值的垃圾。有些人在知识、道德、宗教信仰方面受过教育，但没有成为社会上行善的积极力量，这些人就枉费了为培育和供养他们的花销。如果他们也算是基督徒，他们就犯了因伪装而受尊敬的罪。他们本应成为世上的盐，而盐的首要责任是有盐味。

这就是今天我要对你们讲题目。盐的盐味象征高尚的、有力的、真正虔诚的宗教生活。

你们大学生是享有特权的人。把你们培养成今天这样，所花费的劳力、心血与金钱，十倍于教育一般人，百倍于抚养大一个未受教育的儿童。这事实使你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否打算成为对得起你吃过的盐的人。

你们受过智力训练，受过各科学问的教育，应该很有知识。你们受过德育训练，不断受到良好典范的影响，应该极有原则。你们在宗教上得天独厚，不断被引导向善，应该极有信仰。你们准备用你们的知识、原则和信仰去做些什么呢？你们有责任积极地调剂、净化世界，使世人得救。不要做只取不予的海绵，要做世上的盐。

首先想想，有知以的人只要愿意将自己的文化用于正途，就可能产生善的影响。人类的烦恼一半来自无知。这种无知与社会有系统地勾结，以便得到它的支持，而为了得到扩散，又利用报刊的力量；这种无知不仅不去认识事物，而且有意无视已经认识的事物。如果人们能够记住已经学到的东西，某些危害身体的疾病在十年内就会绝迹。某些政治和社会瘟疫，只在浅薄的自信和庸俗轻率的气氛里才会传播开来。还有一类坏书特别适合于在各个阶层中散布无耻的邪念、讹误的消息和自负的愚蠢。受到这种恶劣影响的人变得愚昧无知、洋洋自得，以致分不清什么是道听途说，什么是真正的知识。

他们病态地、如饥如渴地阅读印刷品，但他们读得愈多，知道得愈少。他们正是培育愚昧与狂热盲从的细菌的肥沃土壤。

社会上有思想、有教养、有理性的人们，应该成为这类危险影响的解毒剂。他们学习过历史、科学与哲学，有责任用他们的知识来服务于社会。一般说来，他们愿意有偿地为社会服务，做律师、医生、教员或神父。但我今天要求你们受过教育的人去做的，却是更广泛、更高尚而且无报酬的服务，即多思考，并帮助别人学会思考。

.....

其次，由于邪恶腐蚀社会，有道德原则的人要想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正因为我们是比较洁静、高尚和正直的人，我们要一再地提醒自己注意这些邪恶事物的存在。生活上正派的人最怕是洁身自好。我们为了明哲保身，往往把美德装在一包包用尊敬包起来的小包裹里，束之高阁。但是，真正的美德应该用于更好的目的。它不仅适宜于，而且本来就是有意为了像盐那样用来净化人类的生活而存在的。

【英国】萧伯纳（1856～1950）

萧伯纳，英国作家，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高寿者，享年95岁。这是他在70岁寿辰宴会上的讲话。

在70寿辰宴会上的讲话

近年来公众舆论一直千方百计想要把我整垮。此计不成，又反过来把我捧成一个伟人。谁碰上了这种事都是极为倒霉的。现在显然又有人企图在于同样的事了。为了这个缘故，对于庆祝我70岁生日的活动，我完全拒绝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当我的老朋友工党请我到这里来时，我知道不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伟人。我们还发现另一秘密，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伟大的民族，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国家。

.....

资本主义者说，他们将向全世界保证，在这国家里，每人都能得到一份职业。他们并不主张那是一份收入很好的职业，因为假如收入很好，这个人只要做一星期的工，就能节余足够的钱，下星期不用工作了。因此他们要使每个人全时工作才挣得仅能维持生计的工薪，另外，他们还要分得一份，作为资本的积累。

他们说，资本主义不仅为工人提供了上述的保证，而且由于确保巨大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数很少的阶层的人手里，那么，不论这些人自己愿意与否，都必须将钱储蓄起来，用于投资。这就是资本主义，而我们政府的政策却常常和资本主义相抵触。政府既不为人提供工作，又不让他们饿死，而是给他们一点救济——当然，首先得肯定受施者已经为这点救济付足了钱。政府给资本主义者津贴，又订出各种各样规定，破坏自己的制度。政府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我们告诉他们这是破坏，他们却不懂。

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时说道，“你们的制度自公布以来，就从未有哪一天实践过你们的诺言。”我们的生产是荒唐的，我们本需要盖许多房屋，却去生产80匹马力的汽车。孩子们在挨饿，我们却生产各种最豪华的奢侈品。你们把生产本末倒置了，不首先生产国民最需要的东西，却恰恰相反。.....

我们反对这种资本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理论是明白无误的，它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分配制度。我们必须从这个问题入手。如果私有财产妨碍分配制度的实行，那么就必须废除私有财产。

掌握公共财产的人必须按公众的情况来掌握公共财产，就像我拿手杖一样，我不能愿意用它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能用它来敲你的脑袋。我们说，如果分配制度出了差错，那么，宗教、道德、政府等，一切都会跟着出问题。因此，我们说，必须从分配着手，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全部意义。

我以为，我们应当记住上述的一点，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处理好世界财富的分配问题。我告诉过你们，现在还要告诉你们，我认为在我们四千七百万人口中，没有两个人，也许连一个人也没有，会赞同现存的财富分配制度。我甚至要说，你们在整个文明世界中也找不出一个赞同现存财富分配制度的人来。这分配制度已成为毫无意义、荒谬绝伦的东西了。.....

.....

我认为我们能够将自己和资本主义者区别开的一天终会到来，我们必须
在人民之先形成一定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宣称我们要实现的不是旧概念中
的再分配，而是收入的再分配。我们指的始终是收入的问题。

今天晚上我很高兴，我们的主席说，你们对我的社会地位有很高的评价，
也对我有根深的个人感情，我感到非常光荣。我不是一个善感的人，但也不
能对此无动于衷。我知道这一切的价值。由于这一切，我十分高兴能够在这
里说出了一些许多人不能说的话。我已经 70 岁了，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次
70 岁，我说这话也就是这一次了。

现在我确信，在我年轻时，思想转变，加入工党，这转变从一切方面都
可以说，我的道路走对了。

【俄国】普列汉诺夫（1856～1918）

普列汉诺夫，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这是他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阐述了俄国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以及俄国的形势和社会民主党所要采取的策略与步骤。

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的演讲

诸位在这个工人代表大会上看到俄罗斯的代表可能会感到奇怪。很遗憾，俄国工人运动至今还很薄弱。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革命的俄罗斯不仅不应该站在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相反地，它今天同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接近起来、必将给世界无产阶级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

诸位都很熟悉俄国专制制度在西欧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俄国沙皇是戴上皇冠的宪兵，他把维护和支持从普鲁士到意大利和西班牙为止的欧洲反动势力看成是自己的神圣义务。在这里谈一谈，比方说，尼古拉在1848年、1849年所起的作用，只会是白费时间，而俄国专制制度的崩溃等于国际革命运动在全欧洲的胜利，这一点是了若指掌的。问题只在于，俄国革命运动在怎样的条件下能够战胜俄国专制制度。

有些作家的想象力大大超过其社会经济知识，他们把俄国描写成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在经济结构上与西方国家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俄国旧的经济基础已处在完全瓦解的过程中。连某些社会主义者也曾十分欣赏的我国农村公社，事实上却是我国专制制度的主要支柱，而现在愈益成为农村资产阶级用以剥削大多数农村居民的一种工具。一部分贫困不堪的农民被迫移居城市和工业中心，与此同时，大工厂工业成长起来了，吞没了盛行一时的农村手工业。我国专制政府急于要钱，于是竭尽全力促使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专制政府这方面的活动，只会使我国社会主义者感到满意，因为它这样做也就是为自己挖掘坟墓。由于农村公社瓦解而形成的无产阶级，将给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虽然俄国革命者英勇奋斗，而专制制度至今在俄国还没有被打倒，这是因为革命者脱离人民群众。我国革命思想家的力量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反对沙皇个人，但对战胜沙皇制度这一政治制度，就显得非常微弱了。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应该掌握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在工人中加以传播，利用工人的力量攻克专制堡垒。俄国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工人革命运动，才能取得胜利。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出路。

【美国】威尔逊（1856～1924）

威尔逊，民主党人、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7年4月代表美国对德宣战。1918年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提出结束战争的《十四点纲领》。这是1919年1月25日他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

关于国际联盟

主席先生：

我认为让我在这次会议上就国际联盟问题首先发言是一种特殊的荣幸。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两个目的：一、针对这次战争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若干措施；二、不仅通过当前的解决措施，而且通过本次会议将要作出的支持上述措施的各种安排，来保障世界和平。我认为，国际联盟，对于实现上述两个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的解决措施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因此这些措施也许不能按照我们在此达成的协议顺利制订，并得到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许多解决措施需要今后继续考虑，我们作出的许多决议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如果根据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来作出判断，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可靠的判断根据。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建立某些机构，来完善本次会议的工作，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决不仅仅是目前需要制订若干解决措施，而是要做许多工作。我们是在国际舆论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此集会的。我可以毫不夸张他说，我们不是各国政府的代表，而是各国人民的代表。仅仅使世界各国政府满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使全人类的舆论满意。这次战争的负担已经极大地落到有关各国的全体民众身上。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这种负担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老幼妇孺身上，转移到文明世界的千家万户头上的悲惨景象，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战争的真正的沉重压力已经深入到各国政府看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有人类的良心在跳动，就会觉察到这种迹象。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争取能够保障他们安宁的和平。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保证这种沉重的压力不再落在他们头上。我可以这样说，当时他们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压力，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人会在这次战争以后集合起来，一致使他们今后不再遭到这种牺牲。

由此可见，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作出永久的安排，来反映正义和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的中心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能是暂时的，但各国为了和平和正义而实行的行动却必须是永久的。我们可以规定一些常规性步骤。我们不可能作出永久性的决议。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考虑到全世界的情况。

举例来说，科学的许多伟大发现，学者们在实验室里的潜心研究，在课堂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现在却都变成了毁灭文明的事物。这不是令人震惊的状况吗？毁灭力不仅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各种便利。刚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就曾在几所大学拥有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发明中心，并利用它们来进行突击性的、彻底的毁灭性研究；人们只有提高警惕，坚持合作，才能使科学和军人同样处于文明的控制之下。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不上在此开会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幅员辽阔、海疆漫长，与在此开会的其他各国相比，不大可能遭

到敌人的攻击。因此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热情（这是一种非常深厚、真挚的热情）并不是一种出于担心或恐惧才产生的热情，而是一种出于对这次战争的认识而产生的理想的热情。在参加这次战争时，美国丝毫没有考虑过它是在干涉欧洲的政治、亚洲的政治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它当时所考虑的是，全世界现在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一种事业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一切种族和一切地方的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因此，美国感到，如果由此产生的只是一个解决欧洲问题的机构，那么它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就徒劳无益，它将感到它不可能参加保证欧洲的解决方案，除非这种保证包括世界有关各国经常性监督世界和平的工作在内。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共同作出最佳判断，使国际联盟成为充满活力的事物。它不是徒具形式，不是临时性的，不是为了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一个为了各国的利益、时刻保持警惕、永远发挥作用的机构，而且，它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应该充满活力；它应该发挥持久的作用，而不能让它的戒备性和它的工作遭到中断，它应该成为密切关注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耳目，成为毫不松懈的耳目，成为随时随地保持戒备和警觉的耳目。

要是我们不能使它成为充满活力的机构，那我们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将会使各国人民伤心失望，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就在这里。自从我来到大洋这一边，在访问好几个国家时，我有过非常愉快的经历。每一次我都听到了从代表那里传来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最突出的要求是希望成立国际联盟。先生们，人类的优秀阶级已不再是人类的统治者。现在人类的命运已掌握在全世界的普通人手中。为了使他们满意，你们不仅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更要建立和平。要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你们所能作出的任何安排不仅不可能建立，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巩固。

先生们，我敢说，你们可以想象到美国的代表们在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伟大计划时的感情和目的。我们认为国际联盟是整个计划的基石，它表达了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目的和理想，而且，有关各国也承认这一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这一计划就回到美国，我们将遭到我国公民同胞的理所当然的蔑视。因为他们是组成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主体。他们期待着他们的领袖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希望他们的代表成为他们的公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但是我们是怀着最大的热忱和愉快心情来接受这种命令的。同时，由于这项计划是整个结构的基石，我们已经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它，同时也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这个结构的一切计划。我们决不能取消计划中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任何项目。我们作为这件事情——世界和平和对正义的态度的倡议者，决不能在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上妥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个原则是，我们不是各国人民的主人，而是到这里来努力使世界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意愿选择主人并掌握自己的命运。总之，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努力肃清造成这次战争的根源。

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批文官武将的个人兴趣；这些根源就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这些根源就是，帝国通过武力胁迫，硬把不甘愿的臣民合并在一起；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撮有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类头上，并利用人类作为自己的赌注。让世界从上述根源中解放出来就会实现和平。因此，你们可以明白，美国代表是决不会陷入选择一条出于私利的道路的死胡同的，

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规定了坚定不移的原则路线。感谢上帝，这些路线已经被一同发起这一伟大事业有关的一切品格高尚的人公认为解决问题的路线。

主席先生，我希望，当人们知道（正如我深信人们是会知道的那样）我们正式通过了国际联盟的原则，亦即使这一原则付诸实施时，我们将通过这一事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解除忧虑不安的负担。我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当我信步走在这里的街上时，我看见到处都有穿美国军服的人。他们是在表达了我国的决心后才参加战争的。他们是作为圣战者前来的，不仅是为了打胜一场战争。而且是为了争取一项事业的胜利。因此我要对他们负责。我曾要求他们为了这些目的而打仗，现在该轮到我来详细阐述这些目的了。而且，我也同他们一样，必须是一个为这些事情而战斗的圣战者，为了实现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不管可能需要做什么。

我很高兴，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事业拥有各方面的拥护者，我之所以坦率承认这一点，目的是让你们理解，为什么由我们来提出它是拱门的基石，为什么我们慷慨的总统会想到请我首先发言，因为我们对欧洲大陆和东方的政治没有牵涉。这不是由于我们是唯一能够阐述这种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能与你们联合起来共同阐述这种思想乃是我们的荣幸。

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刚才的发言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热情的源泉传给你们，因为我觉得，这些源泉产生于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错误和同情，而且，在这项事业上似乎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世界的脉搏。

【德国】蔡特金（1857～1933）

蔡特金，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后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多年的政治活动把她锻炼成为一名著名的演说家，从著名演讲《在走向坟墓前奋发工作、斗争》，可以看出她时刻为无产阶级的崇高理想而奋斗的精神。

在走向坟墓前奋发工作、斗争

男女同志们，你们表扬我、称赞我，就像夺去了我的力量，因为我想到我想做而没有能够完成的一切；我感到给了我生命和革命思想和我很遗憾地欠下革命的一切，因为我没有能超过我的力量。同志们，我所做的像某些事情那样自然。我不过是永远服从我的本性，所以不值得赞扬。我不能是别的样子，只能是我这个样子，我不能有另外的行动，只有像我这样行动。河流向山谷流去，它因此受到赞扬吗？鸟儿歌唱，它受到称赞吗？这是很自然的。我所以为革命，是由于内在的必然性使我必须为革命服务。

我不同意赫克尔特同志在这儿对我的赞美。但是我有义务，在你们面前表达我的愿望：为了我的发展和我能够做的事情，我很感谢德国的理论和实践，为了实践，我非常感谢我们法同和英国兄弟的历史和范例。但是要提到我为革命服务的意志，请你们允许我丝毫不带资产阶级味道说几句话：为了我的革命道德，我必须永远感谢俄国革命者、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典范。我在道德上的成就，我为革命事业而献出的精力的源泉，首先来自我同俄国革命从70年代起就建立的亲密联系。请允许我在这儿再说几句别的话：我不能站在你们面前而不回忆到那些过去是并且将来仍然是我的存在的一部分的人们，不能不回忆到罗莎·卢森堡……我不能抑制我心中的悲痛，她今天不能再站在我的身旁，不在我们中间。我在心中，把这儿的这些鲜花全放在她的坟墓上。

同志们，我太激动，不能为你们作一篇漂亮的演说。可是，我内心只有一个愿望，你们大家都可以帮助促使这个愿望实现。就是在我还没有看到在德国（如果可能也在其他国家）爆发革命以前，就不定到坟墓里去，而去工作，去进行斗争。对我的工作和斗争只有一个决心，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作出贡献。

【英国】乔治（1863～1945）

乔治，英国政治家。1914年9月2日英德两方谈判时，德国首相提出：“你们是否要为一张废纸（指保证比利时中立的休约）和我们开战？”本文是乔治的回答讲话。

“一张废纸”

在座诸位没有人比我更不情愿、更反感地看到我们被卷入一场大战的前景了。在我的一生政治生涯中，我一直抱着上述的态度。没有人会比我更坚信，我们不可能既避免这场战争的发生，又不使我国荣誉受到损害。我完全清楚，历来一个国家如卷入战争，就必然要乞灵于荣誉这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不少罪行都是在荣誉的名义下犯的。现在就有些犯罪活动正在进行。然而，国家的荣誉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任何国家无视这个现实，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为什么这场战争牵涉到我国的荣誉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承担着光荣的责任，要保卫一个弱小邻国（指比利时）的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这国家很弱小，不可能强迫我们这样做。但是如果有人因债权人太穷，无力强迫他还债，便拒绝清偿债务，此人便是一个卑鄙的恶棍。

我们郑重地签订过一项保卫比利时的条约，但是在条约上签字的不仅是我们。为什么奥地利和德国不履行条约规定他们应守的义务？有人提出我国引用这项条约纯粹是借口，说我们施诡计、耍手腕，有意掩饰我们对更为文明发达的国家的妒忌心，我们正企图摧毁这个国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在1870年的行动。当时我们也曾呼吁法国和普鲁士遵守这项条约。

那时比利时的最大威胁来自法国而不是德国。我们要求德、法两个交战大国同时声明他们无意侵占比利时领土。俾斯麦怎样回答呢？他说，既然有生效的条约，向普鲁士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便是多此一举。法国也作出了类似的回答。在布鲁塞尔市政府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份著名文件中，比利时人民对我们干预此事表示了感谢。1870年，法国军队在比利时边境受到普鲁士炮火的严密封锁，断绝了一切突围的出路。唯一的办法是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进入比利时国境。但当时法国人情愿灭亡与屈辱，也不愿破坏条约。当时法国皇帝和将军们以及成千上万英勇的法国人宁愿被俘，也不愿国家声誉受损。在撕毁条约有利于法国的时候，法国没有这样做。但今天，撕毁条约有利于德国，德国却这样做了。

她以一种侮慢的态度公开承认这一点，她说条约只是在有利于你时才对你有约束力。德国首相说，条约不就是一张废纸吗？你们身上有没有带着5英镑的纸币？带着印刷精美的小张1英镑纸币？要是有的话，烧了它吧。还不是几张废纸！它们是用什么造成的？残片碎布罢了！可是它们价值几何？价值不列颠帝国的全部信誉啊！几张废纸！这几个星期我一直在和几张废纸打交道。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商业突然停顿下来，机器停止了运转。为什么？因为商业机构是由汇票来推动运转的。我也见过一些汇票，破破烂烂，皱皱巴巴，上面乱涂乱画，斑斑点点，肮脏不堪。但是这些废纸却开动了载满千万吨珍贵货物的巨大海轮，往返航行于世界各地。这些废纸后面的动力是商人的信誉。

条约是代表国际政治家信誉的货币。德国商人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

商人一样有着同样诚实正直的名誉。但是如果德国货币贬值到和她的政治家的信誉一样的水平，那末从上海到瓦尔帕莱索，再也没有一个商人会对德国商人的签字看上一眼了。这就是所谓一张废纸的理论。这就是伯恩哈迪公开宣扬的理论：条约只在有利该国时才有其约束力。这关系到一切公共法律的根本问题。这样走下去，就直通野蛮时代了。正如你嫌地球的磁极妨碍了一艘德国巡洋舰，便把它除去一样，各个海洋的航行就会变得危险、困难，甚至不能航行。如果在这次战争中，这种主张占上风，整个文明世界的机制便要土崩瓦解。我们正在同野蛮作战。只有一个办法能扭转这种情况：如果有哪些国家说他们只在条约对他们有利时才守约，我们就不得不使局势变得只有守约才对他们有利。

.....

【美国】莱恩（1864—1921）

莱恩，曾任美国内政部长。本文是他 1914 年 6 月 14 日美国国旗制定日对国务院内政部工作人员的讲话。

制造国旗的人们

今天早晨，我走进土地管理局的时候，国旗飘扬着，似乎向我热情敬礼。从那旗面的皱折中，我仿佛听到它说：“早上好，制旗者先生。”

“请原谅，光荣的老友，”我说，“你搞错了吧？我不是合众国总统，也不是国会议员，连部队里的将军也不是。我不过是个政府职员罢了。”

“我再次向你致敬，制旗者先生，”它高高兴兴地回答，“我对你熟悉得很。你就是昨天在爱达荷为移民家宅地基问题费尽心血、解纷排难的那个人，或者你就是那个发现同俄克拉荷马印第安人签订的契约中有弊病的人，要不然你就是帮助了那位有前途的纽约发明家解决专利权的人，或许是开办了科罗拉多一项新的挖渠工程的人，或许是使伊利诺矿山更安全的人，或许是使怀俄明老兵得到救济的人。没有关系，不管你是上述哪一位做好事的人，我要向你这位制旗者先生问好。”

我正要走过去，国旗把我叫住，对我说：

“昨天总统说了一句话，使千百万在墨西哥欠债的佣工的将来更幸福。但是在国旗上，总统的这个行动，并不一定比今年夏天一个男孩在乔治亚洲赢得玉米俱乐部奖所作的努力更伟大。”

“昨天国会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将把阿拉斯加的大门打开；但是密歇根的一位母亲为了使儿子受到教育，从早到晚辛劳工作，这位母亲也同样是在制造国旗。”

“昨天，我们通过了一项新的法律，防止发生经济恐慌；也可能是昨天，俄亥俄州一位小学教师教他的学生学写最初几个字母，这学生也许有一天会谱出一首使我们民族千万人振奋的歌曲。我们都在制造国旗。”

我不耐烦地说：“可是这些人不过是在做工作呀！”

国旗大声喊起来：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制造国旗。”

“我不是国旗，根本就不是，我只不过是它的影子。”

“你们把我做成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

“我是你们对自己的信心，我是你们对民族发展方向的理想。”

“我生活在变化之中，有时兴高采烈，有时心碎，有时疲劳。”

“有时我会满怀豪情，感到坚强，这是人们诚实工作、井然有序的时候。”

“有时我嗒然懊丧，因为我那时失去了目标，可悲地成为懦夫。”

“有时我趾高气扬，华而不实，自我中心，完全失去了判断力。”

“但是，你们希望我成为什么样子，我就永远是你们希望的样子，并且有勇气努力去做。”

“我是欢歌，我是恐惧，我是斗争，我是惊惶，我是使人高尚的希望。”

“我是最弱小者的日常工作，又是最强大者的最高梦想。”

“我是宪法和法庭，我是法规和立法者，我是士兵和大无畏的人，我是运货的马车夫，我是扫街的工人，我是厨子、律师和职员。”

“我是昨天的战争和明天的失误。”

“我是那些不知其所以然而为之的人的一个谜。”

“我是执着的理想，我是经过冷静考虑下定决心去争取的目标。”

“你们相信我成为什么，我就只能成为什么；你们相信我能成为什么，我就能成为什么。”

“你们把我造成什么样子，我就是什么样子。”

“我在你们的眼前飘扬，像一束五彩的光，象征着你们自己，上面画出创造我们国家的伟大精神。我的星条是你们的梦想和劳动。它们因振奋而明亮，因果敢而光辉，因信仰而坚定，因为那是你们用心做成的。你们是国旗的制造者，所以你们应当为制造国旗而感到无上光荣。”

【英国】麦克唐纳（1866—1937）

麦克唐纳，英国工党右翼领袖，曾任内阁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英国参战。本文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工党会议上的演说。

论和平

今天，当我阅悉和平已经到来，就像我当初盼望和平、为和平祈祷之时一样，想到了遍布中欧各地几乎数不清的坟墓。我们许多儿女长眠在这些坟墓之中。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心头为这些再也不能含笑归来和我们重逢的人树立起一座纪念碑。难道不应该建立一座雄伟壮丽的纪念碑，使后世子孙即使忘记了他们的姓名，也能永远记住他们的牺牲吗？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我仿佛听到他们墓上的青草在簌簌生长，发出庄严而又使人慰藉的和声，这种简单而使人安慰的和平之音仿佛逐渐响亮起来，更加庄严肃穆，把一切纷乱的枪炮声淹没下去。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难道心内没有这种感情吗？我们难道不能神游我们孩子们长眠之所，而且感到和平将植根于我们心中，也将主宰欧洲？通过这些哀痛与牺牲，我们不会变得聪明，得到启示，使欧洲永保和平吗？

【美国】杜波依斯（1868—1963）

杜波依斯，美国黑人学者、反帝战士。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泛非运动创始人。主要作品有《黑人的灵魂》、《世界与非洲》等。本文是他在莫斯科全苏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讲，时为1949年8月26日。

为和平而奋斗

我代表千百万正和你们一样反对战争的美国公民。但是，美国公民既不容易知道世界的真相，也不容易把这种真相表达出来。尽管美国有才智，有财富，也有精力，这仍然是事实。为了对我的祖国和对世界和平事业尽我的最大责任，我最好用一点时间来说明关于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历史原因。由于我代表着1400万美国人民——占美国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明了美国的迫切问题——所以我能够更适当地做到这一点。

美国向来有两个极有利的条件：一个是它的丰富的天然资源，另一个是它的效率高的劳动力。效率最高的劳动力是奴隶劳工；起先这种奴隶劳工包括白人和黑人，后来随着时间的进展，其中非洲黑人越来越多，这些非洲黑人是英国人竭力运进来的，在18世纪的时候尤甚。从1500年到1800年，英国人运了1500万黑人到美洲各地，这使非洲损失了1亿人，摧残了它的文化，破坏了它的经济。这些劳动力，为世界生产烟草、棉花、糖和许多其他农作物，并使美国向全世界开放。跟着又有千百万的工人逐渐移居到美洲来，这些工人主要是由欧洲来的。他们由于受了劳动能立即获得大利的鼓舞，成了很努力的工人，技术精良而富有创造性。在这自由的土地上，有良好的气候和贸易的自由，个体工人能维持生活并常有致富的，而且没有必要为了公共的福利施行广泛的社会管理。在1800年到1900年之间，美国的特色是没有社会主义，可是大多数工人都有很大的收益。

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不仅是由于资源丰富，也是因为奴役了黑人。在一个既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社会权利的受压迫的奴隶阶级供给着大量的基本原料和整个地区的劳役的时候，白人的资本和白人劳工的成分是不正常地巨大的。甚至在18世纪末叶，当日渐增加的白人劳工群众由于受到当时思想家的启发，企图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时，还面对着一个不愉快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土地上，还存在着奴隶。有些人主张立刻禁止奴役黑人，但是这些奴隶是非常大的资财和收入，因此要这样做就不容易。在1787年，美国在每五个人里面差不多就有一个是奴隶，所以，在当时这个事实面前，美国就宣布“所有人一律平等”。这公告并不完全是假仁假义的。大多数的人认为如果没有奴隶买卖，就可以使奴役黑人的事不再继续下去，所以他们规定用二十年的时间来消灭这种非洲奴隶贸易，希望由此逐渐消灭这种奴隶劳工。

结果并没有这样。因为在美国，奴隶买卖虽然减少了，这些奴隶劳工却开始种植了非常有价值的棉花，这种用新发明的机器种植的棉花，成了近代世界上一种利润最丰厚的投资。欧洲织布的纱锭从1800年的500万枚增加到1900年的1.5亿枚，而所用的原料都是黑人劳工供给的。这是棉花王国，代表着巨额的资本和千百万人的收入。所以，在1820年，美国的奴隶制度的经

济基础已经非常稳固，以致没有一个大变动，奴隶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了。

社会革命的压力当然不是来自工业家，也不是来自资本家，甚至也不是一开始就来自白人工人，这些白人工人知道他们自己所得的优厚工资是靠着重奴役黑人而来的。压力还是主要来自黑人，首先是他们人数大大增加，从1790年的75万人，增加到1840年的300万人，其中有40万人用赎身、逃亡或由于慈善措施而获得自由。他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逃离了奴隶制度盛行的地区。他们联合了白种人进行废除奴隶制度的运动。他们在海地和西印度群岛其他各地的同白种人的流血暴动，使全世界为之震动。

但是黑奴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的同情，因为奴隶劳工开始增加价值的时候，有人早就广泛进行了一贯的宣传，用科学和宗教证明黑人不是真正的人类，说他们是低级动物，只适于做奴隶。结果争取民主的斗争，尤其是争取对于财富和个人努力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管理的斗争，受到了阻碍，而且被排除了。这是由于最低级的劳工受到普遍轻视，而不受任何阻碍的个人努力自由一贯地被过分强调，甚至这样做使社会受到损害，社会因此退步，也在所不惜。所以当社会政策及为了公共的福利而实行的广泛社会管理，应该在美国像在欧洲那样普遍推行的时候，相反地，美国呈现了一种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加紧了奴隶制度，认为只要个人成功，团体成功，即使因此而牺牲国家利益也是无所谓的。

当白人工人渐渐看出如果奴隶劳工发展到西部自由土地上去，那他们的黑人弟兄的奴隶制度对他们就不再有利的时候，局势已很严重了，因此就发生了内战。战争的目的并不是废除奴隶制度，而是使这种制度局限于产棉的各州内。南方决心把奴隶制度伸展到北方去，要是不能，就伸展到加勒比海沿岸和南美洲去。这么一来把北方的资本逐出了最有价值的市场，北方就是为了保留这个市场而打仗的。可是北方没有奴隶的合作就不能取得胜利，因为南方军队的粮食，是由这些奴隶生产的。这些奴隶经过一次总罢工，渐渐地逃到北方军队里去，做工人，做仆人，做间谍，最后他们有30万人成了武装兵士，另外有100万人准备随时参加战争。这样，美国黑人才得到了自由。

接着就发生了怎样处理这些黑人的问题。他们没有知识，他们贫穷，他们有病。北方人想让他们流浪，可是这些得到自由的黑人迫切地需要土地，需要教育。有些慈善家拟了一个设立学校、分配土地的社会的管理计划。但是这个计划被工业界拒绝了，说它费用太大，又与美国的个人主义精神不合。此外还有一个障碍，如果不把投票权授予这些奴隶，他们的票数就会由他们以前的白人主人得去，这些白人主人就会投票赞成降低战争工业借以繁荣的关税，也会投票赞成削减为北方各银行所有的战债。因此工业界立刻把投票权授予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盼望他们不使用投票权而同时破坏南方种植园主的权力。但是黑人并没有如他们所愿，还是使用了投票权；同时他们使白人兄弟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创办了任何人都能入学的公立学校，并为医院、监狱和土地分配拟定了现代化的社会改良性质的法律。不久，从前的奴隶主和北方的工业领袖们达成协议，剥夺了这些获得自由的黑人的选举权。南方从此将支持关税和战债。获得自由的黑人就丧失了投票权，但是他们保留了学校，依靠他们菲薄的工资和北方慈善家的帮助，惨淡维持下去。

美国最近这七十五年的历史，包括人类历史上一系列伟大的事迹。利用了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高超技术，利用了有系统的老练的管理、庞大的天然资源和世界范围的贸易，美国已经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工业机构，而且还可

以再扩大。这个组织在计划上、调配上和方法上都是社会主义的，可是它并不是民主管理的，也不是以福利国家的那些目的为目的的。

今天美国的工业，正如乔治·塞尔得斯所说的，是由 1000 个人控制着的，美国的工业主要是为了这 1000 个人的利益和权力在经营着。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的进步没有很大贡献，但是人类的进步不是美国工业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它唯一的结果。自拓荒者时代到现在，美国的哲学一直是，个人的成功必是社会的进步；而现在许多美国人坚信，受寡头政治控制的垄断资本的成功就是整个国家的成功。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美国的高度生活水平和生产力并不是由垄断资本和私人利润产生的。但是尽管这样，生产水平和生产力还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事实就说明：如果美国的财富和工业计划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进步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权力和享受而经营的话，那末，不仅是美国就是全世界的生活水平也可能比现在要高得多了。

美国私人财团的权力已经窒息了民主政治。这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内战结束、全国重建工作完成以后，产生了肤色等级。南方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以后，南方白人的事业，就渐渐地归北方工业家所有。肤色等级剥夺了广大的黑种人民的政治权、公民权，并强迫他们接受最低的工资。结果造成了 1890 年至 1900 年的巨额工业利润，当时正是发生最大规模的资本联合的时候。

这些年中，黑人争取民主的斗争，是美国国内这种斗争中的主流。他们开始得到奴隶制度废除论者的后继人、开明的白人的同情。这些白人这时候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身体得到解放以后，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也跟着得到解放，否则就毫无意义了。美国有一群黑人和白人为废除肤色等级而斗争了半世纪以上，而且有了显著的进步：美国黑人已开始有权投票，获准参加工会，得到了许多种公民权，但是坏影响和对民主制度的长时间的玩忽已经波及全国。很多有投票资格的人都不去投票。民主制度在工业里面是没有份的，除非通过强力或以罢工来威吓。美国的大工业没有一个承认它应当或者能由那些替它做工的人来管理。但是工业不采用民主方法，民主制度就不能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发生作用。我们的政治生活是由有组织的财富集团管理着的，这是谁都承认的。虽然我们一切工作的社会化在进行中，但它的管理依然是在寡头政治的控制下，它的目的也是由寡头政治决定的。这种目的也许是有利的决定，也许是有害的，但是都决不是用民主方法达到的。

美国自称代表民主政治，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别，这显然是骗人的。法西斯主义是由寡头政治控制一个社会化的国家，它为的是寡头政治家和他们的朋友的利益。共产主义是一个由一群工人执政、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社会化的国家。美国、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的各种管理的性质比较起来可能相差很小；可是管理的目的，相差却极大。在美国，现在的目标是把管理有组织财富的人的权力集中和扩大。他们还设法向美国人证明任何其他制度对人类的进步都不会像这个制度这样地成功。但证明的方法不是自由的科学研究，自由的新闻报道，也不是公开的自由讨论。在今天的美国，有组织的财团控制着报纸和主要的新闻采访机构，并加强控制学校，使得公开讨论很难进行，甚至使得思想自由也感到困难，而且往往不可能。

要医治这种病态，要把社会化计划的美国改变成为一个福利国家的办法是由美国人民通过工业和政府来治理国家。这件事是要逐渐进行的。许多美国人还没有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我们现在自己办理邮政；我们搞运输和银行业务；我们建立了巨大的田纳西流域管理系统；我们对于铁路、无线电、

都市计划、空运和水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控制；此外，在许多别的方式下，公共福利的社会管理正在美国不断发展，并且一定会在美国发展起来。但是美国群众却不知道这公共福利的社会管理，也不知道它的成就和它在别的发展情况，他们正被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宣传引入歧途。这种宣传说，他们所具有的自由和仅余的一点自主权正受到威胁。只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唯一的补救办法。

整个美国并没有为这种一揭即穿的欺人之谈所迷惑。进步党……已经指责这种宣传；1948年的选民表示了广泛的一致意见，但由于恐惧。却选了一个没有履行他的诺言的人。去年艺术、科学和自由职业界全国委员会发出强烈抗议，反对战争，公谊会也发表了一篇同样内容的、非常得体的声明。此外，还有千百万的美国人同意这些和平运动领袖的意见。我现在向你们转达他们的敬意。

【印度】甘地（1869～1948）

甘地，印度民族运动领袖。早年留学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回印度，提倡“不合作运动”（即非暴力抵抗运动）。1948年被印度教极右派分子行刺身死。这是他1931年9月在英国BBC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说。

我邦之呼吁

我以为印度争取自由的斗争，其后果不仅影响印度与英国，而且影响全世界。印度占有全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是最古老文明国家之一。印度有数万年流传下来的传统，其中一部分至今保存完整，使世界为之瞠目。正如其他的文化和传统年深日久受到损坏一样，印度文明的纯净无疑也受到年代久远的侵蚀。印度若要恢复古时的光荣，就只有先获得自由。就我所知，我们的斗争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并不是因为印度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而是因为我们争取解放所采取的手段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不曾为有过记录的任何民族所采用。

我们采用的手段不是暴力，不必流血，也无需采取时下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外交手段，我们动用的仅是纯粹的真理和非暴力。我们企图成功地进行不流血革命，无怪乎全世界的注意都转向我们。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斗争方式都是野蛮的，他们向自己认为的敌人进行报复。

查阅各大国的国歌，我们发现歌词中都含有对所谓敌人的诅咒。歌词中发誓要毁灭敌人，而且毫不犹豫地引用上帝的名义并祈求神助以毁灭敌人。我们印度人正努力扭转这种进程。我们感到统治野蛮世界的法则不应是指导人类的法则。统治野蛮世界的法则有悖人类尊严。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宁愿等待数个世纪，也不愿用流血手段使我的国家得到自由。在连续不断地从政近35年之后，我由衷地感到，全世界对于流血已经深恶痛绝。世界正在寻找出路，我不揣冒昧地说，或许印度古国会有幸为这饥渴的世界找到这条出路。

【俄国】列宁（1870～1924）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列宁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本篇用激烈的言词抨击了帝国主义在欧洲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了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和态度，预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同志们！欧战逞狂肆虐已经一年零六个月了，战争每拖长一月，每拖一天，工人群众就更加清楚地知道齐美尔瓦尔得宣言说的是真理：“保卫祖国”之类的词句不过是资本家骗人的话，现在人们一天比一天看得更清楚，这是资本家、大强盗的战争，他们所争的不过是谁能分到更多的赃物，掠夺更多的国家，蹂躏和奴役更多的民族。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不足信，特别是对于瑞士的同志们，然而这些话都是确实的，就在我们俄国，不但血腥的沙皇政府，不但资本家，而且有一部分所谓的或过去的社会主义者，也说俄国进行的是“自卫战争”，也说俄国反对的不过是德国的侵略。其实全世界都知道，沙皇政府压迫俄国境内其他民族的一亿多人民，已经有好几十年，俄国对中国、波斯、阿尔明尼亚和加里西亚实行掠夺政策，也已经有好几十年了。无论是俄国、德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权利谈什么“自卫战争”；一切强国所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战争，都是强盗性的战争和压迫弱小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战争，都是保证资本家利润的战争，使资本能够以群众遭受的骇人听闻的痛苦和无产阶级流出的鲜血换得亿亿万万纯金的收入。

四年以前，在1912年11月，当战争日益逼近这一形势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在巴塞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那时对于将来的战争是列强之间的、大强盗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罪过应当由各强国的政府和资本家阶级承当，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政党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宣言，公开说出了这个真理。巴塞尔宣言没有一句话提到“自卫战争”，提到“保卫祖国”。它一无例外地抨击各强国的政府和资产阶级。它公开说，战争是滔天的罪行，工人认为相互射击就是犯罪，战争的惨祸和工人对这种惨祸的愤怒，必然会引起无产阶级革命。

后来战争真正爆发了，大家都看到，巴塞尔宣言对这次战争性质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是，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不是一致地拥护巴塞尔决议，而是发生了分裂。现在我们都看到，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是怎样分成两大阵营的。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领袖、干事、官僚，背叛了社会主义，站到各国政府那一边去了。另一部分人，包括自觉的工人群众，继续聚集力量，为反对战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

后一部分人的观点也反映在齐美尔瓦尔得宣言里。

在我们俄国，战争一开始，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就进行了反对战争和沙皇君主制的坚决的革命斗争。彼得罗夫斯基、巴达也夫、穆拉诺夫、沙果夫、萨莫依洛夫这五个工人代表广泛发出了反对战争的革命号召，努力进行了革命鼓动。沙皇政府下令逮捕了这五个代表，法庭判处他们终身流放西伯利亚。这些俄国工人阶级的领袖已经在西伯利亚受到了几个月的折磨，但是他们的

事业并没有被摧毁，全俄自觉的工人正循着同样的方向继续干着他们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在这里听到了各国代表的关于工人如何进行反战革命斗争的演说。我只想给你们举一个最富强的国家即美国的例子。这个国家的资本家现在由于欧故而得到巨大的利润。他们也鼓动战争。他们说，美国也应当准备参战，应当向人民榨取几亿金元来进行新的军备，无穷无尽的军备，美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也响应这种骗人的、罪恶的号召。但是我要把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最有声望的领袖，美国社会党的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同志写的一段话念给你们听一听。

在 1915 年 9 月 11 日的美国“向理智呼吁报”（《Appeal to Reason》）上，他说道：“我不是资本家的士兵，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我不是财阀的正规军的士兵，而是人民的非正规军的战士。我坚决拒绝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作战。我反对任何战争，但是有一种战争我是衷心拥护的，那就是为了社会革命而进行的世界战争，如果统治阶级迫不及待地需要战争，那末我决心参加这种战争。”

美国工人热爱的领袖，美国的倍倍尔——尤金·德布兹同志就是这样向美国工人们讲的。

同志们，这又向我们表明，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真正在集聚力量。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灾害和痛苦是难以设想的，但是我们不应当、也没有任何理由对将来悲观失望。

在战争中阵亡的和由于战争而丧生的几百万人并不是白白地牺牲的。千百万人在忍饥挨饿，千百万人在战壕中牺牲性命，他们不但在受苦受难，而且也在聚集力量，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锻炼自己的意志，他们对革命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群众的不满愈来愈增长，风潮、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议战争的运动愈来愈激烈。对于我们这就是保证，保证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在欧战以后到来。

【德国】卢森堡（1871—1919）

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的女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本篇揭露和批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

在莱比锡社会民主党集会上的演说

疯狂的扩军奋战的结果是议会主义的可耻破产。德意志议会内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都销声匿迹了，没有任何一个扩军的法案不是被政府的忠实走卒（Manedeuk）顺利通过的。只要政府吹一次口哨。议会就像一只鬃毛狗那样跳起来。当出兵中国（1900年）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帝国议会的议员们躲在家里不出面，然后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像狗一样恭顺地替政府为此耗费的钱财开脱一切责任……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如果还对议会主义抱什么期望，那还配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么？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重心应该转移到群众中去；议会仅仅是一个讲坛，议会活动的意义确实是有的，就是从这个讲坛可以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以此影响群众，为的是在必要的场合使群众能够行动起来，这点近来已有充分的证明。有人常常手里拿着现金出纳簿和党员名册对我们肯定地说，我们党员的数量还不够多，我们的基金非常有限，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发动。啊，这些打小算盘的会计能手！……

不应该犯低估我们的力量、低估广大群众的自发力量的错误，因为对我们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造成的危害性，远远超出于过高估计我们力量的危害。我们应该对无产阶级群众说，如果经过五十年的发展以后，今天我们的队伍已经拥有百万之众，那末，这不仅说明我们足以自豪，而且说明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应该在实现我们的任务时表现出像某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表现的那种勇敢、果断和坚毅不拔的精神，丹东在他有名的演讲中只用三个词表达出这种精神的实质：“勇敢、勇敢、再勇敢！”

【英国】丘吉尔（1874～1965）

丘吉尔，英国保守党领袖，著名政治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本篇是他第一次出任首相时的首次演说。

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上星期五晚上，我接受了英王陛下的委托，组织新政府。这次组阁，应包括所有的政党，既有支持上届政府的政党，也有上届政府的反对党。显而易见，这是议会和国家的希望与意愿。我已完成了此项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战时内阁业已成立。五位阁员中包括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了举国一致的团结，三党领袖已经同意加入战时内阁，或者担任国家高级行政职务。三军指挥机构已加以充实。由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给予人的紧迫感，仅仅用一天时间完成此项任务，是完全必要的。其他许多重要职位已在昨天任命。我将在今天晚上向英王陛下呈递补充名单，并希望于明日一天完成对政府主要大臣的任命。其他一些大臣的任命虽然通常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议会再次开会时，我的这项任务将告完成，而且本届政府在这方面都将是完整无缺的。我认为，向下院建议今天开会符合公众利益的。议长先生同意这个建议，并根据下院决议所授予他的权力，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今天议程结束时，下院体会到5月21日，星期二。当然，还要附加规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提前复会。下周会议所要考虑的议题，将尽早通知全体议员。现在，我请求下院，根据以我的名义提出的决议案，批准已采取的各项步骤，将它记录在案，并宣布对新政府的信任。

组成一届具有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政府，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争的初期阶段，我们正在挪威和荷兰的许多地方进行战斗，我们必须在地中海地区做好准备，空战仍在继续，众多战备工作必须在国内完成。在这危急有亡之际，如果我今天没能向下院做长篇演说，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宽恕。我还希望，因为这次政府改组而受到影响的任何朋友和同事，或者以前的同事，能对礼节上的不周之处予以充分谅解，这种礼节上的欠缺，到目前为止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我曾对参加现届政府的成员所说的那样，我要向下院说：“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的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是漫长的战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斗，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所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赢得胜利。无论多么可怕，也要赢得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赢得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没有胜利，就没有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自己目标奋勇前进这一世代相因的强烈欲望和动力。但是当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是心情愉快、满怀希望的。我深信，人们不会听任我们的事业遭受失败。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要说：“来吧，让我们同心协力，一道前进。”

【美国】爱因斯坦（1879～1955）

爱因斯坦，著名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33年迁居美国。本篇阐述了原子能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呼吁美苏两霸放弃武力。

原子能时代的和平

感谢你们使我有机会就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在军事技术已发展到目前状况的今天，加强国家军备以保证安全的想法，只是一个会带来灾难后果的幻想。美国首先制成了原子弹，所以特别容易抱有这种幻想。看来多数人相信，美国最终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这样，任何潜在的敌人就会被震慑，而我们和全人类就可以得到大家所热望的安全了。我们近五年来一直信守的格言，简而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得到军事力量的优势以保证安全。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最初只是作为一种防止战争的手段，现在已经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保证安全的漂亮帷幕后面，双方都以狂热的速度改善大规模的破坏手段，在人们的眼光里，制成氢弹似乎已是可能达到的目标。

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以及由此导致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从技术角度而言将成为可能。这种发展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已明显地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一步必然引出第二步。最后，越来越清楚地，必然招致全人类的普遍灭绝。

人类自己走进的这条死胡同还有出路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对美国和苏联的立场负责的人，应该认识到：我们可能战胜外部的敌人，但却不可能消除由战争产生的那种精神状态。

如果每采取一项行动都考虑将来可能要发生冲突，那么要取得和平便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为了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存甚至真诚合作，我们能做些什么？

首先要做到的是去除双方的恐惧和猜疑。郑重宣布废弃使用武力（不仅是废弃大规模的破坏手段），无疑是必要的。

然而，只有同时成立一个超国家的司法和执行机构，使它有权决定直接关系到各国安全的问题，才能有效地废绝使用武力。即使是各国发表共同宣言，保证忠诚地通力合作，使成立这样一个“权力有限的世界政府”得以实现，也会大为缓和战争发生的危险。

总括地说，一切人类和平分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信任，其次才是法庭和警察一类的机构。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国家也是这样。信任的基础是：取和予都要正直忠实。

【英国】福斯特（1879～1970）

福斯特，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散文集《阿宾格收获》、《为民主再欢呼》等。本文选自《小说面面观》第五章。本书是他1926—1927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作的讲演，被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

情 节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从人物可看出作品的特色，而从动作——人物的行为——才能感到悲或喜。”可以断定，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见解是不对的。现在就让我们谈谈为什么不同意他上述见解的理由吧。“凡是人的悲或喜，”他还说，“都是以动作来表现的。”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人的悲喜之情也蕴藏于内在活动之中，并不为外人所知。对此，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小说家也不无同感。我们所说的内在活动，意指那种没有外在迹象的活动。它并不像一般人设想的那样，可以从一次偶然的言谈或表情中察觉，因为偶而的言谈或表情也像演说和杀人那样有外在迹象。所以说，这类活动已越出内在的范畴，而进入动作的领域了。

然而，我们也不必借此机会责难亚里士多德。因他几乎没读过多少小说，尤其没看过现代小说——他只看过《奥德赛》，并没看《优利西斯》。他对内在活动从来不感兴趣，甚至认为心灵像条管子，里面的一切意念始终要被抽出来看的。他在写上面引用的那些话时，是仅就戏剧而言，这无疑符合事实的。因为剧中人的悲喜之情只能以动作的形式表现，否则，观众就无法看懂。这正是小说与戏剧的重大区别。

小说的特点在于：作家可以大谈人物的性格。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读者听到人物的内心独白。他还能接触到人物的冥思默想，甚至进入他们的潜意识领域。个人的自言自语——即使对自己说的——并不全是真话。因为个人心中隐约地感到的悲哀与欢乐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往往不易说清楚。由于这些情绪来去匆匆，如果都能加以解释的话，那就会失去其本意。小说家的真功夫就在于他不仅可以将短暂的潜意识转变成言行（戏剧家也有此种本事），而且能够说明这种转变与独白的关系。他们拥有评论一切内在活动的权力。我们决不要剥夺小说家这种特权。“作家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读者有时问道，“他的观点是什么？总是前后矛盾，以前说要有个限度，后来又可以说可以无所不知，现在又回到原来的观点上。”对待这类问题，他真有点像法官判案似的。但在读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观点的转变和内在活动是否令他们信服。看来，亚里士多德也该隐退了，还是连同他为之自我陶醉的那些论调一起隐退吧。

不过，他仍然给我们留下一些混淆不清的概念：人们对人性扩大了视野以后，定会提出究竟情节是由什么构成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包含两个因素，一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人物；二是我们姑且称之为技巧的东西。对于技巧这玩意，我们虽议论过，但仅谈到其中的一种很低级的形式——故事而已。它不过是从时间绦虫上切下的一个片断。而今谈的却是小说中较高级的一面——情节。谈到情节，我们发现小说人物与戏剧人物并不一样。后者多少要受舞台条件的限制：而前者人数众多，形象模糊，又难以驾驭，宛似一座四

分之三已淹没在水中的冰山。对于小说中出现的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如按照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个程序——纠纷、转折、解决——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有些人物一出场就与别人发生纠纷，结果呢，小说最后竟成了剧本。当然，并非所有小说都如此，人物也有独坐一隅，以便善自思索或干点什么的，而情节所忌讳的正是这些离群索居的人物。“不要这样，”情节似乎在说，“个性是最可贵的品质，老实说，我的地位就靠这些人才得以保持，所以往往让他们尽量行动自由，然而也得有个限度，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限度正在被冲破。人物决不要耽于冥思苦想，以免浪费时间。他们必须作出贡献，否则就不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这就是说，“要对情节作出贡献。”这句话是人所共知的，对戏剧人物来说尤其适用，但对小说人物是否也如此呢？

现在，我们该给情节下个定义了。我们曾给故事下过这样的定义：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如“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虽然情节中也有时间顺序，但却被因果关系所掩盖。又例如：“王后死了，原因不详，后来才发现她是因国王去世而悲伤过度致死的。”这也是情节，不过带点神秘色彩而已。这种形式还可以再加以发展。这句话不仅没涉及时间顺序，而且尽量不同故事连在一起，对于王后已死这件事，如果我们再问：“以后呢？”便是故事，要是问：“什么原因？”则是情节。这就是小说中故事与情节的基本区别。对于那些连打呵欠的原始人和苏丹暴君来说，情节是不合他们口味的，连他们的后代——电影观众——也不例外。只有“然后……然后……”才能使他们提起精神，不打瞌睡。这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之故。情节是要凭智慧和记忆力才能鉴赏的。

好奇心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官能。当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别人喜欢提问时，往往是他们的记忆力和领悟力最差的时候。凡是一见面就问你有多少兄弟姐妹的人，决不表示他对你的关怀。如果一年以后，你再碰上此人，也许他还是张大嘴巴、瞪着双眼问你有多少兄弟姐妹哩。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可不容易。如果两人都是好问之辈，那简直无法成为挚友。好奇心对我们作用不大，对阅读小说也一样——充其量只想看看故事而已。如要掌握情节的话，那就非加上智慧和记忆力不可。

首先谈谈智慧。聪明的读者跟好问的读者不同。前者不仅注意用眼睛浏览新事物，还动脑筋思考。他看待事物常用两种观点：先将它孤立地看，然后再同前面看到的其他东西联系起来。也许他还不明白，但并不急于马上弄清楚，留待以后再说。一本结构严密的小说，往往许多事情是错综复杂、互相呼应的，即使很有水平的读者也要到读完全书才能居高临下，鸟瞰全貌。小说中的这种令人惊奇的、也可说是神秘莫测的成分——有时人们空洞地称为推理成分——对情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设下悬念，如：“王后为什么死去？”这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表达方式。要是用暗示或对手的手法则较为高明，待再写若干页以后才让真相大白为好。神秘感对情节十分重要，没有智慧是无法欣赏的。对好奇心强的读者只要“然后……然后……”就行了，而要欣赏到神秘的奥妙，除用一半心思阅读下去外，还要留下另一半心思进行思考。

现在再谈谈记忆吧。

记忆与智慧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记住了才能弄明白。如果王后死时，我们已忘掉国王的存在，那就永远无法弄清她的死因。有些编造情节的作家

总希望读者记性好，而读者也希望作家写得有头有尾、十分紧凑，对情节中出现的每个动作、每句说话都加以认真考虑，并注意节省篇幅；即使情节复杂也要前后连贯，像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只把死材料堆砌起来。对情节中的言谈或行动写起来有难有易，但都应令人产生神秘感，应让其顺着情节往前发展，不要迷失方向。情节开展以后，这些言行就要不断勾起读者的回忆，从而根据新的线索，即新的因果关系重新加以整理和思考，直到结局为止。如果情节引人入胜的话，最后结局就不会使人产生“待续”的感觉，只感到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这也许是作者所要显示的那种美感。假如作者什么都写得一清二楚，那就没什么美感可言了。我们还是初次谈到美感问题。尽管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感为目的，但如果他写不出具有美感的小说便无法立足。关于“美”的问题，我们以后再加以评论。然而，目前我们应该先将它视为整个情节的一部分。看来，美的出现经常会令人产生惊讶之感，这有什么奇怪呢。因为她的芳容就足以使人浮想联翩嘛。当波提塞里在描绘那位从微风轻拂的花丛中冉冉升起的少女时，就已懂得了这个道理。

我们还是回到情节上吧。现在不妨举梅瑞狄斯为例。

梅瑞狄斯已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样名闻遐迩了。当时，整个剑桥以至大半个地球都为他而震动起来，真可谓极一时之盛。我记得他有一句诗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活着，不成刀剑便成砧板。”当时，我既不想成刀剑，也不愿当砧板，自知也非刀剑之材。看来，这句诗并没理由令我灰心丧气，因为当时梅瑞狄斯还处在浪潮之上，也许浪潮会使他声誉更高。但到了1900年，他享有的作为精神支柱的象征已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哲学观点并不健全，他对滥情主义的猛烈抨击使这一代人忍受不了。这代人也反对滥情，而所用的方法却比他高明。这说明爱唱陈词滥调的人，本身就是个滥情主义者。他对大自然的看法也不像哈代那样始终如一，许多观点跟萨里的相像，认为什么都是松散凌乱的。他无法写出像《还乡记》开头一章那样水平的文章，正如无法将伯克斯山移到萨里伯里平原一样。他由于对英国的自然风光存在的悲剧因素和永恒因素一无所知，所以对人生存在的悲剧因素也不了解。当他态度认真、思想高尚之时，也会慷慨激昂一番，但过后又颓丧下去。我觉得他有一点跟但尼生很相似：往往无法冷静地控制自己。他在小说中表现的社会价值观大都是生拼硬凑的，弄到裁缝不像裁缝，板球比赛不像板球比赛，甚至火车不像火车。他所写的士绅家庭成员宛似刚从箱子取出来的玩偶，东歪西倒的，连胡子上还沾着稻草哩。由此可见，他笔下人物所处的环境是离奇古怪的。部分原因是他缺乏想象力，这点不足为怪；部分原因是矫揉造作和处理不当。这些生硬空洞、令人难以忍受的说教，以及将题材局限于都市世家等原因，使他逐渐销声匿迹了。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在英国小说史上仍不愧是个出色的设计师。因此，我们在谈论情节时该向他表示敬意。

梅瑞狄斯的小说，情节并不十分紧凑。我们无法用一句话将他那本《哈里·李奇蒙》的情节加以概括，但对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则可做到。虽然这两本书写的都是一个年轻人弄错了其财产来源的故事，但梅瑞狄斯设计的情节与其说像座悲剧女神或喜剧女神的庙宇，不如说像分布在树木婆娑的山坡上一座座幽雅的凉亭。他的人物要凭本事才能到达这些亭子，才能在那儿以崭新的面貌出现。这样，人物引出事件，事件造就人物，两者紧密相连。梅瑞狄斯正是靠这些来设计情节的，因而总是令人爱不释卷。有些地方感人

至深，结局也往往出人意料。这种出人意料之感，会随即产生“啊，写得多好！”的效果。这就是情节成功的象征。真的，人物应一步步地前进，而情节则该出人意料。在《包全普生平》一书中，出现鞭打希拉尼尔医生一事就出乎读者意料之外。我们知道，埃弗拉德·朗弗里十分讨厌希拉尼尔，对他的鲁莽行径产生了误解，而且妒忌他对包全普的影响；我们还看到他对罗莎孟德的误会加深，看到巴斯克烈的挑拨离间。总之，梅瑞狄斯像玩纸牌似的让人物一步步前进，但当这事件发生时，往往使读者以及书中人物都感到意外：原来一个老人出于某种崇高的动机，鞭打另一个老叟。这种既可悲又可笑的事对两个老人都产生了影响，也使书中其他人物起了变化。这件事并非《包全普生平》的中心——其实它并没有中心。作者主要想使它作为一道门户，好让整个故事能以新的面貌通过，临到结局时包全普给淹死了。后来，希拉尼尔和朗弗里又在他的遗体前言归于好。梅瑞狄斯的意图在于使情节符合亚里士多德提倡的匀称原则，并使该小说像一座修心养性的庙宇出现。然而他失败了，因为《包全普生平》仍有一系列事件要安排，访问法国也是其中之一。而这些布局要来自人物，又对人物产生影响。

现在，我们再扼要地描述一下情节的神秘成分。根据“王后死了，后来才发现她是因悲伤过度而死的”这个公式，我可再举一例说明。这个例子既不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也不是科南·多伊尔的作品，而是梅瑞狄斯的《利己主义者》。举这本书为例比较适宜，因为它以情节曲折、感情隐晦著称，而且事情就出在丽地西娅·戴尔这个人物身上。

作者一开始就将丽地西娅的内心活动和盘托出，因威鲁拜爵士曾两度抛弃了她，使她十分哀伤、沮丧。后来，作者为了取得戏剧性效果，不再描述她的内心活动了，只让情节自然地发展下去。直到威鲁拜感到没把握赢得克拉娜的爱情时，才在一个关键性的午夜向她求婚，岂料这一回丽地西娅的态度完全变了，断然地拒绝了他。梅瑞狄斯对她的转变一直避而不谈。说实话，如果我们知道了她的转变经过，反而会感到这出大喜剧味同嚼蜡了。威鲁拜爵士的碰壁是理所当然的。老实说，假如作者让我们看出他事前设下的圈套，我们就领略不到其中的乐趣了。正因为这缘故，作者没将丽地西娅态度冷漠的原因透露出来。这是情节与人物经常会顾此失彼的无数例子之一。梅瑞狄斯在这里却把重点放在情节上，可见其造诣之深。

我还可以举一个放错了重点的例子——不过是一次疏忽罢了。那是夏洛蒂·勃朗特在《薇拉德》一书中出现的疏忽。作者没让露西·丝诺说出她发现约翰医生原来是她从前的伙伴格拉姆。后来真相大白时，我们不禁为这种情节安排拍案叫绝。不过，这会使露西的性格完整性大受影响。因为在此之前，她给读者的印象是，此人的性格是一贯乐于将自己知道的事全部端出，这似乎是作者有意交给她的道义上的任务。可是这一回她却屈服于压力没敢说出来，这就令人有点懊恼了。不过，这只是一点小疏忽，对她不会有什么损害。

有时过于强调情节，也会使人物的性格难以表现，或者使人物在命运的安排下显得无所作为，从而令读者怀疑其真实性。这类例子我们可从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中找到不少。哈代比梅瑞狄斯更伟大，但作为小说家来说，哈代的成就却不如梅瑞狄斯。依我看，哈代实际上是位诗人。他是在极盛时期进行小说构思的。从性质上说，他写的小说不是悲剧就是悲喜剧，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声。也就是说，哈代安排的事件，很注重因果关系，而整

个部署则立足于情节。人物只能按照情节的需要进行安排。所以哈代的小说人物除黛西（她令人感到是个不受命运摆布的人）外，都令人不大满意。他笔下的人物似乎都陷入各种圈套之中，最后连手足也给捆绑起来，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然而，即使为了情节而牺牲一切，我们并没看到其情节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命运在主宰着我们，而不是对我们产生影响，这就是哈代写的威克萨斯小说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哈代的剧作《王朝》写得十分成功，可谓铿锵之声可闻。尽管人物之间互相争夺，但仍受因果关系制约。同时，人物与情节环环扣紧，虽然哈代的小说竭力使超越一切的令人畏惧的命运在起作用，但一直未能令人相信其真实性。当朱迪遭到不幸时，我们总感到有个要害问题没解答，甚至未接触。也就是说，这是情节要求人物过多迁就造成的。人物除了有点乡下人的气味外，毫无活力，显得又瘦又弱。这就是浏览了哈代的小说后得到的概念，他对因果关系的强调已远远超出了能够允许的程度。作为诗人、预言家和学者的梅瑞狄斯是无法与他匹敌的。但梅瑞狄斯却了解小说应坚持什么，在什么时候人物该迁就情节，什么场合该让人物尽量发挥作用。谈到准则，我看并没有什么准则可循，因为我喜爱哈代的作品比梅瑞狄斯的更甚。从我上面谈的可以看出：我跟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同。表达人类的情感除了通过情节外，还应寻求其他方式，决不要严格地局限于情节这条渠道。

在情节与人物进行两败俱伤的战斗中，情节往往会进行卑鄙的报复。差不多所有小说的结局都显得软弱无力，原因就在于要靠情节来收场。这样做是必要的吗？为什么小说家感到写不下去时不立即搁笔呢？啊！问题在于他务必把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人物往往死气沉沉，读者最后对他们的印象是毫无生气。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作典型例子。这本小说的上半部显得巧妙和新颖，但下半部就流于呆板和一般化了。开始时，事件和人物的出现都很自然，但后来便不得不迎合结局的需要，最后连作者也感到这么做不大合适。“我无法写下去了。”他说，“虽然那些事是常见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有出现异常的情况才会令人惊讶，可是我必须有所反映呀。”诚然，哥尔德斯密斯并不是个重要的小说家，但他的大部分小说所以失败，就在于当他搁笔思考之际，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却受到逻辑观念所束缚。按照这个逻辑，最后除了死亡和团圆之外，一般小说家还能以什么收场呢？对此我也不知道。可见，死亡和结婚是他把情节和人物连结起来的看家本领。而读者也大都希望他那么写，因为结局出现团圆或死亡，他们才认为是合乎情理的。小说家呢，也够可怜的，总得如此这般地写完为止，因为他跟别人一样要过活呀。因此，人们从小说中听到尽是钉棺材或奏弦琴的声音，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结局松散，这就是我们对小说归纳出的通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劲头未能始终如一，这一点作家和工人同样存在；其次是上面谈到的困难；人物变得难以驾驭，羽毛丰满了，大有日后要大显身手之概。可惜作家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只好依照个人意愿动笔，甚至将自己当作书中人物。尽管他不断提到各人的姓名，还用引号说明他们的情况，但他笔下的人物不是不知去向便是呜呼哀哉了。

所以说，情节是小说的逻辑面。它需要有神秘感，但神秘的东西必须在以后加以澄清。读者可以在扑朔迷离的天地中进行摸索，而小说家却不能。他必须驾驭自己的作品。在这儿投下一线光亮，从那又留下一丝阴影。他还

要不断自问，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情节取得最好的效果？他事前应心中有数，要置身于小说之上，动笔之前，要始终考虑到因果关系。

现在，我们务必自问一下：这种设想是不是写小说的最好方法？为什么写小说一定先要心中有数？能不能让其自然发展？为什么它要像戏剧那样有个结局呢？能否留条尾巴？为什么小说家一定要置身于小说之上驾驭一切，而不能投身于小说之中，让作品把自己带到无法预见的境地去呢？情节可以是扣人心弦的，但它毕竟借鉴于戏剧，借鉴于空间有限的舞台，所以才受到盲目崇拜。难道小说不能找到一种既不拘泥于逻辑又比较适合于自己特色的结构么？

有些现代作家认为可以做到这样。现在我们就以一本最近出版的小说——完全摒弃上述情节，并试图用其他东西取代情节的书——为例吧。

我曾提到过纪德的《伪币犯》，这本书把两种方法都用上了。纪德还出版了他在写该书时的日记，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不会在重读这部小说和日记以后，将再出版一本经过最后综合的作品。它将告诉我们小说、日记以及作者对两者的印象是互相影响的。在对待体系性作品方面，纪德的态度确实比其他作家要认真些，这正是大家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也是评论家们值是仔细研究的地方。

我们首先看看那本被认为是客观逻辑典型的《伪币犯》其中的一个情节或几个片断吧。这本书的主要片断是关于一个名叫奥立维尔的人的故事。此人长相漂亮，风度翩翩，但并不幸福，后经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不仅得到了幸福，而且造福于他人。这一片断——如果我可以用粗俗语言的话——真是迸发出感人的“生命之光”。尽管它毫无新意，但仍不失为成功之作。但这个片断决不是全书的中心，类推下去的片断也不是。因为那些片断只写奥立维尔的一个名叫乔治的同学使用伪币，并胁迫另一同学自杀之事（纪德在日记上已载有此事的素材，说他兴起创造乔治的念头来自他抓到的一个偷书男孩；其余则取材于在卢昂破获的伪币集团，以及从克拉蒙至法兰德一带发生的儿童自杀案等等）。然而，奥立维尔、乔治、万山和巴勒德等人都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只有爱德华比较近似，因为他是位小说家。而且跟纪德的关系就像克里梭与威尔斯那般密切。爱德华也像纪德那样爱写日记，而且正在写一本题为《伪币犯》的小说。他同克里梭相似之处是：两人都遭到社会的抛弃。爱德华的日记，记载的事均发生在情节整个片断出现之前，后来继续延伸，直至形成纪德的整部小说为止。爱德华不仅是记载者，而且是参与者。是的，他挽救了奥立维尔；奥立维尔也挽救了他。还是让他们逍遥自在去吧，我们不必再谈下去。

上述一切，都不是这部小说的中心。只有讨论了小说技巧之后，才能使我们接近。爱德华把他的秘书和一些友人介绍给巴勒德时，曾说过一段有关“生活真实与小说真实并不一致”的话，还说他打算写一本包含有这两种真实的小说哩。

“那么，主题是什么？”索弗罗尔斯问道。

“还没有主题呢，”爱德华机警地说，“我这本小说没有主题，乍听起来的确有点可笑。要是你同意的话，我们不妨称它为没有主题的小说……”自然主义学派经常提出“生活的切面”这个口号。他们的错误在于老是从一个方向下刀，总是按照时间顺序从纵的方向下手。为什么不上下切，或从横面切呢？至于本人，我根本不想动刀子。你理解我的意思么？我的作法是将

全部材料放进小说中，不管是这里的或那儿的，一点没加裁剪。我这样做已有一年了，从来没遗漏过：凡是本人眼见的、了解的、能从别人身上学到的，以及自己的，全都在里面了。

“哎！你这样会把读者烦死的”萝拉叫嚷道，但又无法克制内心的喜悦。

“一点不会。为了使效果更好，我拟将主人公写成一位小说家。这本书的主题将体现这样的冲突，即现实向他提供什么素材与他如何运用这些素材之间的冲突。”

“你是否拟好写这本书的计划呢？”索弗罗尔斯装出一本正经地问。

“当然还没有。”

“你说的‘当然’是什么意思？”

“对这类书拟订计划是不适宜的，如果事前作出详细计划，整本书就会走入歧途。我正期待现实来驱使我进行创作。”

“我还以为你想逃避现实哩。”

“是我书中的那位小说家想逃避现实，我还不断地把他往回拉呢。不妨对你实说，我这本书的主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真实与想象中的真实之间的冲突。”

“你能把书名告诉我们吗？”萝拉有点信心不足地问。

“好吧，巴勒德，告诉他们。”

“《伪币犯》。”巴勒德说，“现在你能告诉我们那些伪币制造者是什么样的人么？”

“我一点不知道。”

巴勒德和萝拉对视了一会，又向索弗罗尔斯瞧去。有人发出了一声长叹。

原来在爱德华的书中逐渐充满一些关于金钱、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和伪造货币等概念，——就像《沙托·里沙图斯》一书充满关于服装的论调一样——甚至有取代书中人物的作用之势。“诸位，你们谁拿到过伪币没有？”他稍停了一会儿又问道，“大家想想，一枚十法郎的金币竟是假的，其实只值两分钱，但它未被发现之前仍值十法郎啊。假如我从这个观念开始……”

“为什么要从这个观念开始呢？”巴勒德突然有点激动说，“为什么不从事实开始？假如你举的事实恰当，自然会产生观念的。要是我正在写你那本《伪币犯》的话，就一定会从一枚伪币写起，即从你说的那枚十法郎伪币写起。看，就是这枚！”

巴勒德边说边从口袋里取出一枚十法郎的金币，并掷在桌子上。

“看吧，”他说，“声音挺不错呀，是我今早从杂货店老板那儿得来的。它不只值两分钱，还镀了金呐，其实里面全是玻璃。不用多久便会晶莹透亮。不……不要擦它，否则你会将它的假面具揩掉的。”

爱德华拿起伪币，仔细地端详着。

“杂货店老板又怎么到手的呢？”

“他原来也不知道。他给我时还开了个玩笑。后来才告诉我那是伪币。此人真不错，只索了五法郎便卖给我。当时我想：你正在写《伪币犯》，该看看伪币是啥模样的吧，所以才买来给你。现在你看过了，还给我吧。遗憾的是你竟对这个真实不感兴趣。”“唔，兴趣是有的，”爱德华说，“不过，真实使人感到窘惑。”

“太遗憾了，”巴勒德说。

这一段才是该小说的中心，其中就有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两者不可得兼

这么一个陈旧的理论。由于一枚伪币的出现使主题显得更清楚。这种把两种真实结合起来的意图，这种要求作家置身于题材之中的建议是前所未有的。作家应沿着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下去，应该受材料的指引和制约，而不是去控制材料。至于情节，可以删节、分解和压缩，再按照尼来说的来个“结构大改变”，什么都在事前作好安排那是假的。

有位杰出的评论家也同意纪德的观点——根据一则轶事：有位老太太的几个闺女都指责她说话不合乎逻辑。其实当时并没有人告诉过她什么是逻辑。待她知道逻辑的真正含义以后，便有点恼怒说：“逻辑！那是什么玩艺！”她嚷道，“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之前，怎么能说出自己的想法呢？”原来她的闺女们都是爱过教育的年轻女子，总以为她落后了。其实，她比她们还合乎时代的要求哩。

有些同当代法国有过接触的人说什么：这一代的人由于接受了纪德和那位老太太的观点，从而使这种不讲逻辑的观点十分混乱。他们很羡慕英国小说家在这方面的持重态度，喜欢赞扬是人之常情，但这种赞扬并不是在恭维你。正如你想生蛋，而别人却说你生的是抛物体一样——多么奇怪和令人不快啊！如果你想生的是抛物体，那会有什么后果呢，我真不愿意想下去——也许是母鸡死了。这说明纪德的危险性——他就是要生下一个抛物体。如果他打算写潜意识小说，并对潜意识喋喋不休的话，根本没人会仿效他。因为他在不适当的场合介绍神秘主义。不过这是他本人的事了。作为一位评论家，他还是很有激励作用的。他用了大量词汇写的那本《伪币犯》，将会受到那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之前，无法说出自己想法之辈的赞赏；还会受到那些讨厌以情节取胜，亦即以人物为主的小说读者的青睐哩。

还要看到，我们对小说的其他面尚未涉及。我们应有意识地谈谈潜意识的问题，然而，小说中的潜意识痕迹既模糊不清又牵涉甚广。还有，我们对诗歌、宗教、热情——等问题也未谈到。作为评论家，我们是决不可回避的。这样才能对彩虹的色彩加以分类。我们已目睹了这道彩虹，还站在祖先的坟墓上进行观察研究哩。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彩虹的经纬度，现在就要费神考虑下一个题目——“幻想”。

【前苏联】斯大林（1879～1953）

斯大林，继列宁后的前苏联主要领导人。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向前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本篇为斯大林于1941年7月3日发表广播演说。

广播演说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现在向你们讲话！

希特勒德国从6月22日起向我们祖国发动的背信弃义的军事进攻 现仍持续着。虽然红军英勇抵抗，虽然敌人的精锐师团和精锐空军部队被击溃，被埋葬在战场上，但是敌人又向前线投入了新的兵力，继续向前进犯。……我们的祖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我们光荣的红军怎么会让法西斯军队占领了我们的一些城市和地区呢？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的像法西斯吹牛宣传家所不断吹嘘的那样，是无敌的军队吗？

当然不是！历史表明无敌的军队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过。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但是这支军队却先后被俄国、英国和德国的军队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威廉的德国军队也曾被认为是无敌的军队，但是这支军队曾经数次败在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手中，终于被英法军队击溃了。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是这样。这支军队在欧洲大陆还没有遇到重大的抵抗。只是在我国领土上，德国才遇到了重大的抗击。由于我们的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精锐师团已被我们红军击溃。这就是说，正像拿破仑和威廉的军队一样，希特勒法西斯军队也是能够被击溃的，而且一定会被击溃。

……

为了消除我们祖国面临的危险，需要做些什么呢？为了粉碎敌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首先，我们苏联人必须了解到威胁我国的危险的严重程度，坚决克服泰然自若、漠不关心的心理，克服和平建设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战前是完全自然的，但是现在，战争使形势根本改变了，这种情绪就会置我们于死地。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凭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摧残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摩尔达维亚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以及苏联其他各自由民族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把他们德意志化，使他们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因此，这是苏维埃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是苏联各族人民继续享受自由还是沦为奴隶的问题。苏联人民必须了解这一点，不要再漠不关心。他们必须动员起来，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新的战时轨道上，拿出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气概。

……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也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

还要帮助那些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呻吟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

同志们！我们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趾高气扬的敌人很快就会付出代价懂得这一点。同红军一道对进犯我国的敌人奋起作战的。有成千成万的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我国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将奋起作战。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劳动者已经开始成立有成千上万人的民兵队伍来支援红军。在我们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卫国战争中。在每一个遭到有敌人侵犯的危险的城市里，我们都应当成立这样的民兵队伍，发动全体劳动者起来斗争，挺身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祖国。

……

【美国】麦克阿瑟（1880～1969）

麦克阿瑟，美国将军，历任西点军校校长，陆军参谋长，驻菲律宾美军司令。朝鲜战争中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因战败被免职。这是他于1962年5月2日在西点军校作的演讲。

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早晨，我走出旅馆的时候，看门人问道：“将军，您上哪儿去？”一听说我到西点时，他说：“那是个好地方，您从前去过吗？”

这样的荣誉是没有人不深受感动的，长期以来，我从事这个职业；我又如此热爱这个民族，这样的荣誉简直使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情。然而，这种奖赏主要的并不意味着尊崇个人，而是象征一个伟大的道德准则——捍卫这块可爱土地上的文化与古老传统的那些人的行为与品质的准则。这就是这个大奖章的意义。从现在以及后代看来，这是美国军人的道德标准的一种表现。我一定要遵循这种方式，结合崇高的理想，唤起自豪感：也要始终保持谦虚……

责任——荣誉——国家。这三个神圣的名词尊严地命令您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是您振奋精神的转折点；当您似乎丧失勇气时鼓起勇气；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时重建信念；几乎绝望时产生希望。遗憾得很。我既没有雄辩的词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们说明它们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词。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者，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完全不同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达到愚弄、嘲笑它们的程度。

但这些名词却能完成这些事。它们建立您的基本特性，它们塑造您将来成为国防卫士的角色；它们使您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懦弱，而且，让您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胆怯。它们教导您在真正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胜利时要谦和，不要以言语代替行动，不要贪图舒适；要面对重压以及困难和挑战的刺激；要学会巍然屹立于风浪之中，但是，对遇难者要寄予同情；要律人得先律己；要有纯洁的心灵，崇高的目标；要学会笑，不要忘记怎么哭；要长入未来，可不该忽略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谦逊，这样您就会记住真正伟大的纯朴，真正智慧的虚心，真正强大的温顺。它赋予您意志的韧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的深处焕发精神，以勇敢的优势克服胆怯，甘于冒险胜过贪图安逸。它们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境，意想不到的无穷无尽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它们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官或君子。

您所率领的是哪一类的士兵？他们可靠吗？勇敢吗？他们有能力赢得胜利吗？他们的故事您全都熟悉，那是美国士兵的故事。我对他的估价是多年前在战场上形成的，至今并没有改变。那时，我把他看作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物；现在，仍然这样看待他，不仅是一个具有最优秀的军事品德的人，而且也是最纯洁的人。他的名字与威望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骄傲。在青壮年时期，他献出了一切人类所能给予的爱情与忠贞。他不需要我与其他人的颂扬，他自己用鲜血在敌人的胸前谱写自传。可是，当我想到他在灾难中的坚韧，

在战火里的勇气，胜利时的谦虚，我满怀的赞美之情是无法言状的。他在历史上成为一位成功的爱国者的伟大典范；他是后代的，作为对子孙进行解放与自由主义的教导者；现在，他把美德与成就献给我们。在 20 次战役中，在上百个战场上，围绕着成千堆的营火，我亲眼目睹不朽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爱国的自我克制以及不可战胜的决心，这些已经把他的形象铭刻在他的人民的心坎上。从世界的这一端到那端，他已经深深地喝干勇敢的美酒。

当我听到合唱队的这些歌曲，在记忆的眼光中，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蹒跚的小分队，在透湿的背包的重负下，从湿淋淋的黄昏到细雨蒙蒙的黎明中，疲惫不堪地在行军，沉重的脚踝深深地踩在炮弹震撞过的泥泞路上，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嘴唇发青，浑身污泥，在风雨中哆嗦着，从家里被赶到敌人面前，而且，许多人被赶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我不了解他们出身的高贵，可我知道他们死得光荣。他们从不犹豫，毫无怨恨，满怀信念，嘴边叨念着继续战斗直到胜利的希望而死。一直为了它们——责任——荣誉——国家；当我们在寻找光明与真理的道路上，他们一直流血、挥汗、洒泪。

二十年以后，在世界的另一边，又是黑黝黝的散兵坑的污物，幽灵似的壕沟的恶臭，湿淋淋的地下洞的污泥；那酷热的火辣辣的阳光，那些破坏性风暴的倾盆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兵燹地区的恐怖情景；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目的，他们全面的决定性胜利——永远的胜利——永远通过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攻击，那苍白憔悴的人儿的眼光庄严地跟随着您的责任——荣誉——国家的口号。

这几个名词的准则贯穿着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经受任何为提高人类而传播的伦理或哲学的检验。它所要求的是正确的事物，它所制止的是谬误的东西。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要履行宗教修炼的最伟大行为——牺牲。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他显示出造物者按照自己意愿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品质，只有神明的援助能支持他，任何肉体的勇敢与动物的本能都代替不了。无论战争如何恐怖，召之即来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是人类最崇高的进化。

现在，你们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革中的世界。人造卫星进入星际空间，星球与导弹标志着人类漫长的历史开始了另一个时代——太空时代的篇章。自然科学家告诉我们，在 50 亿年或更长的时期中，地球形成了；在 30 亿年或更长的时期中，人类发展了；从来没有一个更伟大的、更令人惊讶的进化。我们现在不单是从这个世界，而且要涉及不可估量的距离，还要从神秘莫测的宇宙来论述事物。我们正在伸向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界限。我们谈论着不可思议的话：控制宇宙的能源；让风与潮汐为我们工作；创造空前的合成物质，补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质；净化海水供我们饮用；开发海底作为财富与粮食的新基地；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几百岁；调节空气。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

通过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定与不可侵犯地——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的职业中只有这个生死攸关的献身，此外，什么也没有。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的办法去完成；而你们就是训练好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明确的认识就是为了胜利，这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假如您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破坏，唯一缠住您的公务就是责任——荣

誉——国家。其他人将争论着国内外的、分散人们思想的争论的结果，可是，您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的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战斗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老百姓的声音辩论我们政府的功过；我们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利集团发展过于骄横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毋须你们的职业去分担或军事解决。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抵得上夜里的十倍灯塔。

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发酵剂。从你们的队伍中涌现出战争警钟敲响时刻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从来也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您这样做，100万身穿橄榄色、棕卡色、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响起神奇的词儿——责任——荣誉——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战争贩子。相反，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祈求和平，因为他必须忍受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大智的哲学之父柏拉图的不祥之话：“只有死者看到战争的终结。”

我的年事渐高，已近黄昏。我的过去已经消失了音调与色彩。它们已经随着往事的梦境模模糊糊地溜走了。这些回忆是非常美好的，是以泪水洗涤，以昨天的微笑抚慰的。我以渴望的耳朵徒然聆听着微弱的起床号声的迷人旋律、远处咚咚作响的鼓声。在我的梦境里，又听到劈啪的枪炮声。咯咯的步枪射击声，战场上古怪而悲伤的低语声。可是，在我记忆的黄昏，我总是来到西点。那里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标志着我对你们的最后一次点名。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时，我最后自觉的思想一定是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

我向你们告别了。

【美国】罗斯福（1882～1945）

罗斯福，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连任三届。他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他在24小时内驱车赴国会山，向参、众两院发表此演讲，当天国会通过决议，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

副总统先生、议长先生、参众两院各位议员：

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部队突然和蓄谋的进攻。

合众国当时同该国处于和平状态，而且，根据日本的请求，当时仍在同该国政府和该国天皇进行着对话，对于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有所期待。实际上，就在日本空军中队已经开始轰炸美国瓦胡岛之后一小时，日本驻合众国大使及其同事还向我们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的信函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言继续现行外交谈判已无用，它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力进攻的威胁或暗示。

应该记录在案的是：由于夏威夷同日本的距离，这次进攻显然是许多天乃至若干星期以前就已蓄谋进行了策划的。在策划的过程之中，日本政府通过虚伪的声明和表示希望维系和平而蓄意对合众国进行了欺骗。

昨天对夏威夷群岛的进攻，给美国海陆军部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遗憾地告诉各位，很多美国人丧失了生命。此外，据报，美国船只在旧金山和火奴鲁岛之间的公海上也遭到了鱼雷袭击。

昨天，日本政府已发动了对马来西亚的进攻。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香港。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关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菲律宾群岛。

昨夜，日本军队进攻了威克岛。

今晨，日本军队进攻了中途岛。

因此，日本在整个太平洋区域采取了突然的攻势。昨天和今天的事实不言自明。合众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十分清楚这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生存的本身。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我已指示，为了我们防务采取一切措施。

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

不论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

我现在断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对敌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均处于严重危险之中。

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上帝助我！

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对我国进行无缘无故和卑鄙怯懦的进攻时起，合众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1882～1949）

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党徒策划“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共产党人。这是他在法庭上的辨词，时为1933年12月16日。最终以无罪获释。

在莱比锡法庭的最后辨词

.....

各位法官、检察官和辩护人！三个月前，在这审讯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被告人，给法庭庭长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我在法庭上的意见引起了各位法官的一些冲突，我很抱歉。但是因而指责我滥用提出质问的权利和作出声明的权利以达到宣传的目的，那是我绝对要加以驳斥的。由于我在本庭受到诬告，我当然要用我所能用的一切方法来为自己辩护，以免遭到诬陷。

.....

这次审讯由一个理论决定，这就是：火烧国会是德国共产党干的，是共产国际干的。火烧国会这一反共行为事实上被用来诬陷共产党人，他们宣称这是共产党武装起义的信号，是推翻德国现政府的烽火。由于用了这理论，全部诉讼程序就贯穿着反共的性质。

.....

任何人都知道德国共产党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但这绝不是本案诉讼程序中决定怕的一点。决定性的一点只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否计划在1933年2月27日发动与国会纵火有关的武装起义，以夺取政权？

先生们，依法调查的结果如何？国会纵火是共产党所为这一神话已经完全被粉碎了。我不想像其他辩护人一样援引许多例证。

对于任何具有正常智力的人来说，至少这一点现在是完全清楚了：国会纵火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完全没有关系，不但与起义无关，而且与罢工、示威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活动都完全无关，按照法律进行的调查已经彻底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不把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算在内）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起义的信号。没有人发现与国会纵火有关的任何起义的事实、行为或企图，种种捏造都是事后很久才编制出来的。那时工人阶级正处于防卫法西斯进攻的状态。德国共产党正力图组织群众进行反抗与自卫。但事实证明：国会纵火只是借口和信号，用以发动预先布置好的大规模运动，来镇压德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

警官海勒在法庭上读了一首共产党员写的诗，以此证明共产党员在1933年放火烧国会。该首诗选自一本1925年出版的书。请允许我也引用一首诗，一首由最伟大的德国诗人歌德写的诗，

要及早学得聪明些。
在命运的伟大天秤上，
天秤针很少不动；
你不得不上升或下降；
必须统治和胜利，

否则奴役和失败，
或者受罪，或者凯旋，
不做铁钻，就做铁锤。

不是胜利，便是失败，不做铁钻，就做铁锤！

.....

清算帐目的时刻终会到来，而且要加上利息！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以及真正罪犯的判定，将由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法庭完成。

伽利略被判刑时，他宣告：

“地球仍在转动！”

我们共产党人今天也怀着同伽利略一样的决心宣告：“地球仍然在转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向着最后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遏制的必然要达到的目标——共产主义.....

（法庭禁止季米特洛夫继续发言。）

【英国】艾德礼（1883～1967）

艾德礼，1945年1951年任英国首相。本篇是他1941年10月19日代表英政府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时发表的演说。

大西洋宪章

除得胜之外，我们看不到这次战争有其他结局。我们不但决心赢得战争，并且决心赢得和平。我们必须预先做好计划。如果希望战争结束时，我们不至处于毫无准备的状态，目前就须采取行动。但是有关和平的问题不能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英国的行动必须配合战后世界的计划，因为这次战争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作战，而且是为未来的文明而战。这次战争的结果不仅仅影响到参加这场斗争的人，而是影响全世界人类的生活。

当然，只有从人民的肩上卸下全世界的军备重担，人民才可能享受到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我们不可能在持续存在的侵略威胁下，建设心中理想的城市。我们必须同时争取免于恐惧和免于贫困的自由。

大西洋宪章表达了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共同目的，其中不仅包括了有关战争的目标，更勾画出长远的目标。

大西洋宪章约束我们，使我们努力根据现有的义务协助一切大、小国家，不论其为战胜国或战败国，均能更好地平等进行贸易或取得原料，令该国得到经济繁荣。此外，大西洋宪章还载明了我们愿意令一切国家在经济上得到最充分的分作，目的是使一切国家的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得到保证。但是，仅仅表示赞成这些目标是不够的，还要努力争取达到这些目标。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需要有最密切的国际合作，联合王国乐于尽力达成此种国际合作。

我们决心使经济问题、生活水平与营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的问题不被忽略。而这些问题在上次世界大战后因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而被忽视了。事实上战争只会使世界贫穷而不会使之富裕，如果我们要弥补战争的破坏，要保证达到大西洋宪章所要求达到的最高劳动水准、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我们就需要果断的政治家的胆略。

【美国】杜鲁门（1884～1972）

杜鲁门，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1945～1953）。这是他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发表的广播演说。

在日本投降时发表的广播演说

全国同胞们：

全美国的心思和希望——事实上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和希望——今天晚上都集中在密苏里号军舰上。在这停泊于东京港口的一小块美国领土上，日本人刚刚正式放下武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

四年前，整个文明世界的心思与恐惧集中在美国另一块土地上——珍珠港。那里曾发生的对文明的巨大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了。从那里通向东京的是一条漫长的、洒满鲜血的道路。

我们不会忘记珍珠港。

日本军国主义者也不会忘记美同军舰密苏里号。

日本军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弥补，也无法忘却的。但是他们的破坏和屠杀力量已经被剥夺了。现在他们的陆军以及剩下的海军已经毫不足惧了。

……

当然，我们首先怀着深深感激之情想到的，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牺牲或受到伤残的亲人们。在陆地、海洋和天空，无数美国男、女公民奉献出他们的生命，换来今日的最后胜利，使世界文明得以保存。但是，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都无法弥补他们的损失。

我们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忍受亲人死亡的悲痛的人们，死亡夺去了他们挚爱的丈夫、儿子、兄弟和姐妹。无论多么巨大的胜利也不能使他们和亲人重聚了。

只有当他们知道亲人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会被明智地运用时，他们才会稍感安慰。我们活着的人们，有责任保证使这次胜利成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为此牺牲的烈士。

……

这次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自由对暴政的胜利。

我们的兵工厂源源生产出坦克、飞机，直捣敌人的心脏；我们的船坞源源制造出战舰、沟通世界各大洋，供应武器与装备；我们的农场生产出食物、纤维，供应我们的海、陆军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国；我们的矿山与工厂生产出各种原料与成品，装备我们，战胜敌人。

然而，这一切的后盾是一个自由民族的意志、精神与决心。这个民族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为了保持自由，值得付出任何代价。

正是这种自由精神给予我们以武装力量，使士兵在战场上战无不胜。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自由的精神、个人的自由以及人类的个人尊严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韧、最持久的力量。

胜利是值得欢庆的，同时有其负担和责任。

但是，我们以极大的信心与希望面对未来及其一切艰险。美国能够为自己造就一个得到充分就业与安全的未来。同联合国一起，美国能够建立一个以正义、公平交往与忍让为基础的和平世界。

我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宣布 1945 年 9 月 2 日星期日——日本正式投降的日子——为太平洋战场胜利纪念日。这一天还不是正式停战和停止敌对行为的日子，但是我们美国人将永远记住，这是报仇雪耻的一天，正如我们将永远记住另一天是国耻日一样。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将走向一个国内安全的新时期，我们将和其他国家一同走向一个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善和合作的更美好的新世界。

上帝帮助我们取得了今天的胜利。在未来的年月，我们仍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得到我们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法国】戴高乐（1890—1970）

戴高乐，法国政治家，军事家。1945年至1946年任法国临时总统，1959年至1969年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1940年6月18日，他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发表本篇演说。演说的成功，使他从此被法国人称为“六·一八英雄”。另一篇是在1945年5月8日发表的广播讲话。

谁说败局已定

担任了多年军队领导职务的将领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借口军队打了败仗，便同敌人接触，谋取停战。

我们确实打了败仗，我们已经被敌人陆、空军的机械化部队所困。我们之所以失败，不仅因德军的人数众多，而是败于他们的坦克、飞机和作战战略。正是敌人的坦克飞机和战略使我们的将领们惊惶失措，以至出此下策。

但是难道败局已定，胜利已经无望？不，不能这样说！

请相信我的话，因为我对自己所说的话完全有把握。我要告诉你们，法兰西并未失败。总有一天我们会用目前战胜我们的同样手段使自己转败为胜的。

因为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她并不孤立！绝不孤立！她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作后盾，她可以同控制着海域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联盟。她和英国一样，可以得到美国雄厚的工业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援。

这次战祸所及，并不限于我们不幸的祖国。战争的胜败亦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场世界大战。我们的一切过失、延误以及所受的苦难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世界上拥有一切手段，能够最终粉碎敌人。我们今天虽然败于机械化部队，将来却会依靠更高级的机械化部队夺取胜利。世界命运正系于这种部队。

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发出广播讲话。我吁请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上的法国官兵，不论是否还持有武器，都和我联系；我叮请具有制造武器技术的技师与技术工人，不论是目前或将来来到英国国土的，都和我联系。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容许法兰西抗战的烽火被扑灭，法兰西抗战烽火也永不会被扑灭。

明天我还要和今天一样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

在胜利日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

战争结束了，胜利已经到来。这是同盟国的胜利，也是法国的胜利。德国已经在东、西线向同盟国军队投降。法国最高统帅部以其中一方代表身份出席了受降仪式。

在德国当局和统帅部处于瓦解的情况下，可能还有敌军的某些零星部队在各地擅自进行毫无意义的顽抗。但是德国已经被击败而且签字认输。

在这国旗高扬、日月重光的时刻，国家首先深切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并向那些曾为祖国作艰苦斗争的人深深致敬。没有哪一次祖国儿女们所作的自我牺牲勇敢行动，没有哪一具被俘男女同胞所受的苦楚，没有哪一次丧亡，

没有哪一滴眼泪是白费的。

在这举国欢腾、扬眉吐气的时刻，法国人民向英勇的同盟国致以兄弟般的敬礼。他们和我们一样，为了相同的事业，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历尽艰难困苦。法国人民还向盟军的英勇战士和指挥官致敬，向全世界一切为争取自由和正义最后胜利而战斗、受难和工作的兄弟姐妹致敬。

永恒的荣耀归于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将领。荣耀归于我们的国家。即使在最严酷的考验下，她也从未动摇，从未屈服。荣耀归于各同盟国。他们曾和我们同洒热血，同甘共苦，今天又和我们共享胜利的欢乐。

法兰西万岁！

【瑞士】皮亚杰（1896—1980）

皮亚杰，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与思维》、《发生认识论原理》、《心理学与认识论》等。本文是1968年作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系列讲演的第一讲。

发生认识论（节选）

发生认识论试图根据认识的历史、它的社会根源和它所依据的概念和运算的心理来源来解释认识，特别是解释科学知识。这些概念和运算大部分是从常识中抽出来的，因此，这些概念和运算的来源能够阐明它们对于较高阶段的知识的重要意义。但是发生认识论，只要有可能，也要考虑形式化的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应用于平衡的思想结构和在某些情况下应用于思维发展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的逻辑形式化的问题。

关于认识论的性质，我们所作的这种描述碰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认识论的传统哲学观点。在许多哲学家和认识论者看来，认识论是对当前此刻存在的知识的研究；它是为知识而分析知识，是在本身范围内，不管它的发展，而分析知识。在这些人看来，追索观念的发展或运算的发展，也许历史学家或心理学家对这有兴趣，而不是认识论者所直接关心的。这是对我在此地所概述的发生认识论这门学科的主要反对意见。

但是在我看来，对于这种反对意见，我们能提出以下的答案：科学知识处在持续的进展之中，它每天都在变化。结果，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有认识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有今天当前的状态，似乎它的当前状态是确定的，乃至是稳定不变的。知识的当前状态乃是历史中的一瞬间，好像过去的知识状态那样迅速地变化着，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变化得更快些。于是科学思想就不是某一顷刻的事情，它不是一种静止的情况，它是一个过程。特殊一点讲，它是一个继续不断构造和重新组织的过程。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科学研究的支流中都是真实的。我们愿意引述一两个例子。

第一个几乎可被公认的例子是关于当代物理学领域的，或者，比较特殊他讲，是有关微观物理学的。在这门科学方面，知识状态逐月都在发生变化，而且肯定在一年的历程中就有重要改变。这些变化在某一个作者的著作中也时常发生，他在他的一生的事业中对他的题材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妨以巴黎的德·布罗格里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几年前，德·布罗格里尚坚持尼尔·玻尔的非决定论的观点。他随着哥本哈根学派相信：在微观物理事件的非决定状态背后，人们就不能发现决定的状态；非决定的状态乃是很深刻的实在，而且人们甚至能够提出理由来证实这种非决定状态的必然性。嗯，后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新的事实使德·布罗格里改变了他的想法，以致现在他采取了一种十分相反的观点。因此，这是科学思想转变的一个例子，这种转变不是经过了连续几代人发生的，而是发生于一个有创造性的科学家的一生之中。

让我们从数学领域中举出另一个例子。几年以前，布尔巴基数学家小组试图把所有数学的基本结构分隔开来。他们确立了三个母结构，代数结构、有序结构和拓扑结构，而这三个母结构就是数学的结构学派所根据的基础，而且被视为一切其它数学结构所由派生的基础。他们的这些有效的努力现在

已经在一定程度下遭到了破坏或者说至少是受到修改了，因为麦克兰和爱伦伯发展了范畴的概念，即许多元素聚合起来的集合以及根据这些集合所定义的一切函数的集。结果，今天布尔巴基小组的一部分成员已经不再是正统的了，而不得不考虑更新近的范畴概念。因此，这里又在科学思想的另一个更基本的领域内，有了非常迅速的变化。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能说，一方面有科学思想的历史而另一方面又有今天的科学思想体系；只有一个连续不断的转变，继续重新组织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事实意味着：在这些变化中历史的和心理的因素对于我们试图理解科学思想的性质是有用的。

还有一些领域中根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因素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代科学观念的起源，在这方面，我们愿意举一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康托尔的集合论的发展。康托尔是根据一对一的对应这样一个基本运算来发展他的理论的。特殊点讲，通过在整数系列和偶数系列之间建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我们所得到的数目既不是整数，也不是偶数，而是第一个超穷的基数，即 aleph 零。就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基本运算使康托尔能够超过有穷数的系统，而这个有穷数系列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运用中的系列。现在，追问一下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的运算是从哪里来的，是有意义的。康托尔并未发明这一对应关系的运算，这是就一个人发明一个完全崭新的构造这一意义而言的。他是在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现了它；甚至在他转向数学很久以前，这种一对一的对应运算早就是他的心理装备的一部分，因为极初步的社会学或心理学观察就揭示出来了一对一的对应是一个原始的运算。在所有一切早期社会中，它是经济交易的基础。而在年幼的儿童中，甚至在具体运算阶段之前，我们就发现它的根基了。第二个问题是：这种一对一的对应基本运算的性质是什么？这立即导致另一有关问题：在一对一的对应和自然数这个概念的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对一的对应的运算流传很广，这是否有助于证明罗素和怀特海的命题，即数是诸等值类的类（所谓等值即指诸类里面的各个单元是一一对应的）吗？或者说，实际的数，除了一对一的对应以外，还根据某些别的运算吗？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作比较详细的研究。现在根据这一鲜明事例来说，如果认识了一个概念的心理学基础，也就蕴涵着对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的理解。在我们研究儿童中数的概念的发展时，我们就能看出：这个概念只是以等值类的类为根据，还是包含有其它的运算？

现在我愿意继续讲第二个例子，而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爱因斯坦怎样能够对于远距离的同时性给予一个新的运算定义？他怎样能够批评牛顿关于普遍时间的概念而不致于在物理学中产生深刻的危机？当然，毫无疑问，他的批评是根据实验发现的，如迈克逊——莫雷实验。虽然如此，如果对彼此远离的事件有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所重新下的定义和我们的逻辑根本是冲突的，那么在物理学中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我们势必在两种可能性中接受其一：要么是，物理世界是不合乎理性的，要么是人的理性是软弱无能的——不能掌握外界的实在。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并没有这种混乱的情况。有少数玄学家（我对在场的哲学家们表示歉意），如柏格森或马利坦等人，曾为物理学中的这种进展所吓倒，但就大多数玄学家而论，以及在科学家们中间，这并不是什么巨大的危机。为什么事实上它不是一种危机呢？因为同时性并不是一个原始的概念，甚至不是一个原始的知觉。以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题目，但是眼前我只想申述一下，我们的实验发现已经显示出

来，人类并不是明确地感知到同时性，如果我们看到两个以不同速度移动着的对象，而它们同时停止下来了，这时，我们并没有确切地感知到它们是同时停止的。同样，当儿童对于同时性没有确切观念的时候，他们并不脱离对象移动的速度去理解同时性。那么，同时性就不是一个原始的直觉，它是一种智慧的构造。

远在爱因斯坦以前，彭加勒在分析同时性这个概念以及揭示其复杂性时，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研究事实上使他几乎已经到达了发明相对论的边缘。现在如果我们阅读他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论文（顺便讲一句，从爱因斯坦后来著作的角度来看，这些论文就更加有趣了），我们便知道，他的思想几乎完全是以心理学的论点为基础的。以后我将表明，时间的概念和同时性的概念都是以速度的概念为基础，而速度的概念乃是一种更为原始的直觉。因此，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心理学上的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相对论所带来的危机对物理学来讲并不是致命的，勿宁说，它是一种再适应，而且我们既可以在实验的和逻辑的基础上达到这种再适应，也可以找出心理学的途径去达到这种再适应。实际上，爱因斯坦本人也承认心理学因素的关联，而且当我在1928年第一次有机会遇见他时，他曾向我建议，如果我能研究时间的概念，特别是，同时性的概念在儿童中的来源，那将会是有益的。

以上所述可以暗示出，当我考虑知识的性质时，利用心理学上的数据可能是有所助益的。现在我想说，它不只是有所助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所有认识论者在他们的分析中都参照过心理学的因素。不过他们对心理学因素的参照大多数是思辨性质的，而不是以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为根据的。我深信，所有的认识论提出了事实的问题，也提出了形式的问题，而且一旦遇到事实问题时，心理学的发现便是有用场的了，必须加以考虑。对于心理学，极不幸的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心理学家。在物理学或哲学领域内并没有这种情况。结果，当认识论者需要考虑某些心理学方面时，他并不参考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也不去请教心理学家，而只凭自己的思考。他把一些观念和关系收集到自己的思想内，试图由自己去解决所产生的心理学问题。我愿意引述几个认识论上的例子，说明即使一些心理学发现初视之下似乎与讨论的问题无关，但这些心理学上的发现是能够和有关问题关联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他们的认识论中从来不参考心理学，他们认为，逻辑实体和数学实体只是一些语言结构。这就是说，当我们进行逻辑或数理运算时，我们只是利用一般的句法、一般的语义学或莫利斯所谓的一般性语用学，即一般性语言用法的规则。一般讲来，他们的主张是：逻辑的与数理的实体是从语言派生出来的。逻辑和数学只是一些特殊化了的语言结构。现在，在这里，这就与考查事实密切相关起来了。我们能够考查，在语言发展以前，儿童是否就有了逻辑的行为。我们能够发现，儿童动作的协调是否揭示出一种类型的逻辑；是否揭示出一个序列系统；是否揭示出种种一对一的对应结构。如果在语言发展之前，我们在幼儿的动作协调中的确发现有逻辑结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些逻辑结构是从语言中派生出来的。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能用思辨，而只能用实验的方法及其客观发现去探索。

于是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原理就是严肃地对待心理学。严肃对待心理学的意思就是说，当发生一个有关心理事实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向心理学的科

学研究请教，而不应试图通过自己的思辨去发明一个答案。

附带说一句。值得指出的是，在语言学本身的领域内，自从逻辑实证主义进入黄金时代以来，理论的地位已经颠倒过来了。布卢姆费尔德在他的时代完全坚持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逻辑的语言学观点。但是目前，如你们所知道的，乔姆斯基已经站在相反的立场了。乔姆斯基肯定，逻辑不是根据于和派生于语言，相反，语言是以逻辑为基础，以推理为基础的，而且他甚至认为这种推理是先天的。他主张推理是先天的，这也许走得太过了，这个问题又是需要参照事实，参照科学研究加以解决的。这是心理学领域内另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在乔姆斯基今天所辩护的理性主义（根据这个理论，语言是根据于理性而理性又被认为是人类天生的）和实证主义的语言学观点（根据这种观点，逻辑只是语言学里面约定俗成的结果）之间还有一整套可能的答案以供选择，而要在这些答案中作出选择，就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即以心理学的科学研究为基础。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思辨去解决的。

我不想给人们这样的印象，觉得发生认识论只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反之，每当我们能够从事某种形式化的工作时，每当我们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碰到某些业已完成的结构时，逻辑的形式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总是在逻辑学家和我们正在探讨的领域内的专家们的协助之下，努力使这种结构形式化。我们的假设是说，以心理学的形成为一方面和以形式化为另一方面，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形式化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我们也明白，光有形式化本身也是不够的。我们正在指出，在一种领域内，要阐明某些认识论的问题，心理学的实验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甚至就形式化本身而论，仍然还有一些理由证明为什么形式化本身永远是不够的。我愿意来讨论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不仅有一种逻辑，是有许多不同的逻辑。这就是说，没有任何单一的逻辑有足够的力量支持人们知识的整个构造。但是它也意味着，当所有不同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它们彼此间又不够充分地连贯一致，以致不能用来作为人们知识的基础，于是任何一个单一的逻辑力量太薄弱，而把所有的逻辑结合在一起又太复杂了，以致不能使逻辑为知识奠定一个单一的价值基础。这是第一个理由，证明为什么单有形式化是不够的。

第二个理由是在哥德尔定理中发现的。形式化是有限度的。这是事实。任何连贯一致的公理系统即使丰富得足够包含初等算术，也不能证明它自己内部是连贯一致的。因此，便发生了下列的一些问题：逻辑是某些事物的一种形式化，一种公理化，但到底是哪些事物的形式化、公理化呢？逻辑的形式化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里甚至还有两个问题。任何公理系统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些不可演证的命题或公理，而其它的命题则能从这些公理演证明白；这种公理系统也包含有不可定义的、根本的概念，而其它的概念则是根据这些根本概念来定义的。那么，就逻辑而言，在这些不可证明的公理和不可定义的概念下面的又是什么呢？这是逻辑中的结构论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表明以形式化作为根本的基础是不恰当的。它表明既要考虑公理化的逻辑系统，又得考虑思想本身的必要性，因为逻辑系统尚在发展而且仍然常有直觉性质的这一事实，正是来源于人类的思想。

形式化不够的第三个理由是，认识论开始解释知识时是按照它在科学领域内的实际情况解释的，而这类知识事实上并不只有形式的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与此有联系的，我愿意引用我的一位逻辑朋友，已故贝思的事例。

他强烈地讨厌一般的心理学并且反对把心理学的观察引入认识论的领域，因此，他也讨厌我的著作，因为我的著作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虽然如此，由于学术对照的关系，贝思参加了一次我们的关于发生认识论的座谈会，并且仔细地考查了我们所关心的这些问题。在这次座谈会后，尽管他害怕心理学家们，但他同意和我合写一本我们称为《数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的著作。这本书是用法文出版的，后来翻译成英文。他在对这一卷书的结论中，写了下面的几句话：“认识论的问题是要解释真正的人类思想是怎样能够产生科学知识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在逻辑和心理学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关系。”这个宣告并不暗示心理学应该直接干预逻辑——这当然是不真实的——但是它却主张，在认识论中对逻辑和心理学两者都应加以考虑，因而讨论人类知识的形式和经验的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

总之，发生认识论既研究知识的意义，也研究它的形成，我们可以用下列的语词来陈述我们的问题：人类心理是用什么手段从一个比较不足的知识状态转向一个较高的知识状态的呢？决定什么是较低的或不很恰当的和什么是较高的知识，当然有其形式的和规范的方面。决定一定的知识状态是否高于另一知识状态，并不是心理学家的事情。这是由逻辑学家或某一科学领域内的专家们所决定的事。例如，在物理学的领域内，要由物理学家去决定某一理论是否比另一理论有些进步。从心理科学的观点来看，从发生认识论者的观点看来，我们的问题是解释一个较低的知识阶段是怎样过渡到被判断为较高的阶段的。这种过渡的性质是一个事实问题。这种过渡是历史性的或心理学性质的或者有时甚至是生物学性质的，这一点我将试图在以后加以说明。

发生认识论的根本假设是：在知识的逻辑的、理性的组织和相应的心理形成过程之间有一种平行状态。好，现在，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假设，那么我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呢？当然，最有成果、最显明的研究领域乃是史前人类的人类思想史。不幸，我们对于尼安德特人的心理或泰拉尔·德·夏尔丹的“北京人”的心理，还没有很好的知识。既然我们还没有研究生源说这个领域，我们就将像生物学家一样行事，转向个体发生学。概念在个体中的发生是我们最容易研究的。我们所有的人周围都有儿童。在儿童们身上，我们有最好的机会去研究逻辑知识、数理知识、物理知识等方面的发展。这些东西，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研讨。

关于这个研究领域的导言，就讲这些。现在我愿意转向某些专题并从研究儿童逻辑结构的发展开始。开始时我将在思想的两个不同而又互相补充的方面加以区别。一个是形象的方面，而另一个我称为运转（算）方面。形象方面被认为是模仿瞬间的和静止的状态。在认识领域内，形象的机能首先是知觉、模仿和心理影象，事实上即内化的模仿。思想的运算方面并不研究状态，而是研究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转化。例如，它包括转化对象或状态的动作本身；它也包括智慧的运算，这种智慧运算实质上就是转化的体系。它们是动作，而这些动作是可以和其它动作互相比较的，可以逆转的，即它们能够向着两个方向进行〔这就是说，动作 A 的结果能够被另一动作 B（A 的反演）所排除：A 同 B 的结局将导致同一性的运算，而未改变其状态〕，而且是能够内化的；这些动作能够通过表象而不通过实际动作进行。形象的方面总是从属于运算方面的。任何一种状态只能理解为某一转化的结果或另一转化的出发点。换言之，按照我的思维方式，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它的运算

方面而不是它的形象方面。

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同一观念，我认为：人的知识本质上是能动的，认识就是把现实同化于一些转化系统。认识就是转化现实，从而理解某一状态是如何产生的。由于这个观点。我发现自己是对立于把知识当作实体的摹本，一个被动摹本的观点的。实际上，这种把知识当作实体的摹本的观念是以一种恶性循环为根据的：为了制造一个摹本，我们就得去认识我们所描摹的模型，但是按照这种认识论的看法，我们认识模型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描摹它，于是我们便陷于循环之中了，而不能知道我们描出的摹本是否像那个模型。按照我的思想方法，认识一个客体并不意味着去描摹它——而意味着作用于它，这意味着构造转化系统，而这些转化系统只能在施作用于这个客体之上或同这个客体一道才实现的。认识现实意即构造着转化系统，而这些转化系统多多少少恰当地符合于现实。这些转化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实的转化是同构的。构成知识的转化结构并不是现实中的一些转化的摹本，它们仅只是—些可能的同构的模型，而经验使我们能够从中作选择。于是，知识就是一种转化系统，它继续前进地变得更加恰当一些。

大家都同意，逻辑数理的结构是抽象的，而物理的知识——根据一般经验的知识——是具体的。但是让我们请问逻辑数理的知识是从什么东西抽象出来的。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当我们对于客体施加作用时，我们的知识就从客体本身派生出来了。这是一般经验论的观点，而且在实验的或经验的知识方面，这个观点大部分是有效的。但是还有第二种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客体正在施加作用时，我们也会考虑到这种动作本身，也可以说，会考虑到运算，因为转化工作能够在心里进行。根据这个假设，抽象不是从受到作用的客体中抽绎出来，而是从这种动作本身抽绎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逻辑的和数理的抽象的基础。在包括物理知识的情况中，抽象是从客体本身抽绎出来的。例如，儿童能够在他手里举起物件并且知道它们有不同的重量——大的东西通常比小的东西重些，但有时小的东西比大的东西重些。所有这一切他是从经验中发现的，而他的知识是从物体本身抽绎出来的。但是我也愿意提出一个例子说明有一种情况和上面的情况是同样原始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是从动作，从动作的协调，而不是从物件抽绎出来的。这个例子，即我们曾对许多儿童相当彻底进行过研究的一个例子，它原是一位数学家朋友提示给我的，他曾引用这个例子作为他对数学发生兴趣的出发点。当他是一个儿童时，有一天他在数鹅卵石，他把它们排成一行，从左边数到右边，他得到十。然后，他为了好玩，又从右边数到左边，看他将得到什么数目，他很奇怪他又得到了十。他又把这些鹅卵石排列成一个圆圈，结果又是十。他从另一方向，围着这个圆圈数，他又得到十。而且不管他把这些鹅卵石排成什么形状，当他数它们时，数目总是十。在这里他发现了数学中的所谓可换性，即总数与秩序无关。但是他是怎样发现这一点的呢？这种可换性是这些鹅卵石的本性吗？不错，似乎鹅卵石让他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排列它们；而对于水滴，他就不能这样做。因此，从这个意义讲来，他的知识有其物理的方面。但是秩序并不在鹅卵石之中，而是他，这个主体，把鹅卵石排列成行，然后又排成圆圈的。此外，总数也不在这些鹅卵石本身之中，而是主体把它们联结起来的。这位未来的数学家那一无所发现的知识便不是从鹅卵石的物理性质中抽绎出来的，而是从主体作用于鹅卵石的动作中抽绎出来的。这种知识，我们称为逻辑数理的知识，而不是物理的知识。

从客体中抽绎出来的这种类型的抽象，我们将称为简单的抽象，而第二种类型我们将称为反省的抽象，我们是从双重意义去使用这个名词。在这里，“反省的”一词除它在物理学中所具有的意义外，在心理学领域内至少还有两个意义。在物理学中，“反射”是指一条光线从一个表面反射到另一表面的这种现象。按照心理学里面的第一个意义，〔反省的〕抽象是从一个等级转移于另一个等级（如，从动作阶段转移于运算阶段）。按照心理学里面的第二个意义，反省〔的抽象〕是指反复思考的心理过程，即在思维运算阶段发生了重新组织的活动。

现在我愿意在两种类型的动作之间加以区别。一方面有个别的动作如掷、推、触、搓。这些个别动作产生于从对象中作出抽象的大部分时间。这是我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抽象的简单类型。然而，反省抽象却不是根据个别的动作，而是根据许多协调的动作。动作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方式中加以协调。例如，能够把它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相加性协调。或者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排列起来，我们称之为有序的或序列的协调。例如，当某些动作是达到一个目标的必要手段时，在我们把动作组织起来去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便有一个先，一个后。另种类型的动作协调是在两个行动之间建立对应的关系。第四种形式是在许多动作中建立的交点。所有这些协调形式在逻辑结构中都有其对应的平行物，而且照我看来，当这些形式以后在思维活动中发展时，在动作阶段的这种协调便是逻辑结构的基础。事实上，我们的假设是这样的：逻辑思维的根源不单是在语言中发现的，即使语言的协调是重要的，而更一般地是在作为反省抽象基础的动作协调中发现的。说得完备些，我们可以补充说，在单个的动作和协调的动作之间的区别自然是一种逐渐发生的区别，而不是一种突然中断的区别。甚至推、触、搓也是由一些较小的细致动作所组成的一种简单类型的组织。

这只是回溯分析的开始，这种分析还能进一步做下去。像在发展心理学中一样，在发生认识论中永远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我们永远不能回溯到这样一点上，在这里我们能说：“这里就是逻辑结构的开端。”一旦当我们开始讲到一般的行动协调时，我们就会觉察到。当然，还可以更进一步追溯到生物学领域里面去。我们可立即进入神经系统和神经原网络内部协调的领域〔如麦卡洛克和皮茨所讨论的内容〕。然后如果我们再寻找这些科学家们所讨论的神经系统的逻辑根源，我们就要作进一步的追溯。我们会发现更基本的有机协调。当我们再进一步进入比较生物学领域时，我们就到处发现具有依次包含的对应关系的结构。我不想进入生物学；我只想把这种回溯分析追踪到它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开端，而且再一次强调人类逻辑的和数理的结构形成并不能单用语言去解释，而是在一般的动作协调中有其根源的。

【美国】福克纳（1897—1962）

福克纳，美国小说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小说以描写美国社会生活的黑暗面见长。

接受诺尔奖时的演说

我感到这份奖赏不是授予我个人而是授予我的工作的，——授予我一生从事关于人类精神的呕心沥血的工作。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为名，更不是为利，而是为了从人的精神原料中创造出一些从前不曾有过的东西。因此，这份奖金只不过是托我保管而已。做出符合这份奖赏的原意与目的，与其奖金部分有相等价值的献词并不难，但我还愿意利用这个时刻，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讲坛，向那些可能听到我说笑话已献身于同一艰苦劳动的男、女青年致敬。他们中肯定有人有一天也会站到我现在站着的地方来的。

我们今天的悲剧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种恐惧存在已久，以致我们已经习惯了。现在不存在精神上的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正因如此，今天从事写作的男、女青年已经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然而，只有接触到这种内心冲突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因为这是唯一值得写、值得呕心沥血地去写的题材。

他一定要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他必须使自己明白世间最可鄙的事情莫过于恐惧。他必须使自己永远忘却恐惧，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心底古老的真理之外，不允许任何别的东西有容身之地。没有这古老的普遍真理，任何小说都只能是昙花一现，不会成功；这些真理就是爱情、荣誉、怜悯、自尊、同情与牺牲等感情。若是他做不到这样，他的气力终归白费。他不是写爱情而是写情欲，他写的失败是没有人失去可贵的东西的失败，他写的胜利是没有希望、更精的是没能怜悯或同情的胜利。他不是为遍地白骨而悲伤，所以留不下深刻的痕迹。他不是写在心灵而是在写器官。

在他重新懂得这些之前，他写作时，就犹如站在处于世界末日的人类中去观察末日的来临。我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因人能传种接代而说人是不朽的，这很容易。说即使最后一次钟声已经消失，消失在再也没有潮水冲刷的映在落日余晖里的海上最后一块无用礁石之旁时，还会有一个声音，人类微弱的、不断的说话声。这也很容易。但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仅能传种接代，而且能战胜一切而永存。人之不朽不是因为动物中唯独他永远能发言，而是因为他有灵魂，有同情心、有牺牲和忍耐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写出来。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去鼓舞人的斗志，使人记住过去曾经有过的光荣——人类曾有过的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以达到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应只是人类的记录，而应是使人类永存并得到胜利的支柱和栋梁。

【美国】海明威（1899—1901）

海明威，美国作家。著有《太阳照样升起》、《老人与海》等。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以描写战争题材著称。他简洁、凝练的文风对后辈作家影响甚大。本文是他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

作家和战斗

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并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并且使之做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正因如此，所以无论早晚，作家总会得到极大的奖赏。如果奖赏来得太快，这常常会毁掉一个作家。如果奖赏迟迟不至，这也常常会使作家愤懑。有时奖赏直到作家去世后才来，这时对作家来说，一切都已无所谓了。止因为创作真实、永恒的作品是这么困难，所以一个真正的优秀作家迟早都会得到承认。只有浪漫主义者才会认为世界上有所谓“无名大师”。

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可以忍受的任何一种现有统治形式下，几乎都能得到承认。只有一种政治制度不会产生优秀作家，这种制度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强盗们所说出的谎言。一个不愿意撒谎的作家是不可能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和工作的。

法西斯主义是谎言，因此它在文学上必然是不育的。就是到它灭亡时，除了血腥屠杀史，也不会有历史。而这部血腥屠杀史现在就已尽人皆知，并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最近几个月所亲眼目睹。

一个作家如果知道发生战争的原因，以及战争是如何进行的，他对战争就会习惯。这是一个重要发现。一想到自己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简直会感到吃惊。当你每天都在前线，并且看到阵地战、运动战、冲锋和反攻，如果你知道人们为何而战，知道他们战得有理，无论我们有多少人为此牺牲和负伤，这一切就都有意义。当人们为把祖国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战，当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而你知道他们如何受到进攻，如何一开始几乎是手无寸铁地起来斗争的，那么，当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斗争和死亡时，你就会开始懂得，有比战争更坏的东西。胆怯就更坏，背叛就更坏，自私自利就更坏。

在马德里，上个月我们这些战地记者一连 19 天目睹了大屠杀。那是德国炮兵干的，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

我说过，对战争是会习惯的。如果对战争科学真正感兴趣（而这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对人们在危急时刻如何表现的问题真正感兴趣，那么，这会使人专心致志，以至于考虑一下个人的命运就会像是一种卑鄙的自爱。

但是，对屠杀是无法习惯的。而我们在马德里整整目睹了 19 天的大屠杀。

法西斯国家是相信总体战的。每当他们在战场上遭到一次打击，他们就将自己的失败发泄在和平居民身上。在这场战争中，从 1937 年 11 月中旬起，他们在西部公园受到打击，在帕尔多受到打击，在卡拉班切尔受到打击，在哈拉玛受到打击，在布里韦加城下和科尔瓦城下受到打击。每一次在战场

遭到失败之后，他们都以屠杀和平居民来挽回不知由何说起的自己的荣誉。

我开始描述这一切，很可能只会引起你们的厌恶。我也许会唤起他们的仇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我们需要的是充分理解法西斯主义的罪恶和如何同它进行斗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屠杀，只是一个强盗、一个危险的强盗——法西斯主义所作的一些姿态。要征服这个强盗，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给它以迎头痛击。现在在西班牙，正给这个法西斯强盗以痛击，像 130 年以前在这个半岛上痛击拿破仑一样。法西斯国家知道这一点，并且决心蛮干到底。意大利知道，它的士兵们不愿意到国外去作战，他们尽管有精良的装备，却不能同西班牙人民军相比，更不能同国际纵队的战士们相比。

德国认识到，它不能指望意大利在任何一场进攻战中不能依赖这个盟国。不久前我读到，冯·布龙贝尔克参加了巴多略元帅为他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演习。但是，在远离任何敌人的威尼斯平原演习是一回事，在布里韦加和特里乌埃戈依之间的高原上，同第十一和十二国际纵队以及里斯特、康佩希诺和麦尔的西班牙精锐部队作战中遭到反攻并损失三个师，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轰炸阿尔美利亚和占领被出卖的不设防的马拉加是一回事，在科尔多瓦城下死 7000 人和在马德里的失败的进攻中死伤 3 万人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开始时说过要写得好而真实是多么困难，说过能够达到这种技巧的人都一定会得到奖赏。但是，在战时（而我们现在正不由自主地处于战争时期），奖赏是要推迟到将来的。描写战争的真实是有很大危险的，而探索到真实也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不确切知道美国作家中有谁到西班牙寻求真实去了。我认识林肯营的很多战士。但是，他们不是作家。他们只会写信。很多英国作家、德国作家到西班牙去了，还有很多法国作家和荷兰作家。当一个人到前线来寻求真实时，他是可能不幸找到死亡的。如果去的是 12 个人，回来的只是两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带回来的真实，却将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而不是被我们当作历史的走了样的传闻，为了找到这个真实，是否值得冒这么大的危险，这要由作家自己决定。当然，坐在学术讨论会上探讨理论问题要安全得多。各种新的异端，各种新的教派，各种令人惊叹的域外学说，各种浪漫而高深的教师，对那些人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的，——他们也似乎信仰某种事业，但却不想为这个事业的利益而奋斗，他们只想争论和坚持自己的阵地，这种阵地是巧妙地选择的，是可以平平安安占据的。这是由打字机支撑并由自来水笔加固的阵地。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研究战争的作家来说，现在正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都会有可去的地方。看来，我们还会经历很多不宣而战的年代。作家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加这些战争。以后也许会有奖赏。但是，作家们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因为奖赏很久都不会来的。对此也不必特别寄予希望，因为，也可能像拉尔夫·福克斯和其他一些作家那样，当领取奖赏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了。

【印尼】苏加诺（1901—1970）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1955 年对召开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是 1955 年 4 月 18 日，他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阁下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各位姐妹、各位兄弟：

我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欢迎诸位来到印度尼西亚，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诸位的期望，我请求诸位谅解和原谅。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诸位在我们中间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烈欢迎将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质缺点。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在这方面，我回想起大约将近 30 年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盟”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许多今天在场的杰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个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异邦人中间、在异邦的国土上、在别的洲上的会议地点。在那个地方集会，并不是由于选择，而是由于必要。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做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

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么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 1954 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 1954 年 12 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诸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我国是你们的东道主，我感到很骄傲。

但是我想到的并不全是印度尼西亚今天享受的荣誉。不。我的一部分心

情由于其他的考虑而暗淡下来。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在 1945 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膺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承担这些负担。

兄弟姐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

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地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却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易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姐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

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报纸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

.....</P

【美国】里根（1911～）

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周年之际，里根出访前德国时，向在“二战”中德国战死者公墓献花圈，并发表这篇讲话。意在“让我们在曙光中走到一起，走出阴影，生活在和平之中”。

曙光越来越亮了

我刚从德国战死者的公墓归来，任何人参观那个公墓都不能没有深沉而又相互矛盾的心情。我对历史能充满这类浪费、毁灭和罪恶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知道，从这些灰烬中产生了希望，从过去的恐怖中我们已建立了四十年的和平与自由以及我们各民族之间的和解，所有这些又使我感到欣慰。

这次参观激起了美国人民的多种感情，也激起了德国人民的多种感情。从我最初决定参观比特堡公墓以来，我收到了许多封信，有的信表示支持，有的信表示深切担忧和怀疑，其它的则表示反对。有些旧伤疤又被揭开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现在本应是治愈伤痕的时刻。

对于退伍军人和仍感到那次战争痛苦损失的美国军人家属来讲，我们今天同德国人民和解的姿态绝不会丝毫减少我们对那些过去为祖国而战、为国捐躯的人的热爱和崇敬。他们在祖国处于最黑暗的时刻为了拯救自由而献出了生命。今天正保卫亿万欧美人民自由的民主国家联盟生动地证明，他们没有白白作出高尚的牺牲。

我们今天的使命是哀悼这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今天，在比特堡公墓，我们纪念四十年前被毁灭的那种潜在的优良品质和人性。如果那位15岁的士兵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他的同胞一起建设新的、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正献身于人类尊严和保卫我们今天所庆祝的自由。

他的子孙今天也许会在比特堡空军基地同我们大家在一起。在这里，新的几代德国人和美国人将友好相处并致力于共同事业，献身于维护和平和保卫自由世界安全的事业。

过去，一场战争的结束常常只是播种下另一场战争的种子。我们今天庆祝的是把我们从毁灭循环中解放出来的两国之间的和解。看看我们一起完成的业绩吧。我们过去是敌人，现在是朋友。我们过去是不共戴天的对头，现在则是最牢不可破的盟友。

四十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战争，那是为了除去笼罩着全世界的万恶的黑暗，让我国以及所有国家的男女老少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现在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员。但是，争取自由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今天仍然处在极权主义统治的黑暗中。

二十二年前，约翰·肯尼迪总统来到柏林墙，宣布他也是柏林人。今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都必须说：我是一名柏林人，我是仍然受到反犹威胁的世界中的一名犹太人，我是一名阿富汗人，我是（苏联）古拉格的一名囚犯，我是在越南沿海漂流的一条挤满人的船上的一名难民，我是一名老挝人，我是一名柬埔寨人，一名古巴人，是尼加拉瓜的一名印第安人，我也可能是极权主义的一名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教训、纳粹主义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由的力量必须

永远比极权主义强大，善必须永远比恶强大。我们两国的道义标准将体现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维护自由、保护生命安全以及尊重和爱护上帝所有的孩子的决心上。

因此，自由民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深刻地、并且令人满怀希望地体现出人的这种精神。我们无法把昨大的罪行和战争勾销，也无法使数百万人复生。但是我们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从而使过去富有意义，我们能让自己的痛苦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医治人类的创伤。

我们牢记过去的教训，已翻开历史上新的更光辉的一页。有许多人就我这次访问给我写信。其中的一位年轻妇女要求我为了德国的前途向比特堡公墓献花圈。我正是这样做的。今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十周年，我们纪念仇恨、罪恶和下流行为结束的这个日子：我们要纪念民主精神在德国复苏的日子。

有许多事情使我们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周年纪念日满怀希望。尽管世界上许多地方仍处在受压迫的黑暗中，但是我们已看到照亮全球的自由新曙光。在拉丁美洲新建的民主国家，在亚洲新出现的经济自由和繁荣中，在中东缓慢走向和平的进程中以及欧美民主国家联盟的不断加强中，我们都能看到曙光越来越亮。

让我们在曙光中走到一起，走出阴影，生活在和平之中。

【法国】尤奈斯库（1912～）

尤奈斯库，法国剧作家，西方“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之一。主要剧作有《秃头歌女》等。另有戏剧、小说、杂文多种。本文是作者1959年6月在国际戏剧学会主办的赫尔辛基先锋派戏剧讨论会开幕式上的演说。

论先锋派

看来，我是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了。因为既然我在这里，在这里参加先锋派戏剧的讨论会，我甚至觉得这是不用待言的，这完全是一次正式的会议。

现在，我们要问：先锋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并不是个戏剧学的博士，也不是艺术哲学的博士，只勉强算作是一个人们所说的那种戏剧家。

如果我还能够对戏剧有一些看法，那么它们也特别是指我个人的戏剧而言的，因为这些看法是从我自己的创作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与其说它们是能起规范作用的，还不如说它们是描述性的。当然，我是希望我的那些规则同其他的人也应当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是由大家一个个的人所组成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是我自己所发现的那些戏剧规律只是暂时的，它们是不停运动的。它们随着艺术创作的激情而来，自生自来。我还能够写出一部新的剧本，我的观点也可以完全改变。有时，我不得不自相矛盾，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还持原来的观点。

我仍然希望我自觉地或者本能地所依靠的几个基本原则不至于改变。那么，我再一次能够对你们讲的。仍然是一种完全是个人的经验。

但是，为了不至于犯太大的错误，我在到这里来以前，仍然是搜集了一些资料的。我打开了我的《拉鲁斯词典》，查了“先锋”这个词。我看到，所谓“先锋”，是指“一支武装力量——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作准备。”

这样，以此类推，戏剧中的所谓先锋派，应当是由进行突击的作家——有时还有进行突击的导演——的一个小组所组成的。在他们的后面，隔开一段距离，跟着的是演员、作家和鼓动者们所组成的大部队。类推法可能是成立的，这就像阿尔贝雷斯继许多人之后，在他的一本题为《二十世纪的智力冒险》中所证实的那样：“由于一种从来也没有人想去加以解释（确实，要解释似乎也是很困难的）的现象，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文学（当然，也包括艺术）的敏感性总是先于各个历史事件，后者对前者进一步作了肯定。”的确，波德莱尔、卡夫卡、皮兰德娄（“他拆开了社会、家庭和其他方面的崇高感情的结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公正地认为是先知作家。

因此，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的现象，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来讲是说得通的。它应当是一种超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来说，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所以，只有在一种先锋派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它已经变成后锋派的时候，只有在他已被“大部队”的其他部分赶上甚至超过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曾经有过先锋派。这是一支向何处去的“大部队”呢？

我倾向于用“反对”、“决裂”这样的词来给先锋派下定义。当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和思想家自以为他们是适合时代的时候，反叛作家已经意识到要反对时代了。事实上，各种思想家、艺术家或者重要人士，在某种时候，只是赞同一些僵化的形式。他们还以为是越来越牢固地安居于思想、艺术和任何一种社会秩序之中呢，他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其实早已经开始动摇了，出现了一些裂缝，不过他们没有怀疑过罢了。事实上，迫于形势，一种制度建立之日，已是它过时之时。当一种表达形式被认识时，那它已经陈旧了。一件事情一旦说定，那就已经结束了，现实已经超过它了。它已是一个僵化的想法。一种表达方式——同样地，一种存在方式——一旦被接受或者简单地被允许，那它就已经是不能允许的了。一个先锋派的人就如同是国家内部的一个敌人，他发奋要使它解体，起来反叛它，因为一种表达形式一经确立之后，就像是一种制度似的，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先锋派的人是现存体系的反对者。他是现有东西的一个批评者，是现在的批评者，——而不是它的辩护士。批评过去是容易的、特别是在当局鼓励您或者容许您这样做的时候；那只是事物现状的一种固化、一种僵化、一种圣化，在暴政面前的卑躬屈膝，笔法的因循守旧。

但是，让我们把我们的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我明显地觉得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确，先锋派这个词有几个意思。因此，它可以完全简单地被认为是与艺术戏剧近似的。所谓艺术戏剧，是指一种特别是在法国被人们称作是戏剧的东西，比通俗喜剧更加文学化、更加讲究、更加大胆的戏剧。乔治·皮尔芒的看法好像就是这样，在他1946年所出版的戏剧选中，把作家分成两类：一类是通俗喜剧，其中有罗贝尔·德·弗莱尔、弗朗索瓦·德·居雷尔等等；另一类是先锋派，其中有克洛德——安德烈·皮热、帕瑟、让·阿努伊、吉罗杜，等等。今天回过头去一看，觉得是相当有趣的，这些作家差不多都变成经典的作家了。但是，莫里斯·多内在他那个时候，还有巴塔耶，也都是先锋派作家，因为他们表现出一种分裂，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反对。最后，他们加入了传统戏剧，这就是一切先锋派的归宿。无论如何，他们曾经代表了一种反对，其证据就是，这些作家在开始时受到批评界的激烈批评，批评界对他们的反对加以反对。当现实主义是戏剧生活中最通常的表现并变得过分时，先锋派作家的反对可以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对抗；而当象征主义变得过分、专横并不再体现现实的时候，先锋派可以是对某种象征主义的反对。不管怎样，被人们称之为先锋派戏剧，或者新戏剧的东西，它作为一种在正式戏剧之外被承认的戏剧或者说被普遍承认的戏剧，就是这样的一种戏剧，它好像通过它的表达、探索和困难，有着一种高级的要求。

既然它的特征是由它的要求和它的困难所构成的，那么非常明显的是，它在被融合和变得易懂之前，就只能少数人的戏剧。先锋派戏剧，或者干脆说一切新的艺术和戏剧，都是不通俗的。

一切革新的尝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的惰性所反对，这也是必然的。很明显，并不是要一个剧作家变得不通俗。但也不是要他变得通俗。他的努力，他的创作，是应把这些一时的评论置之度外的。或者是这种戏剧永远不通俗，不被承认，那么他也就什么都没有干；或者是他的作品变得通俗了，由于环境的变化，经过了一段时间，很自然地为大多数人所承认。

今天，大家都懂得物理学和几何学的基本定律了，而这些学科在它们开

始的时候，肯定是只有一些学者才能够理解的，它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几何学和物理学变得通俗。人们肯定也不能指责他们只是在局限于一定范围的某种社会等级内表述真理，因为他们所表述的是毋庸置疑的客观真理。要去论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似的问题，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还都知道，在精神的这两个领域，不同是比相似来得更大的。然而，每个新的作家正是以真理的名义，去考虑战斗的。布瓦洛企图表达真理，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的序言里，认为浪漫主义艺术是比古典主义真理更加真实和更加复杂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样也企图扩展真实的范围，并揭示出新的、尚未被认识的方面。象征主义以及早些时候的超现实主义，也同样想发现和表现隐藏着真实。

因此，向一个作家所提出的问题，就是简简单单地让他发现真理，并且把它们讲出来。至于讲的方式，那自然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对他来说，这讲本身就是真理。他只是为了他自己而讲出来。他是在为他自己的时候，才也为其他人讲的。决不会是相反的情况。

如果我不惜一切代价，想写一些通俗的戏剧，那么我就得去冒这样的风险，那就是转述一些并不是由我个人所发现的真理，有人在别处已经向我转述了这些真理，我的已是第二手资料了。艺术家既不是教育家，也不是煽动家。戏剧创作是为了要回答精神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的本身就足够了。一棵树就是一棵树，它要成为一棵树，用不着得到我的许可。这棵树不会产生是不是这样一棵树的问题，不会产生让人承认它是棵树的问题。它不去进行自我表白。它存在着，并用它的存在本身来自我表现。它不企求得到理解。不去赋予自己一种更易于被理解的形式，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了一棵树了。它本身就是对什么是一棵树的解释。同样的，艺术作品存在于自身之中，我构思的完全是一种没有观众的戏剧。观众是自己来的，正像他们知道把树叫作树一样，认出了这是戏剧。

贝朗热的歌曲要比韩波的诗歌通俗得多，后者在当时是被认为完全不能理解的。难道因此就应当排斥韩波派的诗歌吗？欧仁·苏是非常通俗的。普鲁斯特就不是那样。他没有被理解，他不是“对所有的人”讲话的。他只是简单地贡献出他的真理，而它对文学和思想的发展却是很有益的。难道应当禁止普鲁斯特写作而仅推荐欧仁·苏吗？今天看来，是普鲁斯特的作品更富于真理，而欧仁·苏的作品却是空虚的。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没有人使用权限禁止普鲁斯特用普鲁斯特的语言进行写作。

一种景象只能用适合于它的表现手段去表达，以致它就是这种表现本身，是唯一的。

但是，通俗的东西有好有坏。有人认为“通俗”戏剧是一种为知识上贫乏的人而写的戏剧，那是不正确的。我们有一种教育的或者教训的戏剧，它是一种感化的、初级的（不是原始的，那是另一回事）戏剧，是一种政治或者一种思想意识的工具。这种戏剧起到双重的作用，即进行一些既顺从大流又毫无益处的重复。

一个艺术作品（因此，一个戏剧作品也是一样的）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最初的直观，它由于艺术家的才能和天赋不同，尽管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是不一样的，但总是一种由其本身决定的最初的直观。然而，为了使得它能够产生和形成，就得让想象力去自由地驰骋，把别人的看法和次要的因素置之度外，例如作品的命运啦，它的名声啦，是否应当体现一种思想意识啦，等等。

在想象力的发展中，各种涵义会自己出现，有一些有说服力，另一些则不那么令人信服。就我个人而言，我真是一点也不明白，有人怎么能够抱这样的奢望：怎么能够对所有的人讲话，怎么能得到观众的一致赞同。而在同一个等级的人里，比如这样说，一些人喜欢草毒，另一些人则爱吃于酪，有些人头痛时服用阿斯匹林，还有些人胃疼时则爱用铋剂。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因为观众是否赞同的问题而有所焦急的。或者，是的……可能……剧本一旦写成，我就要设法把它弄出去，至于他们赞同与否，那都是极为自然的事。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从来是不能为所有的人而写作的。或者，最多不过是为大多数人而写，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写一些蛊惑人心的戏剧，写一些落人俗套的戏剧。当人们想对所有的人讲话时，那实际上就是不对任何人讲，因为一般地说，那些使所有的人感兴趣的东西，就很少能够使每一个具体的人感兴趣了。况且，由于一件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件新的东西，所以它是咄咄逼人的，本能地咄咄逼人的。它冒犯观众，冒犯大部分观众，它以奇特使观众感到愤慨，奇特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它不能是别的情况，因为它没有走老路，而是在荒野上单独另辟了一条新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前面才讲一件艺术作品不会是通俗的。但是，从表面上看来，新的艺术不是通俗的，这倒不是由于它的本质所造成的，而是因为它的出现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所谓通俗的戏剧，在实际上是更加不通俗的戏剧。它是从上而下，傲慢地强加下来的一种戏剧，是由领导的“显贵”所强加下来的，是由一类手里强加下来的，他们事先就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人民需要什么。甚至只把他们所希望人民需要的东西强加下来，让人民只能思考他们所思考的东西。不合常情的是，由于自由的艺术作品在它奇特的外表之上所具有的个人主义的性质，就使它成为惟一的是从人们的内心涌现出来的、透过人们内心的作品，惟一的真正能够表现“人民”的作品。

有人说戏剧正处在危险、危机之中，这有几方面的原因。有时，人们要剧作家去宣传和捍卫各种神学，因此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们强迫他们只能捍卫、攻击、阐明这个或者那个，他们不是卫士，光是些棋子而已。在别的地方，束缚戏剧不是各种体系，而是习俗、恐怖、僵化的精神上的习惯和一些规定。当戏剧能够在思想上有最大自由的地方，是想象力最为活跃的地方时，那它就变成一种僵化的习俗的体系（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不称之为现实主义也罢）的最大约束了。人们害怕有太多的幽默（幽默，就是自由）。人们害怕思想自由，也害怕一种过于悲剧化的或者绝望的作品。乐观主义和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违者处死。有时，人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之为荒诞，因为它揭露了一种语言的可笑的特点，它是没有实质内容的、枯燥无味的、由陈词滥调和标语口号所构成的；因为它揭露了事先就知道的戏剧行动。但是我，我要让一只乌龟出现在舞台上，让它变成帽子，变成歌曲，变成古代的胸甲骑兵，变成泉水，人们在剧中要敢想，这里是人们最不敢想的地方。

除了对机器房的技术可能性要有所限制之外，我不主张别的还有什么限制，人们将会说我写的是杂耍歌舞，写的是杂技。好极了，让我们和杂技合为一体吧！人们可以指责作家过于专横，但是想象力可不是专横的，它是一位启示者。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完全保证，作家就不能成其为作家，他就不能讲出一些别人还没有讲过的东西。至于我，我给自己作了规定，除了我的想象力的法则以外，别的什么法则也不承认；而既然想象力是有法则的，那么这又是一个新的证明，证明了想象力终究不是专横的。

有人说，人的特征就是他是会笑的动物；他尤其是有创造能力的动物。他把一些本来在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引进世界里来，例如：庙宇、兔棚、两轮车、火车头、交响乐、诗歌、主教座堂、香烟，等等。常常，驱使创造所有这些事物的那种实用价值只是个借口而已。活着有什么用呢？就是为了活着。一朵花有什么用呢？就是一朵花。一座庙宇、一个主教座堂有什么用呢？是为了保护教徒吗？我觉得不是的，既然庙宇已经改作他用，而人们却继续在仰慕着。庙完是为了向我们显示建筑艺术的法则而服务的，而且这些法则可能正是我们的精神所显示出来的世界建筑术的法则，既然精神已经把它们认出来了。但是，戏剧如果缺少胆量，那就会自我消灭的。看来，人们并不懂得人们所创造的世界不能是假的。只有在我想写真实并只限于真实时，它才是假的，因而写的是虚假的真实。当我创造时，当我想象时，我才意识到那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想象的结构更为明显和“合乎逻辑”的了。我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世界使我觉得它是不合理的，它变得不合理了，为我的理智所不容。只是在我的精神里，我重新找到了我一直努力使我的精神重新适应，使我的精神服从的法则。但是，这已经超过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了。

当一个作家写一部作品，比如说一部剧本，我们可以说他是清楚地或者模糊地感觉到他在进行一场战斗的，如果他有什么东西要讲出来，那不是因为其他人把这件事情还没有讲明白，就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讲明白，他要讲点新的东西。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写作呢？讲出他所要讲的东西，让人们接受他的世界，这本身就是战斗。一棵树要生长，就必须克服物质上的障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物质，那是已经做了的，已经讲了的。更确切地说，他之所以写作，并不是为了赞成或者反对某件事情，他是不管这些事情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艺术家虽然力量有大有小，但都是一个革命者。如果他摹仿，如果他抄袭，如果他只是举些例子加以说明，那他就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好像诗人都是反对一种传统的（由于他们自身的存在，这种斗争常常是不由自主的）。

然而，如果诗人觉得语言不再能够写出真实，不再能够表达出一种真理时，他们就还要努力以一种更加激烈、更加雄辩、更加清楚、更加准确、更加合适的方式，把真实写出来，最好地表达出来。在这方面，他们努力回到已经过时的传统上去，把它现代化，使它重新获得生命。一个先锋派的剧作家可以觉得（无论如何，他有此愿望）他的戏剧比他周围那些人的写得好。因此，他的活动是一次真正的回到源头去的尝试。什么源头？戏剧的源头。回到戏剧的内在模式上去，人们重新找到戏剧性的人物和永久而深刻的形式。

帕斯卡尔自己找到了几何学的原理；少年时的莫扎特就自己发现了音乐的基础。当然，只有很少的艺术家才能同这两位巨人相比。然而，我觉得肯定的是，人们虽然雄辩地称某种东西为天生的戏剧，但是如果不能再对它进行一点创造，那么人们也就不能拥有它。看来，我差不多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所有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在一次巨大的地壳激变中全部沉没，那么幸免于难的人迟早总会重新发现绘画、音乐和戏剧的，因为它们具有一些作用，这些作用与人的呼吸一样都是自然的、不可缺少的和本能的。那些没有发现（即便是一点点）戏剧的作用的人，因此也就不是块搞戏剧的料子。而为了能够有所发现，可能就必须要有某种的无知，某种的天真，一种从上述的天真中所产生出来的胆量：但是这种天真并不是头脑简单，这种元知并不是要取消

知识，它只是吸收知识，把知识加以更新。艺术作品不是没有见解的。但是既然艺术作品是生活及其表现，那么这些见解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并不是艺术作品能产生出一些思想。相矛盾的是，新的作家正是那些竭力返回到最老的东西中去的人。这些最老的东西是，在一种要更加清楚、更加朴实、更加纯戏剧化的戏剧作品中的新的语言和主题；寻求传统，但拒绝传统主义；概括知识和创造、真实和想象、个别和普遍，——或者像人们今天所说的，个人和集体；脱离阶级，超阶级的表现手法。在说出萦绕在我脑际的一些基本的念头时，我表达了我深刻的人道主义，超越了一切阶级的和各种心理的樊篱，自发地赶上了所有的人。我表达了我的孤独，同所有人的孤独聚在一起；我活着的快乐或者生存的奇怪心情，也是所有的人都有的，——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拒绝从其中看清自己的话。像爱尔兰作家布伦丹·贝汉的一个剧本《马丁的顾客》，就是从作家独特的经验——监狱——中产生出来的。不过，我却觉得我同它是有关的，因为剧本使这个监狱变成了所有的监狱，使它变成了全世界。使它变成了所有的社会。很明显，在这座英国的监狱里，有些囚犯，也有些看守。因此，就有奴隶和主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些人和另一些人被关在同一堵围墙里。囚犯们仇视他们的看守，看守们鄙视他们的囚犯。但是，囚犯们之间也互相厌恶；看守们之间也不能相互了解。如果在看守们和囚犯们之间发生一次简单的冲突，如果剧本只局限于写这场非常明显的冲突，那就没有什么新的、深刻的、富有揭示性的东西，只是写了一个粗浅的、过分简单的事实。但是通过这个剧本，贝汉让我们看清了更加复杂的现实。在这座监狱里，一个人要被处决了。将被处决的犯人没有在舞台上出现。但他在我们的意识中出现了，使我们在思想上极难摆脱掉。这就是剧中的主人公。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个主人公就是死亡。看守和囚犯共同感觉到这个死亡。作品深刻的人道主义就在于大家的、超越于看守和囚犯的区别之上的这种烦扰、这种可怕的相通的苦恼。这是一种超越于各种隔离之上的相通，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友爱，但是作家让我们意识到了。所有的人本质上的一致，被他向我们揭示出来了。这可以帮助一切敌对的营垒互相靠近。确实，我们突然觉得囚犯们和看守们都是要死的，一个问题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使他们团结在一起，支配着他们。这就是一部通俗的戏剧，写了在同一个苦恼中的相通。这是一部旧戏，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的和永久的问题；但这又是一部新戏，是一部局限在一个地方的戏，因为讲的是一个特定国家历史上现在的某个时刻的监狱。

本世纪初，特别是将近 20 年代时，在精神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曾出现过——一个广泛的全世界的先锋派运动。在我们的智力习惯上发生了一次动荡。从克莱到毕加索，从马蒂斯到蒙德里安，从主体派到抽象派的现代绘画，都表现了这次动荡、这次革命。它也出现在音乐和电影中，它还征服了建筑。哲学和心理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科学（我谈这些是不够资格的）给我们描绘了世界的新景象。一种新的风格被创造出来并继续发展。这个时代的特点是有着统一的风格——综合了多种风格——，它相应地在建筑和诗歌、数学和音乐中都有明显的体现。比如，在凡尔赛的城堡和笛卡儿的思想中，就存在着本质的统一。从安德烈·勃勒东到马雅柯夫斯基、从马里内蒂到特里斯唐·查拉或者阿波利奈尔的整个文学和戏剧，从印象派的戏剧到超现实主义，直到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的新近的小说，特别是纳塔丽·萨罗特和米歇尔·比托尔的最新小说，都加入了这场更新的潮流。但是整个文学上的这些活动

没有变成一种运动，而在戏剧方面好像在 1930 年就停止了。现在，最落后的就是戏剧了。先锋派的活动即使没有在整个文学中停止的话，那么至少在戏剧中是停止了。各种的战争、革命、纳粹主义、其他形式的暴政、教条主义，以及在其他国家中的因循守旧的僵化，现在都阻止了先锋派的发展。应当继续发展下去。至于我，我希望成为那些力图使这场运动重新发展起来的普通的创造者当中的一个。确实，这个被抛弃了的先锋派并没有过时，但它被埋葬了，老的戏剧形式又反动地卷土重来，它们有时还居然自称是新的形式呢。现在的戏剧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它表现了一种陈旧的心理，一种通俗的结构，一种因循守旧的审慎，以及一种现实主义——它可以说它自己不是习俗的，而实际上确是如此的，它屈服于一些威胁着艺术家的教条。

法国电影的青年一代要比戏剧的同行们先进得多。青年一代的电影工作者是在影片资料馆和电影俱乐部里培养出来的。他们是在那里接受的教育。在那里，他们看了艺术影片、古典影片、先锋派的影片、非商业影片、非通俗影片，它们由于其非商业性质，通常是从来不在大礼堂里演的，即使在那里演也只是演一个很短的时期。

戏剧还需要（但是对它来说，也是更加困难的）这些试验的场所、这些实验的礼堂，以匡逃避浅薄的公众。唉，在某些国家，还有一个危险，还有一个逃脱不掉的祸害，那就是老板。他们在那里就像些暴君，戏要卖座；而要能卖座，就必须砍掉一切大胆的地方，砍掉一切有创造精神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惊动任何人。有个老板要我改写我的各个剧本，让它们变得可以理解些。我问他有什么权利于预我剧本的结构问题，因为它只应当同我有关，只应当同我的导演有关。我觉得他虽然出钱演戏，但这并不能使他拥有一个对我的作品发号施令、进行修改的充分的理由。他对我宣称他是代表观众的。我回答他说，我们正是要对观众，也就是说对他，对他这个老板，作斗争呢。对他作斗争，或者不把他当回事。

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思想和艺术开放，它相信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相信必须要有一些实验场所。一种发明或者科学理论在得到推广之前，总是要在实验场所里进行准备、试验和思考的。我要求剧作家能得到像学者一样进行他们的试验的可能。人们不能说，一项科学发现因此就是不通俗的。我不相信从我内心的深处所产生出的一些精神现实会是不通俗的。卖座率高，并不见得总是通俗的。诗人的高贵并不像一个社会等级的虚假的高贵那样是一种虚假的高贵。在法国，我们有一些引人入胜的作家，如让·热内、贝克特、沃蒂埃、皮歇特、舍阿代、奥迪贝尔蒂、盖尔德罗德、阿达莫夫、乔治·内弗，他们在继续写作，反对季洛杜派、呵努依派、让-雅克·贝尔纳派，等等。他们还仅仅构成一些起点，预示着一种生动而自由的戏剧有可能发展起来。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

【朝鲜】金日成（1912～1994）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本文是30年代末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时所作的演讲。

为光复祖国而顽强战斗

同胞兄弟姊妹们！

我们是为祖国的光复和民族的解放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朝鲜人民革命军。

我们能够这样有意义地在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胜利的战场上同怀念已久的祖国同胞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我代表朝鲜人民革命军向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革命军的诸位以及国内爱国人士，表示深切的感谢。

诸位！

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在整个三千里疆土上布满了军队、宪兵和警察网，炮制出各种反动法令，对无数的爱国者野蛮地加以逮捕、监禁和屠杀，把耻辱的、奴隶式的屈从强加在我国人民身上。

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阉割我国人民高尚的民族精神，叫嚷什么“内鲜一体”、“同祖同根”，企图对我们民族强行灌输“皇道精神”，甚至企图蹂躏和扼杀夸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我们优美的语言。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变本加厉地加强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尽量抢劫我国的宝贵财富。日本帝国主义者甚至把掠夺的魔爪伸到这个偏僻的山村里来，尽量抢走我们宝贵的山林资源。日本帝国主义者驱使你们像牛马一样从事种种苦役，拼命榨取你们的血汗，害得你们连水田也种不好。因此，你们被迫用草根树皮勉强延命，连土布衣服都穿不上，不得不在快要倒塌的破草房里过着充满血泪的生活。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正在进一步加强侵略中国大陆的活动，同时疯狂地对我国人民进行法西斯镇压和强盗式的掠夺。

的确，今天我们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整个国土荒芜不堪，变成了黑暗世界、人间地狱。

诸位！

有压迫者的地方必然有斗争。我国的热血青年和爱国人士已经毅然奋起投入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高压政策的反日圣战。

朝鲜人民革命军为了开拓我们民族的出路，为了光复祖国，六七年来，手持武器在朝鲜和满洲的旷野上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无比的战斗。我们革命军到处消灭敌人，从政治和军事上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以沉重的打击，给怀着亡国奴的悲愤受凌辱的我们民族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我们的力量加强了，世界革命力量强大起来了，全世界进步人民对我们的斗争的支持也越来越大了。我们必将完成光复祖国的历史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在杀出血路前进的我们革命军勇士们英勇无比的活动和辉煌的战果面前惊惶失措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讨伐”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着种种疯

狂活动，最近，愚蠢地企图阻止我们革命军向国内进军，红着眼睛拼命加强国境警备线。敌人甚至玩弄荒唐的虚假的宣传把戏，说什么“完全消灭”了朝鲜人民革命军。

诸位！尽管日本鬼子如此疯狂活动，但是朝鲜人民革命军依然存在，向全世界显示着它的声威。

这次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突破日本帝国主义者吹嘘为“铜墙铁壁”的国境警备线进军到国内，几天前在茂山方面展开纵横驰骋的活动，把复仇的火焰倾泻到敌人身上，今天，又在普天堡这个地方充分显示了我们民族的不屈斗志和崇高气概。

刚才，我们革命军摧毁了警察官驻在所、面事务所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镇压机构和统治机关，消灭了盘踞在那里把种种不幸和苦役强加在你们身上的同我们民族有着血海深仇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诸位！请看那火焰——那熊熊燃烧着的火焰揭示了敌人的下场；那火焰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民族并没有死，还活着，只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行斗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那火焰将作为希望的曙光，在被虐待和饥饿中呻吟的我们民族的心里大放光芒，并将成为斗争的火种燃遍整个三千里疆土。

朝鲜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是“同祖同根”，我们不承认敌人叫嚷的“内鲜一体”。

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将更加紧握复仇的枪，一定要解放在饥饿和贫穷、无知和愚昧中挣扎的二千三百万同胞，光复祖国，并在独立了的祖国疆土上建立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人民的国家。

诸位！今天，光复祖国是朝鲜民族的生死攸关的要求。

我们大家不要光是坐在那里为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受屈辱的悲惨处境而叹息，而要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一样奋起投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光复祖国大业的圣战。只有斗争才是活路，才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道路。

你们要克服万难，竭尽一切诚意和热情，同心协力，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钱出钱，一致动员起来投入争取朝鲜独立的反日圣战。

你们要开展各种斗争，彻底粉碎吮吸我们民族的鲜血来喂肥自己的吸血鬼——朝鲜总督府的种种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你们要彻底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虚假宣传，始终保卫我国的语言文字和我们的民族精神，从而显示出朝鲜民族的不屈的气概。

我们要抱着只要有百战百胜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我国就一定能获得独立这样的坚定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并顽强地战斗下去。从而让那火焰在整个三千里疆土上熊熊燃烧起来。

同胞兄弟姐妹们！

最后胜利是属于为光复祖国而战的我们的。

让我们大家都为在光复的祖国土地上重逢，高呼独立万岁，过幸福生活的那一天而奋勇前进吧。

朝鲜独立万岁！

朝鲜独立万岁！

【美国】尼克松（1913～1994）

尼克松，1968年当选美国第三十七届总统，1974年因水门事件被弹劾罢免。本文是他1969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另一篇是1972年访华时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就职演说

德克森参议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先生、副总统先生、约翰逊总统、汉弗莱副总统、美国同胞们、全世界的公民们：

今天，在这个时刻，我要求你们和我分享这种崇高肃穆的感情。在有秩序的权力交接中，我们欢庆我们的团结一致，它使我们保有自由。

历史巨轮飞转，分分秒秒的时间都十分宝贵，也独具意义。但是有些瞬间却成为新的起点，定下其后数十年及至几个世纪的行程。

现在，由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各国领导人惧怕战争，所以在历史上第一次，时代站到了和平方面。

历史能授予的最光荣称号莫过于“和平的缔造者”了。这最高荣誉现在正召唤美国。美国有机会引导世界最终从动乱的深渊中拔足，走向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即梦寐以求的和平宽阔高地。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后子孙提到我们现在活着的人时，将会说我们驾驭了我们的时代，为人类求得了世界安全。

三分之一世纪以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曾经站在这里向全国演说，当时国家正受经济不景气困扰，陷于惶恐中。他看到国家当时的种种困难，却仍然能够说：“感谢上帝，我国的困难毕竟只在物质方面。”

今天我们的危机正相反。

我们物质丰富，却精神贫乏；我们以非凡的准确程度登上了月球，但地球上却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们卷入了战争，没有和平。我们四分五裂，没有团结。我们看到周围的人生活空虚，没有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工作需要完成，却没有人手去做。

对于精神的危机，我们需要精神的解决办法。

为了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只需省视自身。

当我们估量能够做什么时，我们只应许诺能做到的事。但在制订目标时，却要有远大的理想。

如果你的邻舍没有自由，你就不会得到完全的自由。只有共同前进才能前进。

这就是说黑人和白人共有一个国家，不是分为两个。法律是按照我们的良心制订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赋予法律条文以生命：保证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生来就有同等的尊严，在人的面前也应有同等的尊严。

我们在国内要学会团结所有人共同前进，让我们也努力求得全人类的共同前进吧。

……

短短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刚分享了人类第一次像上帝那样看到地球的光荣，我们看到了地球像一颗星一样，在黑暗中反射出光芒。

圣诞节前夕阿波罗太空飞行员飞越月球灰色的表面时，告诉我们地球是

多么美丽；由太空远处月球附近传来声音是那么清晰，我们听到他们祈求上帝赐福给地球上一切善良的人。

在尖端技术欢奏凯歌的时刻，人们想到自己的家园和人类。从太空的远处看来，地球上人类的命运是分不开的；这告诉我们，不论我们能到达宇宙的任何远处，我们的命运并不在那些星星上，而在地球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决定于我们的内心。

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望之酒，而是机会之杯。因此，让我们毫无畏惧、充满欢愉地把握住机会吧。“乘坐地球的乘客们”，让我们坚定信念，认准目标，提防危险，凭着对上帝意旨和人类诺言的信心，共同前进吧。

在访华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总理先生，今天晚上在座的诸位贵宾：

我谨代表你们的所有美国客人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的无可比拟的盛情款待。中国人民以这种盛情款待而闻名世界。我们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些盛大晚宴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为我们演奏美好音乐的人。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

总理先生，我要感谢你的非常盛情和雄辩的讲话。此时此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这样的场合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话，人们不会长久地记住，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

正如你在祝酒时讲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如果我们两国人民互相为敌，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就的确很暗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实现世界和平的机会就将无可估量地大大增加。

我希望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谈将是坦率的。本着这种坦率的精神，让我们在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样几点，过去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双方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利决定它自己政府的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在等待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呢？就我个人来讲，我想到我的大女儿，今天是她的生日。当我想到她的时候，我就想到全世界所有的儿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美洲的儿童，他们大多数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

我们将给我们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呢？他们的命运是要为那些使旧世界蒙受苦难的仇恨而死亡呢，还是由于我们有缔造一个新世界的远见而活下去呢？

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

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时候了。

本着这种精神，我请求诸位同我一起举杯，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能够导致全世界所有人民的友谊与和平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

【美国】肯尼迪（1917～1963）

约翰·肯尼迪，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1960年当选，1963年遇刺而死。这是他1961年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就职演说

我们不把今天看作是一党胜利的日子，而看作庆祝自由的佳节。它既象征结束，也象征开始；它意味着继业，又意味着更新。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上帝面前宣读的，是将近一百七十五年前我们祖先拟就的同一庄严誓词。

.....

让每一个关心我们或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国家知道，我们愿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迎接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以争取和维护自由。

我们保证做到这些，我们还要保证做得更多。

对于和我们有共同的文化与宗教渊源的旧盟国，我们保证忠实不渝。团结一致时，我们合作的多项事业将无往不利：一旦分手，我们将一事无成。因为在不和与分裂中，我们不敢应付任何强有力的挑战。

我们欢迎加入自由的行列的新国家，对于他们，我们保证决不容许以另一种更暴虐的专政去替代殖民统治。我们不能指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却总希望他们有力地维护他们自己的自由，而且希望我们能记住，过去想骑在老虎背上攫取权力的蠢人最终必葬身虎腹。

对于地球上一半仍然住在乡村的草舍茅屋、正在奋斗以挣脱悲惨处境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在任何需要的时刻尽最大努力协助他们帮助自己。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怕共产主义同我们争夺阵地，也不是为了争取他们的选票，只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如果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拯救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们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共和国，我们作特殊的保证：我们要把说好话变为做好事，为争取进步结成新的联盟，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穷的枷锁。但是这种和平革命的想望不应成为敌对大国的可乘之机。我们要让邻国知道，我们将和这些妹妹国联合起来，反对在南、北美洲任何地方发生的侵略与颠覆活动。我们要让每一个大国知道，这个半球上的人民要继续做本土上的主人。

在战争手段的发展远远超过和平手段发展的当代，我们对联合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世界组织寄予最终和最大的希望，我们重申对联合国的支持：我们要努力使联合国不单成为互相攻讦的讲坛，而成为新生和弱小国家的庇护者，使联合国的决议案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行。

最后，对于同我们敌对的国家，我们不提出保证而提出一项要求：让我们双方都开始重新寻求和平吧，不要等到由于科学昌明而发展的毁灭性邪恶力量有计划地或偶然地被触发而吞噬整个人类。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最终成败，主要不在我手中，而在你们手中。从我国建国伊始，每一代美国人都曾经被召唤为祖国忠诚服务。许许多多美国青年回答了祖国的召唤，他们的忠骨埋遍世界各地。

现在召唤我们的号角又吹响了——不是号召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需

要武器；不是号召我们奔赴战场，虽然我们已经严阵以待；这号角声召唤我们去作黎明前漫长的斗争，年复一年地“在希望中欢欣，在苦难中忍耐”；这是一场反对专制、贫穷、疾病与战争本身等人类共同敌人的战争。

我们能否在全球东、西、南、北形成一个巨大的联盟对抗这些敌人，以保证整个人类有更美满的生活呢？你们愿意参加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吗？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有幸在自由处于最危急的关头被委以捍卫自由的重任。我对这项任务当仁不让，勇于承担。我不相信有人会愿意同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的人交换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付与这事业的精力、信仰与忠诚将照耀我们的祖国和为国效劳的人，从这里发出的光芒将真正普照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请你们对国家只谈贡献，莫计报酬。

世界公民们，请你们勿问何所得于美国，但问共同为人类自由的贡献有多少。

最后，美国公民和世界公民们，请按照我们向你们所要求的力量与牺牲的高标准来要求我们。良心的平静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历史将为我们的作为做最后的裁判。让我们引导挚爱的祖国勇往直前。我们祈求上帝的祝福与帮助，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在世上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事业。

【南非】曼德拉（1918～）

曼德拉，南非总统。1962年8月，他因领导罢工运动和抵制白人种族主义者成立“南非共和国”，被南非当局逮捕，在狱中度过二十七年之久，于1990年2月获释。这是同年2月11日他出狱后发表的首次演讲。

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全人类自由的名义，向你们大家致敬。我不是作为一名预言家，而是作为你们的谦卑的公仆，作为人民的公仆，站在这里和你们面前。

你们经过不懈的奋斗和英勇牺牲，使我有可能会在今天站在这里，因此，我要把余生献给你们。

在我获得释放的今天，我要向千百万同胞，向全球各地为我的获释而作出过不懈斗争的同胞，致以亲切的和最热烈的感谢。

今天，大多数南非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已认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绝无前途。为了确保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声势浩大的决定性行动，来结束这种制度。我国各个团体和我国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和其他行动，终将导致、也只能导致民主制度的确立。

种族隔离制度给我们这片大陆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破坏。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基础遭到了摧毁。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就业。

我们的经济濒临崩溃，我们的人民卷入了政治冲突。我们在1960年采取了武装斗争方式，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战斗组织——“民族之矛”，这纯属为反抗种族隔离制度和暴力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今天，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原因依然存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希望，不久将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气氛，以便不再有必要开展武装斗争。

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忠诚的遵守纪律的一员。因此，完全赞同它所提出的目标、战略和策略。

现在需要把我国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项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独自承担起所有这些重任。作为领袖，我们的任务是向我们的组织阐明观点，并允许民主机制来决定前方的道路。

关于实行民主问题，我感到有责任强调一点：运动的领导人要由全国性会议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是一条必须坚持，毫无例外的原则。

今天，我希望能向大家通报：我同政府进行的一系列会谈，其目的一直是使我国的政治局势正常化。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斗争的基本要求。

我希望强调一下，除了坚持要求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进行会晤以外，我本人从未就我国的未来问题同政府进行过谈判。

谈判还不能开始——谈判不能凌驾于我国人民之上，不能背着人民进行。我们的信念是，我国的未来只能由一个在不分肤色的基础上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机构来决定。

要谈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问题，就必须正视我国人民的压倒一切的要求，即建立一个民主的、不分肤色的和统一的南非。白人垄断政权的状况必

须结束。

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便使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并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实现民主化。

我们的斗争已经到了决定性时刻。我们呼吁人民要抓住这个时机，以便使民主进程迅速地、不间断地得到发展。我们等待自由等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再等了。现在是在各条战线上加强斗争的时候了。

现在放松努力将铸成大错，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不会原谅这个错误。地平线上萌现的自由奇观，应该能激励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胜利才有保障。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加入我们的行列，来共同创造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也是你们的政治归宿。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行动，来孤立这个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府。

如果在目前取消对这个政府的制裁，彻底消灭种族隔离制度的进程就会有夭折的危险。我们向自由的迈进不可逆转。我们不应让畏惧挡住我们的道路。

由统一的、民主的和不分肤色的南非实行普选，是通向和平与种族和谐的唯一大道。

最后，我想回顾一下我在 1964 年受审时说过的话。这些话在当时和现在都一样千真万确。我说过：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并希望实现这个理想。但是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而死。

【埃及】萨达特（1918—1981）

萨达特，埃及前总统。民族民主党主席。他曾亲赴耶路撒冷同以色列当局会晤，打开埃以直接对话的渠道。本文系1977年11月20日在以色列国会发表的演说。任内结束了埃以历时三十年之久的战争状态，签订《埃以和约》。1978年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在以色列国会上的演说

总统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你们好。愿真主怜悯你们。

蒙真主允许，和平属于我们大家。

和平属于我们大家，属于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在以色列的。在这个充满着血淋淋的争斗、为尖锐的矛盾所困扰、不时遭受流血战争威胁的广袤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所有的人。人类制造战争，以此最终消灭自己的兄弟——人类。在人类所建树的一切的废墟上，在人类牺牲者的尸骨中间，是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真正的被征服者永远是人类——真主创造的最高之物、真主创造的人类。正如和平的圣徒甘地所说：“为了建设生活、为了崇拜真主而奔走。”

今天，我以坚定的步伐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真主的土地上的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一起来为了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崇拜真主，此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崇拜。真主的教诲和戒律是友爱、信任、纯洁与和平。

我请求所有当我在埃及人民议会向全世界宣布我的决定时以惊讶甚至张皇的心情听到这一消息的人原谅。这一异常的突然行动甚至使得有些人认为我的决定最多只不过是在世界舆论面前玩弄花招，给人们提供饭后的谈资而已，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说成是我为了掩盖发动一次新战争意图的政治策略。

我不想隐瞒你们。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的我的一名助手在那天深夜我从人民议会回到家里后同我联系，忧心忡忡地问我：假如以色列真的向你发出邀请的话，你怎么办呢？总统先生。我十分镇静地回答他：我将立即接受邀请。

我曾经公开宣布过，我将到天涯海角去，我将到以色列去，因为我想在以色列人民面前说明全部事实真相。

我请求所有对我的决定感到惊愕的人，或者对宣布决定的真实意图表示怀疑的人原谅。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设想到一个承担着最大负担。承担着中东地区战争和平问题首要责任的最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总统会作出准备到敌对的国家去的决定。我们仍然处在战争状态之中，我们大家还都在遭受着在三十年中发生的四次残酷战争所造成的苦痛，1973年10月战争牺牲者的家庭仍然生活在丧夫失子，父兄阵亡的孤苦之中。

正如以前我所宣布的那样，关于这个决定我没有同任何一个同事和兄弟——阿拉伯国家或前线国家的首脑商量过。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决定宣布以后同我进行了联系，表示反对。因为以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为一方，以色列为另一方之间的全面怀疑和全面不信任至今在所有人的心中仍然存在。长长的几个月是可以实现和平，但是在关于举行日内瓦会议的程序方面

所进行的毫无益处的分歧和讨论中白白浪费了。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全面怀疑和全面的失去信任。

但是，我要非常诚恳地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作出这个决定是经过长则间的考虑的。我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因为如果说真主决定我要对埃及人民负责，要分担有关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的责任的话，那么这种责任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办法，避免阿拉伯与埃及人民以及全体阿拉伯人民再一次遭受毁灭性的、只有真主才知道其规模的战争灾难。

在经过长时期的思考以后，我确认对真主、对人民的责任的忠诚要求我走遍天涯海角，而且要到耶路撒冷去，去向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国会成员说明我考虑已久的全部事实，然后让你们自己考虑并作出你们的决定。最后，让真主按照他的意旨为我们安排一切。

女士们，先生们：

每一个民族和人民的生活中都有这样一些时刻，所有具有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必须注意到过去的复杂状况和遗留问题，以便勇敢地向新的境界前进。

那些像我们一样肩负着同样责任的人们首先应该有勇气作出同形势的主流相一致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应该站得高一些，摆脱一切形式的偏见，摆脱心理错觉和腐朽的优势理论。最重要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无过只属于真主。如果我说我要使全体阿拉伯人民避免新的令人痛苦的战争灾难的话，那么我十分诚挚地向你们宣布，我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怀有同样的感情，负有南样的责任，对以色列人民当然也是这样。

战争的牺牲品是：人类。

在战争中灭亡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失去丈夫的妻子是应该生活在幸福家庭中的妇女，不管是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妇女。

失去父亲的照料和爱抚的儿童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无论是在阿拉伯的还是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都应该担负起为他们创造快乐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的巨大责任。

为了这一切，为了保卫我们所有孩子和兄弟的生命，

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居乐业，为了人类的发展，使他们幸福，给他们以崇高的生活权利，为了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为了降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每一个孩子的欢笑，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甘冒一切风险，我决定来到你们这儿，发表我们意见。

我曾经担负起、现在仍然担负着历史责任提出的要求。为此，从前，几年以前，确切地说是在 1971 年 2 月 4 日，我宣布我准备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和平条约。这是阿以冲突开始以来阿拉伯负责人发表的第一个公开声明。出于领导责任应有的这一切动机，我在 1973 年 10 月 16 日在埃及人民议会宣布呼吁召集一次国际会议，以便确立持久的公正的和平。

在那个时候，我无需乞求和平或要求停火。我在历史的、领导的责任应有的动机的推动下，签订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接着是在西奈的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然后，我努力敲打那些开着的、关着的大门，以寻求一条通向持久的公正和平道路。我向全世界人民敞开心怀，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动机和目标，让他们真正相信我们是正义的倡导者和和平的创造者。

在这一切动机的推动之下，我决定以坦率的思想，坦荡的胸怀、自觉的意志来到你们这里，以共同创造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的持久和平。

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是在伊斯兰最大的节日、吉祥的宰牲节、牺牲和赎罪的节日里进行的一次和平之行，这是天意。当初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祖先易卜拉欣皈依了伊斯兰教。我说，当真主命令他的时候，他就立即心甘情愿地挺身而出，这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的鼓舞，由于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的自由选择，是出于对崇高理想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一崇高理想赋予生活的深刻的意义。也许这一巧合在我们大家的心中具有一种新的含义，也许它将变成安全、宽恕与和平吉兆中的真正希望。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用没有任何隐晦曲折的直截了当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进行坦率的交谈，让我们今天坦率地交谈。包括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个珍贵的时刻，它可能成为世界这一地区——如果不是说整个世界的话——的历史进程中的根本转折点的时刻。

让我们坦率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怎样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

我带着对这重大问题的明确、坦率的答案来到你们这里，为的是让以色列人民听到它，让全世界都听到它，也是为了让所有那些我听到他们诚挚呼吁的人们听到它；他们希望最终实现千百万人对这次历史性会晤所期望的结果。

在我向你们公布我的回答以前，我希望向你们强调，我在这个明确的、坦率的回答中，根据的是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若干事实：

第一个事实：任何人的幸福都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第二个事实：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语言说话。我从来没有，也绝不会用两种政策同别人打交道。我只用一种语言、一种政策、一个面貌同任何人打交道。

第三个事实：直接对话和直截了当的路线是达到明确目标的最近也是最成功的道路。

第四个事实：建立在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基础上的持久、公正和平的主张今天已经成了全世界的主张，它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志；这种意志既反映在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官方首脑，也代表了影响制定政策、作出决定的全世界的公众舆论。

第五个事实，这也许是最突出、最明显的事实：阿拉伯民族不是从一种软弱或动摇的地位出发去为争取持久公正和平而进行活动的。恰恰相反，它拥有实力和稳定的基础。因此，它的意见出自对和平的真诚意愿，发自为了避免将要落在我们和你们以及全世界头上的一场灾难的明智理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确立公正的和平。核弹不能撼动它。怀疑不能损害它。不管是别有用心还是隐晦曲折的意图都不能动摇它。

出于我想使你们了解的我所看到的全部事实真相，我还希望诚恳地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注意可能出现在你们脑海中的某些想法。

开诚相见要求我向你们说明下列各点：

一、我到你们这里来不是为了签订埃及同以色列的单独协议。这不是埃及政策的出发点。问题不在埃及和以色列。埃及同以色列之间，或者任何一个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任何单独和平都不可能在整个这个地区建立持久

公正的和平。再说，即使在所有前线国家同以色列之间实现了和平，只要没有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永远不可能实现今天全世界迫切要求的持久公正的和平。

二、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争取局部和平，也就是说先在现阶段结束战争，而把全部问题推延到第二阶段。

这不是使我们实现持久和平的根本解决。

与此相联系，我来到你们这里不是为了签订西奈或者西奈、戈兰和西岸的第三个脱离接触协议。因为这仅仅是把点燃导火线推迟到以后某个时候而已。

而且，这还意味着面对和平我们缺乏勇气，我们不能担负持久公正和平的重担和责任。

我来到你们这里是为了共同建立持久公正的和平，避免任何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以色列人的躯体再流一滴鲜血。

为此，我宣布我准备走遍天涯海角。

这里，我再回来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我们怎样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我在这个讲坛向全世界宣布，我的意见是，回答不是不可能的，不是困难的，尽管在血的仇恨、忿怨、憎恶中，尽管在完全的隔膜和根深蒂固的敌意中经过了几代人的情况下，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回答是不困难的，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以全部诚挚、忠诚沿着正直的方针前进的话。

你们愿意同我们一起共同生活在世界的这个地区。

我十分真诚地告诉你们：我们欢迎你们平安地、宽恕地生活在我们中间。这本身就构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转折中的巨大的转折点。

是的，我们曾经拒绝过你们，当时我们有自己的理由和主张。

是的，我们曾经拒绝在任何地方同你们会见。

是的，我们曾经把你们描写为所谓的以色列。

是的，我们曾经在某些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中相会，我们的代表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同你们不相理睬。

这些都发生过，现在仍然发生着。

是的，我们曾经提出过任何会谈必须有同双方单独接触的中间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脱离接触协议的谈判。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脱离接触的谈判。

是的，我们的代表曾经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见过面，但是没有直接说过一句话。

是的，这些都发生过。

但是，今天我要对你们说，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同意同你们在持久公正的和平中生活。我们不愿意用毁灭性的火箭以及仇恨和憎恶的导弹来包围你们，也不希望你们这样来包围我们。

我曾不止一次地宣布过，以色列是一个全世界承认的既成事实，两个超级大国担负着它的安全和保卫其生存的责任。

当我们的的确确希望平时，我们就的确确欢迎你们安全地、和平地生活在我们中间。

我们同你们之间有一堵巨大的高墙，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你们一直在努力建造这堵墙。但是，它在1973年被摧毁了。这是一堵一直在燃烧、逐

步上升的心理战的墙。

这是一堵用能够把整个阿拉伯民族扫荡殆尽的力量进行威胁的墙。

这是一堵散布关于我们已经成为一具动弹不得的尸体的民族的墙；甚至你们有人说即使再过五十年，阿拉伯人也不可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一堵以能够达到任何地方、任何距离的长臂来进行威胁的墙。

这是一堵警告我们，如果我们想要行使解放我们被占领的土地的合法权利的话，就要遭致毁灭和灭亡的墙。

我们都应该承认这堵墙已经在 1973 年垮台了，摧毁了。但是还有另一堵墙。

这另一堵墙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复杂的心理障碍。

同时也造成了怀疑和疏远的障碍，对任何做法、行动和决定都产生担心受骗上当和错觉的障碍，对每一件事情或每一次谈话都作出错误的小心翼翼的解释的障碍。

这一心理障碍，就是我在历次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问题的百分之七十都是由它造成的。

今天，在我对你们的访问中，我要问你们：为什么我们不诚恳地、坚定地、坦率地伸出我们的双手来一起摧毁这一障碍呢？

为什么不能以诚恳、信任和忠实的态度使我们的愿望一致起来，以便共同消除一切恐惧的疑虑、背信弃义、隐晦曲折和隐瞒真实意图的现象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男子汉的英雄气概、以那些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一个最崇高目标的英雄们的胆略一起采取行动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这种勇气和胆略一起采取行动，以便建造一座受到保护而不受到威胁的和平大厦，为我们的子孙后代放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芒，使他们朝着建设、发展和人类尊严的方向前进呢？

为什么我们要为这些后代留下流血、杀害生灵、制造孤儿寡妇、毁灭家庭、使牺牲者辗转呻吟的后果呢？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哲人苏莱曼·哈基姆格言所引证的造物者的睿智呢？格言说：

“求恶之心多欺诈，倡导和平有欢乐。”

“和平中的一口粗茶淡饭，胜于敌对中的满屋佳肴珍馐。”

为什么我们不能吟诵旧约中大卫先知的雅歌呢？雅歌说：

“主啊，我向你呼喊，如果我向你求助，请听取我恳切的声音。我把手举到你圣所的正位，不要把我同坏人、同为非作歹者、同那些对朋友口蜜腹剑的人拉在一起。你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行为的丑恶，给他们以报应吧！我要求平安，我为它而努力。”先生们：

我向你们实说，只要和平不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就绝不会有名副其实的和平。和平不能建立在占领别国领土的基础之上。

你们要为自己求得你们反对别人得到的东西是不容易的。

我要非常坦率地、以促使我今天来到你们这里的那种精神向你们说，你们应该彻底放弃侵略的梦想，并且放弃那种以为武力是同阿拉伯人打交道的最好办法的想法。

你们应该很好地记取我们彼此对阵的教训，扩张不会对你们有任何好处。

我们要明确地说明，我们的土地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是不容置辩的。国

家和民族的土地在我们看来就如神圣谷地——图瓦一般，正如真主在那里对穆萨——愿他平安——所说：“我们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同意放弃自己的一寸土地，或接受对此进行争论和讨价还价的原则。”

我还应该对你们说：今天我们面前有一个和平的很好时机。如果我们在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真正采取严肃的态度的话，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良机。

如果我们丢掉了或者浪费了这个机会，那么搞阴谋破坏的人将要遭到人类和历史的诅咒。

对以色列来说，什么是和平呢？这就是同它的阿拉伯邻居一起在这个地区安全、平静地生活。

这是我所信仰的逻辑。

以色列不受任何侵犯地安全地生活在它的边界之内。

这是我所赞同的逻辑。

以色列得到确保这两项事实的各种保证。

这是我所赞同的要求。

而且我们还要宣布，我们接受你们设想的、由你们认为满意的人所提供的国际保证。

我们宣布，我们接受你们希望的由两个超级大国、或者其中之一、或者五个大国、或者其中某些国家的一切保证。

我再一次明确宣布，我们接受你们认为满意的任何保证，因为我们将相应地得到同样的保证。

简而言之，当我们问：对以色列来说，什么是和平呢？回答是：以色列安全地、平安地、在它所愿意的、另一方也将得到的保证范围内，在其边界内同阿拉伯邻居一起生活。

但是，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我们怎样达到这一结果，并由此实现持久、公正的和平呢？这里有一些我们必须以全部的勇气和明朗的态度去面对的事实。

阿拉伯的土地被以色列用武装力量占领了，现在还占领着，而我们坚持实现从这些土地，其中包括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在内的全面撤出；耶路撒冷，我把它当作一个和平之城来到了这里。

这个城市过去是、将来永远是三个宗教教徒共处的生动体现。

任何人想用吞并、扩张的办法谋取在圣城中的特殊地位都是不能接受的。它应该是向一切信徒开放的自由之城。

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城市不应同几个世纪以来把它当作定居之地的人们分开。为了避免唤起十字军战争的仇恨，我们应该保卫欧默尔·本·哈塔布和萨拉丁的精神，也就是谅解和尊重权利的精神。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礼拜的大殿不仅仅是履行宗教圣职和仪式的地方，而且它还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政治、精神和思想上从未间断过的存在的可靠见证。

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要在估计我们基督教徒、穆斯林对耶路撒冷所怀有的崇敬心情方面犯错误。

让我毫不犹豫地对你们说，我来到你们中间，来到这个圆顶大厅不是为了恳求你们从被占领的土地上撤退。从1967年后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全面撤退是不容争辩的明显的事，任何人都不要对此抱什么幻想，或者对别人抱这种幻想。

在你们用武装力量占领着阿拉伯土地的时候，任何关于持久、公正和平的言论，任何保证我们平安、安全地一起生活在世界这一地区的步骤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占领别人的土地的情况下，不能建立和平。

是的。

如果为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子孙万代建立持久、公正和平的愿望很纯正、斗争很真诚，那么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容置辩和讨论的事实。

至于巴勒斯坦问题，那么没有人能否认这是整个问题的实质。今天全世界没有人能同意在以色列高喊的口号：这些口号否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存在，甚至问这个人民在哪里呢？！

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今天不再是任何人可以无视或否认的，而且任何人都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无视或否认的问题。这是一个西方和东方国际社会都已接受的现实。这一现实在一些国际文件和官方声明中得到了肯定、支持和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对一日夜都可以听到其反映的问题充耳不闻，或者对这一历史事实闭目不见，甚至担负着保卫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最高义务的，过去曾经、现在仍正在向以色列提供道义、物质和军事援助的你们的头号盟友美国也不能采取这种态度。

我说，就连美国也已经选择正视事实和现实的态度，它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问题是斗争的中心和实质；只要这个问题继续悬而不决，争执就将不断加剧和升级，达到新的程度。我十分坦率地对你们说，没有巴勒斯坦人，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天视这一问题，或者把它抛在一边，是一个无可估量的巨大错误。

我不想离开本题去引述从贝尔福宣言发表六十年来的过去了的种种事件。你们对那些事实都很清楚。如果你们找到了在完全不属于你们所有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上的、道义上的理由的话，你们就应该懂得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家园重建国家的决心。

当有一些顽固分子和极端分子要求巴勒斯坦人民放弃这一最崇高的目标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要求放弃他们的意愿和他们对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向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以实现和保证和平的以色列声音致敬。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对你们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承认他们建立国家和返回家园的权利是无益的。

我们阿拉伯人从前在对待你们，在对待以色列存在的事实上，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冲突把我们从一个战争带到另一个战争，从牺牲带到更大的牺牲，致使我们今天——我们和你们——达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渊和一场恐怖灾难的边缘，如果我们今天不一起利用这一持久、公正和平的机会的话。

你们应该同我一样勇敢地面对现实。

对问题采取逃避或无视的态度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在全世界一致呼吁尊重权利和现实的情况下，企图制造某些使全世界都不屑一顾的虚幻形势来确立某种和平是不可能的。

没有必要把巴勒斯坦权利问题带入死胡同。制造障碍除了延误和平进程，或扼杀和平以外，没有任何作用。

正如我对你们说过的那样，任何人不可能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获得幸福。进行直接会晤和执行径行直遂的路线是达到明确的目标的最简捷、最成功的道路。正视巴勒斯坦问题，为了持久、公正的和平，惟一的解决办法就

是建立他们的国家。

有了你们所要求的一切国际保证，就不必害怕一个新生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建立需要来自世界各国的援助。当和平之钟敲响的时候，就没有人去敲战鼓。即使有，也听不到它的声音，

你们同我一起来设想一个日内瓦和平协定吧，我们将以它向渴望和平的世界报喜。和平协定建立在：

一、结束以色列对 1967 年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的占领。

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包括有权建立自己国家在内的民族自决权。

三、本地区各国有权和平地生活在安全的有保证的边界之内途径是采取与实现国际边界安全相一致的措施，同时提供适当的国际保证。

四、本地区各国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不诉之于武力，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五、结束本地区的战争状态。

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不是在几行官样文章上签个字，而是重新撰写历史。

和平不是为维护某种贪欲或掩盖某种野心的宣传竞赛。和平在本质上是反对一切野心和贪欲的重大斗争。

古今历史经验也许能告诉我们大家：火箭、炮舰和核武器不能建立安宁，恰恰相反，它将破坏安宁所建树的一切。

我们应该：

为了我们各国人民，为了人类所创建的文明，保卫各地的人们不受武力的控制。

我们应该以提高人类地位的道德观念和原则的全部力量，提高人道主义的威力。

如果你们允许我在这个讲台上向以色列人民发出我的呼吁的话，那么我要向以色列的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发表诚恳的、忠诚的讲话：我从祝福争取和平的神圣使命的埃及人民那里给你们带来了使命。

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的使命——埃及人民的使命；埃及人民不懂得偏见，它正以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的每个人都具有的友爱、友好、谅解的精神生活着。

这就是埃及；它的人民要我忠实地肩负起神圣的使命，安全、平安、和平的使命。

以色列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鼓励你们的领导为和平而斗争，让他们把力量集中到建造和平大厦上来，而不要以毁灭性的火箭建造碉堡和坚固的掩体。

为全世界提供世界这一地区的新人的形象吧！并使之成为现代人类、在各地的和平人类的榜样。

告诉你们的孩子们，最后一次战争、痛苦的最后阶段已经过去，新生活的新起点已经来到；这是友爱、幸福、自由、和平的生活。

失去儿子的母亲，
失去丈夫的妻子，
失去父兄的孩子，
一切战争的牺牲者，

你们要对和平满怀希望，要使歌曲成为活生生的富有成果的现实，要使希望成为工作和斗争的准则。各国人民的意志就是真主的意志。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来到这个地方以前，在我在阿克索清真寺进行节日礼拜时，在我访问复活教堂的时候，我以赤诚的心向至高无上的真主提出祈求，祈求他给我力量，祈求他实现我的坚定信念：这次访问将达到为了幸福的现在和更加幸福的明天我所期望的目的。

我已经决定跳出一切交战国所通行的先例和传统。尽管阿拉伯土地还在被占领之中，尽管我宣布准备来到以色列一事是使许多人感情上受到震动和思想上感到茫然的非常之举，甚至有些人怀疑这一举动的意图，尽管如此，我还是以纯洁的信仰，以完全忠实地表达我的人民意志和愿望的感情作出了这一决定，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甚至是很多人认为非常艰难的道路。

我决定坦率地、光明磊落地来到你们这里。

我决定给全世界为争取和平所作出的努力以这样一个推动力。我决定在你们的家里向你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和倾向的真相。

我不是为了故作姿态。

我不是为了赢得一个回合，现代历史上最严峻的回合和战斗。

这是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战斗。

这不仅是我的战斗，也不仅是以色列领导者们的战斗。

这是生活在我们土地上的、有权生活在和平之中的全体人民的战斗。这场战斗对蕴藏在千百万人心中天良和责任感来说是必要的。

当我提出这一主要行动时，很多人问到我关于这次访问可能达到的结果的设想和对这次访问的期望。

作为对询问者的答复，我要向你们宣布，我并不是从在访问期间可能实现的结果作为出发点来考虑进行这一倡议的。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转达一项使命。我作到了这点没有？真主啊，你可以作证。

真主啊！我要重复先知扎克利亚的一句话：“你们热爱正义和和平吧！”

我引用珍贵的睿智的古兰经中的一段话，它说：“你说相信真主吧，相信真主对我们的启示吧，相信他对易卜拉欣、伊斯梅尔、伊斯哈克、雅各布和对犹太部族的启示吧！相信穆萨、耶稣和先知们从他们的真主那里得到的启示吧！我们不歧视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我们是信仰真主的穆斯林。”

“伟大的真主是至诚的”。

祝你们和平！

【美国】杨振宁（1922—）

杨振宁，美籍华人，现代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对祖国科技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工作。

读书教学四十年

启 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四十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六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像片一是我十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照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像片三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人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五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五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五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中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像片四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三十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照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帝，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

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教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像片五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像片六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像片三十一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四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力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像片十一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四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像片十二是一些教室。像片十三是大学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教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已经 80 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 80 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 1941 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 ReViews of M0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带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做 M0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二十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像片四十七是吴先生和我 1982 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今年 1 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 71 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 1942 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四十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1944 年至 1945 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 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三个月，等到了 U.S.S.General SteWart 上的空位。这种船叫 Lib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四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 60 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Einstein）、费密（Fermi）和狄拉克（Dirac）。他们都是 20 世纪的大物理学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单但深入的想法，用算学方式表示出来。他们的文章是单刀直入，正中要害的。我比较不能欣赏海森堡（Hdsenberg）的风格。海森堡是 20 世纪的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引起我的共鸣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曾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1945 年 11 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花了两天买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密。费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的人。因为这是战时工作，所以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密“失踪”了。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密教授什么时候上课。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费密的人。

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教师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那时正在美国访问。张先生告诉我，费密打仗期间曾在洛斯阿拉谟斯（LosAlamos），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到芝加哥去当教授。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我跟费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Tellr）教授。大家知道，他后来被称为“氢气弹之父”。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是对的，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根深的印象。

刚才我和大家提过，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发，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经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一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

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冈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冈，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 40 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十八至二十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十八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 1948 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1949 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1947 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拥挤。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

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二十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则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 date 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么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防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中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十七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Benjamin Lee）。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七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的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七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情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二十六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七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 顾

去年九月我 60 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教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十七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十七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美国】卡特（1924～）

卡特，民主党人，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任年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 1977 年 1 月 20 日就职时发表的演讲。

美国的理想

我谨代表我个人和我们的国家，向前任总统为医治我们国家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

值此公开的和有形的庆典之际，我们再次证明了我们国家内在的和无形的精神力量。

诚如我的高中教师朱莉娅·科尔曼女士经常说的：“我们必须适应变化中的时代、而又依然坚持恒定不变的原则。”

我的面前是一本 1789 年我国首任总统就职时使用过的《圣经》，我刚才宣誓就职用的是几年前母亲给我的那本《圣经》，这本《圣经》打开的地方写着古代先知弥迦留下的一则永恒的训诫：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新精神

今天的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标志着我们政府的新的决心以及我们大家的一种新精神。一位总统可以领悟并宣布这一新精神，但是，只有一个民族才能赋予这种精神。

两个世纪以前，我们国家的诞生是长期寻求自由的一个里程碑。但是，这个激励立国先贤们的勇敢而光辉的理想依然有待于完成。今天我无意提出新的理想，而是要在原有的理想中提出一种新的信念。

我们的社会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依据精神价值和人类自由来公开阐明自己的社会。正是这种独特的自我定义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号召力——但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一种特殊的义务——道德义务，这种义务一旦承担起来，似乎总是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

你们已给予我一项重大责任——同你们并肩站在一起，不负众望，使大家成为适得其所的人。让我们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团结和信任的国家精神。你们的力量能弥补我的弱点，你们的智慧能帮助我尽量少犯错误。

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欢笑、一起工作、一起祈祷，我深信站在正义这边的我们终将共同获胜。

美国的理想持久不衰。我们必须再次对我们的国家和对我们彼此充满信心。我相信美国能变得更美好。我们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强大。

让我们检讨最近犯的过错，以便使我们对我国的基本原则重新承担起义务，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轻视自己的政府，我们就没有任何前途。我们记得，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时期有过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团结；在那个时候，我们取得了无数珍贵的成就。但是，我们不能陶醉于昔日的荣耀。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们不要那种失败的、碌碌无为的，或者使任何人过着一种低质量生活的远景。

我们的政府既要称职，又要富于同情心。

我们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个人自由，我们现在正在为促进机会均等而斗争。我们为维护人权所作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我们的法律必须是公正的，我们天赋的美德必须保存；强者绝不可以欺凌弱者，人的尊严必须提高。

我们懂得，“更多”未必就是“更好”，即便我们伟大的国家也有公认的局限性，我们既回答不了所有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我们在面对未来时，也不能缺乏勇气。因此，让我们一起怀着为了共同利益而作出个人牺牲的精神，务必尽力而为之。

做他人的榜样

我们的国家只有自强，才能对外称强，我们还懂得，要增进其他国家的自由，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里证实我们的民主制度是值得仿效的。

为要对自己真诚，我们必须对别人真诚。我们不会到别国领土去违犯我们国内奉行的规范与准则，因为，我们懂得，我们国家所赢得的信任，对加强我国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世界本身正受着一种新的精神支配。那些人数较多、在政治上日益觉醒的民族，正渴望并要求在阳光下拥有一席之地——不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是为了获得基本的人权。

人们对自由的热望正在高涨。为了发扬这种新精神，美国在这个新开始的日子里所要从事的崇高而雄心勃勃的使命，莫过于帮助塑造一个公正、和平、又真正合乎人道主义的世界。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要保持无比坚强的力量，这种力量无需在战争中加以证实——这种悄然无声的力量不仅仅是建立在武器库规模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崇高思想的基础之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毫不松懈，我们要向贫困、无知和非正义开战，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光荣地聚集我们的力量来战斗。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怀有无限自豪的理想主义国家，但是我们不允许别人把我们的理想主义误认为是软弱。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对其他地方的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的道德观使我们明显地偏爱那些同我们一样尊重个人人权的社

军备竞赛

这个世界依然有人从事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目的是确保与潜在的对手继续维持均势。我们保证以毅力与智慧，努力使世界的军备局限于各个国家确保其安全所需的范围。此外，今天，我们还将向我们的最终目标——在地球上销毁一切核武器——迈出一步。

我们迫切要求各国人民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此举的成功意味着生存而不是死亡。

在我们合众国人民之中，显然存在一种认真而坚定地恢复信心的倾向，我同大家一样希望，在我担任总统届满时，人们会这样论及我们的国家：

我们记得弥迦的话，我们重新寻求谦卑、怜悯和公义；
我们已经把不同种族、不同地区和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隔开的障碍拆除，我们以尊重多样化的方式使缺乏信任的地方建立起团结；
我们已经为能够从事工作的人们找到了工作；
我们已经巩固了美国的家庭，这是我们的社会基础；
我们已经确保尊重法律，无论弱者还是强者，富人还是穷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们已使人民重新对自己的政府感到骄傲。

我希望世界各国都会这样说：我们不是在武器之上而是在反映我们最珍视的价值观的国际政策之上，建立起持久的和平。

这些不仅仅是找个人的目标。它们也将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对我国持续不断的道德力量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们从未减弱的、不断发展的美国理想的一种肯定。

【美国】布什（1924～）

布什，共和党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任内在内政和外交上作了一定的努力。在对待海湾战争态度上比较强硬。本文是1991年1月16日在白宫向全国发表的广播电视演讲。

沙漠风暴行动计划已经开始

就在两小时之前，联合空军部队开始对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的军事目标发起进攻。在我讲话的此刻，进攻仍在继续。地面部队还没有投入。

这一冲突在去年8月2日伊拉克的独裁者侵入一个弱小无援的邻邦就开始了。科威特——一个阿拉伯联盟成员国和联合国成员国——遭到了践踏；她的人民受到了残酷的对待。五个月以前，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发动了这场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今夜，（侵略与反侵略的）遭遇战已经打响。

这次军事行动是遵循联合国决议——也证得了美国国会的允诺而采取的，是几个月来联合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所进行的经常而实际上是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的必然结局。阿拉伯领导人所寻求的阿拉伯人的解决办法愈加清楚——最终的结论只是萨达姆·侯赛因不愿意撤离科威特。其他到巴格达的人也做过各种努力，试图恢复和平和正义。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日内瓦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谈——结果完全遭到了拒绝。上一周末，联合国秘书长心怀和平的渴望，前往中东，孤注一掷——开始他第二次这样的使命。然而，他从巴格达返回却根本未能在敦促萨达姆·侯赛因从科威特撤军方面取得丝毫进展。

现在，在海湾地区拥有部队的二十八个国家为了谋求和平解决已经竭尽全力、仁至义尽了，除了诉诸武力将萨达姆·侯赛因驱出科威特之外，别无选择。我们绝不会失败。

在我对诸位讲话的此时此刻，对伊拉克境内军事目标的空中进攻也正在进行。我们决心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的核炸弹潜在力量，我们也将摧毁他的化学武器装备。萨达姆大量的大炮和坦克将被摧毁，我们的行动计划是通过破坏萨达姆庞大的军火库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所有联合部队的军事力量。来自沙漠风暴联合部队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的初步报告说，我们的行动正按预定计划进行。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必须撤离科威特。科威特合法政府必须恢复其合法地位，科威特应重获自由。伊拉克最后遵守联合国全部有关决议。而且，当和平重新来临，伴随着海湾的安全和稳定得到增强，我们从而也希望伊拉克将作为国际大家庭中和平合作的一员而存在。

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采取行动？怎么不等一等？答案很清楚。全世界不能再等了。对伊拉克的制裁尽管产生了些微影响，但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能达到目的。制裁尝试进行了五个多月，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终于明白了单纯的制裁不可能迫使萨达姆撤出科威特。

当全世界等待之时，萨达姆·侯赛因有条不紊地洗劫、掠夺、劫掠了一个小小的国家，而他自己却没有受到一点威胁。他使科威特人民遭受到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暴行——这样被残害被屠戮的人之中，有的是天真无辜的孩童。

当世界等待之时，萨达姆企图为他现在拥有的化学武器库增加一种具有更大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核武器。

还是当世界等待之时，当世界谈论和平和撤军之时，萨达姆·侯赛因深沟高垒，并将大批军队移入科威特。

当世界等待之时，当萨达姆拖延之时，对第三世界脆弱的经济和东欧正在形成的民主政治，对包括我们自己的经济在内的整个世界，都正在造成更大的损害。

和联合国一道，美国竭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想使这一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可是萨达姆清楚地觉得，通过拖延、威胁和公然反抗联合国，他会削弱一起反对他的军事力量。

当世界等待之时，萨达姆以公开的轻蔑来对待各种主动的和平倡议。当世界祈祷和平之时，萨达姆已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我本来希望，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论辩中，当美国国会采取果断行为的时候，萨达姆会明白，他不可能胜利，从而根据联合国决议撤军科威特。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仍不让步，仍相信时机掌握在他手里。

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萨达姆要遵奉联合国的意旨，主动撤离科威特还是被驱出科威特。萨达姆傲慢地拒绝了所有的警告。相反，他却试图在美伊之间制造这样一场争端。

好了，他失败了。今晚，来自欧洲和亚洲、非洲还有阿拉伯联盟等五大洲的二十八个国家在海湾地区拥有齐心协力对付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力量。这些国家曾希望避免使用武力。令人遗憾得很，我们现在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迫使他撤离。

在命令军队投入战斗之前，我指示我们部队的指挥员要采取各种必要步骤，尽可能快地取得胜利，并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人和联合部队的士兵和妇女。以前我曾告诉美国人民，这不会是又一个越南战场。今夜在这里我再一次重申这一看法，我们的部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最大可能的支持，他们不必同背后其它掣肘的力量进行战斗。

我希望这场战斗不会持续太久，伤亡也将控制到绝对的最低限度。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过去的这一年，我们已经为结束这漫长的冲突的时代和冷酷无情的战争取得了很大进展。在我们的前面，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将来的子孙后代，我们有机会建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一个有法律准则而不是一堆混乱不堪的法律来支配国家行为的世界。

在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就有了真正的天赐良机来建立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可以信赖的联合国能够利用其保持和平的身份来履行联合国发起人的许诺和预见。

我们同伊拉克的人民并无争论——真的，为了这些天真无辜之人陷入了这场冲突，我祈祷他们平安。

我们的目标不是征服伊拉克，而是解放科威特。我希望伊拉克人民即使现在也可以想方设法说服他们的独裁者必须放下武器，撤离科威特，让伊拉克自己重建这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大家庭。

托马斯·佩恩在很多年前写道：“这是拷问人们灵魂的时代。”这些众所周知的言辞今天还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即使当联合部队的飞机进击伊拉克之时，我也宁愿想到和平而不是战争。我确信，我们不仅会胜利，而且，因为战争我们还将认识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抗一个联合起来的世界，也绝

不允许任何国家蛮横粗暴地袭击它的邻邦。

任何一位总统都不会轻松地将我们的儿女们交给战争，他们是民族的精英。我们的部队完全是一支志愿军——训练有素，斗志昂扬。部队士兵都清楚他们何以来到这里。听听他们说的话，因为他们说的比任何总统和首相说过的都好。

听一听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好莱坞”·哈德莱斯顿的话吧。他说：“让我们解放了这些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家，再次自由了。”他说得对。萨达姆的追随者们对无辜的科威特人民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和所造成的苦痛是对全人类的侮辱，也是对一切自由的挑战。

听一听前线四位伟大军官之一的海军陆战队中将瓦尔特·布默的话吧。他说：“这是值得为之奋战的。一个对残暴和无法无天不加制止的世界不是我们想要居住的世界。”

听一听第二十八空军军士长J·P·肯德尔是怎么说的：“我们在这儿是为着比一加仑汽油价格更重要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要勾画下一个世纪这个世界的远景。现在就同萨达姆这家伙打交道比五年以后再打交道要好。”

最后，陆军中尉杰姬·琼斯的话，我们都应该正襟危坐来听一听，她说：“如果这一次我们让他侥幸逃脱，谁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呢？”

我曾经要求“好莱坞”、瓦尔特、J·P·和杰姬以及所有他们那些服役的勇敢的伙伴们去做该做的事情。今天晚上，美国和全世界都深深地感谢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让我对今晚的每一位听众和观众说：当我们派去参战的部队完成任务时，我一定尽可能快地让他们回国。

今晚，当我们的军队作战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家都在祈祷，上帝保佑每个人，保佑他们全体，也保佑站在我们一边的海湾联合部队——上帝会继续保佑我们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

【古巴】卡斯特罗（1926～ ）

卡斯特罗，古巴共产党总书记。1953年7月26日，他率部队攻打蒙卡达兵营遇挫入狱。这是他在法庭上辩词的开头与结尾部分。时间为1953年10月10日。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诸位法官先生：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辩护律师得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被告遭到过这么多的严重的非法待遇。在本案中，辩护律师和被告是同一个人。我作为辩护律师，连看一下起诉书也没有可能；作为被告，我被关闭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已经有七十六天，这是违反一切人道的和法律的规定的。

讲话人绝对厌恶幼稚的自负，没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于夸夸其谈和做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不得不在这个法庭上自己担任自己的辩护人，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我的受辩护权；第二，是因为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见祖国受到那样深重的灾难、正义遭到那些践踏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场合呕心沥血讲出凝结着真理的话来。

并非没有慷慨的朋友愿意为我作辩护。哈瓦那律师公会为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干有勇气的律师：豪尔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本城律师公会的主席。但是他却不能执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来探望我，都被拒于监狱门外。只是经过一个半月之后，由于法庭的干预，才允许他当着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军曹的面会见我十分钟。按常理说，一个律师是应该和他的当事人单独交谈的，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权利，只有这里是例外。在这里一个当了战俘的古巴人落到了铁石心肠的专制当局手中，他们是不讲什么法理人情的。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对于我们准备在出庭时用的辩护策略进行这种卑污的刺探。难道他们想预先知道我们用什么方法粉碎他们就蒙卡达兵营事件挖空心思捏造的无稽谎言，用什么方法揭露他们所竭力掩盖的可怕的真相吗？于是，当时我们就决定由我运用我的律师资格，自作辩护。

军事情报局的军曹听到了这个决定，报告了他的上级，这引起了异常的恐惧，就好像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妖怪捉弄他们，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一切计划都要破产了。诸位法官先生，他们为了把被告自我辩护这样一个在古巴有着悠久传统的神圣权利也给我剥夺掉，而施加了多少压力，你们是最清楚不过了。法庭不能向这种企图让步，因为这等于陷被告于毫无保障的境地。被告现在行使这项权利，该说的就说，绝不因任何理由而有所保留。我认为首先有必要说明对我实行野蛮的隔离的理由是什么，不让我讲话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如法庭所知，要阴谋杀害我：有哪些严重的事件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在本案中发生的一切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奥妙何在。这就是我准备清楚地表白的一切。

……

我认为我已充分地论证了我的观点：我的理由要比检察官先生用来要求判我二十六年徒刑的理由要多。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助于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人们，没有一个理由是有利于无情地压迫、践踏和掠夺人民的人。

因此我不得不讲出许多理由，而他一个也讲不出。巴蒂斯塔是违反人民的意志、用叛变和暴力破坏了共和国的法律而上台的，怎样能使他的当权合法化呢？怎样能把一个压迫人民和沾满血迹和耻辱的政权叫做合法的呢？怎样能把一个充斥着社会上最守旧的人、最落后的思想和最落后的官僚制度的政府叫作革命的呢？又怎样能认为，肩负着保卫我国宪法的使命的法院最大的不忠诚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呢？凭什么权利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公民送进监狱呢？这在全国人民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照真正的正义原则说来，都是骇人听闻的事。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比其他一切理由都更为有力：我们是古巴人，作为古巴人就有一个义务，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犯罪，就是背叛。我们为祖国的历史而骄傲；我们在小学校里就学习了祖国历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听人们谈论着自由、正义和权利。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从小敬仰我们的英雄和烈士的光荣榜样。塞斯佩德斯、阿格拉蒙特、马塞奥、戈麦斯和马蒂都是我们自幼就熟悉的名字。我们敬聆过泰坦的话：自由不能祈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我们知道，我们的先驱者为了教育自由祖国的公民，在他的《黄金书》中说，“凡是甘心服从不正确的法律并允许什么人践踏他的祖国的，凡是这样辜负祖国的，都不是正直的人……在世界上必然有一定数量的荣誉，正像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光明一样。只要有小人，就一定有另外一些肩负众人的荣誉的君子。就是这些人奋起用暴力反对那些夺取人民的自由、也就是夺取人们的荣誉的人。这些人代表成千上万的人，代表全民族，代表人类的尊严。”……人们教导我们，10月10日和2月24日是光荣的、举国欢腾的日子，因为这是古巴人奋起打碎臭名昭著的暴政的桎梏的日子；人们教导我们热爱和保护美丽的独星旗并且每天晚上唱国歌，这个曲子告诉我们，生活在枷锁下等于在羞辱中生活，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我们学会了这一切并且永不会忘记，尽管今天，在我们祖国的人们由于要实践从摇篮中起就教导给我们的思想而遭到杀戮和监禁。我们出生在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的自由国家。我们不会同意作任何人的奴隶，除非我们的国土沉入海底。在我们的先驱者百年诞辰的今年对他的崇敬好像要消逝了，对他的怀念好像要永远磨灭了，多么可耻！但是他还活着，没有死去，他的人民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他的人民是高尚的，他的人民忠于对他的怀念！有些古巴人为保卫他的主张倒下去了，有些青年为了让他继续活在祖国的心中，甘心情愿地死在他的墓旁，贡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古巴啊！假使你背叛了你的先驱者，你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啊！

我要结束我的辩护词了，但是我不像一般的律师通常所作的那样，要求给被告以自由：当我的同伴们已经在松树岛遭受可恶的监禁，我不能要求自由。你们让我去和他们一起共命运吧！在一个罪犯和强盗当总统的共和国里，正直的人们被杀害和坐牢是可以理解的。

我衷心感谢诸位法官先生允许我自由讲话而不卑鄙地打断我。我对你们不怀仇怨，我承认在某些方面你们是人道的，我也知道本法庭庭长这个一生清白的人，他可能迫于现状不能不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但他对这种现状的厌恶是不能掩饰的。法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有待处理，这就是谋害七十个人的案件——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屠杀案。凶手到现在还手执武器逍遥法外，这是对公民们的生命的经常威胁。如果由于怯懦，由于受到阻碍而不对他们施以法律制裁，同时法官们也不全体辞职，我为你们的荣誉感到惋惜，

也为玷污司法制度的空前的污点感到痛心。

至于我自己，我知道我在狱中将同任何人一样备受折磨，狱中的生活充满着卑怯的威胁和残暴的拷打，但是我不怕，就像我不怕夺去了我七十个兄弟的生命的可鄙的暴君的狂怒一样。

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美国】马丁·路德·金（1929～1968）

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本文是他在林肯纪念堂前所作的演讲。时间为1963年8月28日。

我有一个梦

我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示威游行。它必将作为美国有史以来为争取自由所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游行而名垂青史。

一百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我们现在正站立在他的灵魂的安息处——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这条重要法令的颁发，在一直忍受着不义与暴虐的火焰烧灼的千百万黑人奴隶的心中，竖起一座光明与希望的灯塔。《宣言》似令人欢愉的黎明，即将结束种族奴役的漫漫长夜。

但从那时至今，已经有一百年历史了，可黑人仍无自由可言。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的生活仍旧悲惨地为隔离的桎梏和歧视的锁链所捆绑。一百年后的今天，在浩瀚的物质财富海洋之中，黑人仍旧在贫困的孤岛上生活。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旧在美国社会的一隅受苦受难，并且发现自己竟然是自己所在国土上的流放者。因此，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把这种不体面的身份戏剧性地表演一下。

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是来首都兑现期票的。当我们共和国的“建筑师”们撰写《宪法》和《独立宣言》中富丽堂皇的篇章时，他们是在签写一张“期票”，每个美国人都是这张期票的合法继承人。这张期票是一项允诺，即所有的美国人——非但白人，还有黑人都保证拥有不容剥夺的生活的权利、享受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但是现在，很显然，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却一直拒付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担如期兑现这张期票的神圣义务。黑人满怀期望地得到的是一张空头期票，这张期票被签上“资金不足”的字样。然而我们绝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绝不相信，在美国，储存机遇的巨大金库竟会“资金不足”！

听以，我们来兑现这张期票来了，来兑现一张将给予我们堪称最高财富——自由和正义的保障的——期票。

我们来到这个尊为神圣的地点，其又一目的是提醒美国政府，现在是最为紧迫的时刻。现在既不是享用缓和激动情绪的奢侈品的时刻，也不是服用渐进主义麻醉剂的时刻。现在是从黑暗荒凉的深渊中崛起，向阳光普照的种族平等的道路奋进的时刻。现在是把我们的国家从种族歧视的流沙中拯救出来，重建在兄弟情谊般的坚石之上的时刻。现在是为上帝的子孙实现平等的时刻！

如果再继续无视时机的紧迫，就将导致我们国家的不幸。不实现自由与平等，黑人的完全合法的不满情绪就不会平息；令人心旷神怡的金秋就不会降临；炎炎酷暑就不会消逝。1963年不是尾声，仅是序曲。

如果美国政府继续一意孤行，就会使那些幻想黑人只要发泄一下不满情绪就会满足的人猛醒。在未授予黑人以公民权之前，美国既不会安宁，也不会平静。反叛的飓风将会不断地撼动这个国家的根基，直到迎来光辉灿烂的正义的黎明。

可是我必须对站在通往正义之宫的温暖入口处的人们进一言，我们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进程中，决不能轻举妄动。我们决不能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就啜饮敌意和仇恨。我们必须永远在自尊和教规的最高水平上继续我们的抗争。我们必须不断地升华到用精神的力量来迎接暴力的高尚顶峰。

已经吞没了黑人共同体的新的敌对状态令人不解，但它决不应该导致我们对所有白人的不信任——因为有许多白人兄弟参加了今天这个集会。这就告诉我们，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命运与我们自由是休戚相关的。

我们不能独自前进，而当我们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宣誓永远向前，义无反顾。有些人向我们这些热衷于获得公民权的人发问：你们何时才会满足？答案是明确的：只要黑人还是警察的骇人听闻的恐怖手段和野蛮行为的牺牲品，我们是不会满足的。只要我们因旅途劳顿而疲惫不堪，想在路旁的游客旅馆里歇息，或在市内的旅馆投宿却不被允许，我们就不会满足的。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局限于从一个较小的黑人区到一个稍大的黑人区，我们就不会满足的。只要我们的孩子还是被标写着“只限白人”的牌匾剥夺人格和自尊，我们就不会满足的。只要密西西比的黑人不能参加选举，而纽约黑人的选票还无实际意义，我们就不会满足的。不会的，不会的！除非平等泻如飞瀑，除非正义涌入湍流，我们是不会满足的。

我并非没有留意到，你们之中有些人是从巨大的痛苦与磨难中来到这里的。有些人来自狭小的牢房，还有些人来自那对自由的要求竟会招致迫害的风暴接二连三的打击，竟会招致警察兽行般地反复摧残的地区。而你们却一直富于创造性地、坚韧地忍耐着。那么，就怀着一定能获得拯救的信念坚持下去吧！

回到密西西比去吧！回到阿拉巴马去吧！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吧！回到乔治亚去吧！回到路易斯安纳去吧！既然知道这种境况能够而且必定改变，那么就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陋巷和贫民窟去吧！我们决不能在绝望的深渊中纵乐。

今天，我对大家说，我的朋友们，纵使我们将面临着今天与明天的种种艰难困苦，我仍然有个梦想，这是一个深深植根于美国之梦的梦想。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个民族将会奋起反抗，并且一直坚持实现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平等是不言自明的真理”。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甚至现在仍为不平等的高温所炙烤着的密西西比，也能变为自由与平等的绿洲。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我的四个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性来判断他们的价值的国度里。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就在邪恶的种族主义者仍然对黑人活动横加干涉的阿拉巴马州，就在其统治者拒不取消种族歧视政策的阿拉巴马州，黑人儿童将能够与白人儿童如兄弟姐妹一般携起手来。

我梦想着，有那么一天，沟壑填满，山岭削平，崎岖地带铲为平川，坎坷地段夷为平地，上帝的灵光大放光彩，芸芸众生共睹光华！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返回南方时所怀的信念！怀着这个信念，我们就能从绝望的群山中辟出一颗希望的宝石。怀着这个信念，我们就能变我们祖国的嘈杂喧嚣为一曲优美和谐的兄弟交响乐。怀着这个信念，我们就能共同工作，共同祈祷，共同斗争，甚至哪怕共同入狱。既然知道有朝一日我们终将获得自由，我们就能为争取自由共同坚持下去！……

【中国】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演说大家。本篇是孙中山非常著名的一篇演说，从内容到艺术技巧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听众无不为其演讲所深深吸引，时时被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打断。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

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窃恐无以付诸君欢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数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兄弟由西到东，中国至米国（美国）圣路易斯观博览会，此会为新球开辟以来的一大会。后又由米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今日试就我游历过各国的情形，与诸君言之。

日本与中国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输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从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国人则反抱其素养的实力，以赴媚异种，故中国的文明遂至落于日本之后。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输入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后来又有种种的文明由西洋输入。是中国文明的开化虽先于日本，究竟无大裨益于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东至米国，见米国之人物皆新。论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伦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去年圣路易斯的博览会为世界最盛之会，盖自法人手中将圣路易斯买来之后，特以此会为纪念。米国从前乃一片洪荒之土，于今四十余州的盛况，皆非中国所能及。兄弟又由米至英、至法、至德，见各洲从前极文明者，如罗马、埃及、希腊、雅典等皆败，极野蛮者如条顿民族等皆兴。中国的文明已有数千年，西人不过数百年，中国人又不能由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殊不知不然。不过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物皆无用，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盖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我们中国若能渐渐发明，则一切旧物又何难均变为新物？如英国伦敦，先无电车而用马车，百年后方用自行车而仍不用电车。日本去年尚无电车，至今而始盛。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若如现在的一切思想议论，其进步又何可思议！又皆说中国为幼稚时代，殊不知不然。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之？米

国无此好基础。虽西欧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们试与诸君就各国与中国比较而言之：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八千万，于今米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

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

德、法、意诸国虽称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

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

则是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而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

所以西人知中国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于是占旅顺、占大连、占九龙等处，谓中国人怕他。殊不知我们自己能立志恢复，他还是要怕我的。即现在中国与米国禁约的风潮起，不独米国人心惶恐，欧西各国亦莫不震惊。此不过我国民小举动耳，各国则震动若是，倘有什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即如日本，当维新时代，志士很少，国民尚未大醒，他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国家弄到为全球六大强国之一。若是我们人人担当国家义务，将中国强起来，虽地球上六个强国，我们比他还要大一倍。所以我们万不可存一点退志。日本维新须经营三十余年，我们中国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盖日本维新的时候，各国的文物，他们国人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中国此时，人家的好处人人皆知道，我们可以择而用之，他们不过是天然的进步，我们这方才是人力的进步。

又有说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们不过见中国此时器物皆旧，盖此等功夫，如欧洲著名各大家用数十余年之功发明一机器，而后世学者不过学数年即能造作，不能谓其躐等也。

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所以君主立宪之用不合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又有说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到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来米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二百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做不如其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

吗？！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

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知此，大家已承担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份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程度高。听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

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

又有人说，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格？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到中国来取法的。如美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先皆由英国取法去的，于今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倘是仍旧不变，于今能享这地球上最优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盖这一变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中国】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改良主义政治家、启蒙宣传家，也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学术演说家。《少年中国说》这篇演讲把古老的中国和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对比，号召人们要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演讲饱含爱国激情，对处于内外交困情况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感染力，成为风靡一时，脍炙人口的著名演讲词。

少年中国说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滞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候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刺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头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

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晰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人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人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

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界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棒、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调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这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大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近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棂，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宰鞭身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人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渐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中国】秋瑾（1875～1907）

秋瑾，近代民主革命者。1907年组织起义失败，被清廷所杀，年仅32岁。《敬告中国二万万同胞》是一篇中国妇女的解放宣言。

敬告中国二万万同胞

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答应了。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要是说一二句抱怨的话，或是劝了男人几句，反了腔，就打骂俱下；别人听见还要说：“不贤惠，不晓得妇道呢！”诸位听众，这不是有冤无处诉么？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人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人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能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 一样看待，不公不平，直到这步田地呢？

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他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借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么？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作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作他的奴隶了。既作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这些事情，提起来，我尚觉着难过。诸位想想总是个中人，亦不必用我细说。

但是从此以后，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下，把以后事情，尽力作去，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老的呢，不要说“老而无用”，遇见丈夫好的要开学堂，不要阻他；儿子好的，要出洋留学，不要阻他。中年作媳妇的，总不要拖着丈夫的腿，使他气短志颓，功不成、名不

就；生了儿子，就要送他进学堂，女儿也是如此，千万不要替他缠足。幼年姑娘的呢，若能够进学堂更好；就不进学堂，在家里也要常看书、习字。有钱作官的呢，就要劝丈夫开学堂、兴工厂，作那些与百姓有益的事情。无钱的呢，就要帮助丈夫苦作，不要偷懒吃闲饭。这就是我的望头了，诸位晓得国是要亡的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诸位！诸位！须不可以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呢！

【中国】鲁迅（1881～1936）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无声的中国》这篇演讲表面上是讲文字、文学革新，实质是对一个泱泱大国，悠悠历史的民族却无声于世界的悲叹，同时愤怒抨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与封建文化对人们的束缚。

无声的中国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民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Z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借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主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众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要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样，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学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人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他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

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好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他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中国】冯玉祥（1882～1988）

冯玉祥，著名爱国将领。固遭到蒋介石的排挤，1946年以考察水利为名，被迫去美国。在美国，他到处讲演，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1948年回国途中不幸遇难。这是他1948年10月10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华侨和美国各界人士五百多人的大会上发表的《国庆演词》，向美国人民宣传援蒋打内战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

国庆演词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们能来纪念中华民国37岁的生日，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满清，我们才能成为民国。什么叫民国，就是真正民主国家，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了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

在说别的话之前，我先回答两个问题。有人说：“冯玉祥是政府派出来的，为什么批评南京政府贪污无能，压迫人民打内战？”你们想想，如果我说南京政府非常清廉，没有杀学生，没有捕学生，没有征兵征粮，没有抢米的风潮，……你们看可会有人相信？大家会指着冯玉祥骂，说我不讲良心话。

又有人说：“你和蒋先生是好朋友，做国府委员和常务委员就是二十年。有话为什么不当面说？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大家不知道，我不是不说，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但说了，而且每次说了之后，还加上一封信。我出版一本《蒋冯书简》，看了就知道我一切的话都说完了。说了人家不听，如今我不能不向全国同胞说话，向世界人民说话。你们看训政训了二十年，实在不是国民党训政，而是一个人和少数几个人的训政。

今天在纽约能和这么多中国的青年主人翁们见面，是冯玉祥到美国后第一次最快乐的事。这原因还不仅因为我们今天能在一起，共同来庆祝我们中华民国37岁的生日，更因为诸位是主张中国民主的进步青年。在中文和英文报上，我都看见了，今天这个盛会的发起人，中国留美基督教学生会今年在美东、美西和美中都召集了夏令会，各处参加的同学有百来位，都曾以绝对大多数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主张实现中国民主，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勇敢地提出主张来，真是合于耶稣基督勇敢牺牲的精神。中国史书上说：“禹闻善言则拜”。冯玉祥不敢比大禹，可是愿意学习大禹的精神，今天冯玉祥听见民主则拜。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托，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行政的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本大总统这次是来做你们的奴隶的，就是其余文武百官也都是你们的奴隶。前从帝国时代，四万万人都都是奴隶；现在民国时代，大家都是主人翁，这就是民国和帝国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演讲词）可惜孙先生二十年以前说的“大变动”，到今天还是未能实现。少数丧心病狂的特权者，忘记他们是公仆，应为人民服务，他们要四万万同胞做奴隶。可是全中国人民却都要起来做主人翁，要人民自己来“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诸位青年主人翁知道自己做主人翁的责任，响亮地高呼民主，这真是很值得钦佩的。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国际地位是世界上

四大列强之一。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结果，中华民国过去三十六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危险过，老百姓的生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现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反而不如一个战败的日本。一切和平和赔款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反而被逼迫和日本通商，又作日本经济侵略的牺牲品。通货膨胀绝对空前，物价比战前高涨了四万多倍，财政八个月就亏空三十万亿元，在全世界数第一位。贪污不法的事情，最著名的像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罕中公司、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外国报纸早把舞弊的情形，登载得清清楚楚，到今天没有听见严厉惩办。今年夏初，南京学生肚子饿了，抬着纸制的大饭碗游行，被军警残暴地打一顿。武汉大学的学生们睡梦中胡里胡涂被打死了三个。各大都市的学生，很多都遭到特务的摧残。教授们吃不饱没有人管，说两句公道话便被解聘。公务员槽腹从公，好的公务员，像北平的余心清少将等，是好的基督教徒，是好的美国留学生，在重庆是最廉洁的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只因为说真话，主张和平，便被特务逮捕了。工矿企业家想作一点正当企业，不是关门，就是奄奄一息。工人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最苦的当然还是农民，壮丁拉去当炮灰了，粮食拿去当军粮了，苛捐杂税一齐加在农民身上，人为的水旱虫灾，吞噬了二千二百万的农民。

一句话说，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特权者没有一个人能过好生活，除了英勇地起来革命，便没有出路，这些大都要打破这痛苦的现状，都主张成立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和它必然实现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大规模剿共已剿了一年零三个月，今天成绩如何，大家天天读报，知道得很清楚。东北国军形势危殆，共军到长江北岸，连南京城门也关闭了。冯玉祥 20 岁当兵，1946 年退役，做了五十五年的丘八，看不出捆绑来的壮丁能打胜仗，看不出违背人民利益的军队，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没有倒台以前，以为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总可以长期挣扎，然而孙中山先生 1924 年改组国民党以后，团结全国各革命的力量，不到四年工夫，便扫荡了军阀，完成了北伐。现在中国人民的力量，从国民党民主派到共产党，经过了八年抗战的锻炼，经过了胜利后民主奋斗的两年努力，已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了。中国今天的形势，又好像在 1927 年北伐大革命成功的前夜，只要把各党派各阶层一切民主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向贪污无能和反动的旧势力进攻，精诚团结，坚强组织，我们便是不能摧毁的革命力量，我们便可以促进民主胜利的更早到来。

今天在海外的同学们虽然非常困难，非常艰苦，虽然你们得不到随便卖给扬子、孚中公司的外汇，虽然你们之中的很多位，只买了半年用费的美金，半年之后的生活费和回国川资都无着落，但是另一方面，你们要认清，民主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民主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你们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在美国睡洗衣馆熨衣板的精神，要有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不畏惧的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团结起来为真正的联合政府而奋斗，让中华民国名符其实，让全中国都成为你们贡献研究心得的自由园地。这样，才不辜负我们今天来纪念双十节一场。

我们今天纪念先烈，要对得起流芳万古的秋瑾女士、黄花岗烈士、滦州起义的烈士和所有的烈士们，必须自己勉励自己，有“舜人也我亦人也”的精神，去努力，去奋斗。最后一句话，你们的决议案好极了，可是我还有一

个建议请求你们尽量宣传，每一个人抱定一个志愿，写一千封信到国内去，把国内的同胞都唤醒过来，做孙中山所说的“唤起民众”，那我们民主胜利的成功就更快了。

【中国】李大钊（1889～1927）

李大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7 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英勇就义。李大钊是杰出的演说家，他的演说措辞尖锐、观点鲜明，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彩。这篇演讲借庆祝欧战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一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演讲。

庶民的胜利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耳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方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线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占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极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

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害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19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和平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做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情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呵！

【中国】郭沫若（1892～1978）

中国著名的文学大师，诗人，戏剧家，历史、考古和古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成为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科学的春天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是上一个世纪出生的人，能参加这样的盛会，百感交集，思绪万千。

在旧社会，多少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向往着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科学文化繁荣。但是，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哪里有科学的地位，又哪里有科学家的出路！科学和科学家，在旧社会所受到的，只不过是摧残和凌辱。封建王朝摧残它，北洋军阀摧残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它。我们这些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喊出过发展科学的口号，结果也不过是一场空。大批仁人志士，满腔悲愤、万种辛酸，想有所为而不能为，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少人就是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岁月中，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地度过了大半生。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科学得到了解放。毛主席和周总理又亲自为我国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国的科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回忆起这些情景，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都涌上心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万分感激和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呢！万恶的“四人帮”对科学工作百般摧残，对科学工作者横加迫害，妄图重新把我们的祖国拉回到愚昧、落后、黑暗的旧社会去。但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党中央一举扫除了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使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现在，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说，反动派摧残科学事业的那种情景，确实地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看到今天这种喜人的情景，真是无比感慨和兴奋。“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敬爱的叶副主席的光辉诗篇，完全表达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情。

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恩格斯在谈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更加需要大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巨人。我们不仅需要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

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

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我祝愿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在新的长征中为我国科学事业建立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

我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革命加拼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

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一定会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我祝愿全国的青少年从小立志献身于雄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培育革命理想，切实学好现代科学技术，以勤奋学习为光荣，以不求上进为可耻。你们是初升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革命加科学将使你们如虎添翼，把老一代革命家和科学家点燃的火炬接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的这个发言，与其说是一个老科学工作者的心声，无宁说是对一部巨著的期望。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中国】毛泽东（1893～1976）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是一位纯熟地运用民族语言的大师，他的演讲深入浅出，比喻形象贴切，巧用古语、俗语和成语，语言生动精美。《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青年运动的方向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么，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最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

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他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卅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

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

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这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于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

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受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做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两个中国之命运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么，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这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能够实现。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 121 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 9550 万人口，91 万军队，220 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能够实现的。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

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中国】宋庆龄（1893～1981）

宋庆龄，女，广东文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国家名誉主席。这是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各界反战大会上的演讲。

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

同志们和朋友们：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了明显的理由不得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

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国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对劳苦大众及其领导者施用了最残酷的压迫、酷刑和残杀，文化与生产的进步停滞。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

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

历史很明显地指示我们：战争的破坏性必然一次比一次厉害，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必然一次比一次惨重，战争中间相隔的时间必然一次比一次缩短。但同时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1914年～1918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且使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

我很想在这里说明我自己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的态度。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

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民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

现在，帝国主义者为了克服那分裂它们日益尖锐化的矛盾，正竭力企图以重新分割中国和发动反苏的干涉战争来取得暂时的妥协。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远在日本夺取台湾以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控制了中国的一切战略要地，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支配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利用中国的军阀和其他反动分子作他们的爪牙，来达到各帝国主义不同的目标。

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1925—1927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也正是这种政策，鼓励并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窥伺川西边界。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法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云南。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财政和政治霸权，帮助了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更进一步实施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恶毒计谋。目前还看不到侵略的终结。这还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继续不断的卖国行为的帮助下，从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的开始而已。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更惨重的奴役。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将来一定还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来从事彼此间的相互厮杀。战争将继续不断地发生，而在这些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将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今天，中国东北的人民已经在替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了；将来，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助之下，将被迫给各帝国主义者充当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东北建造成将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它并且在企图扩大它的根据地，想先控制黄河以北的土地，然后加以占领，再进一步侵略内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征服全中国。至于英帝国主义，它和美国有尖锐的矛盾，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冲突也在增加，对印度革命怀着畏惧，并对苏联怀抱仇恨；它正在拼命设法组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反苏集团，以图延缓帝国主义强盗间不可避免战争。

这是目前局势的真相。希望从任何帝国主义者或国际联盟那里取得帮助是犯了叛国之罪。希望从国民党的政策中获得生路，简直是愚蠢。国民党今天正在更有意识地、填密地计划着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作全部的、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和希望，那就是，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

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亿万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进行这个斗争了。

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

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

只有这些斗争，才能把中国从连年战争的无穷苦难与长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暴行为之中解救出来。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支持者问我们：“你们既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白色恐怖，那么为什么不反对革命中使用武力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

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干涉苏维埃中国或是干涉苏联的战争、对民众的压迫和恐怖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动的目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可以明了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危机中我们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帮助我们来解除中国人民在目前和将来的斗争中的武装。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反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击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武力的斗争，这种历史的先例指示了中国人民的出路。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装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很明显的，东北英勇的义勇军长期间的抗日斗争现在还在继续，假如不是惨遭反动政权罪恶地加以破坏，早就达到更高的程度了。

除却蒋介石政府方面的破坏，还有另一个因素阻挠这运动的进展。抗日义勇军的领袖们畏惧群众，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只武装了以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阶级观点看来认为“稳健”的分子。东北的工人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对这些义勇军的领袖如马占山、李杜之流，同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可能迅速成功了。

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

帝国主义者。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军事协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附加的条件是武装人民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提议指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认真态度。这些呼吁虽然获得了群众和兵士的同情，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响应。这表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要不是亲帝的、国民党的工具，便是没有进行真正斗争的勇气。

总而言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像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最后，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 5000 万美元中 1600 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意、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受到帝国主义各色各样物质的与精神的帮助。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于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中国】刘少奇（1898～1969）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发表了《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这篇讲演。

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各位代表先生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两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次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但在过去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百般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没有能够在组织上最后地形成起来，或者初步地形成起来又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然而，在今天，由于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业已基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以及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增高，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得以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就是表示这新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已经在组织上的最后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十分巩固，团结的规模十分广大，在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虽然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种团结，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碍与破坏中国人民的这种革命大团结。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奋斗。在今后，它也一定要继续为这种大团结而奋斗。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以至全国人民，对今天开幕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在今天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是有它的坚固的政治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即将由政协筹备会提交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它是如此的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这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共同纲领，经过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中国共产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在这样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及政治协商会议，在世界上将是无敌的。

中国共产党要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是因为这个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这个最低纲领，既已全部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为实现它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乃是当然的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除开自己的最低纲领之外，还有它的最高纲领，而这个最高纲领，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所没有包括进去的。在协商过程中，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毫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因为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不使中国走到社会主义去，就要使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能允许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所有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我们知道，不独是今天实现新民主主义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就是到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样地需要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中国】周恩来（1898～1976）

周恩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他的演讲气魄宏伟，思维敏捷，口才雄辩，具有一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1955年4月，他在万隆会议上的精彩演说，赢得了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赏和支持，包括在会议上曾发表过攻击中国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1972年2月，中美两国在隔绝几十年后，美国总统首次访华，周恩来在欢迎宴会上所作《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的演讲，以政治家和外交家的风度和气派，赢得了各国首脑的一致好评。

在万隆亚非会议上的演说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听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

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 700 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达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 1000 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 4000 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区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16 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们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 1955 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国】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著名学者，诗人，民主战士。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参加了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的爱国志士李公朴追悼大会。当大会遭到特务破坏时，他“拍案而起”。即席发表了这一著名讲演。

最后一次的讲演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讲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发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尽的，要是这样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取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反动派故意挑拨美苏的矛盾，想利用这矛盾来打内战。任你们怎么样挑拨，怎么样离间，美苏不一定打呀！现在四外长会议已经圆满闭幕了。这不是说美苏间已没有矛盾，但是可以让步，可以妥协，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

的重开！我们有这个信心！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这不用说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